房龙书系

宽容

[美] 房龙 著　刘梅 译

人类的解放



一部描写人类思想发展史
畅销近百年的通俗历史读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房龙文集

宽容

[美]房龙　著　刘梅　译

人类的解放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宽容 /（美）房龙（Van Loon, H.W.）著；刘梅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11（2017.3重印）

ISBN 978-7-5057-3250-6

I．①宽…　II．①房…②刘…　III．①思想史 - 世界　IV．①B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46958号

书名　宽容

著者　［美］房龙

译者　刘梅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80×1230毫米　32开

11.5印张　248千字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3月第3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250-6

定价　29.8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蒙昧的暴虐
第二章　希腊人
第三章　约束的开始
第四章　上帝之光
第五章　禁锢
第六章　生活的纯洁
第七章　宗教法庭
第八章　艰难求知的人
第九章　书籍的灾难
第十章　关于这本一般历史书籍的写作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第十二章　基督教改革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第十四章　拉伯雷
第十五章　旧时代的新招牌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徒
第十七章　索奇尼一家
第十八章　蒙田
第十九章　阿明尼乌
第二十章　布鲁诺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第二十二章　新的乐园
第二十三章　太阳国王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专制
第二十八章　莱辛
第二十九章　汤姆·佩恩
第三十章　最后的百年
后记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世界

序言

很久以前，人们在静谧原始的山林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四面八方绵延着亘古的山脉。

载满智慧和知识的泉水汩汩地流淌在荒芜的河沟里。

它的源头在很久以前的荒山上。

它要到达的是遥远的未知世界。

尽管这只是一条涓涓细流，没有波澜壮阔的景象，但是，对于那些愚昧无知，没有多大上进心的村民来说，已经足够了。

夜晚来临，牲畜们吃饱喝足安静地睡去了，家门口的水桶也装满了水，村民们便心满意足地卸下一身重担，开始享受天伦之乐了。

那些一整个白天都在阴凉中对着神书冥想的顽固的老年人这个时候也开始出现在夜色里。

他们啰啰唆唆地向孩子们说着奇怪的话语，孩子们一门心思只想着玩耍嬉戏以及那些美丽的小石头。

老人们口中叨念出来的语言含混不清，但它出自一千多年前一个古老神秘的部落，因而，散发着神圣的光辉，不可侵犯。

愚昧落后的山谷居民对古老的东西无比的崇敬。

假如有人胆敢怀疑祖先们的智慧，任何正直的人都会与他绝交。

大家深知这个道理，所以都相安无事。

哪里有人类，哪里就有恐惧的存在。要是有谁没有得到果园里应该得到的果实分量，又如何呢？

夜深人静的时候，人们集聚在村子里狭长的小巷子里，轻声细语地讲述着已经模糊的古老故事，他们总是提起那些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们。

那些人离开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还有一些人，企图登上那座将太阳遮挡住的高大石墙。

结果，人们只看到他们在石墙下面的一堆堆白骨。

时光飞逝，过了一年又一年。

人们在静谧落后的山谷里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周围的世界漆黑一片，有一个人影在黑暗中晃动。

他已经遍体鳞伤，手指甲磨破了，缠着破布的双脚血肉模糊。

他踉踉跄跄地来到一间破屋子前面，敲开了门。

接下来他不省人事，人们把他抬上吊床，微弱的烛光映照着他虚弱的面庞。

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回来的消息立刻在全村炸开了。

围在他身边的邻居们摇头叹息，他们早就知道了这样的结果。

那些大着胆子走出山谷的人，最后注定要带着失败和伤痕回来。

村子的另一端，思想老旧的老人们一边咒骂着，一边摇头叹息。

并不是他们太过残忍和铁石心肠，不过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违背了老人们的意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当他的身体痊愈的时候就是他接受惩罚的时候。

守旧老人们原本想对他宽恕一些的。

因为他们的脑海里还闪现着母亲闪亮的双眼，父亲在三十年前迷失沙漠的悲剧也历历在目。

可是，法律不容情。

作为它的执行者，长老们不能违背法律。

那个出走的游客被守旧老人抬到了热闹的集市，大家恭恭敬敬地围在他身边，一切安静得出奇。

遭受着饥渴的折磨，那个人身体十分虚弱。

老人们命令他坐下。

他拒绝了。

老人们命令他闭上嘴巴。

可是他不为所动，他背向老人们，一边寻找着前不久还支持他的人，一边哀求：“请听我说，我到了山的那一边，在那里踩到了新鲜的土地，看见了很多其他民族，有许多奇妙美丽的景象是这里看不到的，请大家欢乐的听我讲吧！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父亲的花园就是我的整个世界。

“当这个世界开始诞生的时候，花园的东西南北各个疆界就已经确定了。

“可是，却没有人能够明确地告诉我在疆界的那个地方有些什么东西，大家都只是不停地摇头叹息。不过，我一定要知道，于是，我被他们带到了这块岩石上，我看到了那些因为忽视上帝的存在的人的下场。

“我喊道：这一切都是骗局，勇敢的人一定会博得上帝的欢心的。这个时候，守旧的老人们走了过来，对我读起了圣书。他们告诉我，世间万物的命运都是由上帝决定的。这个山谷是我们的，应该由我们来管理，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以及果实和鱼虾都是我们的，用我们的意愿来控制他们。可是，山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刨根问底地去探究山那边的事情，直到世界终结，我们都应该保持缄默。

“可是，这些都是谎言，我被他们骗了，你们也被他们骗了，山的那边同样有牧场和牛羊，有血有肉的人们生活在那里，那里还有精心建设的流光溢彩的城市。

“通往幸福的道路我已经找到了，幸福就在前方，只要你们跟随我来，我会带领你们去寻找幸福，上帝同样眷顾了其他的地方。”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守旧老人们叫喊着：“这简直是一派胡言，是对神明的亵渎，这个人已经彻底的疯了，完全没有理智，要给他严肃的惩罚，他竟敢对执行了一千多年的法律进行轻蔑和嘲讽，他必须得死。”

于是，人们将无数的石块砸向他，他终于还是悲惨地死去了。

他的尸体被扔到了山崖下面，变成了教育人们乖乖听从祖先教诲的典型教材，时刻提醒人们，敢步他后尘的人将会得到跟他一样的下

场。

不久之后，持续的旱灾爆发了。小溪不再流动，牲畜都渴死了，粮食在田地里败落，这个愚昧无知的山谷哀鸿遍野。

但是，这并没有挫败守旧老人的信念。他们发出预言，马上就会好起来，圣书里面都是这样写的。

反正，如此苍老的他们只需很少的粮食就可以存活了。

冬天来临了。

村庄变得冷冷清清，一片萧条。

有将近一半的人被饥饿和严寒夺走了生命。活着的人唯一的希望就是山脉的那一边。

可是，法律却斩钉截铁地阻止了他们。

不过，如此绝望的生活已经让人们豁出去了，他们一反常态，拾起了勇气。

某天夜里，动乱爆发了。

守旧老人们的反抗显得多么的苍白无力。

这些可怜的老人们被推倒在地，虽然他们嘟嘟囔囔地咒骂着孩子们的无情无义和自己命运的悲惨，但是，当看见最后一辆驶出村子的马车的时候，他们还是强行坐上了马车，跟着人们一同离开了。

就这样，人们开始了寻找陌生世界和新生活的旅程。

这个时候，离那个无辜的游行者枉死已经有很多年了，人们很难顺利地找到他寻找到的通往幸福的道路。

几千几万的人们在旅程中死去，人们踏着他们的尸骨，终于找到了第一个用石头垒砌的指路牌。

这以后，旅途中的艰难险阻终于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在密林和荒野中有一条先驱们烧出来的宽阔道路。

这条道路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崭新的世界，人们踏上这条道路一直走，就能够到达。

人们开始意识到那个死在他们手上的游行者是对的，是守旧老人错了。

他们无言以对。

“他说的才是事实，而守旧老人欺骗了我们……”

“我们把他的尸体丢下山崖，但可恶的守旧老人安然地坐在我们的车里唱着古老的歌曲。”

“我们杀害了那个救了我们的人。”人们这样议论着。

“我们非常遗憾，竟然会发生这样的事，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假如知道的话……”

之后，人们跳下马车，装好行李，安置好牲畜，开始建设自己的家园、规划土地，很长时间过去了，幸福美好的生活又回来了。

几年以后，人们为智慧老人建造了崭新的大厦，他们准备将勇敢先驱的遗体安放在里面。

人们怀着严肃的心情再次回到了那个已经荒无人烟的山谷，可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先驱的尸骨，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先驱的尸骨早已经被饥饿的野兽拖进洞穴消灭了。

人们为了纪念他，在他双脚走过的那条路的尽头放置了一块石头，并且在上面刻上了他的名字，正是这个敢于挑战黑暗和残酷的先驱给他们指引了通往新世界的方向。

石头上还写上了建造它的人心怀感激并且真心诚意地表示敬意的话语。

这样的事情，我们在过去可以看到，在现在也可以看到，不过我们希望将来不会再发生了。

第一章　蒙昧的暴虐

公元527年，弗雷维厄斯·阿尼西厄斯·查士丁尼当上了罗马帝国东半部的统治者。这个塞尔维亚农夫（他来自于乌斯库布，这里是后来历次战争中争夺激烈的铁路交点）觉得“书本知识”无用。正是由于他的命令，古代雅典哲学学派最终遭到镇压。也正是他关上了埃及唯一的一座神庙的大门，而这座庙宇自从信仰新基督教的僧人侵入尼罗河谷之后，几个世纪以来一直都香火不断。

这座神庙坐落在一个叫作菲莱的小岛上，靠近尼罗河第一大瀑布。从人类的记忆所及之时起，这里一直是朝拜爱西斯的圣地。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非洲、希腊和罗马的神在这里早已悲凉地销声匿迹了，而爱西斯女神却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拜，得以幸存，依然灵光不灭。直到公元6世纪，菲莱岛已演变成至关重要的地方，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懂得象形文字的人。为数不多的教徒继续讲述着在其他地方早已被遗忘的经文。

而现在，由于一个文盲农夫——那个被称为“皇帝陛下”的人一声令下，这座神庙和毗邻的学校被变成了国家财产，雕像和石像全部被送到君士坦丁堡的博物馆里，那里的牧师以及象形文字书法家们被打入监狱，当这些人在饥饿和寒冷中慢慢被遗忘，一个接一个死去时，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象形文字便成了失传的艺术。

这一切实在太令人感到悲伤了！

如果查士丁尼（这该死的家伙，愿上帝降罪于他）把一切做得不

那么彻底，或者是把几个懂得古象形文字的专家放进“挪亚方舟”，那么，今天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就要轻松容易得多了。虽然现在我们能够拼写和翻译出一些古怪的埃及词汇（这都是商博良天才的功劳），但是要想真正把古埃及人留给子孙后代的话中蕴含的意思搞明白，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困难。

在古代社会的各个民族中，类似这样的事情实在数不胜数。

留着奇特大胡子的巴比伦人给我们留下一大批刻满宗教文字的泥版，当他们虔诚地祷告着“有谁能够理解天国中上帝的忠告”，那时候他们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们年复一年不断祈求上帝的庇护，不遗余力地解释神法，把上帝的旨意刻在最神圣城市的大理石柱上，他们对神灵到底怀着怎样的情感呢？他们忽而宽大为怀，虚怀若谷，曾鼓励教徒和牧师们去研究天国，去探索陆地和海洋；忽而又变成惨无人道、狠毒无比的刽子手。人们只稍微疏忽了一点如今早已无人问津的宗教礼节，就会有残酷无情的惩罚降临在这些人的头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无法知道这其中的原因。

我们曾派出探险队到尼尼微，在西奈的沙地上发掘古迹，我们破译的写满楔形文字的书简排列起来有数英里长。在美索不达米亚，在埃及，我们用尽各种办法四处寻找神秘的智慧宝库的大门钥匙。就在这个时候，这也完全是偶然的机会，我们发现了宝库的后门，原来它一直敞开着，人们可以随意地进出。然而，这扇小小的方便之门并不在阿卡德，也不在孟菲斯，它隐藏在丛林的深处，而且，它几乎被异教徒寺庙的木柱遮挡得风雨不透。

我们的祖先为了寻找到易于抢掠的对象，与他们惯称的“野蛮人”开始有了接触。这种接触并不让人感到愉快，这些可怜的野蛮人因为误解了白人的用心，于是便举着长矛和弓箭迎接他们。白人来访者却用枪弹作为回敬。从那以后，平心静气便不复存在，不带偏见的思想交流也变得十分渺茫。

野蛮人总是被描绘成一群崇拜鳄鱼、枯树的肮脏、懒惰又一无是处的废物，任何灾难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罪有应得。

直到18世纪，这一情况似乎才有所变化，复古运动中，让·雅克·卢梭用满含感伤的泪眼开始观察这个世界，他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许多同时代人的心，很多人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愚昧无知的野蛮人是他们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看来（哪怕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野蛮人），野蛮人是周围环境的不幸牺牲品，也是人类社会各种美德的真正代表。只是在3000年的腐败文明中，这些美德早已丧失殆尽了。

如今，至少在特定的调查范围里，我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研究原始人，其实就像研究比较高级的家畜一样，二者并无太大区别。

一般来说，我们的辛苦付出总会有所回报。野蛮人实际上正是生活在恶劣环境中的我们自己，他们只不过还没有被上帝感化而已。通过对他们认真仔细的研究，我们开始了解到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半岛早期社会的情形。对野蛮人更加深入彻底的研究使我们得以窥见人类社会五千年以来，人们形成的许多奇特的天性，如今这些天性却被几千年来的礼仪和习惯深深地掩盖了。

这些发现并不是总能让我们感到自豪。而且，我们意识到许多环境虽然离我们很遥远，但是前人在很多方面业已取得了研究成果。这些只能使我们以新的勇气继续进行手头上的工作。如果说除此之外还会有别的什么影响的话，那就是新发现会使我们对那些落后的远方同族们稍微宽容一些。

这不是一本人类学手册。

这只是一本关于“宽容”这个主题的书。

然而宽容这一命题太宽泛。我们太容易跑题，一旦偏离主题，只

有上帝才知道，我们的思绪将在哪儿歇脚。所以，最好还是让我用半页的篇幅，给读者解释一下我所讲的“宽容”究竟是什么。

语言是人类最具有欺骗性的发明之一，任何定义都是主观而武断的。因此，后学之辈还是去请教大家所公认的权威著作吧。而权威著作也是用这些人的语言写就的。

我说的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

这本书第二十六卷第一千零五十二页这样写道：“宽容（来自于拉丁文tolerare，意思是忍受）：容许别人有行动和判断的自由，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传统观点的见解不一致的意见。”

也许还有其他定义，不过就这本书的主题而言，我很愿意接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下的这一定义。

既然我已经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观点束缚在这个明确的宗旨上，那么，还是回到野蛮人这一话题，让我来告诉你，从已有记载的最早期社会形态中我发现了什么样的宽容吧。

人们通常会觉得原始社会非常简单，原始人的语言只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咕哝声，原始人的自由只有在社会变得“复杂”以后才会消失殆尽。近五十年来，探险家、传教士和医生们对中非、北极地区和波利尼西亚的土著居民进行了调查，得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结论。原始社会其实非常复杂，原始语言的时态、变格比俄语和阿拉伯语还要多，原始人不仅是现在的奴隶，即便是在过去和未来，这一情况也不会改变。总而言之，他们是凄凉悲惨的生灵，他们的一生都处在恐惧之中，最终在战栗中死去。

我们对野蛮人的通常想象是一群红色皮肤的人悠闲自在地在大草原上漫步，寻找野牛和战利品。而我所得出的结论却似乎和这种想象

大相径庭，可是这更接近于事实。

那么，事情为什么会是这个的样子呢？

我读过许多介绍奇迹的书，但是它们都缺少一个，那就是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奇迹。人类是最缺乏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哺乳动物，他们为什么能够抵御冰雪和灼热，抵御细菌和猛兽，最终又是怎样成为世间万物的主宰者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不想现在就做出解释。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人类绝不可能单枪匹马完成这些事情。为了获得成功，人必须把自己的个性融入部落生活中去。

统治原始社会的只有一个信条，那就是生存的欲望。然而这也并非易事。因此，最终所有其他欲望都必须服从于最高的要求——生存下去。

个人的利益是无足轻重的，然而集体利益却至关重大。部落是移动的堡垒，它自成体系，依靠群体的力量为己谋利，只有排斥一切外来的异类，才能保证安全。

但是问题并不比刚才所说的简单，我的话只适合于可以看到的世界，但是在人类发展最初的阶段，看到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为了彻底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记住，原始人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根本不知道因果法则。

假如我坐在有毒的常青藤上，我会责怪自己的马虎大意，会去请医生看病，并让园丁赶快把那些有毒的东西弄走。懂得因果法则的能力告诉我：有毒的常青藤会引起皮疹，医生会给我药让我止住伤口的奇痒，除去有毒的常青藤可以避免这类痛苦的事情再发生。

然而，真正的野蛮人的反应却不是这样。他不会把皮疹和有毒的常青藤联系起来。在他生活的环境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互相交

织、无法分离的。死去的首领和邻居们的灵魂仍然是部族中看不见的成员，他们时时刻刻陪伴着活着的人，与他们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同看守大门。活着的人必须要做出选择，是避免与他们接近还是与他们成为朋友，否则他们马上就会遭到惩罚。因为活着的人不知道讨好灵魂的方法，于是便总是害怕鬼神们会把不幸作为报复降临在自己头上。所以，一旦发生了什么异常的事情，他们并不会找到最根本的原因，而是归结于看不见的灵魂的影响。

这样的话，如果他手臂上长了皮疹，他不会说："该死的毒藤！"而是喃喃自语："我得罪了哪位神灵，他开始来惩罚我了。"然后，他跑去找巫师，然而他并不是去讨要一剂除去藤毒的良药，而是要一张符咒，以此来消除愤怒的神灵（不是毒藤）降罚于他的符咒。至于使他感到痛苦的毒藤他却不予理睬，依然让它继续生长。如果偶尔有个白人带来一桶煤油，烧掉了这些常青藤，他还会责怪他在捣乱。

所以，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认为一切事情都是由看不见的生灵在起决定作用的结果，那么他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恪守那些能够让神灵平息怒火的律法。从野蛮人的观点来看，这些律法确实存在。祖先制定了律法，把它传递下来，这一代最神圣伟大的职责就是保持它已有的、同时也是最完美的状态，并将其传给下一代。

很显然，这在我们看来是非常荒诞无稽的，我们坚信的是进步、发展和持续不断的提高。但是，"进步"一词是近年来才被引用的一种表达方式，而低级社会比较典型的特点是：人们看不出他们现在所存在的社会还有什么改善的必要，他们认为这个状态已经完美无瑕了，因为他们从来不知道，也没见过别的世界。

……

如果上面所说的都是事实的话，那么怎样才能防止律法和已经形

成的社会状态有所变更呢？

答案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对于那些拒不把律法看作神的旨意具体体现的人应该及时惩处，直白点来说，就是实行森严的专制制度。

……

在这里，如果我说野蛮人是最不懂得宽容的，我的本意也不是在侮辱他们，所以我要赶快加上一句：在他们借以栖身的环境里，不宽容应该是必然的。如果他们一意容忍别人对他们的律法进行践踏，该部族的安危就要受到威胁，这个罪过可就大了。

但是，值得探讨的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组成的一个部落为什么能保持一种十分复杂的语言规范条例，而在今天，我们拥有成千上万的警察，数以百万的军队，却在推行和实施几项普通法律的时候仍然感到困难重重。

答案依然很简单。

野蛮人比我们聪明得多。他们靠着精明的估算，完成了用武力尚且完成不了的事情。

他发明了“禁忌”（塔布）这一概念。

也许在这里用“发明”这个词有些不妥，这类东西很少是能靠着一时灵感就能产生的。它们是日积月累的实践和经验的产物。无论如何，非洲和波利尼西亚的野蛮人想出了“禁忌”这个概念，这为他们避免了很多麻烦。

“禁忌”这个词起源于澳大利亚。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它的含义。现在的世界到处都充满禁忌，有很多事情不能做，有很多话不能说。比如说在吃饭的时候谈及刚刚做完的一次手术让人觉得倒胃口，或者说把小勺放在咖啡杯里不拿出来，等等。不过我们的这些禁忌在本质

上都没有什么特别举足轻重的意义，这只不过出于一些礼节，它并不会对我们的幸福生活造成干扰。

对于原始人来说，禁忌是非常重要的。它意味着超越于这个世界的人或物体是“神圣”的东西，人们绝不可随便谈论或者触及，否则就会马上死去，或承受永久的磨难和终生的痛苦。禁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宗教体系，它有着十分严格的命令，对于那些胆敢违抗神灵意愿的人，将会受到痛苦的惩罚。

……

究竟是教士发明了“禁忌”，还是为了维护禁忌才产生了教士，这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由于传统习俗比宗教的历史更为悠久，因此禁忌很可能在巫师和巫婆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巫师一出现，就成了禁忌最忠实的拥护者，并且他十分巧妙地盗用了这个概念，使禁忌成为史前时代的“严禁”象征。

当我们第一次听说巴比伦、埃及的名字时，这些国家还处于发展状态，禁忌在他们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的禁忌并不像我们后来在新西兰发现的那样，以极为原始的形式出现，这里的禁忌大都已转化为不体面行为的禁则，它们是约束人类行为的严肃准绳，就像我们熟知的基督教《十诫》中有六条都是“你不应该”的禁令。

毋庸置疑，在那些国家的早期历史中，宽容的概念是完全不为人所知的。我们有时候看到的宽容，其实是由于无知导致麻木和冷漠。

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国王或是教士能够有一丝诚意（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心甘情愿地允许别人行使“行动和判断的自由”或者“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观点的见解”。而现在这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理想。

……

所以，这本书对通常意义上的“古代史”并没有什么研究兴趣，即便有，也是以一种反面的形式存在，它并不研究史前的历史，或者按一般所称的“古代历史”。

争取宽容的斗争是直到个体发现以后才开始的。

有关这一现代最伟大的启示，其荣誉应当归于希腊人所有。

第二章　希腊人

有一个渺小的岩石半岛安静地躺在地中海名不见经传的角落里面，但它却在政治、文学、戏剧、雕塑、化学、物理方面为当今世界的生活在近两个世纪里面奠定了夯实而完整的基础。除此之外还有些什么，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而这些是怎么成为现实的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在很多个世纪里苦苦思索，却不得其解，哲学家们一生中都需要或多或少的时间来寻找答案，解决他们心中的这一疑惑。

与化学、物理、天文和医学方面的专家有所不同，历史学家往往是盛气凌人的，对于人们在发现“历史法则”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们总是用居心叵测、藐视的态度待之。在蝌蚪、细菌以及流星研究中有用的东西，到了人类研究领域可能就变得一无是处，无用武之地了。

可能是我错了，但我认为这种法则应该是存在的。目前为止，由于我们在探索研究方面下的功夫不够深，使得我们收获甚微，这是不争的事实。一直以来，我们太过于注重事实的积累，而没有进一步把这些素材烹煮，让它们得到升华和提炼，因此，没有能从中收获到那些弥足珍贵却微乎其微的智慧结晶，但恰恰是这些智慧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哺乳动物而言，或许有点真正的价值。

涉足新的研究领域，我内心感到惶恐、战战兢兢，下面，我借用科学家的名言来阐释历史原理：根据现代科学家得出的优秀研究成果，能够形成一个细胞所具备的物理和化学成分达到理想比例的时候，生命便孕育而生了。

用历史学的概念来理解上面的话，那就是："在尚不健全的世界里，只有所有种族、气候、经济以及政治条件达到或者接近某种理想比例的时候，带着高级气味的文明才能自动的悄然而至。"

对于这个观点，我从反面举几个例子，详细地加以论述。

头脑还处于穴居人水平的种族可能会繁荣昌盛吗？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上帝的家里也不会。如果是在爱斯基摩人的圆顶茅屋里出生，那么，我们还可能看到伦勃朗绘出的锦绣图画吗，还可能听到巴赫所谱出的受难曲吗，还可能领略伯拉克西特列斯塑出的雕像吗？恐怕只是看到一双整天盯着冰上捕海豹洞的直勾勾、傻愣愣的眼睛吧！

达尔文之所以在生物学上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是因为他曾经在兰开夏郡的工厂里干活谋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之所以能够发明电话，是因为他不是一个住在罗曼诺夫庄园的一个偏僻村子里的身不由己的奴隶。

埃及气候宜人，有着灿烂绚丽的高级文明，是人类古文明的发祥地，但居住在这样优越环境下的土著居民却没有强壮的体魄和锐意进取的上进之心，连政治和经济条件也相当糟糕。巴比伦、阿西利亚也是这样的情况。至于后来迁徙到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的闪米特族在政治、经济环境极差的情况下，却还拥有强健魁梧的体魄，加上那里气候也很好，他们都精神抖擞，精力旺盛。

农业落后的巴勒斯坦的气候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人民的个人积极性的发挥并没有得到助长和弘扬，因为在这个国家中，除了横穿国土沟通亚洲和非洲的大篷车道以外的其他地区，商业凋零萎缩，就连政治也是完全被耶路撒冷寺院的教士所操控的。

腓尼基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和经商条件，人民身材魁梧、体格健壮，但仍然逃脱不了厄运，这个国家经济严重不平衡，商业垄断现象突出，制度森严，全部的财富归小部分船主所拥有。这使得早期

泰雅和西顿的政权被大富豪牢牢把持。而被剥夺了勤劳干活权利的穷苦大众在这样的条件下逐渐变得冷漠、苍白，最后，腓尼基不得不踏入迦太基所走的道路，因自私贪婪和鼠目寸光而化为废墟。

总体而言，成功的必要因素在各个早期文明的中心总是有所欠缺的。

完美平衡的奇迹出现在公元5世纪的希腊，可惜，只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并且这束曙光只是出现在希腊爱琴海彼岸的殖民地，并没有发生在本土上。

在我的另一本书里面，我详细描述了沟通了亚洲大陆与欧洲大陆的著名岛屿桥梁，埃及、巴比伦和克里特商人在还没有文字记录的年代里就踏着这些“桥梁”来到欧洲。随着他们的步伐，亚洲绚烂的文化精髓和商业文明在欧洲大陆上开花结果，小亚细亚狭长的土地上留下了他们不朽的足迹，这个地方用以沃尼亚来命名。

这段历史发生在特洛伊战争前几百年，当这块九十英里长、数英里宽的疆域被希腊大陆某些部落的铁蹄所征服的时候，诸如著名的有以弗所、福赛、艾丽斯莱和米莱图斯等殖民城市在这块土地上先后冒出来。各种成功的条件以完美的比例环绕在这些城市的周围，在这种光辉的笼罩下，文明以最快的速度滋长，不断挑战着新的高度，触及巅峰状态，为后世的文明发展树立了无法超越的丰碑，以后的文明历程中顶多只出现过与之平等的现象而已。

首先，殖民城市集聚了十多个民族的集体智慧，有最有胆识、最为活跃的人才。其次，新旧世界之间、欧亚大陆之间互通贸易得来的财富都在这里累积。还有，生活在这里的自由之身的人们，得到殖民主义利益政府的眷顾，其个人才能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和拓展。

而对于以商业为主命脉的国家而言，气候并无大碍。在这些国家，船只可以通过建造获得，货物可以卸舱，只有气候恶劣到使港口

结冰，城镇被水淹没的地步，居民们大概才会关注天气预报吧，这就是我不提及气候的原因。

对于知识阶层而言，以沃尼亚的天气对他们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在尚未出现书籍和图书馆，知识靠人们口口相传的时候，最早的社会活动中心以及最古老的大学所在地就是城镇的水泵周围。

他们当中有记载的第一个人不仅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真正创立者，并且也是一个背景值得怀疑的人物。当然，对于这个人物扑朔迷离的背景并不是说他是因为抢银行或者杀死家人而戴罪潜逃到米莱图斯来的。他的祖先是谁？比奥夏人？腓尼基人？（借用学富五车的人类学专家的行话来说）游牧人抑或闪米特人？无人知晓！

由此，麦安德尔山口的这个区区古城在当时作为显赫的世界中心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由于他的人民来自于四面八方（跟当今的纽约一样），所以人们往往只凭表面现象来审视自己的邻居，对于他的家庭却不作过多关注。

我想不必为阐释泰勒斯的思想而过多的占用书本篇幅，毕竟这不是一本数学史和哲学手册。但对于他在新思想上采取的宽容理解态度倒是有必要提及一下的。当罗马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商镇坐落在远方一条鲜为人知的泥泞小河旁的时候，当犹太人还是在阿西利亚人的胯下受辱，卑躬屈膝的当俘虏的时候，当欧洲北部和西部还是鬼哭狼嚎的荒原的时候，这种风气就已经在以沃尼亚盛行了。

要把这种发展做一个透彻的分析，找出原因，就得了解希腊所发生的变化，而这种变化至少应该追溯到希腊首领渡过爱琴海、对特洛伊城堡的财富进行掠夺的那一个时期。当时的那些辉煌耀眼的英雄们只不过是最初级文明的产物，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劲爆的搏斗和厮杀，上帝把他们制造成四肢过于发达的孩子，在他们的世界里，刺激、角斗、赛跑等如此种种的竞技成为主宰生命的长跑，而现在的我

们为了获得面包、香蕉，不得不一头扎进日常琐碎的工作中去，至于那些远去的活动，实在已经是无暇顾及了。

那些血气方刚的侠士们对待他们信仰的上帝犹如对待日常生活中所有的严肃问题一样，态度质朴、坦荡、忠诚。公元前10世纪主宰希腊人命运的奥林匹斯山诸神在外貌体形上同地球上的人类一样，都具有实实在在的形象。至于地球人和天神们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怎样的方式划分开来，大概没有人解释得清楚，这个谜团将一直沉睡。但远在九霄的上帝一直将他的恩泽和深厚情谊洒向地面上渺小卑微的臣民们，就是这个亲切人性的特色，使得希腊的宗教笼罩着独特的光彩。

有一定文化素养，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都知道，那个蓄着长胡子的宙斯是宇宙中强大的统治者，当他粗暴怒吼、天地间电闪雷鸣时，就像世界末日就要到了一样。孩子们还在摇篮里嗷嗷待哺的时候，就被灌输以神灵的故事，当他们长大能够自己解读古老传说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思索这些强大可怕的神灵背后隐藏的缺点和不足。这个时候的神灵在他们眼中只是化装人物而已，他们在温馨的家庭晚会的灯光下戴着面具，彼此制造恶作剧，并乐此不疲，他们在渺小的凡人朋友圈子里谈论时事和政治，有各自支持和力挺的派别，他们唇枪舌剑、争吵不休。这势必使得凡间与天国有了密切的联系，所以凡间每发生一次争论，就必然会引起天国诸神之间的一场轩然大波。

但最好不要触怒至高无上、强大无比的宇宙统治者宙斯，即使他有人类的一些弱点，这是从安全角度发出的忠告。当然，宙斯也有“通情达理”的一面，我们可以通过华盛顿会议中专门进行院外游说活动的说客们来了解这个词的内涵。“通情达理”这也是事实，如果掌握得当，拿捏好分寸，是可以稍稍左右他的，他幽默的个性以及并不把他自己与他的天国看得太过重要，这是可以疏通他的最主要原因。单从这一点并不能很好的评价宙斯，但这却是非常明显而易于接受的。古希腊似乎从没有对凡人做出太过严苛的条例和教规，没有把凡

人们区分真理、谬误作严格的规定，正是由于没有现代概念的“信条”、冷严的教规以及仰仗绞刑架而扬扬自得的职业教士们的羁绊，全国的人民都可以用自己的观点和评判标准来修改他们崇尚的宗教思想和对天国的印象。

塞萨利人对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崇拜比起阿索庇人要差得多，那是因为塞萨利人住在距离奥林匹斯山很近的地方，与诸神为邻，而阿索庇人却住在很远的拉科尼亚湾小村子里。雅典人之所以对宙斯无礼，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有宙斯的女儿雅典娜的庇护。与之相比，阿卡迪亚人住在偏僻的山谷里，这里远离繁华的交通要道，他们的宗教信仰更为质朴，对于轻视宗教的态度和行为会使他们感到厌恶和恼怒。宗教是无比严肃的事情，这样一种观念在他们的脑海里根深蒂固。

福西斯人依靠人们对德尔法的朝圣来维持生计，在福西斯居民的观念里，阿波罗（这个在有利可图的圣地接受朝拜的天神）是所有天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他们认为，千里迢迢而来的人们，即使腰包里只有一两个德拉马克都应该拿去孝敬阿波罗。

犹太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标志就是他们只信仰一个上帝。犹太人之所以只信仰一个上帝，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中保持了对宗教的绝对垄断地位，是因为聚集于一个城市的犹太人日益强盛，逐渐清除了周边能与之匹敌的其他朝圣地。希腊就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雅典人和斯巴达人曾经为了争夺全希腊公认的首都城市的名誉权而展开长年内战，厮杀混战，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独立思考的精神将在个性强悍的民族面前得到广阔的发展前景。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与《圣经》风马牛不相及，前者只是普通的读本，从来不在“圣书”的范围内，但有时候却会被称为“希腊人的圣经”。由于在这两本书里可以看到英雄们惊险刺激的冒险，于是这些叱咤风云的英雄常常被人们当作希腊的祖先加以崇拜。天神们似

乎总不干正经事，反而喜欢在凡人的斗争以及其他繁杂事务中凑热闹，且各自为营，而悠闲地欣赏着在自己版图上展开的旷古厮杀，基于天神们如此种种，使得这两本书讲述了很多的宗教知识。

希腊人从未深究过荷马的著作是不是直接或间接地在米纳瓦和阿波罗的启示下才写成的。但荷马史诗在人类文学史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辉将不可磨灭，它已成为漫长的冬夜里陪伴人们的良好读物，孩子们因为它而为自己的民族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

这就是一切，这就是全部。

泰勒斯诞生的这座城市是知识和精神自由的完美结合体，世界各地纷至沓来的船只聚集在这里，空气中到处飘散着刺鼻的气味，同时，这里也是东方绸缎装点的富丽天堂，饱食终日的人们传出的欢声笑语到处飘荡，泰勒斯在这里工作、学习，直至离开凡尘。与其他人的见解相比，泰勒斯所探索出来的结果总是大相径庭，分歧严重，请记住，这是因为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程度的局限性。泰勒斯在米莱图斯人中的知名度可以跟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当中的知名度相提并论。爱因斯坦在纽约人心中的形象是留长发、叼烟斗、拉小提琴，还有他登在星期日报纸上的在火车两头之间走动的一个人的故事，这就是纽约人口中的爱因斯坦。

稍纵即逝的真理正是被这个叼烟斗、拉小提琴的怪人抓住了，六十个世纪以来形成的科学结论被推翻（最少也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但数百万计纽约人对于这件事似乎并未太过关注，只有当自己青睐的击球手因推翻万有引力而受到阻碍的时候，数学这门学问才会被懒散的他们所想起。

古代历史教科书只有用印有“米莱图斯的泰勒斯，现代科学的奠基人”字样来搪塞，想巧妙地避开这个难题。当时《米莱图斯报》上登出“本地毕业生发现了真正科学的秘密”。这样的大字标题的情景完

全可以想象得到。

我无法准确地告诉你关于泰勒斯超越前人、标新立异、开创新局面的历程是在何时、何地以及怎样完成的。但他的生活空间绝对不是知识的真空世界，他的智慧也是实实在在的，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公元前7世纪，许多新的科学领域已经被人们探索研究，学者可以随时参考大量数学、物理学以及天文学方面的资料。

巴比伦的星球观察家在天空自由探路，两块重达百万吨的花岗石经过埃及建筑师的精心计算，可以安然放置于金字塔里面墓室的顶部，通过对太阳运动的研究，尼罗河谷的数学家们能够精确地测算出旱季和雨季的时间，农民因为有了日历而使得劳动作业迈向规律化。

即使是这些找出实际问题答案的人们依然乐意将自然的力量归功于上帝意识的杰作，季节、星球以及海潮牢牢的掌控在上帝他老人家的手里，这种统治跟掌控农业部、邮电部、财政部的总统的各路议会议员如出一辙。

泰勒斯虽然对这种看法持反对态度，但却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对其加以讨论，跟当时大多数有着良好教育素养的人们一样。正如，泰勒斯如果看到被日食这种怪异的现象吓得匍匐在地的海滨水果贩子惊恐地叨念着宙斯的名字祈求庇佑的时候，他也断然不会去告诉他关于天体运行知识的真相，纵然是小学生也可以用天体知识测算出公元前585年5月25日米莱图斯城将被暂时的黑暗笼罩，那是因为发生了日食。

正当波斯人和利迪亚人在战场上相互厮杀的这个下午，这次著名的日食爆发了，人们有理由相信，由于光线问题他们停止了相互厮杀。犹如当年阿迦隆山谷战役中发生的先例一样，是不是利迪亚的诸神们的作用，才使得天国的光芒熄灭，大地黑暗的时候，胜劵能够被他们所扶持的一方所操纵？至少泰勒斯，他并不认为是这样。

所有的自然现象，在泰勒斯看来都是受制于某种永恒法则的支配，体现了永恒的意志，而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由天神掌控和支配，这就是泰勒斯的境界和造诣（他的丰功伟绩正体现于此）。他认为，那天下午在以弗所大街上即使只发生狗的撕咬，或者仅仅只是哈利奇举行一次婚礼筵席，没有别的更重大的事情，日食照样会如期而至。

泰勒斯认为万物的产生是普通法则支配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如下推断（他的推断有一定的正确性）：因为有了水，世间万物得以存在，而这个世界的方方面面都被水所包裹着，从创世纪开始便与世同在。这是泰勒斯运用科学的探索观察手段得出的具有逻辑性的结论。

然而，我们至今都没能找到有关泰勒斯思想的任何亲笔文稿，这真是无比遗憾的事情。那个时候的他用文字记载自己的思想是极有可能的（希腊人已经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会了字母），而今那些人们希冀中的珍贵文稿在历史的风尘中却了无痕迹。对于他个人的认知，我们只是从与他同时代的那些书籍中搜索到的一些蛛丝马迹，这些认知自然是微薄的。早期的哲学家大多脱不了商人的角色扮演，泰勒斯也不例外，这一角色加强了他与地中海各个地方人物的接触，这是那个年代的一大特点。“智慧的恋人”这一殊荣被冠名于哲学家头上。生活的秘密孕育在万物生灵之中，这是哲学家们历来重视的事实。他们赞同这样的观点：“为智慧而寻求智慧”与“为艺术而艺术”、为食品而填饱肚子的错误是一样的，将有害无益、贻害无穷。

对他们而言，衡量世间万物的最高标准就是好、坏和中性，因为世界上人们的个性各异。于是他们在空闲的时候开始挑战高难度，按照人的真实面目去研究人这种高深的动物，并不是只凭主观臆断、先入为主的思想去考量。正因为如此，他们能够与其他人相处和谐，睦邻友好，自己对周围人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悄悄滋长开来，这比起单纯的说教、乏味的指点以及动辄用森严的清规戒律约束限制人们的

活动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他们身体力行，用自身作为榜样，向人们说明灵魂深处的幸福和安宁寄托在对自然力量的真正了解和认知上。哲学家们得以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自由地探索、深究、挖掘，甚至是深入到被认为的只有上帝的力量才能涉及的冒险领域里去，这一切自由随性的行为都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周围人对其的认同感。泰勒斯就是这个福音受益者的先驱代表，在他的研究领域里，他穷尽一生智慧和汗水，只为了他钟爱的对人们有益的事业。

泰勒斯把希腊人眼中的世界进行了分解，并细致入微地研究了每一个枝节，公然挑战长久以来形成的、被人们深深认可的事情，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人们的允许下永远静止在那张他安眠的床上。就算当时他有对自己的奇思异想做出解释和申辩的机会和权利，我们也无法对其考证了。

在泰勒斯指引的地方，无数的追随者如潮水般涌来。

三十六岁从小亚细亚来到雅典的阿那克萨哥拉就是其中一位，对天文学有颇多研究的他有着“诡辩家”的名号，曾在希腊的城市里当过私人教师。正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授课的时候已经推翻了太阳是由天神驾驭的马车这样被公认的说法，他认为太阳是一个比希腊大一千万倍的又红又烫的火球。

这一理论的提出并没有给他招致灾祸，天国的霹雳也并没有降临到这个胆大妄为的人身上，在此基础上，月球表面由山脉和山谷覆盖这样的理论也孕育而生，他的理论向着更高层次迈进了一大步。最后这一理论又上升到世间万物的起源和归宿问题，他认为有一种“种子”作为万物的起源和归宿存在于宇宙诞生之初。

由于阿那克萨哥拉谈论的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事情，至此，他已经将自己推进一个危险的领域，后来许多的科学家都有这样的经历。

太阳、月亮距离地球那么遥远，哲学家们并不关心对他们的称呼，但这个曾经的教书匠居然用一个叫作“种子”的东西来亵渎世间万物的起源和成长，这与天神的故事实在是相差太远了——天神故事里面描述的是，世间男女是由小石子变成的，洪水之后，天神恩泽，使石子变成人形，世界才有了生气和生命。这个故事即使是幼小的希腊幼童都能倒背如流，毫无疑问，对天神故事的否认就是孩子们对长辈智慧的怀疑，对烙在人们心中神圣无比的真实性的挑战，社会的安宁和谐势必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当然，阿那克萨哥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雅典父母同盟猛烈攻击的对象。

当时的雅典早已被民主制的气流所笼罩，个性和自由空前发展，城邦的统治者再也无力保护一个有异己学说的地理教师，即使目不识丁的愚蠢农民都可以迫害他。因为君主制或共和制早期的统治力量已经远去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位天文学家的得意门生正是当时深受多数人鄙视的伯里克利，这无疑使法庭的判决有了更为有利的筹码，为人们发动一场反对老独裁统治的政治运动提供了充分的理由。

一个人口最稠密的郊区行政长官奥菲特斯教士，曾经提出了一条法律，这条法律要求，“对于不相信现存宗教和对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的人，要立即治罪”。而这条法律被法庭理所当然地接受了，因此，阿那克萨哥拉锒铛入狱。最后，由于城市中的开明势力的发展，阿那克萨哥拉只缴了一小笔罚款后就出狱了。此后，他在小亚细亚安度晚年，公元前428年结束长长的一生，归至黄土，也算含笑九泉。

事实证明，科学理论的发展是任何官方都不可能压制得住的，在与科学发展的抗衡中，官方的抵制行为实在是徒劳。阿那克萨哥拉被迫离开雅典后，他的思想却在那片土地上生根发芽，世代流传，永放光芒。两个世纪以后，他的理论成为亚里士多德科学假设的基础，再往后一千年，拨开暗淡的乌云，这根接力棒传到了一位伟大的阿拉伯医学家伊本·路西德（通常称阿威罗伊）的手中，他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西班牙南部摩尔大学的学生中大力传播，同时，在理论支撑和现

实观察的双重推动下，伊本·路西德写下了很多著作，这些闪光的智慧结晶通过比利牛斯山，被及时送到巴黎和布伦大学，并译成拉丁文、法文和英文多种文字。书中的观点被西欧人和北欧人所认同和接受，如今它们在人们眼中已经像乘法口诀一样成为科学入门书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现在，再说说阿那克萨哥拉，他的受审事件过去一代人时间的时候，希腊科学家终于可以教授与民间迷信有所不同的学说了，这可以说是科学家们受到的无上恩泽。

直至公元前5世纪末年，发生了第二件受害事件。这位来自希腊北部以沃尼亚殖民地阿布戴拉村的流浪教师名叫普罗塔哥拉。普罗塔哥拉生活的地方同时也是提出“只有能够给绝大多数人提供最大幸福和最小痛苦的社会，才是有价值的”这一法则的“微笑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出生地，这一法则的提出给德谟克利特扣上了激进分子的帽子，应该在保安系统的监视之下生活，正因为如此，该地区在当时已是名声在外。

受德谟克利特思想的影响，普罗塔哥拉来到雅典，潜心钻研，几年后他向人们宣布了他的思想成果：世界万物中人才是最终衡量的尺度，天神是否存在，是很令人怀疑的，生命短暂，稍纵即逝，人们不应该把宝贵的时间花在对天神存在的研究上，全部精力应该用来经营美好愉快的生活。

这一观点问世于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战争胜败关键之际，一击即中，可谓落地有声，比起以往任何形式的文字或谈话，这个观点极大地动摇了人们的信仰。在战火和疾病的折磨中，人们确实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这个节骨眼上，普罗塔哥拉对上帝超凡能力提出质疑，无疑将自己置于无比险恶的境地。最终，他被指控为无神论者，被命令改变理论，屈服于法庭判决。可以保护他的伯里克利已经与世长辞，作为科学家的普罗塔哥拉并没有选择为维护真理和信仰而献

身，他逃走了。但他的船在驶往西西里的途中不幸触礁，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可能他已在那次事故中葬身海底了吧。

同样，并不是哲学家的戴阿哥拉斯也并未逃过惨遭雅典人狠毒迫害的厄运，作为青年作家的戴阿哥拉斯对上帝产生怨恨情绪源自于一场官司中的溃败，因为没有得到上帝的垂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苦苦思索，以至于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于是，他到处奔走呼号，诽谤希腊北部人敬仰的“神圣玄机”，亵渎人们的信仰的言行为他招来了死刑判决书。就在临刑前夕，这个可怜虫得到机会逃跑了。来到科林斯的戴阿哥拉斯没能忘记继续诅咒奥林匹斯的天神，最后致使他命休黄泉的原因是肝火过旺。

希腊人对于异己学说的偏见食古不化，无与伦比，法庭对苏格拉底的死刑判决真可谓臭名远播，这是最为典型的例子，关于这个我们有很详细的记载。

苏格拉底的例子已经成为谈论世界故步自封、雅典人心胸狭窄到后无来者这类话题必推的证据，同时也有力地证明了希腊人的顽固不化。

这位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盛行的思想自由精神做出了直接的贡献的街头演说家其实一生都很平凡，他才华横溢，但没有人喜欢他。这是今天我们经过详细的考察之后所得出的清楚结论。

苏格拉底在老百姓面前扮演着代表上帝的预言家的角色，这是为了取悦于当时相信天神存在的老百姓们。

尽管雅典人不能完全明白他所说的“精灵”（即在内心深处告诉他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的声音）是什么，但关于他对周围人们所信奉的神灵所持的否定态度还是有所领悟的，并且他对传统习俗也不屑一顾。最后，这位老人被当政者杀死了，而他的神学观点（都是官方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而做的欲加之罪）与法庭审判的结果并无任何相关之

处。

现在有必要来了解一下苏格拉底这个人物的平生。他的父亲只是一名贫苦的石匠，收入甚微，况且有很多孩子要养活，在这样的家庭里成长的苏格拉底是没有机会接受正规大学教育的。那个时候的哲学家们似乎并没有无私奉献、教书育人的高尚情操，也没有这个时候的诸如义务教育之类的制度，要拜师一名哲学家，至少要付得起两千块钱的学费。并且，那些纯真理的东西对于苏格拉底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与其浪费宝贵的时间，花大量的心思去钻研没有用的科学现象，还不如好好的培养自己的信念，即使不懂几何学的知识也不要紧，拯救灵魂比了解彗星、行星这些自然现象更为重要。

苏格拉底白天游荡在大街小巷，与无业游民唇枪舌剑、争执不休，晚上在妻子的唠叨、喋喋不休中做一只温顺的羊羔（他的一大家子都是靠妻子给别人洗衣服来养活，而本应该挑起家庭重担的丈夫却毫不看中谋生手段）。这个有着一副塌鼻梁、衣冠不整的小个子先生，曾经多次在战争和远征中一试身手，他不仅是受人尊重的老兵，而且还当过雅典参议员，在庞大的教师队伍里，他很荣幸的拜倒在自己信仰的光辉旗帜下，抛头颅、洒热血。

在苏格拉底先生为人类的知识和进步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的时候，雅典究竟处于怎样的政治框架下呢？这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只有这样整个事情的完整性就显露了。

苏格拉底用毕生（他被执行死刑的时候已经有七十多岁）的经历和时间告诉人们，他们碌碌无为的生活，亵渎了生活的真谛，将岁岁年华毫无价值的浪费在需求渺茫的享乐和争强好胜上，为满足自己膨胀的野心、虚荣心和各种龌龊的欲望而将上帝所赐予的各种恩惠白白浪费掉。因为苏格拉底完全相信人的命运的崇高，他因此可以走得比普罗塔哥拉更远些，敢于打破旧哲学的禁锢，义无反顾地踏入禁区，追求心中真理。当普罗塔哥拉发出“人是衡量世间万物的尺度”的呼声

的时候，我们的苏格拉底先生则以更高的姿态表明：“人的无形意识是（或者应该是）世间万物的最后尺度；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寄希望于上帝。”

关于他在法官面前（确切地说，是苏格拉底的政敌为他精心挑选了五百多名法官，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有点小学问）的那篇演讲，确实最大限度地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不管他们对这位小个子先生同情与否，这些通俗易懂的道理都直接沁入到人们的心坎里去了吧。

这位哲学家大无畏的发出“世界上谁也无权命令别人信仰什么，或剥夺别人随心所欲思考的权力”的呼喊。他坚信“人只要具有自己的道德和信念，即使没有朋友的赞同，没有金钱、妻室和家庭，也会成功。但是如果不彻底研究问题的来龙去脉，任何人都休想得出正确结论，因此必须拥有讨论所有问题的充分自由，必须完全不受官方的干涉”。

是不是天妒英才呢？苏格拉底的厄运并没有因这段不合时宜的论断而停止。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之后，雅典富人与穷人，主人与仆人这两个阶层的关系真可谓箭悬一线，苏格拉底试图寻求一个方案让双方偃旗息鼓，像这样一个可以看清双方利弊的“温和分子”没有更坚定的支持任何一方，自然也就引起双方的反感。

公元前403年，当王国完全控制在民主派手里的时候，双方再也没有可能势均力敌的时候，终于又一只空闲的手要来提苏格拉底的衣领了，我们的哲学家的生命到头了。

这个消息最先由他的朋友知道，朋友劝他选择明智的路走，离开这座危险的城市。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物，“口头评论家”的招牌一直陪伴了他大半个世纪，打着“聪明的大忙人”的幌子，热衷于将自以为是雅典社会精英们的得意之作从黑暗中搬运到阳光底下晒太阳，久而

久之这成了他无比热爱的事业。他的名字就这样在人们的家里、嘴里来回穿梭，以至于他在上午谈论的趣事，在下午便飞遍全城。他的人生被编成了喜剧，入狱后，他毕生大小琐事在整个希腊人们的掌控之中。

苏格拉底的最终命运给那些主审判官们（比如那个粮贩子，目不识丁却十分通晓上帝旨意，他在起诉中成为最卖力的人）注入了新的沾沾自喜的资本，他们以为他们是在做一件对人们、对社会极其有利的事情，为城市清除了一个知识界中的炸弹，从此以后知识界就太平了，也没有人去鼓动奴隶们偷懒、犯罪和不满了。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险象环生的境地，苏格拉底施展了他无与伦比的口才，他的辩解博得了陪审团中大多数人的同情，释放他的矛头向他这边倾斜过来。这些人提出可以赦免他的条件：剔除辩论、争吵、说教，不再对别人的爱好做无谓的干涉和抨击，不再对别人提出任何的疑问和怀疑。

除非这位老人不再是苏格拉底，他真的办不到，拒绝是必然的。

“这绝不可能，”苏格拉底最后的呼声带着十足的潇洒，“我要把真理的道路无所畏惧的指引给人们，我要把我的想法、我的信仰毫无保留地告诉我遇见的每一个人，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这是我内心的声音，我的灵魂要我这么做，我的良心要我这么做，只要我还有微弱的心跳，我都会这么做的，不管迎接我的是怎么样的后果。”

还能怎么办，还能怎样选择？死神不得不将他带走，于是，死刑成了最后的判决。

根据当时雅典的法律规定，只要每年一次去戴洛斯朝拜的圣船还没有返航，就不得执行死刑，因此，苏格拉底被缓刑三十天执行。晦暗的牢狱里，苏格拉底用最后的三十天践行了他不虚度年华的呼声，睿智的光芒照耀着牢狱，老人安之若素，只是在思考怎样将他的逻辑体系构架得更加完美精致。当然，这期间他是有机会逃跑的，但他真

的已经累了，这一生，没有妄走，该做的做了，在追求的路上走得太久太长，他需要闭上劳累的双眼，卸下一身疲惫，离开这个世界了。只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然没有忘记履行自己的职责，行刑前还劝朋友们要在精神世界里走得更远些，不要太过拘泥于物质的世界，真理在最后关头仍然闪耀着光辉。

一杯毒鸩通过他的喉咙流向身体的每一个脉络，世间的繁华、荣辱、声名、争论至此戛然而止。

苏格拉底死后，公众的愤怒、谩骂洪水般涌向他的门徒们，在惊恐万分中，他们从原先的活动场所低调地退场。

到了一切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些曾经受伤的门徒们又重新回来了，他们讲学、传道，哲学家的思想、智慧被继续传播着，并向着越来越远、越来越宽的范围迅速飘散。

就在此时，这座城市迎来了最困难的时期。雅典人在争夺希腊半岛领导权的战争中溃不成军，以失败收场，胜利的荧光棒被斯巴达人收获囊中。当然在这种体力与智力的对决中，体力取胜的一方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的。斯巴达人只在乎雅典人的围墙是否能推得倒，雅典人的舰队只依赖于围墙的高度和强度而已，至于知识、智慧方面的东西（不包括军事战略战术，在今天的足球比赛里，还可以看到那些战术）他们不屑一顾，所以斯巴达人没有在历史上书写过什么有记载价值的名言也就很正常了。相比之下，雅典人更具备天资聪颖的头脑，当世界各地的舰队云集在古老的比雷埃夫斯港跃跃欲试的时候，雅典的海军将领又一次站在了战斗的前列。

并且，如同公元前4世纪的巴黎一样，因为有了伯里克利的努力付出，雅典有幸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即使这种付出并没有引起那个时代的重视，但是雅典却因此获福了。你可以想象当罗马、西班牙、非洲的富人们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孩子带到雅典来学习，即使只是瞻

仰一下卫城附近的学校都可以让他们回去后在别人面前大肆炫耀了，能够到雅典接受所谓的时髦教育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是何等的荣光啊！

现代人要对古代社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真正的了解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毕竟，那个年代生命和生存才是至关重要的。

基督教曾经被一切异教文明排在对立面看待，也因此，罗马人和希腊人与臭名昭著、丧尽天良画上了等号，这都是拜早期基督教所赐。他们在吃喝玩乐、莺歌燕舞的空当敷衍了事的崇拜一些莫名其妙的天神，与埃及舞女缠绵悱恻，用整桶的萨莱诺酒麻痹自己，又或者奔赴战场，以杀戮无辜的日耳曼人、法兰克人、达西雅人为人生乐趣。

确实，在希腊和罗马有很多很多的商人和发战争财的可恶贩子，尤其在罗马，这类人物还要更多。他们才不可能会记得苏格拉底当年在法官面前发表的那一通精辟入微的道理，他们只管怎么样充实自己的腰包，财富才是最牢靠的靠山，正因为他们财大气粗，因此更可以为所欲为，人们大抵只是敢怒不敢言的。当然，财富是无法为他们堆积出文化地位来的，这些人在社会中并无任何威信可言，也不可能成为文化的代表。

当我们站在埃帕菲罗迪特公寓残破的废墟上的时候，当年这座用大量不义之财建造起来的拥有四十多间房屋的豪华景象是完全可以想象得到的，那时，埃帕菲罗迪特与尼禄联合起来把整个罗马及其殖民地的所有财富搜刮一空，巨大的财富落入了这个老投机商的口袋里。时光飞逝，历史带走了所有的辉煌，只留给后人一声叹息：真的太腐败了！

现在，是时候坐下来拜读一下爱比克泰德的著作了，尽管他曾经

是埃帕菲罗迪特的奴仆。然而，不管埃帕菲罗迪特是怎样一个恶俗的人，我们却能从爱比克泰德的书本里面看到一个无比高尚的灵魂。

我知道，人们似乎总喜欢在自己的小家里讲自己的邻居或邻居的悄悄话，对其加以评论，拿来做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确实，作为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这可谓是那个时代生活的一个剪影，将他推出来作为表率是再恰当不过的。正如埃帕菲罗迪特，他可以称得上朝廷中的势利小人，但却有他独一无二的代表性，如同当今人们对于各种欲望的追求一样，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人们对于完美生活的追求丝毫不逊色于当今。

虽然如此，那个时候的完美与现在的完美是大相径庭的，别的不讲，单在概念区分上就是这么回事。那个时候人们追求的完美生活完全受到欧洲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是一个被欧洲着了色的怪物，至于东方社会，确实毫无瓜葛的，可能有些肤浅，但不可否认，这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易于接受的思维，在他们的思想王国里根深蒂固的追求崇高的目标。是的，你可以说他们是“野蛮人”，这就是我们的祖先。生活的哲理正是由他们逐渐发展起来的，最后被大多数人接受、内化。假如我们将知足常乐的良好保障框定在心思纯正、简衣素食、身体健康、收入稳定充足这些因素上的话，那么认可这个哲理可能是有益处的。

灵魂的归宿对于那些“野蛮人”来讲，丝毫不能引起他们的反思和沉淀，他们总是沾沾自喜的以自己仅有的微薄知识凌驾于地球上其他生物之上，上帝这类词从他们口中轻易地被说出，那份随意就跟今天我们张口说出“原子”“电子”“乙醚”一类词汇一样平淡无奇。

他们认为，应该给万物起源冠之于一个名称，所以，爱比克泰德口中的宙斯仅仅是人类无法解释、无法认清的所有难题的一个代号而已，跟欧几里得在解题时用的X和Y代号一个性质，你可以说他意义非凡，也可以说他渺小甚微。

人们最感兴趣的是生活，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其次是艺术。

生活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他们应用苏格拉底的分析方法对生活加以探索研究，最终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当然，有的时候，他们会在无限大的精神世界里迷失，越追求完美，越深陷不能自拔，这不得不令人扼腕叹息。但是我们允许人们有些许的过失，毕竟是人都会犯错误，即使圣人也不例外。值得庆幸的是，在完美精神世界的探索道路上，人们并没有全部沦陷，柏拉图就是那束值得庆幸的光芒，在古代如此之多的理论家里，他对完美精神世界的无比热爱真可谓是绝无仅有。

众所周知，他就是苏格拉底心爱的门生，这个年轻的雅典人将苏格拉底的文字进行了传承。

《苏格拉底福音书》就是由他一手编制完成的，这本书将苏格拉底曾经说过或想过的一切都编成了对话。这项工作做完以后，柏拉图又将精力投向了自己老师理论的更深处，将那些深奥难懂的地方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由此一系列的闪着深邃思想光芒的文章问世了，除此之外，他还开课讲学，将雅典人公正正义的思想散播到世界各地，使很多人受益匪浅。

在这些工作历程当中，他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毕生的精力都投放在正义思想的传播上，这种忘我的精神简直可以跟圣徒保罗相提并论。但是，与之不同的是，柏拉图的传道工作只是在家里后花园里舒适的椅子里进行的，世界各地的人们慕名来拜见他，苏格拉底的福音以这种方式传播开来，而圣徒保罗的经历则更加惊险刺激，他忙碌地奔波于世界各地，身体力行的传播上帝的福音。

说到柏拉图其人，首先要了解的是他是一个雅典人，从他母亲的血统来看，索伦是他的祖父。然后，他是一个较为富足的人，不必为生计而烦恼，刚成长到法定年龄就继承了一大笔足以安享生活的财

富。同时，上帝还赋予了他一副伶牙俐齿，他出类拔萃的口才是吸引众多聆听者的制胜法宝，即使只听过很少几次课的人，都会被他所牵引，不惜千山万水来到爱琴海拜会他。

当然，柏拉图同其他青年人一样，还具有许多其他特点。他做过士兵，但这丝毫没有激发出他更多的军事方面的兴趣。他虽然在摔跤和赛跑等户外运动方面有过人之处，但也没有更多的名气和发挥的潜能。他曾经沿着祖父索伦走过的路程，穿越爱琴海，到达埃及的北部，重温祖父旅途中的故事，之后，他重归故里，除了雅典郊区赛菲萨斯河畔那座景色绚丽的花园外，再也没有到过别的地方。他深邃的思想和宏大的教义就在舒适花园的藤蔓阴影处开始流传各地，时间长达五十年之久，因此花园里他讲学传教的地方被命名为“柏拉图学园”。

谁会想到，这位为现代政治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一开始是个数学家，后来才涉足政治领域。他的乐观主义思想在现实世界里开了花，他指出人类是持续不断进化发展的，生命也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世界正在越变越好，美好的实体必然萌发美好的制度，在美好的制度酝酿下，美好的思想之花必定绚丽绽放开来。

他强烈的想把这种想法变成具体原则，去支配他理想的共和国理论的基础，他想让正义和公正能够真正起到普照的作用，而不是只在羊皮纸上发发光而已。当实施这个行动的时候，还有什么能够阻挡他呢？他描绘的共和国蓝图是那些整日迷蒙虚无的幻想者们心目中最完美、最理想的境界。纵观古今，这个共和国组织本身就存在很多的偏见和不足之处，这些偏见为那些退伍上校们所独有，他们喜欢在与政界的斗争中获得胜利的滋味，对于社会中低层的人们，他们持鄙夷的态度，这些人因为收入丰裕、不必为生活而烦恼奔波，他们只是借那些上流社会的特权来显摆自己的地位而已。

非常不幸，柏拉图构建的共和国著作受到西欧中世纪学者的垂

青，这些学者将共和国构架装饰成与宽容精神斗争的利器，并猛烈地开炮。其实柏拉图所作的结论与他们生活的公元12、13世纪所反映的情况是没有什么瓜葛的，但是学者们却要故意将这个事情忘记。

如果硬要用基督教教义来阐释，柏拉图跟虔诚半点挂不上钩，这一点可以从细数他对神明们所持的态度中看出来，那些在祖先们心里无比威严神圣的神灵在他看来只是马其顿的乡下佬，低俗可恶。记录在特洛伊战争纪年表中的那些神明的丑恶行径让他羞愧难当，感到耻辱。

成年后的柏拉图，在橡树园子的隐蔽下年年月月看着家乡那些小国家之间愚蠢无谓的争夺吵闹，心中的怒火正一点点燃烧起来，他似乎已经坐不住了。从旧民主理想的彻底溃败中，他看清了平民老百姓对宗教的依赖性，离开宗教，他思想中构架的共和国就会立刻分崩离析、混乱不堪。所以这更坚定了他要在这个模范社会里建立对居民的行为规范和相关准则，自由人和奴隶都要无一例外地被框定进去，对于违反规则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死刑、监禁或者流放，这一主张的实施貌似是对苏格拉底倡导的宽容精神和宗教自由的全盘否定和挑战，但柏拉图确实是这么想的。

这个世界是怎么改变的？要究其原因，其实很简单。与苏格拉底深入民众阶层的探索方式不同，柏拉图面对现实的勇气是不够的，这个丑陋的世界让他失去了信心，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更让他觉得安全。他非常清楚他的梦想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当集权统治替代了各自为政的小政权的时候，命运的光环将罩在宽广的马其顿帝国头上。此后，它的国土覆盖了整个希腊半岛，并且由马里查河一直延伸到印度河畔。

当征服者的魔爪还没有把古希腊半岛上桀骜不驯的全部的民主城域笼络到自己的麾下的时候，一位思想界的巨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曾经淹没在历史红尘中的那一代希腊民族因为巨人的出现而被整个世

界重新缅怀。

我说的这位巨人就是来自斯塔吉拉的神童——亚里士多德。他知识渊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通晓很多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人类知识库因为他而得到极大的丰富。他的智慧成果一直恩泽着整个五十代的欧洲人和亚洲人，此后的人们可以轻松地从他的知识库里提取自己想要的答案，节省了冥思苦想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在十八岁的时候从家乡马其顿来到雅典聆听柏拉图的教育。毕业后的亚里士多德曾经在许多地方讲学授课。公元前336年再次回到雅典的他在阿波罗神庙附近的花园里拥有了自己的学堂。这座哲学殿堂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求学者。

雅典的城邦逐渐退出商业舞台，可是雅典人对于建造自己的学园却没有多大的兴趣。当传统商业重地的作用逐渐丧失的时候，亚历山大港、马赛和其他南方和西方的一些城市迅速积聚了一些精力充沛、有上进心的市民。那些平庸、懒散的人则选择继续留守在原来的城邦，这些人是老一辈自由民中的残余势力，他们目光短浅、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对柏拉图及他的学园没有半点好感，也不关心学园里的思想。所以，当柏拉图的得意门生在老师离世十年后再次来到雅典，竖起指引真理的路标，讲授世界起源，揭发神明们能力有限，宣扬并不为人们所接受的教义的时候，这些保守派拉起老脸，摇头叹息，自由的思想和自由的信仰将再次在城邦里飞舞。

保守派们深知眼前这个体格健壮、双眼近视、衣着考究并且博学多才的绅士并不是请几个小流氓或打手就能将之扫地出门的小人物，他在当时政治上的赫赫声名让这些心怀不轨的老家伙们及时的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并没有做出一意孤行的举动。

作为宫廷医生的儿子，亚里士多德不仅有着与皇子们一起温书学习的经历，并且在八年的时间里与年轻的亚历山大形影不离，作为皇

储的老师，他拥有历史舞台上最强大帝王的友谊和帮助。因此，当亚历山大出兵印度的期间，他得到了掌管希腊各省的摄政王的加倍关怀和保护，任何人都伤害不了这位皇帝的良师益友。

可是，当亚历山大去世的消息一传到希腊，亚里士多德便有了生命危险。他想起了苏格拉底的遭遇，不愿意再步他的后尘。他像柏拉图那样，谨慎地把哲学和现实政治区分开来。但是，他对政府的民主形式的不满和对平民掌权的不信任是众所周知的。他看到雅典人爆发出冲天怒火赶跑了马其顿的守卫部队，便度过埃维亚海峡，来到卡尔希斯。在马其顿人再次征服了雅典、惩治了叛乱的前几个月他离开了人世。

亚里士多德曾被指控为对帝国不忠，这是否有确凿的事实依据，如今已无法证实了。但是在那个游说家、评论家猖獗的年代，亚里士多德必然将与各种政治力量画上等号，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不可能说清楚的，如果说他的指控是因为散布了异端邪说而惹怒了天神宙斯，使得宙斯降罪于雅典，倒不如说是因为他对有偏见的地方实力派态度过于轻蔑而招致的罪责。但是，这个背景材料已经不重要了。画地为牢、各自为政的小城邦共和国已经迎来了它的末日。

此后不久的时间，亚历山大的丰功伟绩被罗马人充分地继承了去，古老的希腊、名噪一时的希腊以一个省的省份划归于他们的国家版图中。

所有的争执到此告一段落，罗马人在宽容精神上发挥得比全盛时期的希腊人要淋漓尽致得多。臣民们除了在政治原则上必须保持沉默外，其他方面可以自由思考，罗马人的政权之所以能如此稳固长久，与坚持这一信条是分不开的。

跟西塞罗同一时代的人们的思想与伯里克利的崇拜者们所垂青的理想之间是有细微的区别的。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摸索，从实践中

总结经验并经过思想过滤，希腊思想体系的古代领袖们终于得出了一些明确的结论，而宽容精神正是被赋之于这些明确的结论上的。与之相反，罗马人从来不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跟理论比起来，他们更看重实际行动，实用的东西比空洞的理论更能博得他们的好感。所以他们不会在理论方面下功夫去研究。不过，如果可能，罗马人倒是不反对外国人在老橡树下谈论的统治理论或者月亮对海潮的影响这类事情。

罗马人比较重视外国佬的理论和知识是否能够为实践效力，如那些长篇大论、歌舞曲剧、烹调、雕塑以及其他科学那些东西，是希腊人或其他外国佬的玩意，正统的罗马人对此不屑一顾，仿佛慈悲仁怀的朱庇特创造他们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让他们去拾捡罗马人不喜欢的东西。罗马人的任务是管理逐渐扩大的国家疆土，训练足以保护边沿省份、巡查沟通西班牙和保加利亚的交通要道的外籍士兵。要维持几千个不同民族和部落人民之间的和平友好，确实让他们声嘶力竭、费尽心机、够忙活的了。

但是，挂满荣誉和光辉的华冠终究是要配得上的人才能享有。

罗马人伟大的功绩在于他们真的是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体系，并且殚精竭虑的使这个系统一直维持到现在，尽管形式多样。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民只要按时交纳规定的赋税，从表面上能够尊重帝国订立的行为规则，就可以享有很大的自由。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信仰几个上帝或者任何一个住满上帝的宇宙都没有关系，完全随个人意愿和喜好。不过有一点是要注意的，那就是不管你的思想如何驰骋，不管你的信仰如何，庞大帝国的各色人物种类都必须记得“罗马和平”，只有记住这个信条，“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才能真正公正的被实现。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人们对于别人或自己大门内的陌生人的事情千万不能加以干涉，就算是自己所顶礼膜拜的诸神被别人所亵渎，也别把讨回公道的责任交给政府。就像台比留大帝在一次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场合讲得那样：“如果有人蒙受了损

失，而上帝认为他可以得到补偿的话，上帝会看着办的。”法庭正是仗着这样一句话就可以把这类案子统统拒之门外了，人们休想将有关个人见地的问题带上法庭决议。

假如卡帕迪西亚的商人到了哥罗西人的地盘居住的时候有权利继续信仰自己的上帝，并且被允许在哥罗西的地盘建造属于自己的庙宇，同样，哥罗西人以同样的原因到卡帕迪西亚人的地盘居住时，也一定要获得同样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必需的。

罗马人所持有的高高在上的宽容姿态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哥罗西人、卡帕迪西亚人和其他所有野蛮部落的人保持了极其轻蔑的态度呢？这也是人们经常争论的问题，这种说法是否正确，我也说不清楚。纵观五百年的历史，在宗教上体现出的完完全全的宽容在文明和半文明时期的欧亚以及非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达到鼎盛。尽可能地降低摩擦，就能在实际中获得巨大的成功，不得不说，这正是罗马人倡导的统治艺术。

罗马人一手征服了世界，也一手将自己给毁灭了，成千上万的帝国战士在几千个战场上化为一堆堆的白骨，没有人记得他们，所以说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的东西，依靠武力建立的帝国更是不可能长久屹立。

从爱尔兰海到黑海的殖民帝国，在长达五个世纪的时间里，这项庞大的管理工作消耗了无数天才、骨干们的精力和智慧，最终招致了无法挽救的恶果。

世界之大，岂能由一个城邦在统辖，这个事业实在是伟大得有点过了吧，罗马究竟有多少的人力、物力可以来经营这个事业呢？最终庞大的体系不得不将庞大的帝国连累了。

在随后发生的那件可怕事件里，人们疲惫不堪，最终对生活产生了厌恶的情绪，热情也随之消散了。

他们实在是太富有了，所有的城乡房屋、楼阁别墅、所有的游艇车马尽归他们囊中。全世界的奴隶拜倒在他们脚下；世界上的美酒佳肴他们从不曾欠缺，从巴塞罗那到底比斯的所有女人对他们谗言媚笑，供他们把玩。他们的图书馆里堆满了世界各地的书籍，家里的墙壁上悬挂着最美丽的图画。世界上最才华横溢的音乐家为他们的饭局弹奏最动听的乐章，在童年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接受世界上最完美的教育，接触最出色的教师和教育大家，丰富的知识让他们饱赋内涵。到了最后，曾经的美味佳肴在他们嘴里失去了味道，乏味的图书再也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女人们也不再有任何魅力的资本，这时候的他们觉得生存都变成了一种可怕的负担，于是寻求一种体面地离开人世的方法反而成为他们更加努力追求的目标。

当一切远去的时候，还剩下些什么呢？只剩下一些自我安慰和对未知领域的无限假想而已。

然而，旧世界的上帝早已经湮灭了许多年，幼儿园里传出的吟唱朱庇特和米纳瓦的赞歌是不会被聪明的罗马人所轻易接受的。

这时候，显得有些空洞的享乐主义学派和犬儒学派的哲学体系已经开始崭露头角，仁爱、克己、无私的美德、无私奉献、做有益他人的事是这些派别所提倡和弘扬的。这个时候，诸如塞诺、伊壁鸠鲁、爱比克泰德和普卢塔克的书籍在街头书店里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书里面对那些美德讲述的头头是道。

看得更远一些的话，这些单调的纯理论太过缺乏实质的东西，罗马人的精神食粮丝毫不能从此获得，于是追求一种真正的精神食粮的运动开始了。

这么看的话，只有那些上流社会听过卓越的希腊教师的教导的人才会对纯哲学色彩的宗教（假如我们把宗教思想和追求完美高尚生活的梦想结合一下，这就是一种哲学色彩的宗教）有兴趣，而这部分人

只是社会中的一小部分而已。

那些并无实际效果的哲学思想对于一般的老百姓来说根本一文不值，百姓认为由于祖先的无知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所以编制了古代神话故事寄托他们游离无助的灵魂，这样看来，百姓的思想觉悟已经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只是要真正否认上帝的存在，恐怕还需要更久的发展吧，这就是他们与那些思想境界较高的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区别。

基于这样的认知水平，他们只能扮演着表里不一的角色，表面上对共和国推崇的上帝持温顺认可的态度，而背地里却在某些个宗教团体中寻找理想境界的幸福，使精神有真正的寄托。在这种社会环境中，这几乎是所有知识匮乏的人们能都会采取的方式。于是乎，宗教行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在台伯河畔的古城里找到了一席之地。

上面我所应用的“行会”这个词的原本意思是指“得到启示”的人，它源自于希腊。“得到启示”的人还可以这样理解——这个群体里的男人女人们必须“守口如瓶”的保守着行会最神圣的秘密，决不能外泄出去。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这些秘密的真相，这就像纽带一样将他们紧密的团结联合起来，如同大学校园里的兄弟会的暗号一样。

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行会被看作一种崇拜方式、一个看法、一种派别。当一个希腊人或者罗马人想脱离长老院，去加入基督教科学会的时候，他往往会对别人讲，他去参加“另外一个行会”。对于当时的人而言，“教堂”“英国北部教会”和“贵族院”这些都是新出现的词汇，还没有人知道。

假如，你对这个问题有很浓厚的兴趣，亟待了解那个时候的罗马是怎样的情况，那一定要在下个星期六购买任何一份纽约报纸来看。有关新引进的教义和处方广告会在报纸的四到五个栏目里刊登出来，它们可能是来自于印度、波斯、瑞典、中国以及其他十多个国家。健

康、财富、救赎灵魂的希望这些信息都可以从广告中传达出来。

如同现在的国际大都市一样，外来的和本地的宗教派别汇杂在罗马，这是无法避免的。

由于罗马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对神母的崇拜始于小亚细亚的北部那些爬满绿藤枝叶的山上。神母被弗里基亚人拜为天神之母。供奉神母的神母庙最后被罗马当局所关闭，是因为对神母的崇拜形式太不合乎礼仪，形式太过放荡，有伤大雅。当然政府的拆除行为中还付诸了武力，不然问题可能就难以解决了，直至最后，由于这种宗教煽动公众饮酒作乐或者做出更令人愤慨的事情来，所以它最终以法律规定的形式被果断的禁止了。

人类所熟悉的五六个怪异的天神降临在埃及这片神秘而自相矛盾的古老土地上，罗马时期的奥赛利斯、塞拉皮斯和爱西斯跟阿波罗、迪梅特和赫耳墨斯拥有一样的知名度，真可谓家喻户晓。

在很多个世纪之前，由抽象的真理和行为指引的法典的体系最初的模板就是希腊人的杰出贡献。此时，他们又毫不吝啬地向坚持偶像崇拜的别国隆重推出了艾蒂斯、迪奥尼修斯、奥尔费斯和艾多尼斯的“宗教行会”，用公共道德的尺度来衡量的话，这些名声大噪的神明们没有一个是完美无缺的，但这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们的喜爱和推崇。

在一千年的时间里，意大利的海岸上时常出现腓尼基商人的影子，这样，他们的上帝巴尔（耶和华的仇敌）和上帝的妻子艾斯塔蒂这对眷侣神明被罗马人所熟知。老年时候的所罗门曾经在耶路撒冷建造了一个雄伟的“高台”，目的就是为了供奉艾斯塔蒂这位怪异的女神，这个行为曾经让所罗门的臣民们大为不解。在地中海诸神首领的漫长战斗中，这位神勇的女神一直以迦太基城的保护神的身份出现，当亚洲人和非洲人砸破她的庙宇后，重新回到欧洲大地的她，此刻又

扮演了基督教圣人的角色。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伟大的米思拉斯神。他在军队中的神望没有任何一位神明能够与之匹敌，这一点可以从莱茵河口到底格里斯河源的罗马边境线上找到的他的破碎金身可以看出来。

根据我们所掌握的知识，这位主管光、空气和真理的亚洲神一直受到里海低地平原地区人民的香火供奉。欧洲的形成源自于我们的最古老的祖先对那片牧草丰美的土地的占领，从此人类就在深山峡谷中建立了栖身的大本营。居住在这方水土上的天神充分施展了他庇佑的本领，尽可能的赐予人类各种美好的东西，因此人们的头脑里滋生了这样的念头：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拥有的事物都是受到神明的庇佑和照顾所得。万能的天神米思拉斯终日处在天火之中，手握重权的领袖如果能够得到米思拉斯赐予的天火，那就是无上的天恩。尽管他已经离世那么长时间，连名字都已经消失在滚滚风尘之中，但那个千年前的古老传统还在那些仁厚慈悲的圣人头上的光环之上跳跃不休。

这样一位在人们心中占有很重分量的天神，如果想要准确了解他的一生，恐怕并非易事。

米思拉斯神话在早期的基督教传教士眼中简直是苦大仇深的对象，他们对米思拉斯的憎恨远远大于一般神话的几百倍。他们认为印度神是他们真正的对手，凶狠残暴，于是，他们用尽心机洗刷掉人们对米思拉斯的记忆和所有的印象。这样努力的结果使得这个曾盛行于罗马五百年的宗教庙宇荡然无存，那个时候，米思拉斯的狂潮丝毫不亚于今天美国的美以美教派和长老会，但现在却找不到任何一篇关于他的文字记载的东西。

好在当时还没有发明火药，人们从残存的建筑物废墟里，以及对亚洲古老之地的探索中可以找到些许蛛丝马迹，这些资料足以让我们更透彻的看清这个很有趣的天神的平生和相关事迹。

关于米思拉斯的故事要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讲起，这位天神是在某天从一块石头里面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当他还在摇篮里酣睡的时候，就得到附近牧羊人的参拜和礼见了，还收到了礼物。

有点像希腊孩子们心中的英雄赫尔克里斯，幼年时代的米思拉斯就已经经历了很多惊险怪异的冒险了，所不同的是，赫尔克里斯残暴不仁，而米思拉斯却善良和蔼。在一次跟太阳神的斗争中，米思拉斯将太阳神打翻在地，得胜的他表现得非常大度宽容，所以在诸神中，太阳神和他是如同手足一样的兄弟，这也是人们经常分不清二位的原因。

罪恶神想毁灭人类，于是降下一场干旱，是米思拉斯用弓箭从岩石中射出了拯救生命的泉水，使干涸的土地得以滋润。罪恶神艾赫里曼（这是罪恶神的名字）的目的被米思拉斯扼杀后，他又想出发大水的损招。米思拉斯知道后，让一个人造一只大船，带上亲属和家禽，他又一次拯救了人类。米思拉斯为了人类，尽心尽力，最终人类没有因为自己的错误和弊端而灭绝。就是这样的一个神明升入天国后主管正义和公平。

那时，加入米思拉斯崇拜团的仪式是为了纪念他和他的太阳神朋友共进的著名晚餐，首先，作为礼餐，要吃一些面包，喝一些酒。然后是在水前接受洗礼。这些宗教的入行仪式在今天看来是无聊而又没有任何意义的事情，它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终止了。

所有崇拜米思拉斯的信徒都是平等的，被平等的对待。烛火通明的祭祀台将成为他们共同祈祷的地方，他们唱着同一首赞美诗，在每年12月25日到来的时候一起参加节目，以此为米思拉斯庆祝生日。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天神，每周的第一天，信徒们不做任何工作，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认识的“星期天”。死后的信徒会等待最后的审判，善良的好人则会得到应有的福祉，坏人将在永不熄灭的烈火中饱受煎熬，所以，他们死后，尸体要整齐的摆放。

人们对于宗教的兴趣造就了纷呈异彩的神话故事的成功，此外，罗马士兵对米思拉斯的狂热崇拜也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在最初的几个世纪里，罗马帝国一直致力于寻找精神的寄托，使人们从精神上获得满足。

公元47年，有这样一件事发生：一个名叫保罗的人和一个名叫巴纳巴斯的人驾驶一艘小船，从腓尼基出发，向佩加城驶去，佩加城就是著名的欧洲各大交通要道的起点，特别要注明的是这两个人并没有带任何行李。

作为犹太人，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持有罗马护照，并且对于其他民族的智慧烂熟于心。

这是一次永垂青史的旅程的开端。

基督教征服世界的帷幕被拉开了。

第三章　约束的开始

西方世界被基督迅速征服时候，它不得不臣服在基督教义之下。这个事实是否可以说明基督教的思想是天国所赐呢？对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什么多加辩驳的兴趣，当然，我必须指出的是，最早期的传教士的胜利与辉煌其实是建立在大多数罗马人的苦难生活之上的，这跟窘苦的生活导致神学的成功是一个道理。

到此为止，罗马的一个方面已经逐渐展现在广大读者朋友们面前了，那就是士兵、政客和企业富豪为素材的社会，这些居住在拉特山坡、坎帕尼亚峰峡谷和那不勒斯海湾的上帝宠儿正沐浴着文明的阳光，享受幸福生活赐予的美好呢。当然，这仅仅只是罗马生活的一部分而已。这些人并不能代表整个罗马。

相反，如果你走向城郊，你会看到铺天盖地的贫民窟，诗人叫嚣中的太平盛世以及演说家口中如朱庇特般繁荣的奥克塔维安是不复存在的。

廉价破败的出租房一排连着一排，就像要绵延到天边一样，生活窘迫的贫民一群群集聚在这里，黑压压一片，散发出阵阵恶臭，他们的命运永远与饥饿、流放和无止境的苦难联系在一起。对他们而言什么都是虚无的，只有那个质朴的木匠讲述的故事才是现实的东西。即使像他这样默默无闻的在大海彼岸辛勤劳作，日出而作、日落而归，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辛勤汗水来勉强度日的人，最终还是被残暴不仁、嗜血成性的敌人给无情地杀害了，这是因为他对贫苦大众的同情和热爱给他招来的祸害，他的躯体再也不能居住在那个小山村里了。还有

谁可以来拯救他们？他们所熟知的米思拉斯、爱西斯和艾斯塔蒂都死了很久了，腐朽的尸体不可能带给他们任何的庇护，就连对他们的一点认知也是从死了几千年的人们那里听来的。

但是，还有一个人不久前还活着的，他就是希腊传教士口中的救世主：约书亚，基督。当帝国还把持在台比留皇帝手中的时候，他就悠闲自在地在叙利亚南部到处发表演说，当时他的大名深深烙印在活着的人们心中，可能许多去过那一带的人都有幸听到过他的演说。

卑微到街角旮旯里的面包师傅以及对面街的贩卖水果的小商贩都曾经在阿皮恩大道旁边那个幽暗的小小花园里与彼得有过交谈；当先知被罗马政府的士兵残忍的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一幕或许正好被到戈尔格塔山附近的渔夫尽收眼底。这些是我列举的另外一些实例，记住这些，我们或许能较快地理解人们突然改变信仰，去追随新信仰的原因。

基督教所释义的爱深沉地接应了各国受苦受难、饱受压迫、尽失权利的广大平民百姓心底的声音，它因此被推向了一个高潮，四面八方的人们都乐意接受它，至于基督所说的与后人所用的词汇是否一致，这个已经不重要了。奴隶们可以思考、可以理解，翻开那无比神圣的首页，铿锵理性的措辞，那就是一股股的暖流和希望，奴隶们有了平生第一次可以直起腰杆的支撑，黎明的曙光就在前方。不得不说，基督教之所以优胜于其他教义就是因为这些饱含关怀的私人感情以及更亲密的接触。

自由的火炬已经点亮，美好生活展现在眼前，世界上一切的欺压权力、势利小人统统滚一边，抛掉卑贱低微的帽子，慈父的手掌抚过他们炽热的脸庞，世界的主宰里面有他们一席之地，这一切，他们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分享了，包括萨姆尼别墅高墙大院里肆无忌惮、高高在上的欢乐。

普通人在基督教面前可以充分感到实实在在的平等和公平，至此，新信仰的力量孕育而生，掷地有声。

其实，我并不是想刻意地去美化基督教，把他夸大为灵魂深处的感动，也不想把它和生活以及思考方式联系在一起，只是在腐朽的奴隶制社会，这无疑是久旱逢甘露，在人们内心炸开一个惊雷，引起奔走呼号的局面是必然的。由于历史往往忽略了普通人的冒险历程，从奴隶到自由人似乎很少会在历史的篇幅中找到一小个安身之处，除了个别情况。所以，即使我们对基督教会本身知道的很多，但关于它的创始人的背景资料却知之甚少，无比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办法解读到一段极为有趣的基督教早期发展历史。如果当时，这些小人物用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来进行划分，由统一的权力来指挥和领导，长年累月积累起足够的财富，并训练士兵到处征战杀戮，踏上征服的道路，这样可能就会在历史学家的编年纪事里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了，现在关于基督教的历史故事可能要更加丰富多彩一些。

当古老帝国的断壁残垣上出现一座座基督教堂的时候，博爱的慈善主义和狭隘的地方主义也同时在教堂的屋顶并存了。这是两个对立又不得不结合在一起的利益体，前者由耶稣亲自率领传教，而后者却让耶稣的同乡人与世界其他地方之间竖起了一面屏障。换句话说，就是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霸道在这种地方主义的驱使下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并催生了思想极其压抑的最恐怖的统治政权，这种制度有一定的可行性，但却违背了情理和人民意愿。

要弄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我们不妨将目光再次转回到保罗的年代，并纵观耶稣遇难后五十年的那段历程。从犹太教内变革分裂出来的基督教以一场单纯的民族主义运动拉开序幕，受到它最直接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们，这一定位从它一出现就是注定好的了，这是事实。

基督对当权的帕里希人的威胁作用往往让他们胆寒，一旦精神威

胁侵入到武力之上，所发出的威力不仅仅是鼓动宣传这么简单，这种垄断作用很有可能会将他们驱逐出去，为避免祸害发生在自己的头上，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敌不动我动，所以当罗马政权还未来得及进行干涉的时候，他们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架起了屠刀，于是绞刑架上挂满了无数的牺牲品。

假如，基督不曾死去，他会实施什么方法回应当局者呢，我们无从知道，他的信徒尚没有在他的号召下组成有抗衡能力的教派，甚至没有留下任何只言片语告诉人们如何去做，他就遇难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的精神给了信徒们最大的自由指引，没有文字框架、没有条理规定、没有书本束缚，只有无限宽广的精神世界任其遨游，所以他们没有把有限的精力和时间花费在无谓的争论上，句号、冒号的研究游戏没有人愿意去深究。这样看来，基督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符号这些东西反而是件好事。

诚然，基督教会不会踏入其他那些教派走过的道路，轰轰烈烈开始，凄惨溃败结束呢？不得不考虑，如果那样的话，新信仰只会吸引个别专业学者而已，而最后，等待那些争吵不休理论家的是警察和大马路。

在近三十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基督教对罗马帝国产生的影响，其力量是惊人的。奴隶们的躁动不满、女人们开始谈论天国之王、老人们口中地球在火中灭亡的预言，这一切的情绪变化和歪风邪气都是由那个所谓的东方先知所赐，帝国统治者已经意识到，他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丝毫不亚于匈奴人和哥德人发动的侵略。令人费解的是，帝国的当政者并没有采取有力的打击措施。

他们大概把守护帝国的安宁都寄托在警察身上了吧，至少他们能理解贫民们为某个宗教人物发狂这类事情，因为这太常见了，不是第一次，也没有最后一次，这类平常的事情只要警察盯紧一些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新宗教信徒们做事方式较为有趣，他们还没有萌发要推翻政府这样的思想，鉴于他们的谨慎行事和戒备森严，警察无法找到可以使用武力的理由。新教徒里有某些奴隶还做结束奴隶身份的美梦，他们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们的兄弟情感会撕碎这个模式，当这个想法在他们心中萌发的时候，圣徒保罗会立刻告诉他们，凡人们只有理所应当的接受现实的一切，才会在看不见的灵魂天国里得到好的回报。

当妻子们搬出基督教来争辩解放和男女平等，试图挣脱罗马法典的婚姻束缚的时候，保罗再一次出现，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教导这些可爱的女子不要走向极端，并用亚当和夏娃的例子生动的向她们说明，妻子们保持半奴隶的状态是自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女人应该保持本分，女人们应该安分守己、安于现状，教会也就免于异教徒的猜忌和威胁了。如此种种行为，无一不表现出对法律的尊重和维护，这是很值得效仿的，由于这些说教者口中的道理与当局者心底的声音听起来是一致的，因此，基督教传教士们获得了任意往来的权利和自由。

可是，就像历史中极为常见的那样，统治者在宽容方面要比一般群众百姓的觉悟高得多，贫苦多难的群众纵然有可以积累财富、获得财富的机会，他们也不会有满足和欣慰的感觉。这一规律是有确实的实例加以佐证的，从古罗马的底层人民的行为说起，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只热衷于酗酒、打架斗殴这类事情，那些表情呆滞、面容枯槁的男人女人可以为他们提供粗俗的快乐，当这些男女津津有味地倾听着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像其他流氓那样龌龊的死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要为向耶稣投石子的流氓祈祷一下，那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对于这个发展趋势，罗马传教士已经不能够处之泰然、无动于衷了。

当时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会在某些节日里举行隆重的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当然，这些钱最终的归宿将是那些教堂头

目温暖的荷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理睬旧的圣地，奔向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为减少。这当然不会使他们顺心，于是他们竭尽诽谤之能事，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对帝国不忠诚，指责他们为纪念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生活在帝国城市里的还有另一伙人，说他们是骗子一点也不为过，他们如同印度的瑜伽信奉者和爱西斯、艾什特、巴尔、西贝尔和艾蒂斯神话的祭司长一样，罗马帝国中产阶级的金库成为他们的私人钱庄，这些耳目不聪、轻易听信谎言的人毫不吝啬地给他们提供挥霍的花销，生活极度奢华，年年月月如此。如果基督教加入到与他们竞争的行列中来的话，他们仍然可以堂而皇之地以上帝之名将那些收费合理化。在上帝的意志面前，不管是巫师还是看手相的人还有什么理由可以抱怨呢？

用预言来做幌子，真是个不错的主意，这种生意允许别人也参与一下倒也可相安无事。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基督教不买这套账，他们不仅不收任何酬劳，而且还主动将自己的东西往外送，为饥饿的人慷慨解囊，不嫌弃将无家可归的人领进家门，他们这么做无异于搅乱了市场，这种操作模式的背后如果没有别的收入来源或别的隐蔽的财富，恐怕是很难维持的。

这一时期的帝国汇集了从全国各地迁徙过来的失去财产的农民，再也不是那个只有自由民众的国度了。这些人太过于平庸，乐于安分守己，脑子里蹦不出一点异己行为，人云亦云、跟风，这些都是他们的特点和本质，如果他们当中有人稍微有不同于常人的行为，就会引起他们的戒备和反感。在他们眼里，只有那些与他们一样经常喝点小酒，高兴的时候替别人付账的人才是友善的邻居、可爱的朋友。但是，如果在凯西特兰山的街道上看到有战俘在游街而不欢呼雀跃，就是他们的敌人，是国家的叛徒，至少是不正常的人。

公元64年，罗马的贫民窟里燃起了熊熊大火，随着那些破败景象

在火中化为灰烬，对基督徒的第一次有组织的攻击开始了。

尽管，在最初的时候，有人以喝醉的尼禄大帝发布的命令为托词，把火烧贫民窟说成意在重新规划建造城市，但关于这场火的真正起因，大家还是心知肚明的，是犹太人和基督徒将预言中天国的火球变成了现实，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上放了一把火。

这种说法一经传开，立刻引来许多的连锁反应，各种关于基督徒狡猾卑劣的行为一一被细数：一个老妇人听见了基督徒跟死掉的人说话；另外一个人则知道基督徒有拐骗小孩的勾当，甚至割断孩子的喉咙，在奇怪的上帝祭坛上抹上孩子的鲜血。当然，关于这些传闻，没有人亲眼目睹过，大概警察的口袋早已经被基督徒的钱财塞满了。

当保罗和彼得的名字沉寂在人们的口中的时候，有多少教徒带着他们最后的虔诚毙倒在私刑之下，我们无从得知。

确实，民众普遍参与的这场斗争中，无人受利。那些牺牲掉的人们只能说是以他们的生命为新教做了一下宣传，至少，当厄运降临的时候，他们还保持着该有的节气。一个基督徒倒下后，他的位子会被十几个异教徒补上。可怜的尼禄一生虽然没有什么作为，生命也比较短暂，但还做了一件略显体面的事情（指的是公元68年他自杀的事件），这事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他们还是依恋这片土地，于是，一切依然如故。

这时候的罗马当政者开始对基督徒和犹太人产生怀疑，他们并不是一样的，对于当时的当政者来说，这可能算是一个重大发现。

通过几百年的历史研究，犹太人集会场所的真相逐渐暴露在阳光下，其实它是新信仰思想传递的中转站，世界各地的信徒们从这里获得了信息，把它理解为今天的情报中转站最为恰当，所有关于他们的错误认知，我们是可以原谅的。

你可能没有忘记，那个只对着犹太人演讲的耶稣，他本身就是个犹太人，祖先制定的律法他丝毫不敢亵渎，一直很谦恭地执行和推崇，他一生只离开过故乡一次，而且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一切都是为了犹太人，甚至连给自己定下的使命也是要跟犹太人一起完成。罗马人从他的言行中找不出任何基督教与犹太人有所区别的地方。

耶稣从来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一门宗教的创始人，他只是在祖先留下的教堂里看到各种陋习后，决心将之整顿一下，于是他发出呼号，并为之斗争，可是自始至终，他也只是在内部进行了一下改革，他努力工作，做的就是这些。如果有人告诉他，他已经创立了一门新宗教，他可能会觉得荒谬可笑。当他的事业越做越大的时候，许多的问题出现了，他深陷其中，无法进行合理的调节和管制，他已经跳不出来了。像路德以及其他改革者一样，他事业的初衷只是想稍微调整一下内部事务，将他们理理顺，顺便自己做点好事，可是，某一天回过头来才发现，事情已经势不可挡的发展开去了，自己莫名其妙成了外部某个团体协会的新领袖，于是乎，多少有点手足无措，回不过神来，不知道该怎么办好，耶稣可能是幸运的，他还没有体会到这样一种感受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耶稣辞世后的很多年时间里，基督教（那个时候，并没有形成这个名称）并没有太大的发展，只是一个犹太小教派，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支持者，甚至连叙利亚省的大门都没有迈出过一步。

这个新生宗教未来的光明前景，最先由盖尤斯看到，这个有着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意识到基督教有可能发展成为世界上的大教派。当然，正是他饱经磨难、历经沧桑的传奇经历，开诚布公地向世人展现了犹太基督教强烈反对宗教世界化的意愿。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才有资格接受基督教义，只有本族人才能加入这个宗教，而这个宗教理所应当只该在本国享有统治地位，对于遍地开花，不分种族的宣讲灵魂拯救的人，他们极其反感。保罗最后一次踏进耶路撒冷的土地上的时

候，因为有了罗马护照的保驾护航才没有使耶稣厄运在历史上重演，同乡人的怒火终究被压抑在了心底。当然，为了周到的保护这位圣徒，有必要用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为他竖起坚固的堤防，让他安全的由港口城市乘船回到罗马，然后出席并没有发生的著名审判。

他生前曾经发出的预言，并且担心了很久的事情，终究在他死后几年发生了。

罗马人的铁蹄踏平了耶路撒冷，新建的朱庇特神庙在被推倒的耶和华庙旧址上拔地而起，连城市的名字也被爱利亚首都所替代，这时，朱迪亚也被圈点进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版图上，成为一个组成部分。可怜的当地居民，等待他们的是杀戮和驱逐的命运，废墟周围方圆数英里内，再无人烟。

这座曾经带给犹太基督教徒无数灾难的圣城，在金戈铁马中灰飞烟灭。当然，此后几十个世纪中，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的残余势力一直存在着，他们居住在朱迪亚内地的一些小村子里，以穷人自居，被别人看作异类，他们年复一年的发出冷静的祷告声，安然的等待世界末日的来临。

公元5、6世纪的书中有关于他们的详细记载，这些蒙昧无知、与文明没有太大瓜葛的人们在自己的世界里渐渐创建了一套独特而又荒诞怪异的教义。这套体系的宗旨集中体现在对保罗的无比仇视上。那些拿撒勒人在公元7世纪时候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他们在伊斯兰教的胜利者的屠刀下化作一缕青烟，不知飘向了何方，但是，就算他们能够躲过地狱的召唤，再活个几百年，历史也不会对他们做出任何让步。

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制以及化零为整的国家版图，为宗教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世界已经有条件接受它了。况且，基督教简单实用的特色使它在与犹太教、米思拉斯教以及其他宗教的竞争中占有绝

对的优势，成功已经成为必然。但新宗教在发展中仍然对原来存在的缺陷加以了继承，这一点与他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这让人无比遗憾。

从亚洲到欧洲的那一只小舟带来了保罗和巴纳巴斯这两个人物，同时也带来了希望和仁慈的力量。

同时溜上船的还有另一个神秘的家伙，他纱巾遮面，看似神圣高洁，但却戴着一副残忍仇恨的嘴脸。

它的名字是：宗教独裁。

第四章　上帝之光

早期的教会是非常简单的组织机构，如果世界末日不是朝夕之间发生的事，那么即使耶稣遇难了，也不会很快迎来最后的审判，人们都很清楚，基督教确实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可能走得很艰辛，也很挫折，所以急需建立一个规范的体制来加以管理。

犹太人的教堂是基督教徒（全部都是犹太人）最早的集会地。至于非犹太人，为避免与犹太人之间的斗争，别人家的空房子则成了他们专用的会议室，如果实在找不到能够容纳这些虔诚弟子的空房子，他们倒不介意利用室外露天或者废弃的石材场。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集会都是定在星期六。但是犹太基督教徒与非犹太基督教徒之间实在是太剑拔弩张，已经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于是非犹太基督教徒把基督复活的星期天作为集会的日期，放弃了星期六安息日。

公众的特点和丰富的情感在这些庄严的宗教仪式中体现无遗，所有的人，只要内心有圣火的感召，都可以马上站出来敞开内心，将自己所信仰的东西完全阐述出来，不必有固定的演说和说教形式，也无须有教士这类人物在场。保罗在他的书中对这些虔诚的兄弟雄辩的口才和逻辑推论做了详尽的记录，还有关于他提出的二元哲学思想。这位伟大的圣徒从来没有怀疑过充满希望的前途。大多数的平民老百姓是真诚质朴的，他们没有机会接受什么良好的教育，性格也易于激动，时常头脑发热，大吼大叫的像疯了一样。对于人们的冷嘲热讽，教会似乎有些手足无措，相比较而言，它无惧于任何形式的迫害。为

了维持秩序，保持良好的风气，保罗、彼得，还有他们的继承人，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安抚人们纷繁复杂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情绪，而这些情绪是由于人们对于精神世界的表达和神圣的热情无处发散所造成的。

由于用于维持秩序的这些规章制度与基督教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相悖甚远，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收到多少实际的效果，但是到了最后，人们还是接受了现实，慢慢接受了这种集会的相对固定的形式。

集会的固定形式以一首赞美诗拉开序幕（赞美诗的作用是用来安抚参与的犹太基督教徒），紧接着，全体教徒要高唱歌曲，这首歌曲是为罗马和希腊的崇拜者所谱写的。

然后，还要作一段高亢的演说，就是从这篇著名的祷告文字中，可以看到耶稣闪光的哲学思想。当然，真正的布道其实是自发的，如果内心感到有需要表达的言语，就可以登台说教，在几个世纪中一直延续着这样的潜规则。

不断增加的集会次数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毕竟，这些诡异的秘密社团最容易暗藏巨大的波澜，对于警察的干涉，集会必须要推选出一些人与外界交涉。领导的才能在保罗的评价体系里到达了很高的境界，他觉得，那些他曾经走访过的亚洲和欧洲的小团体就如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的渺小舟叶，如何安全平稳地驶出大海，优秀舵手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

于是，团体中的执事就诞生了，他们由虔诚的信徒们集体推选，他们最先的角色定位是团体的“仆人”，照顾好病人和穷人（早期的基督徒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这个）、管理集体财产是他们的职责，同时，日常的一切琐碎的事务也要兼顾到位。

发展到后来，随着教会成员的大量增加，教会中的管理任务变得

非常繁重，在此情况下，专职执事顺其自然的产生了，最先担任此职的人是教会中年老的人，用希腊人的说法就是“长老”，即我们口中的“神父”。

多年以后，当教堂出现在每个村庄和城市的时候，原先存在的管理系统已经捉襟见肘了，执行共同的政策被提上了议程，于是，能够对整个教区实施监督的“总监”（就是主教）出现了，他拥有可以代表教区与罗马政府交涉的权力。很快，在安提阿、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迦太基、罗马、亚历山大和雅典以及帝国的其他主要城市都出现了主教这类人物，这些著名的当权者拥有很大的权力。

在耶路撒冷变成废墟之前，耶稣生活、受难、死去并受到尊敬的广袤土地都在主教的掌控之中。当这些连同本身的威望在破败的宫殿里化为泡影的时候，已是那些梦想天国和期待世界末日的一代人消失在地球上之后的事情了。

传说中的罗马大主教就是住在文明世界首都、被各种优越所包裹的“总监”，作为虔诚信徒的首领，他们严密地守护着西方大圣徒保罗和彼得的殉教地。

与其他主教一样，这位主教也获得神职人员的惯有称呼，被冠之于“神父”或“圣父”，这些称呼为他们赢得了尊敬和热爱。但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人们心目中“圣父”称谓已经成了主教管区的首领所特有的。人们口中的“圣父”，绝不可能是君士坦丁堡的主教或迦太基的主教，而是指罗马的大主教——教皇。这个演变过程是很顺其自然的，就像我们看到报纸上的“国王”这个词的时候，不必再在前面加上“英格兰”三个字，我们都能立马知道这说的是政府首领，与宾夕法尼亚铁路局长、哈佛大学校长或联合国主席没有丝毫关系。

当罗马还是强盛浩大的帝国的首都所在地的时候，“教皇”这个名字就出现在了正式的公文里面了，那是258年，主教的势力在皇帝面

前还不值一提的时候。但是，时间往后推移三百年，在帝国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新的城市，即大名鼎鼎的拜占庭，它是恺撒大帝的后裔为避免外侵内乱的威胁所开辟的新的安乐窝。这个新城市的名字与传说中的英雄拜扎斯有关。拜扎斯在特洛伊战争后登陆于此地，切开亚欧大陆的几条海峡横亘在它周围，它是连接黑海和地中海的重要商业贸易之地，有几家独一无二的商业中心牢牢地控制在它手中，它在商业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曾经勾起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血腥杀戮。

这样的拜占庭在被马其顿掌控之前的亚历山大时期，一直保持着独立自主，但自那以后，它成为罗马帝国辖区的一个组成部分。经过数十个世纪的风雨历程，它已经累积了大量的财富，当几百个国家的船只停靠在号称“金号角”的海港里的时候，它作为罗马帝国的国家中心以高姿态翘首挺立于国家版图上。

这个时候，曾经高高在上的罗马居民被卸下帝国的保护伞，任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还有很多无名的野蛮人残害。皇宫连续好几年没有任何收入，政府组织陆续向博斯普鲁斯海峡之滨搬迁，千里之外的法律条令紧紧束缚着都城的人们，当这一切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时候，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惧笼罩在他们心里，挥之不去。

但是，历史是一个天平，一头上升，另一头就下降了。皇帝离开后，城镇的主权当然就落在了主教手里，作为皇位荣誉的继承人，他们才是实实在在的显贵。他们利用自己掌握城市主权的这段没有任何约束的大好时机，将教会的影响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使意大利所有的博学之才都对他们趋之若鹜，主教们在此成功地扮演了精明能干的政治家的角色。他们以传播永恒经典信念的代表自居，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做好了长期作战的准备，在这个过程中寻找最佳时机，来个出奇制胜。他们并不急于求成，因此没有像别人那样急功近利带来的压力，他们明白，太过急躁会引起慌乱，最终出错，欠缺考虑会招致失败。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主教们所做的一切、所说的任何话都是围绕一个目的进行的，他们为了上帝的荣誉和威严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使这个代表上帝的凡间组织教会更加强大、更有力量。他们用以后十几个世纪的时间充分证明了他们付出努力所取得的功绩。

教徒在黑暗混乱的中世纪的形象就是最好的佐证。那时候，欧洲大陆被野蛮部落搞得腥风血雨，帝国的围墙分崩离析，到处一片狼藉，破败腐朽，不堪入目，几千个跟巴比伦平原一样古老的体制被分割吹散，像垃圾一样到处飘落。只有教堂，作为唯一坚实的支撑屹立着，没有半点损伤。

虽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马厩里面诞生的基督教，最后在富丽的宫殿里安然了断一切。那些宣扬自己是神的使者，能在人与神之间自由对话的神父，努力做到了让每个世俗的凡人对他都绝对服从、俯首称臣，他们大概忘记了，基督教原本就是为了与政府抗争才发展起来的。带有变革性质的基督教经过发展，使新的神权政治体系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内就形成了。

现在，我将要用下面的篇幅来说明这种情况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科利西姆是现在很多到罗马旅游的人们必去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看到一块洼地，它在被风沙蚕食的围墙里安静地躺着，这个特殊的地方被数千名基督徒的鲜血浸染过，他们死于罗马专制统治之下。

有几次，新信仰的倡导者由于政治原因而遭到迫害，这与宗教的专横毫无关系。

以一个宗教派别存在的基督教拥有非常广泛的自由。但是，当他们以宗教道德为借口而拒绝服兵役的时候，他们被冠以国家敌人的身份，并且被送上了断头台，当然，除了拒服兵役那件事以外，他们竟

然在任何场合公开藐视、辱骂土地法，甚至在国家遭受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还若无其事的吹嘘所谓的和平主义，这些都是把他们逼上死路的原因。

基督徒受自己头脑里坚定信念的指引，各种言行围绕这个信念展开，但这一套在地方法官面前一文不值，那些政府长官们对于基督徒努力辩解的基督的道德本性一头雾水，一无所知。

这些罗马的地方法官被召唤来当审判官，面对罪犯的辩解和陈述，他们认为那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他只是个凡人而已，该如何判决，这倒是把他们给难住了。这个时候，他凭借长期累积的经验以及借用许多皇帝敕令中对政府官员的忠告，采用超脱的态度和圆滑世故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企图用说教的方式进行说服教育，但是，当全部的分歧意见触及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那些具有逻辑的方法就失去效用了。

到了最后，一道选择题摆在了这些长官面前：一个选项是弃法律的尊严于不顾，另一个选项是维护国家最高权力的惩罚职能，尽管这种职能可能不太够格。但是，在那些异教徒心里，死亡才是真正的生命的开始，离开这个邪恶的世界就能够去天堂享福，这对他们而言是何等幸福而值得欢呼的事情啊，所以牢狱和酷刑他们又怎么会放在眼里呢？

至此，一场痛苦而漫长的战争在政府和基督教徒之间爆发了。在这场战斗中死了多少人，并没有确切的官方记载。不过，根据奥利金的说法，“因为坚持信念而牺牲的真正的基督徒的数量是可以统计的”。放出这一说法的这位颇有名气的神父生活在公元3世纪，亚历山大曾经无情的迫害了他的很多亲戚。

我们可以从早期圣徒的研究中看到许多残酷带血的故事，这个屡次遭受迫害、被屠杀的宗教居然能够一直流传下来，这是怎么做到

的，真是让人费解。

即使我用确切的数字来加以说明，也难免会有人说我是骗子，是心怀偏见，对于这些，我无话可说，保留意见，读者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德西厄斯皇帝和瓦莱里安皇帝的生平，而且自己作一个定论，从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专制统治下疯狂迫害、杀戮的真面目。

除此之外，读者如果想透彻地了解远离帝国的那些小官吏们面对的困难，就先想想马可·奥勒留皇帝。你们可曾记得，这个英明睿智的帝王，居然在关于处理基督教徒的问题上公开承认自己的能力低下。那些小官吏们实在是非常的为难，他们要么就玩忽职守，不履行自己的职责，要么就杀掉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拒不服从帝国政府颁布的保护自己的简单法律。

与此同时，基督教并没有停止发展的步伐，教徒们没有被异教徒惺惺作态的小伤感所牵绊，反而不断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公元4世纪后期，由于罗马元老院的基督徒的控诉，格拉提恩皇帝下令将那座矗立了四百年之久的胜利女神雕像搬离了恺撒大帝创建的宫殿。基督徒们控诉的理由是这座圣像是异教的偶像，他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每天生活在这个异教偶像的阴影之下。有几个持反对意见的元老，还因为这件事而遭到流放。

这个时候，颇负盛名的昆塔斯·奥勒留·西马克斯及时站出来，这位忠实的爱国者写了一封书函，一个折中的道理跃然纸上。

“为什么？”他提出疑问，“我们异教徒与基督教的朋友们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我们抬起头看见的也是同一颗星星，在同一片土地上留下我们共同的脚印，我们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世间万物暗藏着如此之多的秘密玄机，寻求真理的方法有很多，通往真理的道路也有很多条，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走哪一条去追寻真正的道理，这一切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关于这个道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懂，古罗马宗教的开放性政策传统正在遭受威胁，关于这一点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看到。在拜占庭内部的两个敌对基督教派因为罗马胜利女神像搬离皇宫的事情展开了激烈争执。围绕这场争执，由哲学家泰米思提厄斯发起了关于宽容的才思广溢的大讨论，这种大讨论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行为。这位绝对忠诚于祖先信仰的上帝的讨论发起人看到瓦伦斯皇帝在正统与非正统的基督徒论战中表现的不够公平时，他认为皇帝必须了解自己真正的职责所在。

于是他发表了一通根本没有人听得进去的金玉良言："只有统治者不以强权政治来作威作福的国家才是真正的美好清明的国家，才算得上是一个人们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用强制专横的统治手段换来的归顺只是由欺骗和虚伪伪装而来的。宽容精神可以有效防止民众的冲突事件，因此，统治者要对所有的信仰持以宽容的态度。并且，宽容是上帝的旨意，上帝已经明确地向世人们阐明要允许多种宗教共同存在。对于人类寻找解释真理的各种方法，上帝都是能够辨别的，各种各样对他表示的崇拜，他也是欣然接受的，他喜欢基督徒的礼仪，也不排斥希腊人和埃及人的其他礼仪。"

思想也好、理想也好，在消失了的遥远的古代世界，没有任何行为、任何人可以成功地逆转时空。生活和进步，进步和磨砺是永远分不开的。旧的社会秩序正在迅速的消亡，边境叛乱不断，军队沦为反对帝国的外国雇佣民，野蛮人将英格兰和其他边陲之地收归己有。

几个世纪以来，为国家统治部门效力的聪明年轻人在最后的灾难的逼迫之下终于清醒地看到，只有供职教会才是唯一的升迁途径。我们来看一下基督教的权力，西班牙地方官员总是对主教俯首称臣，基督教的作者只是在研究理论方面的论题，大量的读者和崇拜者就会蜂拥而至，作为基督教外交官，如果他是罗马教皇的忠实代表，就可以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受到很好的待遇，又或者他们愿意到危险的高卢或斯堪的那维亚腹地去稍加走动，取得野蛮人首领的信任，平步青云地

高升就等着他们了。

在最近的五年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具有相同本质的事情，到公元1914年为止，那些胸怀大志的欧洲中部的青年人，他们跳开艰辛的体力劳动，把职业生涯规划入政府部门，渐渐地他们活跃在皇家陆军队、海军以及法庭的各个要职和首脑部位。他们把持着财政，成为殖民地的总督或军事总司令。财富并不是他们最终追求的目的，他们热衷的是这些体面的官职给他们带来的社会地位和认同感，他们充分发挥着聪明的头脑，非常勤奋努力，保持城市信用的美德，这些努力为他们的晚年带来了舒适的生活和人们的爱戴敬仰。

随着战争的爆发，在旧社会体系下的封建构建顷刻间土崩瓦解，政权又回到了下层阶级的手中。那些年事已高的正式官员无法在新潮流中有什么改变，他们变卖代表自己荣誉的勋章，将那些生前的习惯一同带进了坟墓。当然，绝大多数人都跟着潮流走。这些从小时候就接受良好教育的人，对经商持鄙夷的态度，他们认为做生意是很丢脸的事。先不提经商这件事，但是，现在摆在人们面前的是去办公室还是去贫民窟这样的选择。这场灾祸过后几年，我们已经很少会看见为了坚持信仰而饱受饥饿折磨的人了，至于那些政府官员和军官们，他们一概抛开十年前对生意的偏见，心甘情愿的混入经商行列淘金。另外，这些世代从政的家庭背景以及惯有的指挥别人的天性使他们在新的领域里受益匪浅，让他们的事业发展得比想象中的顺利，幸福和美满也就随之而来。

今天的经商贸易与教会在十六世纪以前的境况不谋而合。

很多的年轻人都自以为自己的祖先是赫拉克里斯、罗米拉斯或特洛伊战争的英雄，有如此“显赫”家世的人是不可能轻易听得进去一个奴隶的儿子、普通的平民教士的教导的。但是，矛盾的是，那些以赫拉克里斯、罗米拉斯和特洛伊战争的英雄的后代自居的年轻人狂热追求的东西只有那些身为奴隶的儿子、朴素的教士才能传授。所以，如

果这双方都能聪明机智一些（很可能是这样的），就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达到共赢互惠的局面。往往是从表面上看有很大变化的事物，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改变，这是奇怪的历史法则。

统治者只可能由很少的一部分智慧聪颖的人来当，而大部分愚笨的人的职责只是服从听任。这条不可逆转的规律是从远古时期，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形成的。不同的时代，这两种人分别有不同的名称，一类是力量、领袖的代名词，确切地说，他们被称为帝国、教堂、骑士、君主，而另外一类则是软弱和服从的代表，他们也有不同的名称，被称为民主、奴隶、农奴、无产者。但是，我们在莫斯科、伦敦、马德里和华盛顿所看到的关于推进人类发展的神秘规律都是一个样子的，没有因为地点不同而有异处。它用伪善、怪诞的外衣遮盖了原本残酷严苛的原始法则的真面目，继而向人们大肆鼓吹爱，对上帝的忠诚、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期望得到好处的愿望。但我们不得不接受人首先要满足生存这个职责的事实，很多人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这让他们既恼怒又反感。这些人认为出生在哺乳动物世界的人都是“唯物主义者”“愤世嫉俗者”这样。

他们宁愿把历史当作一个赏心悦目的神话故事来听，但，当历史以一门严谨的科学站在他们面前时，也许还带有对其他事物的控制性，他们就有些接受不了，感到无比惊讶，这时他们还可能连平行线法则和乘法口诀表都不认同了。

规律的东西是必须要服从的，这是我给他们的忠告。

只有做到这一点，历史的真正作用才能发挥，它应该以对人类的实用价值而存在，那些种族偏见、部落专横以及试图利用人们的无知来填充自己的行为，应该被彻底摒弃。

我在前面几页中已经写下了几个世纪的历史了，如果谁对上面的观点有怀疑的话，可以去看前面写过的那些历史，从中寻找证据。

如果对生活在最初的四个世纪里的教会领导的平生事迹作一个详细的研究，不难发现，这些在充满异议的古代社会出生的教会首领都曾经有过在希腊哲学家的学校里面接受教育的经历，毕业的时候，面临职业选择的时候，他们不得已步入了基督教会的殿堂。绝大多数人是因为想在教会得到升迁的机会才放弃效忠凡间的主人，而转投天国统治者的怀抱的，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几个真正被新思想感动、想真心诚意地追随基督的人。

教会从不过问那些新教徒从别的教会或民间进入基督教的真正目的，从这一点看，它其实是通情达理的，对教徒们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对所有的人认真细致的对待和保护。教会给那些对物质生活无比热爱的教徒提供进入政界和从事经济活动的机会，让他们大干一番。而对于那些一心追随教义，坚持信仰的人，教会同样也不会忘记，安排他们远离拥挤污秽的城市，在安静清幽的环境中继续思考领悟，让他们去追求让灵魂幸福安宁的仙境。

一开始，那些心中装满上帝，祈祷、思考、冥想的生活是非常自由舒心的。

教会刚刚建立的初期，那些远离政治中心、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下层阶级还没有明显地感到教会势力的干涉。但是，当教会接过帝国的接力棒，拥有了统治世界的权力的时候，那种与世无争的隐居生活便在这个拥有广袤土地的庞大政治组织的统领下慢慢消退了。“过去的美好生活”成为信徒们争先恐后追寻的目标，他们努力创造条件，为了幸福的生活，为了能像以前那样将做好事和祈祷作为最伟大的事业，他们要让过去那种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局面以人为的方式使之再次出现。

这场由东方传来的倡导修道院式生活的运动在历史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及深远的影响力一直延及一千年后的政治经济发展历程，并且在它的基础上产生了一支对付不信教和异教徒的强有力的军队，他

们绝对忠诚于教会。

对此，我们大可不必感到惊讶。

人们没有任何活力去钻研地中海东岸沿海国家的那些陈旧的文明，他们太过疲惫，对此提不起兴趣。当第一个居民决定在尼罗河谷定居的时候，埃及境内的几十种文化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做着循环运动。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上。路边到处是倒塌的庙宇和宫殿，在那一堆堆残垣断壁的废墟的背后，隐藏着人们空虚渺茫的生活，毫无希望和生机，人类努力付出和追寻，最后一无所获。欧洲的青年人出于对生活的无比热情而委身于基督教门下，至少，这些青年在那里可以挥洒一下他们的热情，消耗一下他们旺盛的精力。但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对自己宗教生活的看法与他们大相径庭。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渴望的是通过宗教之门走向死亡的崇高境界，他们渴望解脱，他们希望远离这个残酷的现实世界，不愿意看见堆满尸骨的冰冷，他们在沙漠里居住，宁愿自己孤单、自己悲伤，而与上帝同在。

在每一次的改革运动中，士兵们总是最先被感染和召唤的人群，这其中有很多原因难以解释清楚，他们是最先直面文明中的野蛮和恐怖面貌的人。另外，他们还具备强烈的纪律观点。查理五世军队中一个上尉，叫作帕科米乌，他是教会最伟大忠诚的卫士，这个埃及人曾经是君士坦丁帝王军队中的一名小兵，退役以后，他投靠了由小头目安东尼组织的一个小团体中，做了一个隐士。从此，他在远离城市的沙漠里同豺狼野狗一起生活。但是，有些隐士会在隐居生活中产生过分悲观的虔诚，使他们的行为走向极端，比如，有人会爬到高大的古石柱上去生活，也有人居然钻进荒废的坟墓里面去（这种行为被异教徒所嘲笑，真正的信仰者则感到伤感）。这就是隐居生活所萌发的一些思想矛盾。鉴于此，帕科米乌下决心要使这种活动与现实世界靠

拢，让它具有确实的实际效果。作为宗教秩序的第一个奠基人，那个时候（公元4世纪中期）他成为隐居者们共同的长官，他们称之为“最高统领”，每个修道院的院长都由他来任命，那些林立的修道院，在他看来就是上帝的堡垒。

公元346年，帕科米乌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来的修道院思想成为成百上千的人们躲避世界的避难所，在这个坚实的堡垒里面，现实的邪恶、掠夺再也不能侵蚀他们。最先将他的这种思想带到罗马的是生活在亚历山大时代的阿萨内修斯主教。

但是，与尼罗河谷的景象大不相同，欧洲有冰天雪地的气候，人们不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忍受品尝饥寒交迫的滋味，再加上欧洲人超现实的本性，他们也不可能在东方思想表现出的肮脏和邋遢里得到什么有用的启示，反而让他们感到恶心乏味，于是，创始人不得不把这番事业做一下修改，使它更适合欧洲人的口味。

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开始反思：“早期教会励精图治、做了很多善事，可是并没有得到什么好的结果，几个人住在遥远的森林里，搭起阴冷的帐篷，禁欲苦修，这样的行为并没有给寡妇、孤儿和病人带来任何的好处。”

西方世界的首领们下决心要对修道院思想进行修改，让这种体系趋于合理化，在这件事情中，住在亚平宁山脉纳西亚镇的本笃具有很大的功劳，这位被称为圣人本笃的人，曾被他的父母送到罗马去学习过，在那段学习的期间，这个城市给他的基督心灵带来了莫大的恐惧感，于是他逃走了，在阿布鲁齐山的苏比亚克村的一座尼禄时代的古老乡间会所里过了三年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在他隐居期间，他的盛名和美德迅速传遍了乡间村落，谁要是能够与他有所接触，就能立刻名满天下，于是大批的隐居者慕名而来，这些人实在是太多了，非得要修建十几座修道院才能容得下他们。

为了更好地统领这些追随者，本笃离开了隐居的土窟，开始为修道者们编制法典。制定法律是他首先做的一件事，在他的法律条款文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罗马血统的影子。那些发誓追随他，并坚定地遵守他法律的僧人们每天都必须祝福和默默祈祷，此外，他们必须到田地里去辛勤劳作，并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让他们游手好闲。就算是年迈干不了繁重农活的人也不能闲着，他们有另外一个职责，就是教育年轻僧人做一个好的基督徒和好公民。本笃修道院的教育能够屹立千年不倒，并且时刻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与这些严谨的制度以及僧人们恪尽职守的品质是分不开的。在中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它获准成为才能超群的年轻人的培养基地。

当然，僧人们并不是白白地辛苦劳作，他们可以得到漂亮得体的服装，有丰盛可口的食物，有舒适的温床，要是不干活不祈祷的时候，还有两三个小时用来睡觉。

但是站在历史的高度，僧人是上帝的仆人，这一点才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不是那种为了躲避现实的残酷和推脱义务而躲进修道院祈祷，只为了下辈子的灵魂能得到解救的普通凡人。为了对得起上帝仆人的这一光荣尊称，他们必须在尘世中接受漫长的痛苦煎熬和锻炼，这样才能为传播天国中上帝的思想和旨意发挥有效的作用。

要向欧洲那些原本不信教的人们传播教义，这项工作的初期准备已经完成了，但是，这种成果必须加以巩固，为了取得老百姓们和官员们强有力的支持，僧人们不得不千里迢迢地来到德国、斯堪的那维亚、俄国和远方荒凉的冰岛，他们背着铁锹和斧头，带着祷告书，辛勤地劳作、收获、传道、开办学校，第一次为这片远方的土地播下了许多人只是听闻过的文明的种子。

各种各样的人类精神力量就是以这种方式尽收在罗马教皇的手中——这位教会的最高统领。

这个世界上没有白做的运动，也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浪费的，具有实干精神的人总有出人头地的一天，这跟做梦者会在梦里安静的树林中找寻到幸福是一个道理，只要采取运动，力量就会壮大，很快，随着基督教徒们力量的发展壮大，他们可以对国王和皇帝理直气壮地提自己的要求了，而帝王们如果还想继续待在自己的王座上，就不得不做出某些让步。

基督教徒取得成功绝对不是单单靠人们心血来潮对宗教狂热追随的结果（大多数人可能这样认为），它是有很明确的原因的，我们可以从取得最后胜利的方法中看到。

戴克里先皇帝统治时期，基督教徒又被牵进了无情的迫害之中，这是最后一次了。

不得不提的是，在欧洲用近卫军力量登上统治者宝座的众多君主中，戴克里先并不是最残暴的一个，可是历代的人类统治者当中，这个对经济知识一无所知的人却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

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所统治的这个帝国已经大不如前了，国力衰落，正在走向土崩瓦解的地步，这个久经沙场、戎马一生的帝王清楚地知道问题的症结就是罗马的军事体制。正是这个体制的规定，国家的边防守卫任务由占领地的士兵来执行，但是，非常不幸，这些士兵已经在长期的生活中成了乡村俘虏，优哉游哉地过着乡下人的生活，甚至还与本应该赶至国门外的野蛮人做了卖萝卜白菜的勾当，他们早已斗志全无。

摇摇欲坠的帝国体制必将走向覆灭，这是他无力改变的事实，可是，他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召集了众多年轻机智的战士，组成一支新型野战军，这支强悍的队伍能在帝国遭受入侵的第一时间内奔赴帝国的任何地方，为帝国解除危机。

这确实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但问题是这需要十分庞大的一笔费用

来支撑，几乎所有军事领域的好方法都要附带这个条件。军队开销由赋税支付，而赋税就牵扯到百姓的钱包了，果然，老百姓不干了，他们太过愤怒了，高声控诉这些赋税会让他们倾家荡产。皇帝一边安抚百姓们说是他们想错了，一方面又赋予了收税官刽子手一样的权力。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各行各业的人们辛苦劳作，一年到头却并没有收获，只是亏损而已，于是他们不得不抛家离乡，走上了在城市流浪、乞讨的道路。

到此，皇帝一鼓作气，颁布了一道使罗马帝国彻底走向东方专制主义的法令，用以解决当前所遇到的困难。他规定所有政府机关、手工业、商业都成为世袭的职业，换句话说就是官员的儿子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只有当官这条路走，面包匠的儿子永远也只能是个面包匠，即使他是个音乐天才或者典当业天才，也只能在面包房度过一生。水手的儿子则注定在船板上过完一生，即使他只在台伯河划船都会晕船，他的一生也必将跟船板连接在一起。相比较而言，苦工在技术上倒是自由的，但是他们就像奴隶一样一辈子都不能踏出出生地一步。

那些自负的统治者会不会忍受得了人们凭着自己的喜好干遵守或反对法律规定的事呢？尽管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如果有谁认为他们会，那就错了。戴克里先的确是对基督徒采取了暴戾的行为，可是，那个时期，他已经在进退两难的境地徘徊了，再加上他对上百万的人们的忠诚是持怀疑态度的，那些臣民们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无动于衷，只知道在皇帝的庇护下享受物质生活，整天声色犬马，没有半点为国家承担忧虑的责任心。所以，当我们对戴克里先皇帝作评价的时候，必须对那个时候的一些背景作深刻的了解。

在早期的基督徒的意识里，世界随时可能从这个地球上消失，并且这也是他们所希望发生的，所以，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去写那些文学作品，即使写出来，连十年的时间也保存不了就要在世界毁灭的烈火中丧失了。正因为如此，他们懒得动笔去做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以至于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传世。可是，世界并没有在新教徒的预

言中毁灭。口口相传的基督教故事，越来越背离了原本的位置，人们总是热衷于对它添枝加叶，所以，那些忠诚的信徒们已经无法区别它的真假了。《新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人们想要一本更权威的书，收录和整编耶稣的短传和圣徒们的信件。

有关城市建立在“七座山”之中的佐证和预言被收录在这本书中的《启示录》那一章中。传说，罗马是建立在七座山之中的城市，人们从罗慕拉斯时代就已经知道了，描写这一章的作者以匿名形式向人们讲述的那个城市就是巴比伦，他对那个城市深恶痛绝，尽管他只是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但是，帝国的官员还是充分地理解了。在书中，那个城市成了“妓女的母亲”，是“地球的污点”，所有的魔鬼和邪恶之徒的老窝，那里洒遍了圣人和牺牲者的血液，是所有恶心肮脏的鸟类的卵巢，像这样的污言秽语随处可见。

可能，这位作者在撰写本章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多年前被残害的朋友们，于是，他内心开始汹涌澎湃、热血沸腾，同情和怒火同时向他攻击，在他一颗狂热之心的驱使下，那些胡言乱语就这样落在了纸上，我们只能这样理解。这些言论在教堂里被一层又一层地赋予神圣的外衣，教士们无比虔诚地在庄严的礼拜仪式上向人们宣读，所以，旁观者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语言的确是代表了基督徒们对位于台伯河畔的那个强大城市的真实看法。当然，基督徒们大概是可以跟旁观者们达成一样的共识，可是，我们却不能苛责戴克里先的不同观点和情感。

这并没有代表全部。

关于“异教徒”这个词，起先罗马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后来这个概念就在他们头脑中渐渐变得清晰了。最开始的时候，“异教徒”这个名称可以与一个“教派”相提并论，它是指那些愿意信仰某些教义的人们。慢慢地，它的意思缩小了，专指那些不信仰教会的人，他们公然反对教会权威制定的“正确”“合理”“真实”“正统”的教旨，圣徒给他们

戴上了“异端、谬误、虚假和永恒错误”的帽子。

有几个隔离在基督教会的罗马人，他们虽然坚持旧信仰，但却可以不被冠以异端邪说的罪名，这些被隔离在基督教徒之外的人连阐释自己观点的权利也是没有的。同样，《新约》中的那些诸如“异端邪说是可怕的邪恶，犹如通奸、猥亵、淫荡、偶像崇拜、巫术、愤怒、怒火、争斗、杀戮、祸乱、酗酒”这些话是有伤皇帝自尊的，当然，这类语言还有很多，基于礼貌问题，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

摩擦、误会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接下来自然是血腥的迫害了。于是，我们又看到了血流成河的局面，基督教囚徒住满了罗马的每一个监狱，他们一批一批地倒在刽子手的刀下，尽管数量与日俱增，却并没有什么收获。戴克里先已经没有任何招数了，他走投无路，只好从帝国统治者的王位上走下来，回到家乡，一心一意从事更有趣味的消遣——在后院里种大白菜。

王位的继任者君士坦丁大帝终止了这种屠杀镇压策略，在313年，首次以官方名义承认了基督教会，因为他清楚地意识到，依靠暴力是不可能铲除基督教的，于是便改变政策，做了一场有损威严的交易，借以收买敌人。

假如有一天，我们成立了一个“国际历史修改研究会”，用特定的标准对所有皇帝、国王、总统、教皇、市长这些带“大”字称号的人作一个评价，那么君士坦丁大帝是“国际历史修改研究会”法庭需要特别谨慎细致考量的一位人物。

君士坦丁大帝，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无比野蛮的塞尔维亚人，从英格兰的约克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拜占庭，他驰骋在欧洲的各个战场上，金戈铁马，手刃无数人的生命，甚至还包括他的妻子、姐夫和侄子，连一位地位低下的亲戚也没能从他的屠刀下逃生。就是这么一个残暴的人却具有“第二个摩西”的称号，这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

当他最危险的对手马克森提乌让他手足无措的时候，他为了获得基督徒们有力地支持而大肆许愿和承诺。在亚美尼亚和俄国教会中他是圣人的化身。这个天生的野蛮人是不可能真正认可基督教的，在他即将死亡的时候还企图蒸煮祭祀羊，用它的内脏来测算未来。可是，这些在他的《米兰赦令》面前都微不足道，不会有人想起的，基督徒们只知道这位帝王在《米兰赦令》中向他们承诺“不干涉他们的自由言论和集会”。

这个法令的颁布，确实是值得纪念的事情，它使基督教这个小教派披上了国教的华丽外衣。这都是教会首领们的功劳，关于公元4世纪上半期这些首领们实用政治家的本性，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说过了。对于这件事情成功的内幕，教会首领们和君士坦丁的后裔们都非常清楚。不管施展怎样花言巧语的本领，也不可能瞒天过海、扼杀真相。

“伟大的帝国领袖，请把那些反对教会的敌人交给我来处理，你的敌人同时也是我的敌人，我们是站在一起的，你的敌人由我来帮你清除，你跟我站在一起，就可以看见天堂。”这是聂斯托利主教对狄奥多西皇帝的承诺，由此，这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交易达成了。

虽然，有无数这样的交易发生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但是像基督教掌权这样的妥协还真是绝无仅有。

至此，基督教收获了巨大的权力。

第五章　禁锢

在这里我要讲一下朱利安皇帝。

在世界历史舞台上，朱利安皇帝确实是一个在古代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圣徒”光环的笼罩仍然延续不了他短暂的生命，这让我们觉得无比遗憾。这位君士坦丁大帝的侄子于331年在帝国新首都呱呱坠地。在337年，他那曾经显赫一时的叔叔撒手人寰了，他的财产成了三个饿狼儿子疯狂争夺的对象，于是出现了相互厮打的局面。当然，为了赌上那些觊觎的眼睛，住在城里及附近的皇亲国戚也被荣幸地邀请到了这种战斗的局面中来，朱利安的父亲就是在这场斗争中遇害的。他的母亲在他出生几年后也离开了人世，从此这个六岁的孩子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儿。

在此后的日子里，只有一个体弱多病的表兄陪着他，他们一起接受教育，亲切和蔼但无所作为的尤斯比乌主教是他们的老师，关于基督教诸多好处的教义是他们主要学习和接受的内容。

为了避免小拜占庭王子那样可怕的遭遇落在他们身上，长大后的孩子被人们送到了远离都城的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小村庄里去了，在那种平淡无奇、索然无味的生活状况下，年轻的朱利安从他的邻居卡帕多西亚的山里人那里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他的这些邻居们生活朴实，对先辈信仰的天神们顶礼膜拜，万分推崇。

在小村子里生活的孩子根本没有任何机会接触什么重要的职务，更别说能参与政治管理，他只是希望能够有学习的机会，可以潜心研

究学问，这么点要求，还是得到了许可的。

于是这个为文学和科学所牵引的人首先来到了尼科美迪亚，古希腊哲学只有在这个地方还有其他很少几个地方得以继续地教授，深受科学和文学影响的年轻人来到这个地方后，原先在尤斯比乌那儿学来的东西已经完全被挤兑得掉出脑子了。

此后，他还去过雅典，重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待过的圣地，他在那里专心学习，这些都是获得批准后才实施的，但不幸的是，与他一起成长的表兄死于暗杀者的屠刀下。这个时候，帝国的统治者君士坦提乌，也就是君士坦丁剩下的唯一一个儿子，也是他的堂兄，深深感到，皇族中男性力量的薄弱，他和他，是这个世界上仅存的两个皇族男性，于是，朱利安被顺利地接回了皇室，受到亲切的礼待，并与君士坦提乌的妹妹海伦娜结了婚，此后，他受命到高卢去与野蛮人作战。

公元357年，朱利安在斯特拉斯堡附近击败了威胁法国的阿拉曼尼人，此外，他还充分运用他的聪明才智收获了穆茨河和莱茵之间的土地，扩充了自己省份的疆土。由此看来，他在希腊老师那里不仅只学到磨嘴皮子的功夫，还有更实用的东西。住进巴黎的他，用自己所喜爱的作家的书籍装点了自己的图书室，这个平时严肃死板的人这次也禁不住笑容满面。

这个胜利的消息在皇帝看来是一个强大对手的崛起，因此，等待他的不是庆祝胜利的火焰，而是一个无懈可击的谋杀阴谋，他的成功大得有点过了，让皇帝受到了威胁。

当朱利安率领的士兵中有人听到他将被召回的消息（一种委婉的说法，其实是将被杀头的邀请）时，不由分说地闯入他的宫殿，立刻拥立他为皇帝，同时对外宣称，他不接受的后果是被杀头，聪明的朱利安大大方方地接受了士兵的要求，他在士兵当中的威望不言而喻。

朱利安抢先率部从法国中部向博斯普鲁斯海岸挺进，其速度之快，无法言喻，那时通向罗马的道路艰险异常，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就在他即将到达首都的时候，却传来了他的堂兄君士坦提乌的死讯，由此，西方世界又回到异教徒的统治之下。

这个睿智聪颖的人所追求的一切未免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他认为过去消失的一切经过努力就可以重现，死掉的东西可以依靠某一种力量得到重生。他认为在城市的废墟上重新建造、让人们再次住进荒废的学园、教授们套上过去的宽大外袍、人们用消失了五个世纪的言语沟通，就可以回到伯里克利的时代，他力图要做到这些，可是，这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

那些古老的科学，大多数人都不再问津了，却是朱利安在执政的两年时间里努力探索的领域，他想将它重新恢复，还有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僧侣，他们异想天开的认为一本书就包括了所有值得了解的东西，独辟蹊径的调查研究是对自身信仰的亵渎，地狱之火会对这种丢失信仰的人施以严厉的惩罚，除了这个僧人的统治世界外，恢复高度活力和热情的人们的快乐生活，也是朱利安努力奋斗的事业。

他到了众叛亲离、举步维艰的地步，他晕头转向，反对之声一波接着一波，纵然是比他更加坚强勇敢的人恐怕也抵挡不住如此巨大的不安和悲观失望。某一段时间里，他将希望寄托于祖先留下的有益的经验教训上。尽管安提阿信奉基督教的老百姓的石头和泥土无情地投掷在他身上，尽管那些愚蠢的僧人想方设法惹恼他，试图掀起新的迫害高潮，但他还是保持仁慈之心，没有降罪于这个城市，也不允许手下的官员惩罚他们，并告诫他们：“不要造成牺牲。”

这段奇怪的生命历程，在公元363年，被一支仁慈的弓箭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这样的结局对于这位最后的，也是最伟大的异教徒统治者来说，

未必不是最好的结局。

假如，他的生命延续得更长一些，他在病榻上回忆的时候，会不会那样坦然地想起，他统治的时候，并没有处死过任何一个与他有意见分歧的人，这其实是很难保证的。他的忍耐力被那些愚蠢无知的僧侣挑拨到极限的时候，说不定他的大名会书写在历史专横暴君的名单里。就是这样一个仁慈、简朴而充满智慧的君主，他得到的不是礼赞和歌颂，而是基督教臣民们仇视的目光和冰冷的情感，当他死在自己士兵（一个基督叛军团的士兵）的弓箭下的时候，迎来的不是扼腕叹息、悲痛遗憾，而是炫耀欢呼、大快人心。那些无比仇恨他的基督臣民们穷其所学、冥思苦想地寻找词汇来贬低他、污蔑他、诽谤他，他们甚至大肆歌颂赞扬那个杀害他的凶手，并且编造朱利安死前是怎样承认自己做法的错误和承认基督的权力的谎言。这个劳心费神、俭朴自律的正人君子一生都在为臣民们谋取幸福，最后却得到了这样的下场。

当朱利安的躯壳安静地躺在冰冷的坟墓里的时候，基督教的主教们立刻采取行动，对欧洲、亚洲、非洲的每一个角落进行扫荡，把一切反对的声音掐死在人们的喉咙里，他们堂而皇之地以帝国的统治者自居。

公元364年到378年，瓦林丁尼和瓦林斯兄弟当政时期，一条不允许任何罗马人向旧天神祭祀牲畜的法令横空出世，异教徒的收入以这种形式被剥夺了，他们不得不另寻出路。

不过，这比起狄奥多西皇帝在位时颁布的那条让所有臣民接受基督教义，而且接受“天主教”的形式的法令比起来，已经算是很微不足道的了。狄奥多西皇帝将自己作为天主教的庇护者的形象，以大主教的身份彻底控制、束缚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在这项新颁布的法律面前，那些坚持“错误观点”的人，那些将“愚

蠢的异端邪说”视为信仰的人，那些对“可耻教义”推崇的人连无谓的抵抗和呻吟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将被放逐，或者是在极刑中丧命。

这之后，旧世界更加快了他走向灭亡的步伐。桥梁、街道、城墙、瞭望塔以及基督徒会场迅速覆盖了异教徒的庙宇，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英格兰再也找不出一座异教徒的庙宇了。

数以万计的金制和银制神像不是被没收就是被偷盗，最后剩下的也被砸得粉碎，这些东西都是从共和国建立时就开始积累下来的。

屹立于亚历山大城的塞拉佩恩庙在六个多世纪里备受希腊人、罗马人和埃及人所尊崇，如今也变成一堆废墟。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就闻名世界的大学因为亚历山大主教下的谕旨可以继续开课授业，向人们解释各种古老的哲学，但这道谕旨并没有保护好哲学家们，教区的僧人私自闯进教堂对他们进行迫害，最后，一个柏拉图学派的教师海帕提亚被他们一顿毒打后大卸八块丢弃在大街上喂野狗去了。

罗马的遭遇也并没有好到哪里去，甚至是有过之无不及。

都城的断壁残垣中再也看不到朱庇特神庙，古罗马信仰的经典《西比尔书》在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大名鼎鼎的图尔斯主教当权的高卢，当旧的天神被扣上基督教义中万恶的魔鬼的前身时，所有的庙宇都不约而同地消失在了这个地球上。

旧天神在偏远的乡村也没能逃离厄运，当农民们奋起捍卫自己心中的天神的时候，就会招致大批的军队，他们以平息“撒旦的叛乱”为己任，斧子和绞刑架成为他们最好的武器。

这些破坏活动在希腊似乎要进行得稍缓慢一些，但是到了公元394年的时候，从无间断地举办过一千一百七十年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最终受到了被禁止的命运，其他活动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活动被终止的

同时顷刻间分崩离析。查士丁尼皇帝一道命令关闭了雅典大学并没收了基金，哲学家在这个国土上再无立锥之地，被驱逐是给他们的最后礼遇。谋生之路被阻断的六位教授逃到波斯，受到了波斯国王乔思罗斯的友好接待。他们的晚年就在奇特新潮的印度游戏——棋类游戏中如世外桃源般的度完了。

公元5世纪前半叶，古代作家和哲学家的著作在克里索斯托大主教无比自豪地宣布下，在地球上安然隐退，踪迹全无了。丢弃在阁楼和地窖里的西塞罗、苏格拉底、韦尔吉尔和荷马（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由于被所有正派的基督徒恨之入骨，就更不在话下了）在人们的记忆里渐渐消失殆尽。这些曾经让人们无比崇敬、惶恐战兢的文学艺术要在六百年以后才能重见天日。在这段时间里，整个世界只能靠那些神学家赐予的文学食粮生活。

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犹如奇怪的节食（医学术语），无法看到它的平衡性。

在与异教徒的战斗中，基督教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是，很多困难却接踵而至，困境并没有得到解脱。对于高卢和卢西塔尼亚的那些高声疾呼、为信仰的老上帝踊跃上香的贫苦农民是可以轻而易举被制伏的。关键的问题是，基督的真实面目是否如奥斯特罗哥特人、阿拉曼尼人和朗戈巴德人所描绘的那样，亚历山大教士阿里乌是否也认为就是那样。基督教会还要面对阿里乌与死对头阿萨内修斯之间的激烈的争执和斗争，朗戈巴德人和法兰克人关于基督与上帝“并非同类，只是很像”之间的分歧争论让他们无比头疼，聂斯特利所说的圣母玛利亚是“基督的母亲”或者是“上帝的母亲”究竟对不对，这个佐证的过程一度使得汪达尔人和撒克逊人剑拔弩张，布尔戈尼人和弗里西人对耶稣是否具有半人半兽的二重性而刀剑相向。这些野蛮的人，总是表现得愚笨蠢钝，而四肢又太过发达，他们接受了基督教义，却没有真正受到熏陶，走进错误的路途，但鉴于他们是教会的拥护者和忠实的朋友的身份，地狱之火和收回信仰资格的教规用在他们身上有些

不合适，于是教会决定指引疏导他们，好言劝服，给他们指出错误，提点他们走进光明的路途，使他们成为仁慈并具有奉献精神的合格信徒。

然而，拿什么来具体教导说服这些人呢，这就必须要有意义明确的教旨，知道了衡量对错的尺度，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关于人们所信仰的东西，各种说法层出不穷，人们迫切希望能够有一个整合的说法，于是，“基督教世界范围联合会”问世了。这个基督教的著名集会从公元4世纪中期开始就不定期的召开，集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并决定教义的对错，揪出异端邪说的印痕，纠正偏差，铲除异端和谬误。

第一次联合会议召开于公元325年，地点是特洛伊附近的尼西亚，五十六年后，在君士坦丁堡又召开了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于公元431年在以弗所召开。从此以后，这个伟大的会议先后在查尔斯顿召开过几次，君士坦丁堡召开过两次，尼西亚一次，公元869年，再次回到君士坦丁堡完成了最后一次会议。

之后，会议召开地的选择权便归于罗马教皇，他可以指定欧洲的任何一个城市作为召开地，皇帝虽然也有这个权力（这一权力使他不得不成为主教路费的埋单人），但是公元4世纪的人们更重视权力至高无上的罗马教皇的意见。对于第一次尼西亚会议究竟是在谁的主持下召开的，今天我们已经得不到确切的证实，但是之后的会议被教皇操纵和主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教皇对圣会有绝对的决定权，没有经过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的会议是没有任何效力的。

说完君士坦丁堡，让我们把目光投向风景秀丽、风调雨顺的西部地方吧，让我们去踏访那里的情景。

关于宽容与专横关系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也没有达到过平衡互惠的状态，是人类高尚的品德体现还是道德观念中的败笔，这个争

论在两方之间一直徘徊着，我当然不想从理论这个层面来讨论这个话题，但是当教会的拥护者总是为镇压异教徒的种种残酷行为大肆辩解时，的确说得有板有眼，这是必须承认的。

他们认为：“教会就如同一个村子、一个部落、一片森林，它跟其他的组织体系一样需要一个总的领导者，要有供所有成员遵守的一套明确的体系和规则，宣布对教会忠诚就是对教会和首领忠诚，就等于自觉服从法规。假如他们不能做到这些，就根据他们自己订立的法规和游戏规则被踢出教会组织。”

到现在为止，这些做法是正确的，也是合理的。

现在，人们在信仰方面享有充分的选择权利，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教派加以崇拜，随他们个人意愿，没有人干涉他们和阻止他们，除了食不果腹的家里人可能会反对他们一下。譬如，今天他们对浸礼会教派的经典感到反感，那么明天就可以拜倒在美以美教派的门下，当他们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没有兴趣的时候，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的大门随时向他们敞开着，他们只要昂首阔步地走进去就行了。但这是在有轮船、火车和经济发展时代才可能成为现实的。

在罗马教皇主宰一切的公元5世纪，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存在的，到处都是教皇的影子和声音，除非人们可以忍受妻离子散、天各一方的痛苦，不惧怕路途艰险、惊险刺激，倒是可以选择远走他乡，去波斯或印度。

我们要了解的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有理由相信自己对基督有着正确的理解，教会会听从他们的意见，然后对教旨作一个修正，只是需要时间而已，但他们为什么还要放弃信仰自由的权利呢？

早期的基督徒一致认为思想价值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这种想法无论是虔诚的教徒还是怀有异端的教徒，都疯狂的相似。

像一个博学的数学家为了争辩某个无法定义的东西而把败诉的一方推向绞刑架一样，渊博的神学家们把上帝的本质用公式来表达，用以向人们说明那些根本没法解释的事情，真是荒谬绝伦。

可是，自以为是、各执己见、专横霸道的风气已经笼罩了整个世界。

直到现在，那些基于“人们从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理论而提倡宽容的人们为躲避祸害仍然不敢明确地阐明他们的本意，而是用拉丁文为他们的忠告作掩护。

当然，能够揭开面纱真正读懂他们意思的人毕竟是少之又少。

第六章　生活的纯洁

我在这里插一个数学方面的小问题，这并不是故弄玄虚。

像下图这样用一根绳子围成圆圈，当然，这个圈里面的直径各处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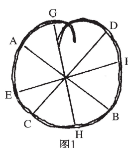


图1

AB＝CD＝EF＝GH，

以此类推。

在这个正圆中，所有的直径都是相同的，如果轻轻地把绳子向两边拉扯，原先的平衡就不复存在了，正圆也变成了椭圆，当然，各条直径也不可能再相等，而变得长短不一。AB和EF等几条线段已经缩短，CD线和其他别的线却是增长了。

历史问题也可以用这个数学问题加以诠释，为方便起见，我们对线段作如下假设：

那么在图1那个各条直径相等的正圆里，代表政治、商业、艺术和军事的线段是一样长的，这说明对他们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是一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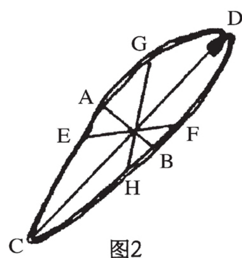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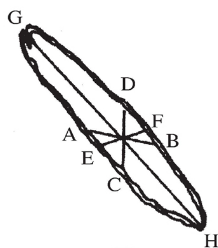


图3

图2图3　AB代表政治，CD代表商业，EF代表艺术，GH代表军事。

到了图2中（它不是一个圆圈了），情况就不一样了，代表商业的线段特别长，说明他的地位很高，受到的待遇也优厚，而代表政治和艺术的线段很短，说明它的地位微乎其微了，相反，军事方面的地位又见长了一些。

或者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案，让GH（军事）线段成为最长，相对的其他方面急速缩短。

可以用这把钥匙来解释历史问题，更易于理解。

这个完美的圆圈，希腊人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随着各种斗争和争执的开始，圆圈就被破坏了。各个不同利益体的政党之间的争吵愈演愈烈，国家长年经受内战的炮火袭击，精疲力竭，逐渐衰弱。那些试图修改征税法的人以及立场不坚定将选票投向另一个候选人的

人成为士兵们枪炮下的牺牲品，这个时候的士兵们的职责已经不是抵御侵略、保护国家，他们听从命令，向国人开火。

作为圆圈中最重要的直线，商业的处境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向世界上其他地方转移是它最后的选择，至少它可以在那些地方找到稳定的发展环境。

当贫困的脚步刚刚踏进前门的时候，后门就看见艺术逃走的身影，随之消失的还有资本，它驾驶的航船以一百海里内最快的速度冲出城域的管辖。智力活动越来越高高在上，成为一般人无法接受的奢侈品，那些最优秀的教师在好学校无法经营的情况下纷纷投奔到罗马和亚历山大。只剩下那些在传统和常规的保护下生活的二等货色。

由此可以看到，完美圆圈的平衡性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政治的线段被超常规地拉长，而代表艺术、科学、哲学等的线段却无法在圆圈里面找到一席之地，完全被挤兑出去了。

将圆圈理论套用在罗马，会反映出这样的问题，代表政治权力的这条特殊线段正在不停地延长，被拉长到一个极限，将所有支撑圆圈的其他线条统统扳倒，整个空间完全消失，只剩下一条直线，于是代表共和国荣耀的圆圈也就不复存在了。从直线的这头到那头，连接着成功与失败，这也是这两者之间最短的距离。

下面，再用中世纪教会的例子来印证这个数学问题，我们会惊奇地发现这些情况：

对于维持这个圆圈的完美，早期的基督徒确实是下了功夫的，但是，对他们而言，这个世界仅仅只是去往天堂的一个入口而已，所以他们对世界上的生活丝毫不感兴趣，对医学、物理、天文这些有用的学科既不关注，也没有兴趣，所以这个圆圈的直径注定是没有科学的存在空间的。

但是，基督的其他追随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倒是很务实的，他们竭尽全力（尽管还是很不完备）保持着勤奋刻苦、慈善宽厚、大仁大义、诚实正直。

然而，这个原本完美的精神圆圈，在许多的社团连结为一个大组织的时候，便受到了新世界的责任义务的威胁，并渐渐遭到破坏。这些人站在贫穷和无私的基石上宣扬自己的信仰，这样的信条使那些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觉得很容易接受和遵守。但是，像生活在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省镇的小执事那样过清贫节俭的生活对于罗马皇帝的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及欧洲大陆上的富豪们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用我们在这个章节里一直套用的数学术语来讲，在圆圈中“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线伸得太长，相对的，“贫穷”“无私”和代表其他基督教基本道德的直线被挤兑得几乎没有了空间。

对于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我们现在的这代人说起来的时候都会对他们产生无比的同情，那些生活在黑暗社会的人们每天在教堂里面点起蜡烛，微弱的烛光映衬着他们睡意横生的倦容，没有什么书本供他们阅读，更别说现在小学里和高级精神病院里面教授的东西了。尽管如此，知识的匮乏并没有影响到这些自由民的智力发展，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沿用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就是他们聪明才智的结晶。

我们对于他们的评价应该要客观公正一些，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在教会恶毒残酷的诽谤面前抬不起头来，没有采取更好的对策来回应，但是，他们对自己信念的坚持是很值得肯定的，为了保护他们心中认可的东西，不惜牺牲个人幸福，甚至还把自己送上断头台，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所知道的就只有这些了，至于其他的事情是什么，没有办法作进一步的了解。

确实，基于教会对异教徒的憎恨和仇视程度一如从前的情况下，

在公元的第一个千年里，能够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付出生命的人凤毛麟角，这些跟基督教会观点分歧的人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危害，相比之下，他们还有更为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实在无暇顾及他事。

首先，奥丁神和其他异教神仍然主宰着欧洲的许多地方，他们最高统治者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然后，更为严重的是有一个新的先知诞生了，这件事情的发生对于整个欧洲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它几乎将欧洲陷于崩溃的地步，而这个新出现的先知就是我们今天熟知的穆罕默德；由此新的上帝“真主”也产生了，西亚和北非在他和他的追随者的努力下被迅速地征服了。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异教狗”以及关于土耳其人凶残恶毒的故事充满了我们的文学读本，这些故事在我们脑海里留下了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宣扬的思想理念之间是各行其道、互不相容的印象。但实际上，他们是说同一种语系方言的同一个种族，亚伯拉罕是他们共同的始祖，甚至连祖籍都是一样的，都发源于一千年前的波斯湾。

细细追究这两位大人物的拥护者，他们其实是有着亲戚关系的，但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友好相处过，仇恨和抱怨一直延续了十二个世纪。

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去做一些“假如”的猜想了，只会是浪费精力，倒是曾经有过这么一次，被罗马视为最大仇敌的麦加差点就折服在了基督信仰之下。

阿拉伯人秉承了沙漠居民的生活习俗，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与家畜打交道，放牧的充裕时间成为他们默祷的大好机会。比起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牧民、渔民和农夫的生活过于单调而且乏味，再加上贫困的折磨，没有城镇集市肯为他们提供乐趣，他们迫切需要一种比热闹和刺激且更为实际的东西来解救他们孤单无依的灵魂。

阿拉伯人迫切地希望得到救赎，在多种宗教中徘徊试探后，他们还是最中意犹太教，这跟他们本身就是犹太人有直接的关联。说到犹太教在阿拉伯的传播要追溯到公元前10世纪，那时大量的流民无法忍受沉重的苛捐杂税和统治者的霸道专横而纷纷逃离所罗门王国，来到阿拉伯。到了公元586年，也就是距离那段逃亡三百年时间的时候，犹太人被尼布甲尼撒所征服，更加荒凉的南部沙漠第二次迎来了它的主人——逃亡的犹太人。随之而来的还有犹太教，在犹太人的信念里，只有唯一一个真正的上帝才是世界的主宰，而恰恰阿拉伯部落的人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惊人的相似让他们更加紧密。

如果你拜读过穆罕默德的著作，你就很清楚这个麦地那人与《旧约》之间的关系了，《旧约》中的很多至理名言都曾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面。

以实玛利（和他母亲夏甲一起埋葬在阿拉伯中部的犹太神殿中的至圣所）的后代们与拿撒勒年轻的改革者之间是可以友好对话的。反之，耶稣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世界唯一的主宰，对于所有人而言，他都是仁慈的父亲，人们对此没有丝毫怀疑和迟疑。对于那些追随拿撒勒木匠的人嘴里面念叨的奇迹，他们是不会轻易接受和相信的，更别说复活了，对他们而言，那简直就是一派胡言。当然，对待新信仰，他们是持宽容态度的。

但是，最终还是发生了让生活在沙漠里的人们对基督教失去信心的事情：有一伙头脑发热的疯狂的基督徒让穆罕默德吃尽了苦头，并且不给他任何申辩的机会，对他进行污蔑和诽谤，骂他是骗子，是假先知，还有更火上浇油的是关于那个基督教不是信仰唯一的上帝，而是崇拜三个偶像的流言的迅速传播，这些不得不使沙漠居民将热爱的天秤偏向了麦地那的赶骆驼人。因为他们坚定地信仰一个上帝，不会因为惧怕眼前的形势和主教的眼色而一会儿说是一个，过一会儿又说是三个，把人们耍得团团转。

由此，两种宗教在西方世界产生了，对他们而言，只有自己信奉的才是真正的上帝，并且是唯一的，而其他的上帝都是骗子。由于这些观点冲突的存在，战争一触即发。

穆罕默德在公元632年离开了尘世。

巴勒斯坦、叙利亚、波斯和埃及在短短十二年不到的时间内被征服，大阿拉伯帝国巍然挺立于地球之上，以大马士革为首都。

公元656年底，在北非沿海国家的大力推崇下，真主终于成为天国的老大，穆罕默德离开麦加向麦地那逃逸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欧洲和亚洲之间中断了所有往来交流。直到公元17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一直被重重包裹着，教会通向东方世界的道路被阻隔了。在这种情况之下，保持原本的成果成为最重要的功课，于是，深邃的精神之花开放在德国、巴尔干各国、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土地上，并且开得夺目绚丽。

在这个过程中，像查理曼那样心高气傲的基督徒曾经也是有遇到的，打着良心的幌子，斯文扫地，将给予自己无限爱意的上帝残酷的屠杀，毫不客气地赶走其他上帝的臣民。但那些诚恳正直的基督传教士倒是很受欢迎的。他们把简单易懂的东西教授给人们，用仁爱、秩序、规整抚平世界上的血腥、打架以及抢劫所带来的伤害。

当前线传来胜利的号角，混乱、灾祸却在教会帝国的宫墙之内迅速蔓延（套用本章一开始所讲的数学理论来说明）。当代表世俗的短线不断变长的时候，教会所倡导的精神宗旨俯倒在政治和经济思想的巨大浪潮中。

虽然，罗马帝国日益膨胀的势力对后来十二个世纪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意义非凡，但是，连平民百姓和睿智的商人都能看出这种风平浪静的表象下暗藏了波涛汹涌的潜流，灭亡和崩溃将成为最后的归

属。

现在，在北方新教徒眼里，教堂就是一座七天中有六天看不见人影的寥落的房子。悠扬的赞美诗只有在星期天才会响起，人们只在这一天才走进教堂去听一听布道。当我们偶尔在城里面看见一群老绅士，他们面目慈善，衣着考究，衣领一律向后面翻去，那他们就是到城里来开会的教堂主教。他们可能反对离婚，对于跳舞这种活动却丝毫不反感，反而还大肆倡导，这些信息我们都是从报纸上了解到的。这些老年绅士们从城里回到家里的时候，一切又归于最初，生活还是那样继续着，幸福和安宁，没有什么烦恼和苦痛。

像这样的教堂（它可能与我们密切相关）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与我们的生死没有任何关联，至少现在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与之相反，政府有剥夺我们财富的权利，并且在社会需要的前提下毫无商量余地地夺走我们的性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归政府所有，政府是我们的主人。但我们却可以把通常意义上的“教会”当作忠诚的好朋友来对待，有与它发生争执的权利，我们把发生争执视为正常的情况，至少它不会要了我们的命。

以上这种理想当然不可能发生在中世纪，中世纪的教会以强大、森严的姿态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之中，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和构架，活跃、专横，超越于政府之外，掌握着人的命运和未来。那个第一个从贫瘠困苦的世界里跳出来的教皇在收到帝王赠予的大片土地的时候，对于这个政策所发展引申的结果，他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很容易理解，圣徒彼得可以接受基督忠诚的崇拜者所赠送的一些世俗的小礼物，这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教会的这一整套监管体系似乎太过庞大复杂了，无论是从约翰格罗茨到特利比桑德，还是从迦太基到乌普撒拉，数以万计的文员、牧师和写字员，成百上千的部门领导以及漂洋过海的信使，他们的吃喝拉撒、衣食住行全都依赖于教会组织。这还不包括外交使臣们在伦敦、诺夫格罗德的外事费用以及维持教皇信使在帝王面前颜面的衣着方面的开销。

也许我们应该深入考虑一下教会存在的意义，它本来是以什么身份存在的，假如环境优越，又将是怎样的光景。而现在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能不说是无比的缺憾。

当罗马以国中之国自居的时候，在它伟岸夺目的光环照耀下的宗教已经黯然失色，只留下些许残破的文字书简在风中飘零，此时，教皇改头换面，坐上世界独裁者的宝座，高高在上，万民俯首，其专制、蛮横让那些古代皇帝都惊叹他们自己曾经统治得太过仁慈。

教会组织一路走来，势如破竹，胜利的呼声响遍了大街小巷，但是，在某个时候，它还是毫无预见地走到了瓶颈之处，它觊觎全世界的目光不得不收回。

上帝的精神之光再次普照万民，民众内心澎湃不已，这股暗藏的巨大力量对于任何一个宗教组织来说，都像如临大敌一样使人感到恐惧。

然而对于异教徒而言，这似乎是家常便饭。

那些持有分歧意见的人与单一信仰的宗教统治一起问世，人们的反对还有什么用处呢？争执就是教会的衍生物，与此同时，欧洲、非洲和西亚陷入了相互仇视的境地，在几个世纪里一直各怀鬼胎，怒目相视。

我不愿意浪费笔墨来描述多纳图派、撒伯里乌派、一性论派、摩尼教和聂斯托利派之间血腥的争斗，通常情况下，没有哪个教派能做到真正的仁慈宽容，阿里乌的追随者专横残酷，可是阿萨内修斯的信徒也是一个样。

何况，在浩瀚的神学世界里，这些斗争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它早已经被丢弃在人们某个记忆的角落里封存了，再将这些老古董从坟墓里扒拉出来，在这本书里占用一点笔墨，再次点燃神学的战火，实

在是不值得的。我之所以将它写在纸上，只是为了宣扬祖先们用生命的力量撞开追求知识自由的理想，后代人有理由相信这些信念傲慢、专横、独断以及教条，而且只会带来灾难，两千年前沉痛的教训血淋淋地在历史中狰狞。

情况到了公元13世纪有了巨大的转变。

异教徒已经成长为一名战士，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姿态决然保护着生活在提比留当政时期的那位木匠，他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举强烈地感染了这些异教徒。这些刚强的战士，谁还会说他们只是单纯的有分歧意见的反对者呢？

他们再也不会在《启示录》中挑错译的句子，也不会为《约翰福音》中错拼了字母而争论不休了。

第七章　宗教法庭

公元1198年，继短命的保罗之后，拉特兰宫出现了一位最伟大的统治者塞格尼公爵罗它里奥，他就是声名显赫的英诺森三世。这位伟大的君主身上聚集了太多的优势和上帝的宠爱，在巴黎大学和博洛尼亚大学有他闪光的智慧。他天资聪颖，精力旺盛，雄心壮志，善于计谋，而且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不计其数的财富。三十七岁继位的他高高在上地端坐在教皇的宝座上，用精湛的手段统治着教会并指挥着全世界。

在他统治时期，那些在罗马驻守的帝国达官显贵得到的是驱逐的下场，意大利半岛由帝国军队的手里回到他的统治之下，帝国皇位的继承人也被列入驱逐的行列，他不得不离开教会，由于处境困难，举步维艰，最后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由此，日耳曼人再也抓不住意大利了，这就是显赫的帝王罗它里奥做的好事。

举世闻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在他手中组织并实现的。这次东征行为仅仅只是打了一个去“圣地”的幌子，君士坦丁堡才是真正的目的地。罗它里奥在君士坦丁堡将他的政治手段和处事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无数的城市居民用鲜血为他的战刀祭祀，大量的财富被他尽收囊中。这些行为对徘徊在希腊港口的十字军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他们担心自己会以亡命徒的身份在绞刑架上身首异处。这位老谋深算的君王曾经为自己这种高尚的行为颇为“为难”，他无比同情地表示这样做可能伤害少数基督徒的心。但是，他很快就从这种“为难”境地中清醒过来，他的实干风格再次发挥了作用，非常识时务地将君士

坦丁堡主教的位置留给了一个威尼斯人。我们不得不再次惊叹他的聪明智慧，双赢的局面是他想看到的结果：东正教被罗马控制了，同时威尼斯共和国也对他无比敬仰。至此，拜占庭成为威尼斯共和国在东方的殖民地。威尼斯驾驶着这匹奴马，任意驰骋。

此外，教皇在精神方面的智慧和造诣也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在婚姻问题上，教会差不多用了一千年多年的时间来审视、思考，又多番地犹豫不决，最后终于将它纳入到圣殿中来，从此，婚姻要经过神父的当众祝福才有效力，而不是男女双方在民间相互约定一下就可以生效的事情。教皇对下属的管教也是非常有手段的，菲利普·奥古斯特和阿方索九世作为法兰西和莱昂的管理者居然违背教会的意愿，按照自己的喜好来治理国家，这些行为立刻为他们招致了深刻的教训，此后，他们都在教皇的指点下小心翼翼地为人处世。

就算是在受到基督教熏染并没有多长时间的北方高地，教皇的威严也同样漂浮在它的天空之上，人们心里面非常清楚地知道真正的统治者是谁。甚至本身拥有挪威、部分苏格兰、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连那个刚刚臣服了的小帝国的哈康四世国王（他的同伙海盗习惯称呼他为“老哈康”）在旧天主教堂加冕之前，对于罗马法庭问讯的身世问题也得清楚老实地和盘托出。

教会的权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膨胀并且加深。

关于教会统治力量的强大，可以从下面这些例子中看出来。那个对宗教思想毫无兴趣的保加利亚国王都不得不长途跋涉来到罗马，拜倒在教皇的脚下，请求给予一点施舍，卑微地向他称臣，就是这么一个人，杀害希腊战俘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拜占庭的皇帝在他的魔爪中饱受折磨。还有英格兰的几个男爵，雄心壮志地编制了一些规则，企图用来约束皇帝，但是，教会一句“依靠武力获取”的托词便将他们的规则埋葬了，到此还没有罢休，那几个可怜的男爵最后因为闻

名于世的《大宪章》而被教会驱逐了。

对于那些老实巴交的纺织工人和蠢钝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英诺森三世是绝对不会宽恕的，他们胆敢质疑神圣的法律。

不过，在这样强大的势力面前，也不乏智慧和胆识的人，我们将看到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

又是异端邪说，这个话题可能太过深奥，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对于异端邪说的了解和认知，是那些审批记录和某些披露异教徒行径的书籍所给我们提供的。说实话，很多异教徒都是贫困的普通百姓，他们做不出什么惊世骇俗的事情来，连起码的宣传才能都不具备，他们能做的就只是把自己的意见写在小册子上，打击一下敌人，保护好自己，就是这样的小小的作为，也逃不过宗教法庭爪牙的监视，一旦有任何把柄，等待他们的将是巨大的灾难。除此之外，他们往往还在敌人诽谤、污蔑的文章中成为警示后人的反面教材。

不得不说，这的确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些异教徒的复杂形象向着他们期望的方向发展，异教徒以蓬头垢面、衣冠不整、污秽肮脏的形象出现在我们心里面，任何体面高贵的人物都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他们永远住在破败的贫民窟里的空地窖之中，没有基督教的精神食品为他们涤荡灵魂，烂菜叶、白开水才是他们的选择，他们远离女人，而且总是唠唠叨叨地说着救世主将第二次下凡的预言，当然，教士们庸俗丑恶的行径以及存在于万物的规律在他们口中也不能幸免于难。

当然，许多异教徒也确实不能讨人喜欢，人们总是妄自尊大、心高气傲，一方面用毫无价值的热情一味追求神圣的生活，一方面却扮演着恶毒的魔鬼，他们一身戾气，用基督怪异荒诞而不切实际的思想去污染人们原本平静的乡村生活，这些世俗的凡人怎么能摆脱命运的捉弄呢？

即使如此，我们不得不为他们的勇敢和诚挚而鼓掌，他们收获寥寥，却为此输得一败涂地，一无所有，他们前仆后继，一路追赶，仍然一无所获。

但是，“组织”这张网实在是太过庞大了，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毫无预兆的纳入他的编织中，原本对组织毫无兴趣的人为了有所成就不得不将自己归入“无组织促进协会”这样一个组织中来。当然，这也包括了对神话无比钟爱、感情丰富的中世纪异教徒。生存的天性把他们紧密联结在了一起，为了驱逐恐惧感，得到内心的安宁，而不得不用高深莫测的礼仪来装饰自己神圣的教旨外衣。

所有这些在基督教会以外的其他教派被基督教会追随者捏在一起，在他们眼里，异教徒跟龌龊的摩尼教徒没什么两样，所有恶毒的贬义词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似乎这样才能消解他们心中的怨恨。

我现在说，那个时候的摩尼教徒俨然就是中世纪的布尔什维克，并不是说它已经以一个政党的形式存在了，它不可能像俄帝国建立的统治力量一样有明确的政治系统和纲领。我只是意在阐明，对它而言，这是一种无情的诋毁和辱骂。如果小伙计没有把电梯停在合适的位置，房东就会向他要房租，那么人们就要咒骂这个房东了，我以上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中世纪的基督徒对于摩尼教徒的憎恨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没有真凭实据对他们加以审批，这让他们恨得牙痒痒，于是尽其所能的言论攻击成了最好的武器，并且这个方法在很多私下集会中确实发挥了它的功效，它有超越法庭的办事效率。当然，许多的冤假错案也是它的得意之作。

由于摩尼教徒的创始人摩尼太过仁慈谦恭，在他精神指导下的摩尼教徒的境地是可想而知的。现在，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波斯人摩尼，他在历史人物的榜单上有一席之地。公元3世纪前，埃克巴塔纳的小

镇子传来了他生命的第一声啼哭，颇有声名的财主福塔克是他的父亲。

摩尼哲学的形成，与他年轻时所处的环境和底格里斯河畔接受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那是一个风云变幻、鱼目混杂的社会，跟今天的纽约一样的境况，到处充满着虚假和伪善，异端思想和空想主义肆意横飞。那些从东西南北各个地方蜂拥而至的人们集聚在美索不达米亚大商业中心拉帮结派，组织教派，发展教徒，摩尼的哲学思想正是这个环境中佛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糅合以及古巴比伦迷信的点缀的产物。

撇开教徒们将教义引向极端化的行为不说，摩尼真正只做了一件事，将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好上帝和坏上帝搬到现实中来研究。在摩尼的理论中，《旧约》中的耶和华成了罪恶的化身（于是耶和华变成了恶魔），而马太福音中“天父”则成了福泽万物的神仙。人的身体在摩尼看来只不过是污秽邪恶的东西（佛教的影响在这里体现），人们生来是卑贱的，应该要通过后天的磨砺，接受饥饿、苦痛劳累的锻炼，才能将身上不好的东西驱逐出去，才会免于地狱之火的煎熬、免于沦入恶魔的掌控。与此同时，很多的禁忌也被恢复起来，他对追随者们的食谱作了严格规定，剔除了很多禁止食用的东西，最后，他们大多只能吃冷水、枯草和死掉的鱼。

后面的这一条规定，多少让我们感到惊讶，但在教徒心里，海里的冷血动物比起陆地上的热血动物，它们对人们灵魂的伤害要小一些，所以，我们经常看见那些教徒宁愿饿死也不会吃一块牛排，但对鱼却无比钟爱。

摩尼这个地地道道的东方人血液里流淌着根深蒂固的东方思想，他把妇女看得一文不值，他倡导的是要慢慢地让人类在地球上完全消失，所以他的信徒是绝对不可以结婚的。

在摩尼的教规里面，神职人员就职时要行按手礼，而不是将全身泡在水里的洗礼，这是因为，他对于犹太教创立的、洗礼者约翰发起的洗礼等仪式相当反感。

摩尼在他二十五岁的时候，踏上了他的思想传播之路，印度和中国是他的首选之地，在这里收获了成功以后，他回到家乡，向周围的邻国宣扬他的思想，试图将宗教福泽照得更远。

随着摩尼事业的成功发展，那些凌驾于世俗之上的教义大大消减了波斯教士们的黑色收入，反对之声愈演愈烈。在老国王死后，摩尼失去了保护伞，新的国王对宗教事务不闻不问，摩尼的命运掌控在教士们手里。最后，摩尼得到的是横尸在城墙下的十字架上的下场，包裹他灵魂的皮囊被剥离下来作为恐吓追随他的人的信物，这个人物在尘世的一生这样结束了。

摩尼教会在与领导阶层的冲突中崩溃瓦解了，但是，预言家的精神思想却留在了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像天空中飞散的流星洒遍了欧洲和亚洲的土地，直接深入到贫苦大众的血液里面，人们开始凝视它、思考它，人们渐渐发现，这些精神教义与自己是很配套的。于是，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它在民众之间一直有很高的威望和很好的口碑。

至于摩尼教传入欧洲的时间和地点，我也说不清楚。

它的传播路线极有可能是经过小亚细亚，越过黑海，顺着多瑙河的急流到阿尔卑斯山脚下，然后翻山越岭，最后到达德国和法国境内，并且很快站稳脚跟，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追随新教义的人们以卡萨利为自己命名，这是一个纯粹的东方名字。解释得明白一点就是“过纯洁生活的人”。当烦恼困苦的情绪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覆盖到整个欧洲的时候，它无异于“异端邪说”。

但是，“卡萨利”却不会因此以一个固定的教派而存在，没有人会对建立一个新教派有兴趣。我们不能否认摩尼思想在很多人心中的地

位和影响，但接受这种思想的人同时又以基督教忠诚的儿子身份自居，这使得这种宗教变得更为特殊，有些微妙的关联存在其中，并且有一定的危险性。

卫生部门的显微镜能够看见那些体积足够大的病菌，所以由这类病菌引发的疾病对于一般的医生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治疗的病症。

天神对我们的庇护却更加细致体贴：就连那些连紫外线都无法照射到的小生物都不能够对我们造成伤害，因为这些微小的生命也有继承世界的权利。

基督教把摩尼教当作极具杀伤力的社会瘟疫来看待，社会组织的首领们在精神世界遭遇到苦痛之前，脑子里就被恐惧感所充斥着，只是他们并没有觉察到，而这一切正是摩尼教所造成的。这些都是我们私底下说的悄悄话而已，不过基督教早期的虔诚的信仰者确实出现过这些症状。

圣奥古斯丁就是最好的例子。他是十字军中最勇敢、最出色的卫士，当他内心还怀揣着对摩尼教的无比虔诚和敬仰的时候，却竭尽所能率先将这个异教的最后城堡击打得粉碎。

普里西利安，这个西班牙的主教，因为被指控投靠摩尼教而在公元385年被处以火刑，成为第一个死在《反对异教法》法令中的人，于是，他被人们铭记了。

波斯教义的影响力实在是到了非常厉害的地步，甚至连基督教会里的那些领头羊们都要被感染了。

他们渐渐认为，对神学一无所知的外行应该与《旧约》撇清关系，他们开始对这些人进行劝阻。后来，那条规定所有神职人员保持单身的著名法令在公元12世纪问世了。受人敬仰和热爱的圣方济亚西西制定了新的修道院法，这些法令严格按照了摩尼教的模式，体现了

纯洁的特质。由此可以看到，顽固的波斯理想对于精神改革中主要人物的影响是很深刻的。

但是，当人民的心中同时饱受着自愿贫穷和高尚灵魂的谦卑恭敬的时候，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要发生了，而且注定要发生，这件事就发生在皇帝与教皇剑拔弩张地要发动又一次战斗的时候，发生在外国雇佣军为争夺地盘而使地中海沿岸各个渺小的地方飘扬着镶有十字架和苍鹰的旗帜的时候，发生在奢华富丽的宫殿住满了修道院长豢养的卑躬屈膝的家奴的时候，发生在骑着高头大马的教士冲开密集的人群赶往狩猎地享受早餐的时候。

一点也不用奇怪，在法国的某个地方，对基督教现状的抱怨最先被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个地方曾经在很长时间里受到过古罗马文化的熏陶，在愚昧野蛮和文明的对决中，后者显然没有占到太大的便宜。

这个地方就是普罗旺斯，它位于地中海——隆河——阿尔卑斯山所组成的一个三角地带，我们可以从地图上找到它的位置。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港口，就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马赛，不仅过去是，现在仍然拥有重要港口地位，许多富裕的乡镇和村落集聚在这片肥沃且风调雨顺的土地上。

普罗旺斯的民间歌唱家和诗人以新的文学方式为现代小说铺设基石的时候，中世纪欧洲的其他地方的人们耳朵里还只有留着长头发的条顿英雄的野蛮故事呢。鉴于与西班牙和西西里这些邻居之间紧密的商业贸易活动，科学方面的新图书总是能第一时间传到普罗旺斯人手中，这些新学科图书在欧洲北部是极少见到的。

“重返早期基督教义”运动在公元11世纪的头十年就在这个国家崭露头角了。但是不管怎样勉强，这也不可能成为公开叛变的理由而被提上议程。某些小村子里，人们婉约地表达了教士应该跟普通教徒一样，保持朴素的生活；他们拒绝追随爵士们在战场上驰骋（啊！古代

战场上牺牲的英雄是多么令人怀念啊）。为了能够读懂福音书，他们需要学习拉丁文，对于死刑，他们是持反对态度的。从耶稣离世后的六个世纪，基督教定义的天国中就存在着“炼狱”，并且以官方认可的姿态存在，可是现在他们不认可“炼狱”的存在，并且（这是更重要的部分）教会绝对不可能从他们口袋里搜刮出任何一分半分的钱财。

胆敢挑战教士权威，与他们作对的反叛者的头目随时有被揪出来的危险，假如他们仍然继续拒绝接受改造，他们将会受到逐出教会的下场，并且这种行为是悄悄进行的。

即使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仍然不能阻止邪恶势力的扩展，关于对付这场具有煽动性质的骚乱的专题会议在普罗旺斯召开了，他们集中了各地的主教的智慧，讨论着对策，直到公元1056年，这种讨论争执的声音都没有间断过。

驱逐出教会和普通的惩罚措施对于追求“纯洁生活”的人民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关于这一点已经非常明确，如果这些纯朴的人们被关进监狱，这对他们来说倒成了使人高兴的好事，他们可以继续在监狱的铁窗里面追随仁慈宽容的基督，就算最后被判处死刑，他们也会毫不惧怕地乖乖到火刑柱上去服刑，一个人倒下了，马上就会有几十人顶上，他们心里都充满了对基督教义的无限崇敬。

这时候，关于惩罚措施的争执在教会代表和地方贵族及牧师们中间爆发了，前者认为要加大惩罚和迫害的力度，后者（他们知道百姓们的真正想法）则不同意罗马教皇的命令，他们认为，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进行残酷的镇压，异教徒的反对声音只会更加浩大。这种争执在一整个世纪里从来都没有消停过。

公元12世纪末期的时候，北方的加入使得这场运动得到了火上浇油的效果。

里昂小镇里有一个叫作彼得·韦尔多的商人，小镇的河对面是普罗

旺斯，这个商人对于救世主的崇拜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善良稳重、严肃大方的他对于基督说过的那句让骆驼钻进针眼也比让富有的年轻人进天堂容易的话没有丝毫怀疑。当然，这句话曾经让整整三十代的基督教徒陷于思考沼泽，他们并没有弄懂其中的含义，可是我们的这位商人却能慷慨解囊，将自己的财富尽数分给穷人，千金散尽后，与商界划清了界限，对于新的财富没有再追求。

有二十个教皇评论了约翰写下的这句话："你们要自己去研究圣经的真谛。"教皇们根据这句话的启示小心翼翼地制定出了一些条例，明确地规定了凡夫俗子们没有教士的点拨而自己研究圣经的条件。

这一套，对于彼得·韦尔多是不管用的，他牢牢记住了约翰的话，"你们要自己去研究圣经的真谛"，所以他决定付诸实践，自己去读圣经。

在这个过程中，他挖掘到了一些跟圣徒哲罗姆的结论很不一样的地方，于是他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解释了《新约》，普罗旺斯的各个地方都出现了这种手稿。

开始的时候，罗马教会并没有注意到他所做的这些，他只是热衷于贫穷而已，这会给他带来什么灾祸呢？那些真心实意向往贫苦生活的人寄希望于他来制定一种新的修道院式的禁令，当然，现存的修道院中奢侈舒适的生活他也是相当看不惯的。

罗马是不会冷眼旁观的，像他这样在追求信仰的道路上热情过度、横生事端的人，罗马已经为他找到了可以发泄的场所了。不过，规矩和先例还是要遵守和考虑的。这样，普罗旺斯的"纯洁人"和里昂的"穷人"已经越来越嚣张了，他们对教皇隐瞒自己的所作所为，大胆地扬言他们不需要专业教士的指导，自己也可以成为一流的基督教徒，他们认为罗马主教们只有司法权，此外，他们跟培尔塔利的大公

爵或巴格达的哈里发一样没有资格和权力限制人们的言行和信仰，显然，这些人的自由思想已经让罗马非常头疼了。

如何处置这些歪门邪说，教会对此花了很长的时间考虑，中间也犹豫徘徊过，最后，终于决定采取武力行动。

像教会这样的组织，它从来就是坚持告诫人们正确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只有一种而已，其他的都是错误的，是人们所不齿的，如果有人对于这一原则提出抗议、发出挑战，那么采取极端的方式来进行打击是唯一的选择，这也是生存的机会。当然，罗马在遇到这类情况的时候，也是不得已果断地这样做的，并制定出一整套惩罚条例，这对后来的意见分歧者起到了极大的威慑作用。

首先以身试法的是阿尔比教徒（以新教义发祥地阿尔比城命名的异教徒）和韦尔多教徒（因创始人彼得·韦尔多而得名），因为他们在国家中的政治地位实在太低，因此缺乏有力的保护伞。他们死在了英诺森三世组织的正规十字军的屠刀下。英诺森三世讨伐阿尔比教徒和韦尔多教徒的理由源于那个把普罗旺斯当作臣服自己的土地而肆意发挥权力的统治普罗旺斯的教皇代表，当然，他最后的结果也是死。

加入这支征讨大军对于北欧人来说有让他们乐不思蜀的好处，首先，如果有欠款的，可以不用交利钱，其次，以前和将来发生的罪责都将被赦免，甚至，在某一段时间内，普通法庭都无法对他们进行审判。还有就是普罗旺斯丰富的物产和遍地的财富可以装满他们干瘪的口袋，使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得到满足。比起要跋山涉水、长途奔波地跑到遥远的东方巴勒斯坦去打仗抢夺财富，他们更愿意少走一些路，反正收获也差不多，何乐而不为。

灾祸临近时，“圣地”的概念在人们头脑中已经不复存在，南方成了那些法国北部、英国南部、奥地利、萨克森以及波兰贵族绅士中的败类新的发财之地，他们在这里重整旗鼓，积累自己的钱箱子，而所

有的灾难、苦痛和罪责都留给了原本富庶的普罗旺斯人。

在那场灾难中，许多的男女老幼被十字军绞死、烧死、斩首和分尸，不过，究竟有几万人惨遭祸害，人们有很多种说法。各个地方在执行正式的死刑后，通常不提供准确的数字，根据城市疆域的大小，可能在两千到两万之间吧，我不能得到更确切的数字。

十字军攻占了贝济埃城以后，士兵们无法准确地区分出异教徒和非异教徒，这个棘手的、不确定的问题只有交给跟随军队出征的教皇代表来处理。

这个人对士兵们说："孩子们，就这样做吧，把他们全部杀掉，送到上帝那里去，主可以分得清好坏的。"

在十字军中有一个多次参战、残暴不仁、杀戮成性的英国人，叫作西蒙·德·蒙特福特，他残杀掠夺的手段层出不穷，由于他的这种"赫赫功绩"，大片掠夺来的土地被封赏在他名下，就连他的手下人也论功行赏，得到了好处。

从这场杀戮中侥幸存活的少数韦尔多教徒最后逃到荒凉的庇耶德蒙山谷。在那里，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教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16世纪基督教改革运动的发生。

至于阿尔比教徒，他们的情况更加不妙，在将近一个世纪那么长的时间里受尽迫害、杀戮，此后的宗教法庭报告中基本没有出现他们的名字。直到三个世纪以后，萨克森一个叫作马丁·路德的教士将原来的教义作了修改，并以此为武器对统治了一千五百年的教廷提出了抗议，宗教垄断局面被这场运动打破了。

对于这场潜在的危机，英诺森三世敏锐的双眼并没有看到，他看到的是糟糕的情况已经被收拾干净，人们没有任何异议地接受和服从了新建立的条例。然而，当异教徒们被再次扯进教会的时候，在《路

加福音》中那条著名命令在现实中又一次上演了。在那条命令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在举办一次宴会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客人没有来，宴会上有一些空位子，于是他对仆人说：“去大街上，拉他们进来。”这个故事引申在现实里，“他们”就是指异教徒。他们被拉进来以后教会一直致力于如何留住他们这个问题，多年后才收到了成效。

在首次阿尔比教徒造反时期，欧洲各省都建立了专门审判异端邪说的特别调查法庭，即后来人们口中的“宗教法庭”，这类法庭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地方法庭的职责。

尽管宗教法庭在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和地位了，但我们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仍然有惊悚的感觉。它似乎就是哈瓦那的黑牢，里斯本的刑具室，克拉科夫博物馆的生锈铁锅和烙人的刑具的化身，听到这个名字，我们脑海里面就会闪现那些黄的兜帽和黑的面纱，面部宽阔的帝王冷眼看着走向绞刑架的无数男女那一幕也无法抹去。

发生在宗教法庭的残酷野蛮的行为，我们可以从公元19世纪后期的那些通俗小说中看到，撇开作者百分之二十五的想象、百分之二十五的对异教徒的偏见，剩下的部分已经足够说明那个时候的地下法庭是任何一个有文明曙光照耀的社会都不会出现的残忍的恶魔了。

我在这本书里只用两三页的纸来简述了亨利·查尔斯·李费尽心思完成的八卷书中所讲叙的宗教法庭的活动，显然是不可能精辟透彻地将中世纪中如此复杂的问题摆在读者面前的，毕竟现在的最高法院或国际仲裁法庭与那时候的宗教法庭根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

当然，宗教法庭的存在形式并不是单一的，它们是多种多样的，在不同的国家里各不相同，并且使命和职责也是不一样的。以著名的西班牙皇家宗教法庭和罗马的圣宗教法庭为例，西班牙的皇家宗教法庭的职责是监视伊比利亚半岛和美洲殖民地的异教徒，它的使命是针

对局部地区而言的，是一个带有局部性质的宗教法庭。相比之下，罗马的圣宗教法庭所能干涉的地域却涉及欧洲的各个地方，连大陆北端的圣女贞德和南端的乔达诺·布鲁诺都没有一个能都逃出它的酷刑，在烈火中丧失了生命。

宗教法庭似乎只负责审判而已，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它没有杀过一个人，这确实是真实的。

审判法庭由教士们组成，他们宣判完毕以后，对异教徒罪犯的处罚措施由非宗教组织的政党来执行。至于用何种方式来实施惩罚，那就是那些政党当局的事情了。但是，必须完全服从法庭的裁判，假如当局没有对他判处死刑，这些执行者面临的将是逐出教会或者失去教廷支持的后果，相当麻烦。当然，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罪犯没有被送到地方当局，幸运地逃过了一劫，但这并不是最终的结局，宗教法庭黯淡的地牢将成为他们有生之年的最后归宿，这才是更大的灾难。

很多无辜的罪犯往往更愿意带着冤屈非常爽快地承认各种罪责，因为对他们而言，与其在石头垒砌的城堡的地洞里慢慢疯狂、腐烂，还不如以异端邪说的罪行在火刑柱上来个痛快解决，也好早日解脱。

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不可能完全摒弃偏见，这实在太难了。

在五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平民老百姓，他们本来过着与世无争的平静的日子，却经常莫名其妙地遭受半夜被人从床铺里面拽出去关在肮脏阴暗的地牢里受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的苦的厄运，被那些他们并不认识、也不知道的法官们审判，这一切噩梦的开始可能仅仅只是因为几个爱嚼舌根的邻居们的道听途说。这些可怜的人遭受着不明不白的罪责，他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被指控，是谁指控了他们，当然也不能与亲戚联系，更别说请律师了。没有异教徒会替他们说好话，揭发、污蔑倒是可以，坚持自己的清白和

无畏的辩驳只会为他们招来酷刑，直至手脚断折，最后到死，他们也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如何获罪的。

还有更让人难以接受的，即便是已经死掉掩埋在土里面五六十年的男女都可能被扒出来进行所谓的“缺席”审判，如果“有幸”获得这样的罪责，他们的后代的财产在他离世五十多年后仍然要被没收。

只有这样，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大量财富跑到宗教法庭审判官的口袋里去，这就不难理解这类事的存在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祖父干了触犯法庭的事，以后两代的子孙都跟着遭殃，所有财物被洗劫一空，这种荒唐的事是非常常见的。

从公元13世纪到15世纪，暗探在南欧和西欧肆意猖獗，这些居心叵测、阴险恶毒的私人探子带着醒目的个性和忧伤的面具，以小偷和改过自新的赌徒的身份出现，对二十年前沙皇俄国全盛时期的报纸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暗探们的这种形象和嘴脸。他们总是以自己参加革命以后的悲惨的故事作为诱饵，博取一心一意反对帝国的那些人们的同情和悲悯，当他们成功打入内部，挖掘出秘密的时候，就会将这些伪装时候的收获告诉警察，他们就是依靠揭发那些对教会有异心或者对教会提出抗议的人为生，以此来收取酬劳。结束之后，下一个城市又将成为他们卑劣行径的演出舞台。

为了维持生计，如果周围实在是没有可以告发的搞异端邪说的人，暗探们就要充分发挥想象，人为的制作几个出来。他们不用担心这个骗局会带来什么麻烦，他们非常清楚，再怎么清白的人也抵不住严刑拷打，俯首认罪是必然的，这样想来，这个职业是非常“长远而有前途”的。

很多国家都倡导对于思想异己者，告发者可以用匿名形式，这使得最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也没有信任存在，连同一个家庭里的人都非常戒备，言语谨慎，这种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正是人们的这种无止境的恐惧给为宗教法庭工作的拿着钵盂的僧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在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竭尽所能地对人们进行了无所忌惮地搜刮。

当这些用虔诚的外衣做掩护的乞丐随意闯进本分的公民家里，侵占人家最好的床，吃着人家最好的食物，嘴里还厚颜无耻地叨念着他们是尊贵的客人，人们应该敬重他们，好好招待他们，让他们生活得舒服美好，他们应该要享受奢华的一切，人们被恐吓：如果不这样对他们，他们就会去宗教法庭告状。这个时候，人们心中忍耐的极限崩塌了，对于这些乞丐的趾高气扬，人们已经恨得牙痒痒。此时，宗教改革运动就要爆发了，我们甚至可以底气十足地说这正是宗教改革爆发的原因。

为此，教会会为宗教法庭找诸多的理由和借口来搪塞，它说，宗教法庭是在履行人们思想检察官的职责，防止错误思想在民众中传播而使人们走向歧途。它甚至还搬出了他们不会追究因为无知而步入歧途的异教徒的罪责，也没有处死过任何一个教会的叛徒和顽固的不知悔改者这样的例子来。

可是这些都无济于事。

在清白的人身上泼脏水，让他变成死囚犯，或者是让他表面上服从，只需要耍一个小花招就做到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以奸细的水平来制作几份虚假文件是很正常的事情。

反正，暗探和伪造者本来就是一对分不开的好朋友。

第八章　艰难求知的人

跟古代的高卢人如出一辙，现代意义的不宽容划分为三种：第一种不宽容因为懒惰而产生，第二种不宽容因为愚昧无知而产生，第三种不宽容因为自私而产生。

因为懒惰而产生的第一种不宽容出现在每个国家、每个地方，小乡村和古乡镇就更不用说了，不仅如此，下面用我们家的老马为例来说明它的普及范围并不只限于人类。

那匹老马的头二十五年时间都生活在考利镇，后来，它怎么都不肯离开考利镇那个温暖舒适的马厩到西港的谷仓去，尽管那里也同样的温暖舒适。这是因为，它过惯了考利镇的生活，对那个地方实在是太熟悉了，它知道每天悠然自得地在康涅狄格州的土地上散步时，不会出现陌生景物来吓唬它。

已经消失掉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方言是我们的科学家们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他们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它、复制它。相比较而言，狗、猫、马以及猴子这些动物的语言却无人问津。倘若人们也稍加注意这个问题，就知道那匹叫“杜德”的马向那时考利镇的居民们发出的疾呼，这确实是一场关于宽容的异常激烈的抱怨。杜德已经长大了，像社会体制的自然发展那样，它习惯了考利镇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它一生都觉着这一切本就该是这个样子的，而西港的礼节、习惯和风俗完全不正常，不合它的意。

由于这种不宽容行为的存在，所以，当孩子们做出蠢事的时候，

父母们就摇头叹息、垂头丧气；“过去的好日子”也成了人们盲目追求的生活；也正是由于有这种不宽容行为，所以无论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都穿上了令人讨厌的衣服，有很多异样的声音在这个世界周围响起，人类将那些另辟蹊径、有新想法的人当作敌人看待。我们所有的人迟早都将被这种不宽容所连累。过去，许许多多的人因为它远离家乡、抛家妻子，而今，在荒芜偏远的地区出现热闹的城镇，成为人类永久的居住地，这些都是它造成的。所以，相对来说，这种不宽容的危害还是小的。

下面要说的第二种不宽容则更加严重。

就是由于对事物的无知，那些愚蠢的人就可能成为破坏力很强的危险人物。如果他还在为自己的无知蠢钝做一通无畏的辩解，这种危险性就升级了。这些人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为了维护自身可怕的偏执而向敌人（与他的偏见有分歧的人）猛烈地开火，咄咄逼人地质问他们凭什么活着。

这一类人，长期被生活的恐惧和阴暗面折磨，渐渐变成一个苛刻和阴险狡诈的人，他们个性冲动、残忍暴戾，对他们所憎恨的人绝不手下留情。“上帝的特殊臣民”这个说法就是最先从他们这群人当中流传开来的。这群自以为是的家伙是十足的幻想家，他们在自己编织的幻觉中，用与上帝的特殊关系来当作自己的盔甲，为自己在辩解中增加胜利的筹码。

例如，如果有一个叫作丹尼·迪弗尔的人可能只是做了一些偷鸡摸狗的小勾当而被他们处死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说，“因为他对我们的幸福生活造成了威胁，我们无比憎恨他，我们绞死他是因为我们喜欢”。他们不可能这样做，在决定丹尼·迪弗尔最终的命运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召开长达几个小时、几天甚至是几个星期的秘密会议，在会议上作详细部署、研究和讨论，最后给他戴上“违背上帝旨意”（这旨意是上帝私下传达给特选子民的，只有上帝的选民才能理解）、“魔

鬼的同类”这样一些“高帽子”，然后，他才会被送上绞刑架接受上帝的惩罚。那些执行官们也会为自己能够亲自执行这样一件光荣的任务，具有与撒旦斗争的勇气而感到无比的荣光，泽及祖先万代。

不管是老实善良的人还是野蛮粗鲁、残暴不仁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在这个烟幕弹面前迷失了自己，这样的事情在历史学和心理学上屡见不鲜。

一千名可怜的老百姓，他们并没有杀人放火，他们只是正直忠诚的普通百姓而已，却要在巨大的灾祸中走向死亡，那些成群结队的旁观者不但没有表现出半点怜悯之心，反而兴致勃勃，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在上帝面前做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

他们这些人是绝对不可能承认自己的道德有问题的，所以，如果有人以宽容来质问他们，他们会不高兴，会发出反对的声音。就算是自己不宽容，但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是看见丹尼·迪弗尔身着红色衬衣和有小魔鬼点缀的马裤，穿过寒冷的暮气，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绞刑架的情景，他们也会感到荣耀，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行刑结束后，这些围观者回到家中还会若无其事地吃熏肉和豆角。

他们就是这样一群旁观者，这些已经足以证明他们想的和做的是正确的，他们就只是观众而已。或许，他们应该跟死者互换一下角色。

在人们的意识里，已经根深蒂固地认为自己的思想就代表着上帝，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错误，因为上帝是不会出错的。这种想法太常见了，尽管经不起考量，却没有人有办法回击。

最后要说的是因自私而引起的不宽容，即第三种不宽容。这种由嫉妒之心而引起的不宽容，普遍得像麻疹病一样随处可见。

耶稣来到耶路撒冷，看见人们只一味地对上帝宰杀牛羊祭祀，便

对他们讲，光靠这些活动是完全不够的，这一举动立刻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他给那些靠祭祀典礼谋生的人带来了威胁，于是，耶稣被诽谤为危险的改革者，他还没来得及做出真正威胁到那些人的钱袋子的事情来的时候，就被处死了。

艾菲西斯的珠宝商们一直靠制作和贩卖戴安娜女神的小塑像来发财致富，几年后，圣徒保罗的到来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一种新教义，这种教义直接威胁到珠宝商的生意，因此，他成为不受欢迎的入侵者，差点在金匠行会的私刑下丧命。

公开的战斗一直在那些依靠某种已经建立的崇拜而谋生的人和那些企图搬动这种原有的崇拜，将它们转移到别的寺庙的人之间存在着。

历史上那些著名的迫害活动通常都囊括着这三种不宽容的情况，很少只有一种不宽容现象存在的情况，除非极为个别的特例。因此，我们在探究中世纪的不宽容这个课题的时候，必将明白，我们是在面对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当一个组织的实力达到鼎盛，国库充盈、土地广袤，有数以万计的农奴可供使唤，这个时候，那些试图重新建立“地上天堂”的农民就将被这个强大组织当成怒气和能量的发泄对象了，这是极为平常、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于是，用第三种不宽容，即由自私而导致的不宽容来解释，阻止异端邪说是为了发展经济。

此外，这种官方禁令使科学家们感到无比的压力，这个问题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了。

我们将目光转回到许多个世纪以前，有必要细致地了解一下公元1世纪到6世纪这段历史时期欧洲所发生的事情。这样我们就能充分理

解教会对那些探索研究自然奥秘的人所采取的残酷恶毒的行为了。

当欧洲大陆被野蛮人的长矛戳得千疮百孔的时候，城墙里面的社会已经土崩瓦解，书籍和艺术都掩埋在破败的废墟里，被人们遗忘，无知和野蛮充斥着每一个角落，收藏馆、博物馆、图书馆全部在欧洲总部野蛮人的篝火中化为灰烬。古罗马的政权就这样，在混乱不堪、硝烟弥漫、险象环生的环境里孤立地苟延残喘着。

公元10世纪左右图书馆的一些书籍，我们倒是有一些，可是却没有古希腊的书籍（不包括君士坦丁堡，因为那时君士坦丁堡被视为远离欧洲中心的地方，就像今天的墨尔本一样遥远），那些书就算是西方人也并没有多少。不管有没有人相信，反正是真的没有这些书。专家学者们费尽心机要对古人的思想作一个透彻的了解，也没有太多可供参考的资料，只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著作中的某些章节里找到一些翻译（译文很粗略）。而且也找不到专业的老师教他们学习古语，只是找到了几个从拜占庭的神学争执中战败背井离乡，逃到法国、意大利避难的希腊僧侣。

现存的拉丁文书籍是有一些的，但是，它们大部分都成书于公元4世纪和5世纪。至于那些传世不多的古人们的手写稿，实在是过于难懂了，学者们恐怕要用一辈子的时间、花尽精力才能染指一二吧，因为在太久的时空转移过程中，它经历了无数次的转抄，且很多抄录者持有不负责任的态度。

科学书籍里面，仅存的只有欧几里得的一些简易的几何图形题，其他的书籍在任何一个图书馆里都不可能找得到了，这些书籍似乎是人们所不需要的，这是最让人悲哀叹息的事情。

那个时候，科学在统治者看来是无比低下和卑贱的学说，是根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的，在人们眼中是不值一提的，因此统治者不倡导数学、生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研究行为，至于医学和天文学，地位就

更低下了。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呢？我们这些现代人真的很难理解。

不管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公元20世纪的人对进步的追求是不会停止的，对于我们而言，我们努力要做的是让世界更加完美，不管世界现在已经是什么样子，无论如何都是要试试看的，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的确，进步已经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且这个信念在某些时候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信仰了，可这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他们绝不可能有这样的意识。

希腊人民曾经做了一个美丽的梦，在他们的幻境里，现实是其乐无穷的，但这个美梦很快就被政治混乱和动乱无情地粉碎了，整个国家陷入了巨大的悲哀中。以至于此后几个世纪，希腊的作家满眼都只有悲伤和哭泣。那些繁华过后的废墟和颓败将悲观的情绪注入了他们的心脏，他们觉得人们做任何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另外，罗马作家看到的是历史发展中蓬勃向上的精神，他们总结一千年的历史，找到了这种发展趋势。哲学家们，包括著名的伊壁鸠鲁，也无一例外地心怀着幸福的未来，他们乐意融融地教育着年轻的下一代。

在这以后，就迎来了基督教的世界。

人们所凝视的中心一下子逆转了，世界从此改变，黑暗、苦难和地狱在召唤着他们，他们雀跃的心马上干涸了，变成了一群无欲无求、逆来顺受的人。

人们被罪恶所包裹，无比低俗，带着天生的邪恶，与罪恶为伍，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过程都与罪恶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脱不了干系。

不过，旧的失望与新的失望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希腊人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总是比别人要聪明一些，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还对那些遭遇不幸的野蛮人发出同情悲悯之声。但是他们从不认为自己的这个民族因是由宙斯挑选出来的，而与其他民族有什么区别。

与之相反，基督教一直都依附于祖先行走，他们将《旧约》视为圣书，对犹太教义也毫无怀疑，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是特殊的民族，与其他民族大不相同。他们认为，只有由官方建立的教义才能拯救人类，如果不信仰这类宗教，就将万劫不复。

上面所论述的这种思想与那些缺乏谦卑思想的人趣味相投，并带给他们直接的、巨大的好处，这些人总是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优于其他成千上万的同类。在很多关键时期，这种思想紧紧地把基督徒们连在了一起，让他们成为坚固的堡垒，巍然屹立在异教肆虐的世界。

特图利安、圣奥古斯丁还有其他一些人，对于他们来说，埋头写教义才是他们的具体工作，他们丝毫不会去关心这片大海周围东西南北各个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别人关心和追求什么，他们从不关注，他们只想着要快点找到一个远离危险的安全海岸，并将上帝的城堡建立在那里。

所以，他们细致地创造了一整套关于人类起源以及时空界限的说法，这种全新的概念完全摒弃了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思考的结果，他们坚信，基督一诞生，世界上所有陈旧的东西都将不复存在，不管有无存在的价值。

比如，关于地球的问题。

古代的科学家认为地球只是几十亿个星球之中的一个，对于这个观点，基督徒持绝对反对态度，他们认为他们生存的这个小小的圆球

就是宇宙的中心。

《创世纪》里有一种关于地球的说法：地球是为一群特殊的人所特意创建的，是他们的临时的居住地。它具体的缘由已在第一章中作了清楚详细地描述。

要明确上帝钟爱的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了多长时间，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如果将遍布各地、随处可见的大型古代事物、城市废墟、灭绝的怪物以及成为化石的植物彻底否认、忽略它们的存在，那就可以很轻易地决定世界被开创的具体时间了。

这样的世界是一个完全静止的世界，它从某年某月某时开始，又在某年某月某时结束。地球只因为一个目的而存在着，因此根本不需要那些只看重一般规律和时空永恒的数学家、生物学家、化学家以及如此种种的人去探索挖掘它。

不得不承认，许多科学家打心里把自己当作上帝最忠实的儿子看待。但那些所谓的真正的基督徒们则认为，有忠诚信仰的人、真正热爱信仰的人是不会了解那么多东西的，也不应该有那么多的书籍，除了《圣经》。

真正的基督徒应该要拥有这本由接受神的旨意的圣人所写的《圣经》，书中的每个字、每个逗号、每个冒号、每个感叹号都受到了神的启示，都代表着神的意思。

生活在伯里克利时代的希腊人即使能够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本圣书，他们也不会对此产生半点兴趣的，因为这本书中记录了很多林林总总的难以理解的民族历史，还有情感表述模糊的爱情诗歌以及那些痴痴癫癫的先知脑海中的虚无的幻觉，还有对那些由于某种原因亵渎神灵的亚洲人的控诉、咒骂大幅大幅地出现在书里面。

相反，公元3世纪的野蛮人对“文字”的崇拜程度已经到了登峰造

极的地步。当人们追随的教会通过连续的会议把这本他们认为完美无缺的书推荐给这些人的时候，他们感到无比地惶恐，就像挖到了一块文明的瑰宝。这本书所阐述的观点，他们毫无条件地全部接受了。他们认为人类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因此，如果有人不承认天国的存在，探索摩西和以赛亚规定之外的领域，他们就会对这个人进行咒骂，甚至迫害他。

能够心甘情愿地为了坚持原则而去死的人其实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而已。

但是，确实有些人基于对求知的热切渴望，压制不住内心的骚动，需要寻找一个地方发泄积累了很久的精力。最后，在求知和压抑的矛盾中，“经院学派”产生了，这个学派诞生之际，还十分的弱小。

让我们再次回到公元8世纪中后期。那个时候，法国国王矮子丕平得到了一个儿子，因此他大赦天下，看来，他可以被法国人民称为恩人和圣君了，甚至比好心的路易国王还要更加适合这个称谓。因为路易国王从百姓们手里获得了八十万土耳其金币的获释赎金，当然，作为对百姓们忠实的回报，他们被获准可以建立属于自己的法庭。

回到矮子丕平的儿子这里来，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在接受洗礼的时候，被起名叫作罗拉斯，他的名字经常出现在那些古代宪章的最后位置。这个小时候学过法兰克文和拉丁文的人在与俄国人和摩尔人搏斗的战场上患上了手指风湿病，所以他的手指经常不听使唤，写出来的字也有些拙劣，当然，他本来也没有好好地对待过拼写工作。到后来，他不再自己写字，代替他签字的是当时最优秀的书法家。

这位新皇帝同时也是一位常年征战沙场的老兵，他经常以自己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穿过两次“城市服装”（罗马贵族们穿的外袍）的事迹为荣。他在位期间，皇宫成了私立大学，他的儿女们和其他大臣的孩子在这里学习，他对学习的价值从不敢忽视，许多著名人士围绕在他

身边，他津津乐道地同他们打发业余时间。他在各种讨论中表现得踊跃积极，跟大卫一样，就算是地位低下的学者也可以直接和他展开辩论，他特别崇拜学院式的民主，连礼节也不顾。

可是，当我们对他们辩论的题目进行审视的时候，脑子里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位于田纳西州的任何一所乡间中学的辩论小组所选择的题目。这充分说明了这些人的天真幼稚。

似乎，公元800年的情况与公元1400年的情况是一个样子的，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对中世纪学者的那些行为进行过多地苛责了，反之，我们还应该夸奖他们拥有和公元20世纪的后代人一样聪明机智的脑袋。换句话说，他们与现在的化学家和医生有很多可以相提并论的地方，由于在那个年代，化学还披着神秘的面纱，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个学科，而医学又往往与屠宰有很大关联，所以，尽管他们可以自由地去探索研究，但行为和观点要严格遵守1768年的第一版《大英百科全书》。

这样导致的结果（我自己都有些分不清这些比喻）是很多麻烦的出现，就像把一台罗尔斯·罗伊斯牌的现代引擎安装在一辆旧汽车的底盘一样，这些中世纪的科学家拥有很高的智商和能力，却没有广泛的试验地，一旦踩下油门，就故障了。等他能安全驾驶这个奇怪的新鲜东西，遵守交通规则和按章办事的时候，已经到了无比荒谬的地步，这时候，就算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到达目的地了。

当然，要那些卓越的人才按部就班地遵守进度，这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令人着急的事情。

他们要反抗，要将自己内心的思想和观念彻底地表达出来，于是，他们绞尽脑汁，甩掉教会爪牙们无止境的监视，撰写了工程浩大的作品。

他们掩人耳目的伪装层出不穷，要让人们以为他们是没有任何危

害行为的神经病患，所以，他们常常穿着奇装异服，在屋顶上挂满鳄鱼，将奇怪的瓶子满满地摆在架子上，甚至，为了吓跑邻居而在炉子里焚烧草药，产生奇怪难闻的气味。这样，他们就可以在神经病的幌子下自由地演说，而不必为表达自己的思想而负什么责任。慢慢地，一整套科学的伪装就这样形成了，即便在今天，我们都很难对他们的真正愿望加以正确地辨别。

很多个世纪以后，就像中世纪的教会一样，新教徒也不会对科学和文学持有什么宽容的态度了，我在这里就不花费笔墨来解释了。

那些大宗教的革命家们仅仅只是发出了随心所欲的高声疾呼和诋毁，并没有将这种声势浩大的恐吓变成实际的反抗行为。

至于罗马教会，对此不屑一顾，它已经拥有了铲除异己分子、将他们送上断头台的强大能力，一旦时机成熟，就会采取措施。

我在上面所讲的这些差别，对于那些喜欢将宽容精神和专横政策作抽象考虑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值一提的。

但是，上面的这些差别，将一个无比现实的问题摆在了那些在当众放弃信仰或者是当众接受酷刑两者之间必须做出选择的人的面前。

很多时候，他们虽然想表达自己的观点，想证明那是对的东西，可是他们却缺乏必要的勇气，他们宁愿在《启示录》中野兽名称的纵横填字游戏中荒废大把的时间，对此，我想我们也不用过多地责备他们。

我可以非常确定地说，如果是在六百年前的时代，现在这本书我是不敢写的。

第九章　书籍的灾难

关于对历史的写作，我感到越来越吃力了。这就像我从小就开始学习拉小提琴，三十五岁的时候，别人就以“钢琴也是音乐”为借口，突然给我一架钢琴，命令我过上演奏家克拉威尔那样的生活。让我从一个特别熟悉的学习领域一下子跳到另外一个领域，重新开始学习新的技巧和从事与以往不同的工作，这是同一个道理。我所致力于的事业是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作细致地观察，再加以总结，并且这种观察活动是借助一种明确建立的秩序而进行的，也就是由皇帝、国王、大公和总统在众议员、参议员和财政部长辅佐下较为有效地管理的国家。并且，我小的时候，人们心中主宰世间万物的仍然是上帝，因此，我必须对它保持礼貌和周到的崇拜。

后来，战争爆发了。

帝王和国王随着旧秩序的覆灭而被废黜了，不负责的秘密委员会替代了负责的大臣官员，没有经过议会的讨论和批准，天国之门就这么关闭了，这种现象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屡见不鲜。官方将一个已经死掉的经济学雇佣文人挖掘出来，给他披上了纵横古今的先知们的继承人的外衣。

尽管这些并不会维持多长时间，但它所表现和达到的境界却是文明在几个世纪以后才能企及的，当然，那个时候，我已经离开人世很久了。

对于现有的一切，我必须好好地加以利用，但这其实是一件非常

困难的事，以俄国的情况为例，将近二十多年前，有一段时间，我居住在这个所谓的圣地的时候，时常看到被涂黑四分之一的外国报纸，这些技术上称为“鱼子酱”的漆黑，其实是小心的政府为了遮住群众的眼睛而做的工作，特意遮盖的。

这种让人无法忍受的监督行为被全世界认为是“黑暗时代”的卷土重来。在西方伟大的共和国人民看来，这简直就是无比滑稽可笑的事情，有些人用自己收藏的“鱼子酱”报纸向国人们讲述著名的俄国人只是落后老土的野蛮人而已。

然后是伟大的俄国大革命。

在过去的七十五年里，俄国革命家怒吼说，自己是贫穷的、受到迫害的，没有享受到一点“自由”的生物。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所有的报纸都受到了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方面的严格监督。但是在公元1918年，情况颠倒过来了。发生了什么呢？胜利的革命者、热爱自由的人，他们是不是废除了新闻自由审查制度呢？绝对不可能！他们查封了所有对新主人的行为不作积极评论的报纸和杂志。他们把大批不幸的编辑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者阿尔汉格尔斯克（没有太多的选择）。很明显地，他们比被称为“白衣小神父”的那位沙皇手下遭受唾骂的大臣和警长不宽容一百倍。

我生长在信仰弥尔顿格言的社会，他说：“最高形式的自由是顺应自己的内心自由地理解、自由地描述和自由地辩论。”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相对民主和自由的社会。

“战争爆发了”，就如同电影播放的一样，因此，那些流失掉的过去又重新回到我的视线里来，被宣布为危险文件的《神山布道》在德国被禁止了，它失去了在成千上万的臣民间流传的权力，就连编辑和印刷商为了免于罚款和牢狱之灾也对它敬而远之，没有人敢出版它。

考虑到如此种种，也许写作短篇小说或者是去经营庄园可能会是

比研究历史更明智的选择吧。

但是，我不想就这样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工作，我不能轻易地妥协，我牢牢地记住了，其实每个正直善良的公民都有在秩序良好的国家自由表达、思考和阐述自以为正确东西的权利。当然，这种权利要以不干涉别人的幸福为前提，不能藐视社会的文明礼貌，要遵守当地警察局制定的治安条例。

正是我所做的这些，我成了“黑名单”上的常客，官方出版社将我当作敌人一样的看待。我个人认为，追查那些通过印刷色情杂志和报纸而获利的人才是警察应该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人们想印刷什么就印刷什么，不应该加以管制。

其实我是个注重实际的人，对于无谓地浪费精力我尤为反感，所以，我上面所说的那些话并不代表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是改革者。从我所熟悉的过去五百年的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文字和言论采取的暴力镇压，没有任何一次收获了好处。

那些胡言妄语如果放在了狭小的密闭的容器里，再加上一些外力的打击，就会产生如同炸药一样的威胁。倘若是让一个可怜虫任意发挥，去做演讲，只会有寥寥几个听众过来打发一下好奇心而已，相反，他还会成为人们大肆嘲笑的对象。

还是那个人，如果不去做演讲，而是戴着手铐，被大字不识的粗俗的地方官送进监狱，去承受三十五年的孤独牢狱人生的时候，大家就会对他报以同情怜悯之心，甚至还会被戴上烈士的帽子，光宗耀祖。

不过有一点一定不能够忘记，这个世界上除了有因为做好事而牺牲的烈士，还有因为做坏事而丢掉小命的亡命徒存在，这些亡命徒阴险狡诈，人们永远也看不透他们，不知道他们接下来又要做什么。

所以我说，不要对他们的言行太过限制，就让他们自由地写、自由地说吧。倘若说的是真理，我们就应该知道和了解，如果不对，我们将它很快淡忘就可以了。关于这一点，希腊人早就已经理解了，即使是罗马人，在帝国之前也是对此深信不疑并这样做的。直到罗马军队总司令被吹嘘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以朱庇特远亲身份与普通百姓隔离开来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发生了大逆转，全都变了。

从奥古斯都王朝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如果有人对帝王进言的时候，有稍微地不敬和冒犯，等着他们的就是晦暗的监狱，因为这样的事而获罪的人在那一段时期比比皆是。他们往往被冠之以“欺君犯上”的政治罪名，这项罪名也是那段时期被制造出来的。总之，谈论罗马的皇帝是十分危险的事情，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话题好避讳了。

当世界掌控在教会手中的时候，再无快乐美好可言。

善恶、美丑以及正统与异教之间有明确分界线的时候，是在耶稣死后的几年时间内发生的。

公元1世纪后期，小亚细亚的以弗所附近地区随时可以看见圣徒保罗传教的身影，那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享有盛名，他到处宣扬教义，降妖除魔，许多教徒拜倒在他脚下，甘愿追随他、相信他的异教错误。《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一个天气晴朗的日子里，人们带着无比虔诚的忏悔之心，手捧魔法书，相聚在一起，一把火烧掉了价值一万美元的秘密符咒。

这些行为是人们在忏悔之心的牵引之下做出的自愿行为，《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这是保罗要求他们不得阅读或收藏这些东西。

一个世纪以后，保罗被彻底打倒了，它成了教徒们绝对不能跨越的禁地，在以弗所城的某些主教的命令之下，凡是对圣徒保罗有记载的书都成了虔诚忠实的教徒们严禁沾染的书。这一个历史性的步伐，到此终于迈了出去。此外，在以后的两百年中，由于本身就很少有新

的图书出现，所以也很少再有书籍被封停。

对文字的审查工作被提上教会的议事日程是在尼西亚公会议（公元325年）以后，当基督教登上罗马国教的宝座的时候，教士们的日常工作又增加了一项，就是对文字的审核。那个时候，有些书是被绝对禁止的，有些则被贴上了“危险品”的标签，它警告人们：阅读的后果就是生命的代价。所以，出于对生命安全的考虑，还是在当局的准奏下出版作品吧。而且，作者的手稿必须经过当地主教的审核、批准，这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必须要遵守。

就算这个作者的这本书通过了教皇的审查，顺利出版，但也不能说这本书就获得了永久流传于世的通行证，这一届教皇赞同的，下一届教皇很可能会认为它亵渎正统而将它扼杀。

但是，这一项制度至少是保证了作品创作者的安全，由于那个时候的书籍靠手工抄写流传，而一套三卷本的书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出版，这项有效的措施可以避免作者随着羊皮纸上的作品在烈火中丧生。

后来，约翰·谷登堡的发明又将这一切改变了，他还有另一个名字叫作古斯弗莱士。

这个发明使出版界发生了空前的变革，公元15世纪中叶以后，那些能干的出版商可以在短短两星期的时间里将四五百本的图书呈现在人们面前，大量的图书问世，使得从公元1453年至1500年这短短的时间内，多达四万册不同版本的图书在西欧和南欧读者间流传，这些图书量可以跟当时最大图书馆里拥有的全部图书量相媲美。

迅猛增加的图书量使教会颇为头疼，有两千万的异教徒正手捧两千万册编辑规整统一的图书在阅读，他们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所以他们也不能轻易去逮捕一个在阅读自抄的《马太福音》的异教徒，虽然他们已经掌握了确切的消息。当政者的思想体系已经受到

了巨大的冲击，这件事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必须对这些书籍进行全面的审查，确定是不是可以出版，因此，执行这项任务的特别法庭成立了。

这个特别法庭拥有与宗教法庭一样不堪的名声，臭名远播的《禁书目录》就是它的杰作，它经常公布一些含有“触犯禁令”的书目，把它们打入禁书行列。

对于印刷出版的监控并不是只有天主教会才有，如果有人认为是的话，就大错特错。对于出版物的言论威胁，使得很多国家政府机关非常害怕，为了及时杜绝出版物对国家安宁造成危害，出版商的出版物必须要先移交公共检查机构审核，盖上官方批准的印章才能顺利出版，否则，是不允许出版的。

这种做法在罗马得到了延续，不过今天的做法与公元16世纪中期的情形也有很大的不同，此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将它继承延续下来。这是必然的结果，在如此迅猛发展的出版事业面前，负责审查的“‘禁书目录’委员会”，即红衣主教会议是绝对不可能跟上发展的步伐的，大量的图书还有报纸、杂志和以传单形式流传的小册子和油印文稿像洪水一样势不可挡地猛冲猛撞，把主教们搞得焦头烂额，不管他们有多么敬业和勤奋，要在三年之内把这些东西读完一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还有审查和分类，那就纯属天方夜谭了。

恐怖和灾难再次降临到可怜的人们身上，统治者的专横跋扈同样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

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塔西陀觉得“迫害作者只会让那些原本没有被公众注意到的图书更加裸露在公众面前”，所以他发表宣言说要“反对对作者加以迫害”。

这一观点在“禁书目录”中得到了证明。随着宗教改革的凯旋，大批的禁读书籍一跃成为指引读者了解当代文学的向导书，它的地位如

日中天。此外，更为夸张的是，它成就了一整套禁书出版贩卖流程。公元17世纪的德国和低地国家那些负有雄心壮志的出版商把自己的耳目常年投放在罗马，什么书籍被列入禁书行列或者有被删节处理的，立马会被他们所掌握，接着他们带着这些最新禁书名册千里迢迢地穿越阿尔卑斯山和莱茵河谷，快马加鞭地交给赞助商。然后交给位于德国和荷兰的印刷商进行印刷，印刷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印刷，最后，这些特别版以高价被专业书贩子偷偷售往禁令森严的国家。

但是，能够安全顺利过境的书籍只是很少一部分，像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国家，直到不久前，“禁书”活动的风声还非常之大，对于禁书的打压政策是残酷血腥的，后果不敢想象。

大学生们没有外国教科书可以阅读，不得不使用的国内书籍也没有很高的含金量，纯属低劣产品，这对于国民素质的发展是有诸多限制的，所以，如果这些国家在国际进步的竞争舞台上败下阵来，也是很容易理解的。

其实“禁书”带来的最大危害是对人们求知探索热情的直接打击，人们早已经心灰意冷，他们不想花费自己大量的时间和心血做一件没有结果的事情，头脑健全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反正，辛苦写出来的书，最后要被无知的检察官“修正”得乱七八糟，支离破碎，或者被胸无点墨的宗教法庭调查委员会把它改得背离作者原来要表达的意思。

比起写书这件无谓的事，他觉得钓鱼、参加化装舞会或者去酒馆这样打发时间要更好些。

当他对自己和自己的人民彻底绝望的时候，他可能会安静地坐下来，将唐·吉诃德的故事写在纸上。

第十章　关于这本一般历史书籍的写作

对于那些在现代小说的路数里厌倦不堪的人，我在此怀着热切的心慎重地将伊拉斯谟信札推荐给他。这位博学多才的求知者本身就是个极其温顺的人，他拥有很多更加温顺的朋友，这些朋友经常给他来信，在这些信件中有很多对他一如既往的忠告。

“听说您准备要将路德之争写成一本小册子。像您这样容易得罪教皇的人，在写这本册子的时候，请注意分寸，您能诸事平安，是教皇的意愿。”这是谋行政长官写给他的。

还有人说：“有个刚从剑桥回来的人告诉我说，您的一本散文集正在筹备中，即将出版了，您千万不要触怒皇帝啊，他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会使您遭受危害的，您就当是给上帝面子吧。”

作者出版一本书想要从中获取收入，得到官方的保护，要考虑得很周全才行，不管是卢万主教、英格兰国王还是索邦大学或者是剑桥大学里面目狰狞的神学教授，这些方方面面的一个都不能落下。如若不然，很可能就会在宗教法庭的刑车下遭受粉身碎骨的厄运。

现在的情形与以前相比真可谓是天上地下了，行刑的轮子（运输工具除外）已经安静地躺在古董博物馆里，落满了尘灰，宗教法庭消失在近百年的历史洪流中，历史学家们从来不会把“收入”这两个字挂在嘴边，人们埋头经营着文学，至于官方保护，对他们而言，实在是

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了。

但是，当我决定要写一部宽容史的时候，在我那一向远离尘嚣的小屋子里还是充满了另一种形式的各种各样的忠告和警示。

有一个书记官对我说：“黑人已经被哈佛大学拒之门外了，如此令人遗憾的一件事，请切记写在书里面！”

还有人说：“马萨诸塞州的弗拉明戈的一家食品店老板公开宣称加入了罗马天主教，当地三K党已经采取措施对他进行了抵制，在您写宽容故事里面，对于这个事情应该会说几句吧。”

类似这样的忠告和警示，实在是太多了。

不可否认，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很愚蠢的，本来应该受到严厉地指责，但这本论述宽容精神的作品似乎没把他们包括进去。它与官方形式的宽容是大相径庭的，某种程度上，它只是代表了那些低劣做作和缺乏正派的公共精神而已。而官方的宽容精神则被嵌套在教会和国家法律之中，并且为对无辜百姓的迫害残杀行为套上了神圣职责的光环，使它合法化了。

历史的生动光辉应该要体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上，就像伦勃朗的蚀刻画一样。其他方面就让它留在黑暗中，没有人可以看见。这是贝奇霍特的观点。

不宽容在现代社会也是存在的，并且还非常的强大，我们可以从报纸上看到事实，虽然如此，前途还是无比光明的。

很多在前辈们眼中是无比正常合理的事情，今天看来却有些需要商榷的余地，激烈地争论由此开始，人们不会接受那句“一直都是这样”的批语，逆来顺受地全盘接受一切，他们会跳出来为捍卫自己的思想而战。可能他们捍卫的这些思想在长辈和前人们看来只是增加笑料的、没有任何实际价值的幻想。当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他

们的思想世界常常受到这些人的猛烈攻击，很多次他们都摘取了胜利的桂冠。

我不想用太长的篇幅来写作这本书，短小是这本书必须坚持的原则。

我不想对那些生意兴隆的当铺老板阿谀奉承的嘴脸做作过多的描述，我不愿意谈论独霸一方的北欧人降低的荣誉和在偏远地区传教的无知教士，还有偏执顽固的农民教士和巴尔干的犹太法学博士。这些人品还可以、但思想龌龊的人总是对我们纠缠不清。

在政策开明的国家，这些人如果没有官方保护的盔甲，他们就是不成气候的，那些可能存在的危害性，完全没有发挥的余地就消失了。

个人的不宽容很可能会引起一个社团内部的巨大矛盾，确实是很令人厌恶的，它的破坏力甚至比麻疹、天花和长舌妇加在一起产生的能量还大。不过，这种不宽容的主体中要排除刽子手，如果不宽容的个人是刽子手的角色，那就非常危险了，就像某个时候的某些国家所发生的那样，超出法律的限定，警察该找上门了。

此外，个人不宽容的情况还排除监狱，也不能上升到国家高度，为人民的吃什么喝什么以及言行做出限制，不然的话，新法律就失去存在的意义了，就是在哥伦比亚也无法立足，正直的老百姓必然会怨声载道，民怨沸腾。

总之，个人的不宽容只是一个小范围的东西，它不能挑战大多数人民的意愿，在自由国家里存活于人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不过，官方的不宽容则另当别论，巨大的权威才正是它的特点。

官方的不宽容有置人于死地的特权，除了它本身以外，它不承认任何权力的存在。它高高在上，从不会为自己的错误做任何忏悔和补

救。它善于用“天神”来进一步装点自己的权威，为自己披上“天国”旨意的强大外衣，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有力，所以，任何的辩解它都不可能听得进去。谁掌握了政权，谁才拥有解开生存之谜的伟大思想。

假如，读者们看到我在这本书中大多数时候解释的“不宽容”都是“官方的不宽容”，而对个人的不宽容提及甚少，那么要请各位读者原谅我，对我多多担待了。

毕竟，我在同一时候，只做得了一件事而已。

第十一章　文艺复兴

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住着一个博学多才的漫画家，他总是在想，诸如地滚球、填字游戏卡、小提琴、煮洗的衣服和门前的擦鞋垫，这些东西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他似乎喜欢用这样的问题来困扰自己。

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些奉命操控现代化大型攻城大炮的人的心理更能引起我的兴趣。战争中各种各样奇怪的工作中，没有什么比发射贝尔塔型巨炮更荒诞可笑的了，因为，至少其他士兵多多少少能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想知道煤气工人是否中弹，飞行员可以透过腾飞的红色光芒看到。

返航的潜艇指挥员，在两三个小时后，只要看一下遗弃的残骸，就知道自己成功的程度了。

壕沟里的可怜士兵们，只要还在壕沟里面活着，就可以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已经守住了阵地。

就连野外的炮兵们，当看不到射击目标的时候，藏在七英里以外一棵枯树上的同伴可以用耳机告诉他们目标教堂的塔尖是不是已经被摧毁了，还是要重新调整角度打一次。

但那些常年生活在孤独虚假世界中的贝尔塔型巨炮操控手却不可能会知道他们对着天空发射出的炮弹的最后归宿在哪里，甚至是经验

老到、博学多才的弹道学教授也不可能知道。那颗炮弹可能击中了目标，光荣完成了任务，也可能是在兵工厂或者是什么要塞中心引起了一片恐慌，也不排除它来到了教堂或者是孤儿院，当然，它在河水底下或是墓穴里面睡大觉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以我之见，作家就跟那些操控重型武器的攻城炮兵是一样的，他们打出文学这颗重型炮弹的时候也不知道炮弹未来的命运，出乎意料地落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引起骚乱和动荡，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不过，这种情况毕竟太少见了。大多数时候，只是一颗没有任何威慑力的哑弹而已，它最后的命运就是悄无声息地躺在田埂上等着人们把它当废铜烂铁一样的捡回去，制作成雨伞架或者是花盆，了其一生。

下面我要说的就是“文艺复兴”的时代，这个最短的时间内消耗了最多纸浆的时代，这个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的时代。

这个时代的确是空前的，每个人都迫不及待地印刷自己的作品，这里所说的每个人指的是意大利半岛最常见的托马索、里卡多、恩里格，还有条顿大平原上的每一个托马斯医生、里卡得斯教授和多米尼·海因里希。他们用的最小的纸张是十二开的，至于仿照希腊人而写作出来的美丽的十四行诗的托马西诺和里卡蒂诺照着罗马祖先的美文而写出来的颂歌就更不在话下了。此外，有无数的人加入了收藏大军，他们收藏古币、雕塑、塑像、图画、手稿和古代盔甲，并乐此不疲。那些从祖先留下的废墟里面挖掘出来的所有东西，被他们迫不及待地进行分类、整理，并完成一系列的制表、存档和编纂工作，最后，配有美丽铜板和精美木刻的印刷本问世了。

谷登堡因为印刷术的发明而进入了地狱，却使弗罗本、阿尔都斯、爱提尼及其他新印刷公司大发横财，大量的财富因人们急切的求知欲被他们拢入了自己的钱袋子。但是，我要说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只看到为数不多的几位耀眼新星所贡献出的闪光新思想，作家们生活的公元15、16世纪并没有因为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而受到较大的

影响。那些贡献了新思想的人跟操控重型武器的士兵一样，自己的作品究竟带来了什么后果，他们并不知道。但是，我们不得不感谢他们，拦在进步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和一堆堆的垃圾被他们彻底地清除了，因为他们的功劳，我们就不用担心那些垃圾会扰乱我们的思想。

其实，早期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是艺术品，它们企图从艺术品中挖掘出叫作“古典精神”的东西。所以，一开始它不具有太多的积极意义，对于刚刚消亡的过去，它是持鄙视态度的。上代人的作品在他们眼里成了“野蛮”的作品（由于哥特人曾一度有着和匈奴人一样不堪的名声，所以也可以叫作“哥特式的野蛮”之作）。

建立在人性上的自由和宽容由于文艺复兴而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人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可惜，这场运动的领导者们并没有致力于这些。

我们知道，在相当一段时期内，罗马主教拥有不可动摇的强大权力，他限定了波希米亚农民和英格兰自由民祈祷时用的语言，规定了学习耶稣教义所持有的精神境界，规定了人们的放肆行为应该接受何种程度的惩罚，也规定了人们所读的书本和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可是，这一切又凭什么呢？罗马主教有什么权力来强制限定这一切呢？关于这一质问，在这场运动前的很多年，就已经有人提出来了。公然对抗这个强大帝国的强权只能招致毁灭，就连他们倡导的那场民族运动也不免以失败告终。

当莱茵河上飘满约翰·胡斯尚带火星的骨灰的时候，教会无疑是用这不光彩的一幕对全世界发出郑重的警示，教皇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仍然是世界的主宰，任何反抗行为都是徒劳地挣扎。

已经死掉的威克里夫被当政者从坟墓里扒拉出来，他的尸体在烈火中化为灰烬，教皇借此告诫莱切斯特的下层农民，它的势力无处不在，连坟墓也不在它的视线之外。

正面冲突这条路很明显是走不通的。

十五个世纪里浩大权威的累积，铸成了“传统”的坚固外壳，它经得住任何外力的捶打。当然，这个铜墙铁壁堡垒的里面却是发生了很多的丑闻。三个教皇都说自己是合法的，为争夺圣彼得继承人的位置而大动干戈；腐败的罗马和阿维尼翁教廷制定了便于人们花钱疏通的法律，毫无章法可言；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大肆向人们鼓吹地狱的恐怖，敲诈失去孩子的可怜父母缴纳大量的赎罪钱，这些发生在教会内部的龌龊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教会却并没有因此而有什么损失，对此，大家都心照不宣了。

奇怪的是，正是那些无暇顾及教会之事又对教皇和主教们没有太多恨意的人们随意打出的几颗炮弹竟然将这座古老坚固的堡垒给击垮了。

有一群杂乱的平民老百姓实现了布拉格那个“瘦小苍白的人”的梦想，这个人一心想着踏进基督美好道德的最高殿堂。现在这群人意图单纯，他们只想尽一个圣母教会虔诚弟子的责任，一辈子做有意义的事情，为全世界人民做善事，不管活着还是死去（最好等老了以后再死）。

这群人来自欧洲的每个地方，他们是各行各业的忠实代表，他们不愿意当时的历史学家将他们的真实意图表达给人们听，这样会让他们无比恼怒。

以马可·波罗为例。

这位被人们称为“百万美元的马可”是个卓越的旅行家，我们都知道他一生中到过许多地方，看到过很多陌生而奇异的风景，他的足迹从来不局限在西方城市那块巴掌大的小地方。人们从他那里听到这个世界上有像宝塔一样高大的金色宝座，他向人们描述大理石城墙的长度跟巴尔干到黑海的距离一样大，人们经常被他所讲述的奇闻怪事逗

得哈哈大笑。

这位伟大的旅行家在历史进步潮流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马可先生却并不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文笔也不好，在他来看，真正的绅士已经开始与宝剑打交道而不是鹅毛笔。他跟那个时代同一个阶层的人们一样，对文学是持有偏见的。他一生的传奇经历和所见所闻被欧洲人所熟知，这得益于跟他一起坐牢的一个可怜的作家。那个时候，战争导致了马可的监狱生活，在百般无聊的牢狱生活中，他把自己全部的故事讲述给那个作家听。

马可告诉人们他看见一个虔诚的圣徒在小亚细亚把一座山移动了两英里，这个头脑简单的家伙固执地认为圣人借此向人们证明“真正的信仰可以做到什么”；另外，对于一些流传已久的故事，他也深信不疑，无头人和三脚鸡的故事就是他讲出来的，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讲述远远超越了一千三百年的一切，教会的地理学理论就这样被他全盘否定了。

其实，马可·波罗从出生那天开始就一直是个地道的基督徒，关于这一点，他自己也是深信不疑。与他同时代的还有著名的科学家罗杰·培根，当时，要是有人把他们两个相提并论，马可先生会怒发冲冠，他一点也不喜欢人们这样做。我们所熟知的培根，他曾经十年没有写过一个字，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求知道路，后来，还在监狱里度过了整整十四年的光阴。

尽管如此，将这两人相比较，马可·波罗的处境要更危险一些。

你想想看，培根的境界毕竟太高了，十万个人当中，能够跟上他的步伐飞到天上去的顶多就只有一个而已，但是，马可·波罗所说的那些，就算是只学过ABC的普通百姓都能够了解。他向人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世界有很多东西是写作《旧约》的圣人不知道也想不到的。

当然，我们知道，要教化一个蒙昧的世界是要经过很多个世纪的

时间来探索和准备的，这个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苦难，所以，我并不是要告诉你们当这个世界还完全没有自由的时候，只要出版一本书就可以击垮无比权威的《圣经》。但是，人们却能充分理解探险家、航海家和旅行家所发出的质朴的声音。这充分支持了怀疑论精神，对它的诞生起到了助推作用。产生于文艺复兴后期的怀疑论，用极大的宽容和耐心批准人们自由言论，这些言论如果是在几年前出现的话，很可能会获罪于宗教法庭。

我在这里举一个薄伽丘的例子，这是一个具有奇特性质的故事。

薄伽丘和朋友们离开佛罗伦萨去旅行，在妙趣横生的长途旅行中，他们听到了一个论述所有宗教体制利弊共存的故事。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宗教体制都是一半对、一半错。倘若是这样，就不存在衡量对错的准绳，那些因为有分歧观点的人在绞刑架上丧命就是无比冤枉的事情了。

还有更为奇特的探险是由著名学者伦佐·瓦拉创造的。这位至死都在罗马教会政权中享有盛名的政府官员，在拉丁文研究中曾慎重地指出那个关于“罗马、意大利和西方所有省份”都是由康斯坦丁大帝赠送给了西维斯特教皇的传说（从这以后的历代教皇拿着这个令箭称霸欧洲）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而已。他说，这只是教皇法庭里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吏在皇帝离世几百年后杜撰出来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现实世界中那些深受圣奥古斯丁思想感染的忠实教徒们。他们从圣奥古斯丁那里得知生活在地球另外一端的人没有机会看到第二次基督降临了，由于他们异端邪恶的思想，他们没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但是，在公元1499年圣奥古斯丁的这种说法随着达·伽马远航结束从印度的归来而遭到了巨大的冲击。达·伽马向人们讲述了地球另一端的真相，那里有众多的人口和密集的王国，这个时候，追随圣奥古斯丁的信徒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他的教义了。

环球航行的“维多利亚号”顺利返航碾碎了这群头脑简单的人一直被灌输的这种理论：世界是像平面的圆盘子一样的形状；宇宙的中心在耶路撒冷……诸如此类。同时，《旧约》中的很多错误的地理知识也暴露无遗。此时，人们的认识观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事情呢？

在此，我有必要对刚刚所说的那些做一下重复说明。自由探索钻研科学的时代并不是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甚至精神领域也并没有多大的建树，没有建立真正的合理追求，反正，美和享乐在那三百年的时间里一直稳居主导位置。异教徒们只要对印刷术感兴趣并且具有好口才，即使他们曾经把教皇大人惹得恼羞成怒，也可以有与他共进晚餐的机会。像萨伏那洛拉那样的人物，对于美德的歌颂和赞美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他跟那些未知论者一样，处境危险。至于年轻聪明的未知论者，他们善于用诗歌和散文对基督教教义的观点进行无情地抨击，通常是言辞激烈，绝不手软。

这个时候的人们出现了表里不一的特性，表面表现出来的是对新生活的无比向往，但内心却暗藏着对现实的不满，拥有巨大权力的教会对于人类发展的束缚使得人们相当地反感。

从薄伽丘到伊拉斯谟，中间两个世纪近两百年的时间里，抄书匠和印刷商一直处于忙碌的工作状态。除了教会自己出版的图书以外，其他所有重要书籍无一例外的向人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明被入侵的野蛮人破坏了，世界只剩下混乱和野蛮，无知蠢钝的僧人掌控了西方世界，巨大的灾难降临了。

生活在马基亚维利和罗伦佐·德·美第奇的那个时代的人是地道的现实家，他们对伦理学没有丝毫兴趣，实际和现实世界对他们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害怕教会庞大的组织系统和巨大的威力，他们提倡和平相处，他们非常清楚改革和对抗只会为他们带来灾难，因此，他们从不轻易尝试这些活动，对管辖制度也表现出温顺的态度。

人们习以为常的是，从小就非常自信于这句“我们知道”。现在，他们的求知欲开始膨胀，好奇之心永远处于饥渴状态，新鲜刺激成为他们追逐的目标，在他们异常活跃的思想驱使下，开始发出“我们真的知道吗”这样的疑问来。

比起彼特拉克的十四行诗集和拉斐尔的画集，这些似乎更加值得后人纪念和缅怀。

第十二章　基督教改革

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有很少的时候是只出于一种单一的动机，这是我们从现代心理学中学习到的其中一件非常有用的东西。我们心里非常清楚地知道，当我们慷慨解囊，为一所新成立的大学捐赠一百万美金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看见饥饿的流浪汉却连一个铜子儿也舍不得施舍给他的时候，我们内心所做出的这些决定很多时候都是由很多种动机和理由共同促使的。这样的情况同样表现在当我们非常努力地去辩解说只有在国外才能得到真正的智力自由，或是我们发誓永远不再离开美国海岸的时候，还有坚持说黑是白抑或是说白是黑的时候。即便是这样，为了我们的面子能挂得住，我们往往又不愿意在大众面前老实自觉地承认自己有这些动机。很多时候，面对这些动机，我们总是会进行一遍细致的筛选，挑选出我们认为最具有说服力、最体面、最有价值一个，然后再对这个经过我们精心挑选脱颖而出的动机进行华丽地装饰，使它更适合大众的口味，然后才向人们公布它，并冠冕堂皇地把它称之为“我们做某件事的真正理由”，当然，促使这一切发生的，正是人类的天性。

但是，这些所谓的动机只能骗别人，很多时候也能在大多数场合起作用，却无法骗到我们自己，哪怕是一分钟也不能骗到。

这似乎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共识，这种默契在文明伊始就已经诞生了，人们都默默地遵守着，没有任何人会在公共场所将它点破。

不管我们心里面的想法是怎样的，只要从表面上保持体面，我们

的内心就会觉得满足和快乐，人们之间很容易就达成这样的共识：“你相信我的谎言，我也相信你的谎言。”

不过，这一套却不能用在大自然中，它是没有任何礼仪界限可言的，它也从不遵循人们的行为和准则。正因为如此，文明社会的大门面对它时基本都是紧锁着的。毕竟，到今天为止，只有极少数人会以历史作消遣。那个可怜的女神克莱奥似乎很不幸，甚至比没有她体面的姐妹们还不幸，她只能在枯燥乏味的生活中慢慢消耗了精力，而那些姐妹们却从天地产生之始就拥有唱歌和跳舞的权利，她们可以自由地接受邀请，参加晚会，这些在可怜的克莱奥心里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于是，她开始施耍一些小手段，以此来平息自己心中熊熊燃烧的妒火。

报复的种子埋藏于人们的天性之中，它是非常危险的信号，常常要人们付出生命和财产的昂贵代价。

很多个世纪流传累积下来的一整套的谎言被这个老妇人捅破了，霎时间，世界开始动荡不安，安宁和幸福被硝烟和战场所取代，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搏斗场，由几千个战争组成。

这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横冲直撞的骑兵团和满世界移动的步兵团，他们黑压压地覆盖了广阔的大地。荒凉凄惨充满着整个国家，人们只能安静地躲在家里或者墓地，他们所有的财富正渐渐化为乌有。

就像我在前面所描述的那样，与我们一样的人，现在开始清醒过来，有关历史不仅是科学也是艺术的说法，他们也渐渐接受了。到目前为止，只有在化学实验室和天文台才能有一席之地的自然法则成为历史的支架。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有必要开展一次有价值和意义的科学大扫除，对于后人来说，这也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到现在为止，我终于绕近了本章的正题了，即：基督教改革运动。

对于社会和思想大变革的意义，人们有两种观点，即要么是持全盘肯定的观点，要么是持全盘否定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直到不久前还保留着。

对于支持第一种观点的人来说，这是宗教热情高度膨胀所导致的结果，教皇所做的那些肮脏的交易和腐朽的统治以及大肆受贿让品德高尚的神学家们实在忍无可忍，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建立新的教堂，将真正的信仰传授给正直、忠实的基督徒。

可是，这种热情在依旧忠诚于罗马的人身上是绝对不可能找到的。

在阿尔卑斯山另一端的学者们则认为宗教改革其实就是一场反叛运动，带着憎恶的面具。几个不想结婚的王公贵族企图霸占教会圣母的财产而阴谋搞怪，莫名其妙横生事端。

跟以往一样，持有这两种观点的人都对了，但是又都错了。

导致宗教改革爆发的原因实在是太多了，而且是有形形色色的人参与进来。而宗教不满并不是造成这次运动的主要原因，相反地，它只是扮演了一个小角色而已，神学方面的背景在这里更加显得渺小而卑微。事实上，它是一场势不可挡的社会和经济革命，它的发生绝非偶然。

要是跟我们的子孙讲，有一个无耻的政客，在与其他教徒战斗的时候，使出了很多阴谋诡计，接受了土耳其异教徒的帮助，这样，子孙可能一时很难去理解。如果告诫他们说，开明的统治者菲利普王子非常重视改革后的教旨，这样一来他们可能会容易相信吧。所以，新教徒们喜欢给赋有野心的伯爵穿上宽容大度的外衣，几百年来，这种做法也一直在延续，然而，他们最希望看到的，可能是哈斯堡家族被黑森家族从历代统治者的王座上赶下来，并取而代之。

另外，关于主教克莱门特，我们就把他当作一个用尽最后力气控制羊群不至于跟随领头羊误入歧途的可爱的牧羊人来看待吧，如果以典型的美第奇家族的王子来看待他，这似乎更难理解。因为在美第奇家族看来，所谓的宗教改革其实只是喝多酒的德国僧人，头脑不清醒在那里撒酒疯呢，为了意大利的好处，教会被他们利用了。所以，对于天主教书本中这个传说人物的那张笑脸，我们也根本不用讶异。

新世界的序幕已经拉开了，我们已经站在了舞台上，就让我们的思想自由地驰骋吧，我们不必再坚持这种欧洲必然发生的历史上先人们的错误，让我们自己来下一个结论。

那位雄心勃勃、赋有强烈政治抱负的黑森家族的菲利普，他是路德的好朋友和支持者，同时他也是宗教信仰的支持者。

对于宗教信仰，不能说他不虔诚，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

公元1529年，他扮演了一回实际上已经扮演了的角色。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在著名的《抗议》上签了字，与其他的签名者一样，他安然地等待着一个大名签上去以后所带来的“狂风暴雨般的残酷打击”。在此，我们看到了他的勇气，那无与伦比的勇气。

我必须要再强调一下，对于那些历史人物因某种启发而做一些事情，或者是因为不得已而放弃一些事情这样的行为，我们不能因此随便给他（或者是我们所熟悉的人）一个评价而企图概括他这个人，相反地，我们应该要对他的各种动机做全面的研究和分析，然后才能得出一个客观公正的定论。

我在法国那句“了解一切即宽恕一切”的谚语上稍微地作一下补充修改，因为我觉得原来那句话所阐释的解决方法有些简单了，现在我的这句是“了解一切就是理解一切”。很多个世纪以前，我们善良的主就给予了自己宽恕别人的权力，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地让他去履行宽恕的职责。

我们可以谦恭地试着去“理解”，毕竟人类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这样做就已经足够了。

在这个题目上我的话题被扯得有些远了，现在，我们还是回到宗教改革这个正题上来吧。

前三个世纪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爆发。一开始，它只是为了追求一种新的精神而已，后来被人们加上了“民族主义”的帽子，所以，那个外来的国上之国成为它无比仇视的敌人。在前五个世纪的欧洲，这个所谓的国上之国作威作福，每个国家都不得不在其权威之下唯唯诺诺的生活。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理解”。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共同的敌人，德国人、芬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挪威人才走到了一起，积聚了团结的巨大力量，运用这种力量，那道一直以来监禁他们的城墙便可以被击得粉碎。

相反，如果各怀鬼胎，各自为营，个人的仇恨和嫉妒之心四起，并从中作怪，没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可以压制这些野心和情绪，那么，宗教改革就会演变为很多小规模的地方混战。它的战斗力和抗打击能力也会低到一支雇佣军团和几个强悍的宗教法官就可以轻易地摧毁它。宗教改革最终必然会以失败收场，等待他们的也将是残酷的厄运，领导者的下场最终会像胡斯一样，而跟随他们的人也逃不掉死亡的命运，沃尔登学派和阿尔比格学派就是他们的榜样。教皇集团将迫不及待地将这次轻而易举得来的胜利进行大肆宣扬，而接下来，雷克里克式的统治制度便会降临在那些“违反纪律”的人们的头上。

当这场改革运动胜利的号角吹响的时候，新教徒的阵营便迅速地分解了，他们各自为营，虎视眈眈地相互对望，敌人当权时所犯的那些错误，被他们全部拿来重演，并且是在一个比以前大大缩小的范围内进行的，所以说胜利并不等于成功，可以说，成功的范围是非常之

小的。

有一个法国主教（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人，可是我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了，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曾经说过，不管人类处于什么样的境地，我们都必须热爱他们。

站在历史的高度，我们看一下近四个世纪里发生的这些事。一直以来，人们在希望和绝望的境地里挣扎匍匐。曾经有无数的男女，为了心中的理想，毅然走向刑场和战场，尽管他们的勇气非凡，但那些理想却从来没有变成现实；还有那些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神圣的东西而牺牲的数以百万计的平凡普通的老百姓；此外，那些为自由公正而战的新教徒，他们的死并没有换回开明美好的世界，而更多的是以失败告终。在这些事实面前，人们该如何面对呢，他们博爱的心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我要毫无顾忌地说，这个世界并没有因为新教徒推崇的那一套而变得美好和高尚，相反，原来的美好、美丽和高尚反而被他们破坏了，并带来很多狭隘、粗俗、可恶的垃圾，人类社会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变得简单和谐，而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没有秩序可言了。这些如果要归罪于宗教改革，倒不如归罪于大多数人天性中的缺点。

他们不愿意匆忙慌张地去做一件事情，也无法跟上领袖们的步伐。

当然，他们心里面依旧有着善良的愿望，他们要选择最好的时机才会踏上通往新天地的桥梁，不过，他们最终都是要这么做的，对于祖先留给他们的传统，他们也不愿意放弃。

宗教改革的本意其实是人们对于一种新关系的渴望，他们试图彻底铲除以前的那些偏见和腐败，使基督徒和上帝之间以一种新的关系存在，但是，中世纪的包袱却一直在那些追随者的头脑中作祟，最终，宗教运动被他们搅黄了，事情最终还是走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最后演变成了跟它无比憎恨的教廷组织一样的运动。

新教徒起义最终还是败给了那些支持者的庸俗理智，对此，我们不能不说这是令人无比遗憾的悲剧。

当然，西部和北部的人期望进步的理想也就随之化为泡影了。

不过，在这场运动中，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虽然我们看不到一个正确到底的人，却看到了一本传说中完美无缺的书。

无数个小当权者取代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当权者。这些小政权的首领，人人都狭隘地想着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称王称霸。

基督世界被无数个意见不同的小团体所瓜分，而没有出现那种一部分是统治集团、一部分是被统治集团的两部分团体的局面。这些小团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语言，他们总是相互仇视，把所有跟自己有分歧的人视为仇敌。

宽容的统治局面也并没有出现，它跟早期的教会是一个样子的，他们获得了权力以后，便用数不胜数的宗教手册、教旨和忏悔为他们加固城墙，以便对那些反对他们的团体进行猛烈开火。

这些在公元16、17世纪的思想发展中是无法避免的。像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领袖，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他们所具备的勇气呢？左思右想，只有一个：硕大无比，这听起来似乎很吓人。

有一位住在德国偏僻荒芜之地的潮汐学院里的教授，曾经当众将教皇的一道谕旨给烧毁了，这个质朴的多明我会僧人用自己反抗的思想向教会发射了一颗炮弹。另外，还有个体弱多病的法国人，他丝毫不顾及教会的力量，把瑞士的一个小村镇建造成了坚固的堡垒。从这些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坚韧执着的人类美德，这些美德，现代世界的人是无法企及的。

很多各怀鬼胎的朋友和追随者迅速地聚集到这些胆大妄为的反叛者身边。说他们各怀鬼胎是因为这些人都动机不纯，朋友们可能有自己的目的，追随者也很可能只是为了捞得一点点好处而已，不过这些都不是这本书要讨论的问题。

未来的世界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或者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聚集了如此之多的北方民族，关于这些，反叛者们并没有预见到，他们去做一场生死搏斗仅仅只是为了坚持自己的良心而已。

但是，这场大旋涡是由他们自己引发的，他们已经深陷其中，随波逐流是他们必然的命运。

当远在千里之外的教皇开始意识到这场动乱不仅仅是像多明我会和奥古斯丁僧人之间的争吵那样简单的时候，让反叛者们头疼的事情也随之而来了，为了保持自己能待在水面上，几乎花费了他们全部的精力。教皇为了阻止那个法国牧师的阴谋，博得广大资助人的欢心，暂时停止了建造教堂的工作，把重心转移到讨伐的事情上来。随着教皇的谕旨和逐教令，帝国的军队快速出动了，反叛者将迎来一场生死相争的恶战，到了现在，他们已没有选择的余地。

激烈地战斗和血腥地厮杀，让那些伟大的领袖们看不到平衡点，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曾经大声疾呼“烧死异教徒是违背圣灵的”的那个路德，在几年后，想起有浸礼教徒思想的邪恶的德国人和法国人的时候，也表现出了深恶痛绝的情感，其憎恨的程度近乎疯狂。

这个在最初极力倡导人们不能打着上帝的幌子将自己的逻辑体系合理化的改革者似乎是无所畏惧的，但最终，理论境界远远高于他的人统统都被他送上了火刑架。

今天的异教徒，到了明天，就成了所有与他的意见有分歧的人们的敌人了。

一直将新世界挂在嘴边的加尔文和路德，尽管他们总是对那个黑暗过后便会充满阳光的世界有着无限憧憬，但事实上，他们的一生都忠诚于中世纪的传统思想。

这些人，从来没有把宽容当成是一种美德。

当他们没有了立锥之地，便拜服在信仰自由的神圣权力之下，用它作为有力的武器，对准敌人开炮。当胜利的果实到手的时候，这个武器似乎就无用武之地了，于是，跟那些善良的愿望一样，这个武器也被划入了废品仓库，束之高阁，并被贴上不切实际的标签。许多年以后，这个渐渐被人遗忘和忽视的武器又被人们从装满老旧的教义的木箱后面挖掘出来，它重新回到人们手中，光鲜亮丽的被带到战场上。但这次他的主人与公元16世纪的那些人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了。

尽管很微小，也不是革命本身的意图，但我们必须得承认，新教徒革命也曾经为宽容事业做出过很大的贡献。革命的结果从侧面给各方面的事业都带来了推动力。

它使人们加深了对《圣经》的了解，这是它第一个功劳。因为教会对人们阅读这本书的态度是不禁止也不提倡。而现在，这本书走进了千家万户，那些正直的面包匠和烛台制造师们终于可以在工棚里面放心大胆地钻研它了，即便是自己对它做出总结也不会面临上火刑柱的危险。

如果那些未知领域的神秘面纱被揭开，人们可以熟悉和了解它们，那么人们心里就不会存在恐惧了。不管是巴拉姆的驴子还是乔纳的鲸鱼，总之关于《旧约》中的一切，忠诚的新教徒们都毫无疑问地全盘接受和相信了。有时候，为了避免新教教士给他们愉悦的生活制造麻烦，那些对每个逗号都还持有疑问精神的人（博学的阿伯拉罕·科洛威斯的“带有启发性的”元音点）会收敛他们怀疑的窃笑，不让人们听见。其实，对于宗教法庭，他们是很无所谓的，只是大众的责难和

口水会给他们的经济带来很严重的后果。就连路德、加尔文和其他改革者都没有预见到这本原本描写牧民和商人的小民族史的书，却在人们对它的长期研究探索中产生了一些后果。

假如他们能够预见到，那么希伯来文和希腊人就会成为他们无比厌恶的对象，而且《圣经》会被小心地保护起来，不使任何一个凡人看见它，关于这一点，我是非常确定的。到后来，《圣经》在那些钻研学术的学生们眼里只是一本颇有趣味的图书而已，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书中那些残忍、贪婪和谋杀的血腥故事是遵照神的指示而写下来的，他们根据这些内容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故事所描述的是处于半野蛮状态的人们的生活。

此后，《圣经》就会失去在人们心中唯一智慧之源的地位。思想找到了自由思考的出路，蓄意待发的一千年的科学探索便迫不及待地在天然形成的河床上奔腾狂舞，古希腊和古罗马哲学家的成果在二十个世纪以前被中止的地方重新开始成长。

由于这场革命的发生，西欧人和北欧得到了解脱，这从宽容的角度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另外，不得不说，这个专制虽然以宗教组织的名义发起，却始终都没有摆脱罗马精神专制的模板。

这场势必发生的宗教运动，给天主教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因此信仰天主教的读者对它始终是怀有感激之情的，尽管有些观点他们不会接受。原本，天主教这个神圣的名称已经被贪婪和暴力所取代了，对此，教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企图把这些责难摘掉，当然，收获还是很丰富的。

公元16世纪中期以后，波尔吉亚人彻底跨越了梵蒂冈的忍耐极限。然而，不可改变的是坐在教皇宝座上的仍然是意大利人，这种默认的规矩跟古代罗马帝国时期的大主教们挑选教皇要遵循的规矩是一样的，要是由一个德国人、法国人或其他任何一个外籍人来担任教

皇，下层百姓们就要闹翻天了。

教皇的选举是一件极其慎重而庄严的事情，只有最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被选中的希望。一旦坐上教皇宝座，忠诚的耶稣会教士们便会为他效犬马之力，当然，随之而来的是彻底地大扫除。

在此之下，胡作非为的行为就没有可逃窜的地方了。

修道院的神职人员被要求必须潜心钻研（其实是服从）修道院创始人立下的规矩。

在这文明的城市里，乞讨的僧人也渐渐消失了。

人们热情高涨，一心向往着美好圣洁的生活，他们热衷做好事，面对那些承受不了生活重担的人，他们会伸出无私的援助之手。这时，由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人们轻视无比的态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尽管如此，大片原本属于教会的土地却再也没有回到它的怀抱中来，从地理划分上来看，新教流传的范围主要是欧洲北部，而天主教是在南半部。

但是，为了清楚地看到宗教改革给欧洲带来的变化和影响，我想，我们有必要用图画来描述宗教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存在于中世纪的那座硕大无比的精神和智力监狱被教徒的反叛运动彻底摧毁了，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监狱，它的全部材料都是现代的。

公元1517年以后，出现了天主教徒专用和新教徒专用的两座地牢，这都是在计划之中的事情。

但是，新教徒的这座监狱却并没有矗立太久，因为他们并没有接

受过长达几个世纪的训练，不知道如何有效地进行迫害和镇压，他们只是单纯地想保护他们的禁地不受反对者的侵扰，即使这样的愿望，也没有达成。很多狂妄的囚徒从窗子、烟囱和地牢的门口逃跑了，之后，地牢也垮塌了。

夜晚来临，异教徒们把废墟清理了一番，用车拉走了石头、横梁和铁棍，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用这些废墟上的材料重新建起了一座看起来像一千年前格雷戈里大帝建造的普通监狱一样的小堡垒。不过，这个小堡垒纯属外强中干。

开始运作的堡垒贴上了新的规章制度，当然，这也引来了大批心怀敌意的信徒。那个不知道旧式法律惩罚措施（逐出教会、酷刑、杀头、没收财产和流放）的牧师长，也就是他们的上级，现在对这帮一意孤行的叛徒束手无策，只能站到一旁观望罢了。为了巩固堡垒的安全，反叛者们颁布了一道新的教旨，这道教旨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们的信仰志同道合。

这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最后导致了精神空地的出现，在这些不同的禁地之间，时常看到自由闲逛的求知者，当然，这里也是真正正直的人们的天堂，他们自由想象，思想任意驰骋，没有人会来打扰和阻止他们。

这就是宽容事业得益于新教的地方，人的尊严体现无遗。

第十三章　伊拉斯谟

每一本书的撰写过程都会遇到很多危机，这种危机有时候在前五十页出现，有时候到稿子快完结的时候出现。这可能是非常平常的事情，一本书不出现危机就像一个孩子没有出过天花一样。

几分钟之前，危机在这本书中出现了。

要想在公元1925年撰写一本关于宽容思想的著作，听起来不免有些荒谬，到现在为止，我花在这本基础研究作品中的宝贵时间和辛勤劳动很可能会付诸东流。我现在已经有了想把伯里、莱基、伏尔泰、蒙田和怀特这些人的书丢进火炕里去的冲动，连我自己的作品也不例外。

我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种情况了。

这其中可能存在很多种原因。其一，与自己确立的这个命题相处得太久了，彼此之间没有了新鲜感，产生了厌烦的情绪。其二，对这本书的实用价值产生怀疑。其三，担心那些不具有宽容精神的同胞利用书中的某些微不足道的史料为自己的恶劣行为找借口。

其实，以上那些问题都还可以克服（这样的问题存在于绝大多数严谨的书籍中），真正难以克服的是它的“结构”问题。

我想让这本书具有成功书籍所具备的开头和结尾，开头已经有了，我担心的是结尾会不会有。

我可以列举很多让人惊诧万分的实例，它们总是用公正和正直作为掩护，实际上却在做不宽容的事情。

我可以详细描述那些在痛苦的日子里把不宽容当作至高的美德来供奉的故事。

我也可以竭尽所能把不宽容骂得体无完肤，尽情地辱骂和痛诉它，煽动读者不约而同地叫嚣着：“把这个面目可憎的东西打死吧，我们都要成为宽容的人！”

只是有一件事我无法做到。对于我期望的目标，要走哪条路才能到达呢？我完全茫然失措。现在，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发生的这许多事情有各种各样的手册来进行绘声绘色的描述，不管是饭后的闲聊还是口技表演，无一不包含在内。上个星期天，我看到一张不少于二百四十九个题目的函授课程的广告，那个学院大肆鼓吹可以把学生的水平提高到相当地水平，而且只花很少的费用。但是，怎样利用四十（或者四万）个课时的时间来透彻理解“如何做到宽容”，却没有人提及。

就连这个传说中能解开无数奥秘的历史这把钥匙，也没有办法让我脱离目前的困境。

确实如此，人们完全有能耐写出厚厚的专业方面的作品，人们可以谈论诸如奴隶制、自由贸易、死刑和哥特式建筑这些非常明确具体的东西。就算没有任何资料，那么那些在自由贸易、奴隶制和哥特式建筑中大展拳脚或是大力反对的男人和女人也可以成为我们研究探讨的课题。透过这些优秀人物来了解他们的命题方法，甚至他们热心支持或是恶意诽谤的思想都可以从他们的个人习惯、社会交往以及他们对食品、饮料和烟叶的嗜好甚至是所穿的短裤中得到一些总结。

但不会有人把宽容当成自己的职业来经营。那些出于偶然的机会而热衷于这项伟大事业的人，他们在追求其他东西的时候意外生产了

宽容这个附属产品。这些政客、作者、国王、物理学家或谦恭的美术家们会在繁忙的国家事务中或者是行医和制作钢板画中挤出一点时间来对宽容大加赞赏一番。如果要求他们把宽容当成毕生的事业并为之奋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下象棋和拉小提琴一样，他们对于宽容的兴趣仅此而已。一般情况下，共同致力于同一个工作的人会有一样的性格，无论这个工作是从军、探测还是为世界免罪，但是，这群混杂的人（谁能想到斯宾诺莎、腓特烈大帝、托马斯·杰弗逊和蒙田竟会是好朋友）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因此，作家极力想找到某一个警示的句子，它存在于世界的某个地方，可以解决所有进退两难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太过棘手了，我们翻遍《圣经》、莎士比亚、艾萨克·沃尔顿和老贝哈姆都无济于事，找不到我们想要的答案。乔纳森·斯威夫特倒是有些接近了，他留下了一条闪光的至理名言，他说绝大多数人都用宗教信仰作为依据来憎恨别人，却没有去爱别人。可惜，即使这一条，也不能很好地将我们从目前的困境中解救出来。有的人对宗教信仰虔诚无比，却从心底里恨着别人；而另外一种人，虽然不信教，却有一颗怜悯之心，对待野猫、野狗以及基督的世界有充分的理解和真诚的情谊。

我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我必须要依靠自己的思考和探究去寻找答案，我应该把我认为的真理认真地阐述一下。

信仰中点缀着怀疑，这是所有为了宽容而努力的人共同的特点，不管其他方面怎样的天差地别，这一点是高度一致的。他们总是自信满满地肯定自己是对的，但对于自己怀疑的那部分却没有办法将它变成坚定的信念来坚持。

在当今这个爱国主义泛滥的时代，我们激情澎湃地呼喊着对这个东西要绝对地信任，对那个东西也要绝对地信任，但是，大自然却让我们听到了另外一种声音，那些标准化的理想，它似乎是很反感的。

从小被人们养大的猫和狗是十足的傻瓜，这一点，大家都是知道的，因为，如果没有人将它们从在雨中抱走，它们就会死。被称为钢的合金取代了百分之百的纯铁。十足的纯金和纯银首饰不会引起任何一个珠宝商的兴趣。再怎么优质的小提琴都是要由六七种不同的木板才能拼凑出来。同样，如果你为我准备了一顿百分之百全是蘑菇的饭，我只能对你说声谢谢，我无法领受。

总而言之，世界上大多数有用的东西必然由不同的成分组成，可是信仰是个例外，这是让我尤为想不通的事。我觉得，在我们“肯定”的基础里面有必要加入“怀疑”的合金，这样，我们的信仰就不会像纯银制成的钟那样，只知道叮叮当当地响，发出铜制长号一样刺耳的声音来。

理解宽容精神的那些英雄，非常明白这些道理，于是，他们头也不回地走上了与其他人不一样的道路。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完全可以接受新教徒法庭授予的完美无缺的人的荣誉，他们拥有正直的品德和人们共知的美德，他们对待自己的信仰是无比忠诚的，对责任也绝对忠实。坦白说，这些人至少有一半人不管是活着或是死了，都可以得到圣人的美称，但是，另外一个组织机构对他们的特殊思想极为仇视，他们不得不同时担当着一个“敌人”的身份，不幸的是，恰恰是这个敌视他们的机构才有加封老百姓为圣人的权力。

这些英雄对天国的神灵们持有怀疑态度。

他们非常清楚（就像古罗马和古希腊先辈）自己面对的是怎样无边无际、浩大的问题，他们清楚地知道，这些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他们站在矛盾的道路上徘徊，祈望那个最终的安全的目的地就在他们所走的这条路的不远处，可是，他们对于这条路的指引性又很怀疑，他们认为除了这条路以外的其他歧途的另一端不一定就是与地狱和罪

恶相连。尽管这些歧途有太多的迷烟，足以让头脑简单的人迷失方向。

《宗教问答手册》和伦理学教科书上的观点跟这种看法是大相径庭的。从这些书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在绝对信念的纯洁火光照射下才会产生这个世界上的绝对美德。这种说法也许是对的，遗憾的是，那团火光一直兢兢业业地照耀了整整几个世纪，却并没有使人民大众得到真正的幸福美好。我觉得有必要稍微地改变一下，当然，我不是要搞改革的大动作，或许应该用一下别的光芒，宽容事业的兄弟们用它来观察判断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物。倘若这样做导致了失败的结果，那么，我们就继续拾捡起先辈们留给我们的传统。这个社会真正能够接受一束新光亮的照射，社会将会充满仁慈和忍耐，罪恶和仇恨能收敛一些，相信我们会得到很多，所付出的代价也会降低到最少。关于这一点，我是非常确定的。

这是我的一点意见，对与不对，就请大家来评价吧。

接下来，我不得不回到历史这个话题上继续讲述。

随着一个罗马人的入土为安，世界上最后一个公民（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讲的）消失在了世界的尽头。彰显人道主义的古代精神作为思想界的先进代表在古代世界里到处横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它再次被挖掘出来，在大地上闪现光芒，社会因此而有了安全的保护伞。就像你们看到的那些，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发生的事。

西方那些贫穷的国家在商业复苏的大流中获得了新的资本，新城市、新阶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大地上，艺术以及在欣欣向荣的景象中诞生的大学得到了资助，他们还慷慨解囊购买书籍。

那些胆敢把整个人类当成试验对象的人，坚定地追随在“人道主义思想”的阵营中，打着反叛的旗号，为打破旧式经院哲学的狭隘局限而冲锋陷阵，于是，他们跟旧的教徒彻底决裂。因为他们对古代前

辈们的智慧和规律具有浓厚的兴趣，而这种行为在旧的虔诚教徒眼里是邪恶、龌龊的好奇心作祟。

有一些站在这群人最前面冲锋陷阵的人，关于他们的故事，我将用这本书后面的全部篇幅来进行讲述，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最值得称赞的人——伊拉斯谟，这同时也是个无比温顺的人。

就是这个无比温顺的人，在当时所有的文字大征讨中作为幽默远程大炮炮手而异常活跃，当然，他所操纵的这门武器，可以说是所有武器中最有威力的一种。因此，他光荣地成为敌人亟待拔出的眼中钉。

那些炮弹被发射出去，然后装在炮弹里的用他智慧做成的芥子气就在敌人的国土上到处肆虐。各种各样的伊拉斯谟式炮弹表面上看没有什么害处，其实是极其厉害的危险品。它用多姿多彩的花炮的样式作为伪装，将它的导火线藏起来，如果它能蒙混过关，被人们捡回家去给孩子们当玩具，那就等着它的毒气侵蚀那些孩子吧。你会看到这一举动的严重后果，根深蒂固的毒气的侵蚀所带来的后果，整整四个世纪的时间都不可能消除。

令人费解的是，这么一个人是从北海淤泥沉积的东海岸的一个沉闷的小村子里开始生命之旅的。公元15世纪的时候，这些吃透了水的土地只是一群地位低下的小国家，在社会文明的边缘挣扎着，看不到富足全盛的曙光。这个地方，鲱鱼呛人的气味到处飘荡，这种鱼是他们主要的出口品。偶尔会有触礁沉船无路可去的水手到家里来做客。

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的人，童年中会留下不堪回首的阴影，另一方面，也能激励有志气的孩子摆脱困境，走向外面的世界，成为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

伊拉斯谟从出生就注定了要走艰难坎坷的路，他是个私生子。中世纪的人们与上帝和大自然保持着友好亲密的关系，他们对这种事情

非常在意。他们认为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这一切真是让人无比遗憾、扼腕叹息，他们很反对这样的事。但是，他们还能保持基本的理智，没有对摇篮里的小生命下手，这本来就不关那孩子的事。特殊的出生背景，对于伊拉斯谟本人来说倒是没有什么不便，但是，比较糟糕的是，他的父母无法妥善地处理这样的局面，只好把他和他的哥哥丢给了不是笨蛋就是流氓的亲戚抚养。

这些叔叔和监护人不知道如何甩掉这两个孩子，在他们的母亲死后，他们终于无家可归了。最初，他们被送到德温特一所著名的学校里，那个学校里有几个教师是“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成员。但是，我们从伊拉斯谟后来的信件中可以了解到，这些青年人仅有的共同点与“共同生活”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这两个孩子分开了，弟弟被送到戈达的拉丁文学校，由校长直接监护。这个校长被指定管理着这个孩子继承的可怜的产业，他是三个监护人中的一个。四个世纪以后的我曾经参观过境况非常不好的学校，假如伊拉斯谟就是在那样的学校学习的话，我真的无比同情他。还有更加糟糕的事，孩子的钱财此时已经被那三个监护人挥霍一空，把他送去修道院可能使这些人免于被起诉（那时荷兰法庭对这类事情管制得非常严格），他们这样做了，并且还祝福他说：“现在前途无忧了。”

这些恐怖的经历在历史的神秘磨盘中不断被碾磨，具有伟大文学价值的东西诞生了。中世纪后期，目不识丁的乡巴佬和出手大方的庄稼人占修道院人中的一半以上，遗憾的是，这个聪慧的孩子不得不经年累月的与这些人住在一起，没有任何共同语言，只能形单影只的生活。

可喜的是，伊拉斯谟能在纪律松懈的施泰恩修道院里专心研究上一届院长留下来的丢弃在图书馆里被人们遗忘的拉丁文手稿，他有的是时间。他从这些书中尽情地吮吸着知识营养，这为他后来成为古代学问活的百科全书奠定了坚固的基石。以后，他总是居无定所，很少能去图书馆查阅图书了，不过，这对他没有丝毫影响，因为他的记忆

库里已经装了很多了，可以随时拿出来引用。凡是读过他著作的十大卷宗的人都会对公元15世纪的“古典知识”赞不绝口的，即使只读过一部分的人也不例外（因为现在的人命太短了）。

伊拉斯谟是一个不会被环境框定的人，这样的人只会自己创造环境，并且是用根本不值一提的材料来创造，所以，离开修道院是必然的事情。

获得自由的伊拉斯谟，为了免受那些慕名而来的拜访者们的打扰，他四处奔波，极力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便于专心工作。

这个愿望直到他即将离开尘世的时候才得以如愿，那时怀着对童年时代“活生生的上帝”的崇敬和缅怀，安然躺在进入死亡的酣睡中，“真正的清闲”才出现了。这对于跟苏格拉底和塞诺走一样道路的人而言，确实是为数不多的人才能享受的美好境界。

每当有真正智慧积聚的时候，伊拉斯谟就出现了，这种情景已经被描述得够多了，在这里我就不再长篇大论地说明了。

他在巴黎学习的时候还是一个穷学生，饥饿和贫苦差点要了他的命。剑桥的教室里有过他授课的身影，他曾经在巴塞尔印过书，他想挑战壁垒森严的正统偏执，试图（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把启蒙光辉撒进那所闻名于世的卢万大学。相当长一的段时间内，他都居住在伦敦，在那里，他成功获得了都灵大学神学博士学位。他非常熟悉威尼斯大运河，希兰让人无比郁闷的道路以及隆巴蒂被他咒骂的口水喷溅的到处都是。对于罗马的天国、公园、人行道和图书馆，他总是记忆犹新，这座神圣的城市在他记忆中的形象就算是遗忘河水也不可能冲刷掉。

只要他在威尼斯就享有客观的年金，如果威尼斯又兴办了一所新的大学，那么你肯定会在大学里任何一门课的教室里看到他，要是他不愿意教书，只要有空的时候到校园去走动一下，都会让校园蓬荜生

辉。

他不愿意成为被束缚和依赖的奴隶，于是那些各种各样的邀请，他都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任何事情都比不上他的自由重要。他喜欢的是舒适干净的屋子，而不是破烂不堪的；他喜欢的是趣味横生的伙伴，而不是蠢钝呆笨的。他很清楚布尔根迪的美味佳酿和亚平宁的淡红色墨水之间的差别，他的生活他要自己做主，他不会臣服于任何人，这些就是他想要的。

他以知识的指引灯自居，当任何事物从这个世界的地平线上升起来的时候，他就毫不客气地把指引灯的光束打过去，将它的真实面目原原本本的照射出来，让人们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明明白白地了解。

在动荡不安的那段历史岁月中，黑暗和仇恨充满了世界，可是，伊拉斯谟这个人做了这么多的事，却安全的活下来，无论是狂热的新教徒还是狰狞的宗教法庭似乎都没有找他的麻烦，这是他一生中最受人非议的一点。

子孙后代在谈论起古人的时候，对于那些殉道牺牲者总是表现出无比诚挚的情感。

“这个荷兰人为什么不站出来支持路德呢，他为什么没有将生死置之度外与其他革命者生死相依呢？”面对这些问题，至少有十二代学识渊博的人被难住了。

得到的是这样的回答：“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伊拉斯谟从来没有倡导用武力解决问题，对于某种运动的领导者这一职务，他也丝毫没有兴趣。有些自以为是的人告诉人们要如何做才能迎接下一个千年的到来，伊拉斯谟却缺乏这种自我感觉。他觉得，当我们重新装饰居所时，没有必要把旧房子拆除掉。这是颇有道

理的，就算那个老房子地基有所损坏，下水道也老旧了，花园一片狼藉、到处堆满了以前的住户丢弃的废品，但是，如果房主舍得花费一些钱，做一些实际的修补工作，房子便会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而伊拉斯谟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他可能真的像他的敌人嘲笑的那样，是个十足的“温和派”，但他所取得的成功并不比那些“激进派”低（也许还高于），原本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暴君，由于激进派的努力而变成了两个。

与其他真正的伟大人物一样，伊拉斯谟似乎也从来不拘泥于制度，从不把这些条条框框放在眼里。他认为只有大家共同努力，世界才能得到救赎，因此，对于世界的改造其实就是对于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改造。

于是，他开始采取行动，对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妄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向人民大众高声疾呼，这的确是非常有效的招数。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国王、帝王、教皇、修道院长、骑士、混混以及每一个想接近他的人（那个时候不用在信封上盖邮戳和写上发信人的地址）几乎都收到了他的信。而且，他寄出去的每一封信都是长篇大论，洋洋洒洒有八页之多。

然后，他把那些在传抄过程中几乎面目全非的古文做了整理。为了理顺那些文字的意思，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他一头扎进了希腊文的学习中，由于这是一门已经被教会禁止的语言，他的投入和苦心钻研激起了那些虔诚的主教的怒火，他们指责他跟真正的异端一样坏。这些听起来荒谬无比的事情是真实的。

公元15世纪的时候，那些稍微懂得一点希腊文的人都会有很多大麻烦，那些正派的基督徒是绝不可能会萌发学习这门语言的念头的。这门语言会驱使人们把福音书的原文与译文作比较，而这些译文恰恰真实地保留了原文的意思，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事实。

这一切还只是个开始而已，接下来，他将要踏进犹太区去学习希伯来文，就差对教会的权威提出公开反叛了。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要是一本画有稀奇古怪、混乱不堪的文字图册就可以成为有地下革命倾向的有力证据。

教会组织的领袖们经常闯入人们的家里搜查违禁物品，那些为了生存私自教授本国语言的拜占庭难民常常因此而被驱逐出城市，没有立锥之地。

尽管有这么多的阻碍，伊拉斯谟还是越过了，并成功的学会了希腊文。他将一些对时事的评价巧妙地掺杂在自己编辑的克里索斯托和其他教会神父的书的注释中。假如这些话单独成册的话，是绝不可能有被出版的机会的。

然而，在伊拉斯谟创造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形式中，注释这个顽皮的精灵又闯了进来，我指的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他的那些希腊文和拉丁文成语典籍。为了能让孩子们也可以学习古文，可以变得优雅，他把成语归纳在一起。就是在这些有趣的成语中，充满智慧的评论到处都能看到，任何一个保守派见了都不会认为是对教皇友好的人写的。

为了增加朋友们的娱乐性，他写了一本在那个时候堪称最怪异荒诞的书，没想到这本书的轻易问世，却意外夺得了古典文学宝贵的一席之地，作者也惊讶不已。这本书叫作《愚颂》，我们正好知道它是怎样写成的。

公元1515年，一本小册子的出现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本巧妙隐晦的书，人们看不懂它是在挑衅僧侣还是捍卫修道院式的生活。书的封皮上并没有署名，但从作者的风格上有些人猜到了，它很可能是出自于乌尔里克·冯·赫顿这个奇怪的人之手。他们猜得没错，这位年轻有为的诗人以及怪异的城市游民为这本作品增添了有用的诙

谐效果。对此，他颇为得意。他听说连英国新学领袖托马斯·莫尔对他的书都大加赞赏的时候，便给伊拉斯谟写了一封信，就一些细节问题向他请教。

伊拉斯谟对冯·赫顿没有多大的兴趣，他是个头脑特别清楚的人（反映在他有条理的生活方式），对那些邋里邋遢的条顿人一向很厌烦，这些上午还在为启蒙运动狂热摇旗呐喊的人，下午便钻进酒馆里去买醉打发时间去了。

但冯·赫顿不愧为天才，他有他自己的一套处事方法，伊拉斯谟也礼貌地写了回信。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对伦敦朋友的美德大加赞赏，他还描绘了一幅幸福美满家庭的景象，对托马斯家庭的榜样形象表示赞同。他还提到，他写《愚颂》的最初灵感来自于莫尔那个卓越的诙谐家。他之所以能在这本书上获得巨大的成功，或许正是因为莫尔创立的那台闹剧（一个真正的挪亚方舟，有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鸟、狗、私人动物园、私人业余演出和业余小提琴乐队）给了他启发。

我的脑海里开始蹦出英国的那个木偶剧《庞奇和朱迪》，曾经作为荷兰唯一的儿童娱乐剧，在几个世纪里它为孩子们带来了无尽的欢笑声。我们从这部木偶剧中可以看到很多粗俗的对话，同时也可以感受到严肃、高雅的气息。帷幕拉开，“死神”站在舞台上，他一开口，舞台上就响起了空洞的声音，紧接着，演员们一个接一个的出场，陆续站到这位破衣烂衫的主角面前进行自我介绍。当这些人一个个被人用大木头敲着脑袋扔进想象中的垃圾堆的时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这一幕总是能够博得他们的欢心。

《愚颂》这本书赤裸裸地描写了一个真实的社会生活，没有丝毫掩饰。它就像一个受到启发的验尸官，竖起评论的长矛，坚定地走到了人民大众身边，对他们大加称赞。

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整个“中世纪主要街道”的人物形象大集合。此外，书本对于当时那些野心家、满口大话说要拯救世界的僧侣以及他们伪善的演说和愚蠢无知的大话都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书中的人物表还特意为教皇、红衣主教、主教的后裔留了好几个章节的位置，这些人与贫困潦倒的加里利渔民和木匠大相径庭。

与玩具画式的幽默文学相比，伊拉斯谟的这本《愚颂》具备更丰富的人性。

他自己所提倡的那一套哲学在书中展露无遗。人们大可以将它理解为“宽容哲学”。

对待别人宽容，则别人也会对自己宽容；了解神圣教规的精神实质，而不是去钻牛角尖，吹毛求疵；把宗教当成门伦理学来认可而不是某种传统。正因为这样，那些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肆意谩骂伊拉斯谟是个“不信上帝的骗子”，把他当成一切正统宗教的敌人来看待，说他“辱没了基督”，但对于那本诙谐之作中真正蕴含的本意，他们却绝口不提。

这些漫天飞舞的谩骂跟随他走完了一生（直到死去），事实上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在那个对文字作品审核极为严格的时代，官方既定的就是不可动摇的，谁要是胆敢在那些文字中间增加或减少一个字都可能会命丧黄泉，但这个个子矮小、鼻子尖尖的老人却一直活了七十个年头。他曾经公开声明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不感兴趣。他非常明白，如果神学上的分歧会导致大规模的宗教战争，那这个世界未免也太危险和恐怖了，因此，他很理智地避开剑和火绳枪，不期望从那里得到些什么。

于是，他开始了海狸一样的生涯，为了阻挡日益上涨的愚蠢与偏执的洪水，他日夜兼程地建造着理智和常识的堤坝。

他所做的这一切，注定是徒劳的，从日耳曼山峰和阿尔卑斯山上猛冲下来的残酷恶毒的企图和仇恨的洪水怎么可能拦得住呢？他离开这个世界没有几年，他的书籍也一同被销毁了。

值得肯定是的，他的巨大付出还是有回报的，那些淹没在水底的沉船残骸几经波折又重新被后人拾捡起来，那些永远不屈服的乐观主义者们把它当作绝好的材料，他们坚定地相信总有一天会建造出真正能够挡住洪水的坚固堤坝。

公元1536年7月，伊拉斯谟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他在他的出版商家里与世长辞，一直保持着非凡的幽默感。

第十四章　拉伯雷

一些奇特怪异的伙伴在动荡的社会中诞生了。

我们在任何正直光辉的书中看见伊拉斯谟的名字都是极为正常的事，这些书可以拿来给全家人阅读，但是，如果在公众场合谈论拉伯雷就是一件很不雅观的事情了。这个家伙的危害性已经足以写到国家法律中去了，事实也是如此，我国通过了一条法律，将他的著作排除在儿童们可以接触的范围之内。在很多国家，如果想要买到一本他的书，那得找那些胆识非凡的书贩子才行。

不过，这些很明显过头了，是虚伪的官方组织高压政治里的惯有手段。

第一，公元20世纪的普通百姓看待拉伯雷的书就跟《汤姆·琼斯》和《七面山墙的房舍》是一样的，那样枯燥乏味的作品很少会有人细致地读完长篇大论的第一章。

第二，他并没有清楚向人们启示什么。拉伯雷使用的是一些很通俗易懂的词汇，不过，现在已经用不到了。但是，那是一个乡村气息浓厚的时代，百分之九十的人都常年在土地上耕作，所以，铁锹还是铁锹，母狗也还是母狗，不会有人把它当作“贵宾狗”。

不对，现在反对这位优秀外科医生作品的声音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那些丰富而坦白的语言了，而是到了一个更深刻的地步。这是因为优秀人物对那些遭受生活重创的人持有厌恶的态度。

我分析后得出，可以把人类分为两类，一类对生活说“是”，另一类对生活说“不”。前者对生活充满了感激，努力地追求生活所赐予的东西。

后者对生活也持肯定态度（不然他们能怎么样呢），但对于生活的赐予并不重视，就像想要木偶小火车的小朋友却得到了一个小弟弟一样，让他们懊恼不已。

第一类人天性快乐知足，对于那些闷闷不乐的邻居们的评价，他们总是乐观的接受，并且用宽容的态度对待他们。从来不阻拦和嘲笑第二类人的悲伤和绝望。但是，这第二种人对于第一种人是极少献殷勤的。

每当第一种人想走自己的路的时候，立刻就会遭到第二类人的责难和阻碍。

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第二类人为了抚慰自己的嫉妒之心，将那些相信世界属于生者而不属于死者的人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对他们进行穷追猛打的残害。

拉伯雷医生坚定地站在第一种人的行列里，他的病人，或者说他的思想，无论如何都不会对坟墓感兴趣。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可能是件让人扼腕叹息的事，不过，不可能让人们都去做挖墓人吧。这个世界上必须要有一些乐观的人存在，假如到处都是哈姆雷特，那么居住在这个世界上会让人觉得无比的恐惧和绝望。

拉伯雷的生活其实是很平常的，并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的朋友们曾经撰写过关于他平生事迹的书，不过他们忽视了一些细微的情节。好在这些遗漏的细节在敌人的书中被记录了下来，这对于我们完整地了解他的一生提供了全面的素材。

拉伯雷出生在紧挨着伊拉斯谟后面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

对世界有发言权的依然是僧人、修女、执事和数不清的托钵僧人。他出生在芝侬一个富裕的家庭里，父亲可能是个药商，也可能是酒贩子（在公元15世纪，这是两种不一样的职业），总之有足够的能力供儿子上一个好学校。青年才俊弗朗西斯正是在那所学校里结交了杜贝拉——德朗家族的后人。那是当地响当当的家族，有跟父亲一样的男孩子，天资聪颖，善于书写，即使送到战场上也不差。他们都相当世故——“世故”这个词经常被人们曲解，不过，我在这里用的是褒义词。他们忠实地担当着国王的奴仆，在许多政府机要部门任职，任何一个职务头衔都可以剥夺他们充满乐趣的生活，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义务和责任。他们成为主教、红衣主教和大使，他们做着翻译古文和编辑炮兵和步兵训练用的材料的工作，贵族说尽的许多职责劳务，他们都能出色地完成。

杜贝拉家族和拉伯雷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种友谊很好地证明了拉伯雷并不是一个只知道陪他们喝酒取乐、骗吃骗喝的人。事实上，他的一生并不顺当，充满了很多的艰难坎坷，好在他总是能够得到老同学的慷慨相助。每当他跟他的上司闹矛盾，发生不愉快的时候，杜贝拉家族的古堡便向他微笑和招手，给他安慰和关怀；每当这个年轻固执的道德家在法国遇到危机的时候，就会有杜贝拉家族的一个人正好奉命去国外，急需寻找一个懂得医术和拉丁文学的秘书。

在这里就不琐碎细说了，每当我们这位学识渊博的医生处于生死边缘的时候，总会有老朋友们的鼎力相助，他们想方设法地将他从巴黎神学院的怒火或者加尔文主义者的仇视中解救出来，这样的事并不是只有一次而已。加尔文主义者原本想把他当作自己人，但是他却做出了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的举动，他当众对加尔文派大师的偏见十足的热情进行了无情地嘲讽和鞭挞，就像他曾经在枫迪南和马尔塞斯嘲讽老同事那样。

他的这两个敌人，最危险的就是巴黎大学神学院，加尔文能做的就只是暴跳如雷地对着他狂吼乱叫一通，不过，一旦走出瑞士这块小

小的土地，他的闪电就变成了爆竹，没有任何效果。

相反，忠实于正统和“旧学”的巴黎神学院和牛津大学却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如果有人胆敢向他们的权威发起攻击，他们就会迅速采取行动，法兰西国王和绞刑吏也将立刻站在他们身边，与他们通力合作。

拉伯雷一走出学校，马上就成为受关注的对象。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喝酒和喜好跟朋友们讲有趣的僧人故事，而是因为他所干的更糟糕的事情——没能抵挡住诱惑，学习了罪恶的希腊文。

他所在的修道院院长听到传闻后立即采取了措施，他们从他居住的地窖里面搜出了许许多多违禁文书、一本《荷马史诗》、一本《新约》和一本希罗多德的书。

这个发现对他造成了极为可怕的威胁，他的那些有权势的朋友经过诸多努力，使他从危险的境地中走了出来。

这是教会发展史中一个非常奇特的阶段。

修道院在最开始的时候确实履行了文明先锋的职责，就像我在前面讲述的一样，在增加教会利益上，僧侣和修女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修道院体制发展的太过强大就会招致危险，关于这一点，很多位教皇都意识到了。但是，跟通常一样，大家虽然知道这一问题所在，却没有对此采取措施。

在新教徒中普遍流传着这样的看法，天主教组织是相当稳定的，天主教的当权者是一小部分贵族，他们处事低调，顺其自然的管理着这个组织的内部事务，似乎没有出现过太大的动乱，但是，其他那些由平民组成的组织则一直内讧不断。

人们的意识又一次远离了真理的轨道，就像前面分析的那些原因，人们会出现这样的意识偏差，是因为误解了一个字。

在民主主义横行的世界里，不会出现“一向正确的人”。

就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一个庞大的机构要有一个绝对领导者，一切事务由他做主，至于其他人只要俯首称臣、听任使唤、绝对服从就可以了，这样，这个组织就容易管理了。

要让那些在新教徒国家成长起来的人意识到这个错误问题的严重性，并全面地了解事实的真相，那真是太困难了。但是，假如我还清醒，那么教皇“一贯正确”的言论就跟美国的宪法修订案一样少得可怜。

而且，每一个重要的决策都要经过充分协商才能最终定案，往往这个讨论的过程对于教会的稳定会有很大的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宣言是“一贯正确”的，跟宪法修订案一样“一贯正确”，因此他们已经是“最终”的结果，纳入到最高法律的体系中，任何争执都可以停止了。

如果有人觉得管理美国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一旦发生经济情况，人们都不约而同地站在宪法这一边，如果这样认为，那真是错得太离谱了，就像说在重大信仰问题上认可教皇的天主教徒们就一定是一群温顺的小羊羔，他们失去了自己独立思想的权力。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拉特兰和梵蒂冈宫墙里面的人倒是可以欢呼雀跃一下，因为他们的日子要多好过就有多好过了。但，一千五百年的历史轻而易举地向我们证实了这种看法的错误性。并且与此相反，那些提倡信仰的人在撰写著作的时候，天真地以为罗马的统治者对路德、加尔文和茨温利满怀仇恨责难的那些丑恶的罪行一无所知，事实上，统治者对于真相再明白不过了，而且，他们看得更为清晰，不知道真相的人是那些整天把信仰挂在嘴边的人，也可以说他们没有能力克制自己追求美好事业的热情。

教会内部的病症，像阿德里安六世和克雷芒七世这样的人怎么可

能会不了解呢。但是，指出丹麦王国里有些腐败现象和改革弊病毕竟是两码事，关于这一点就连可怜的哈姆雷特也非常清楚。

那位可怜的王子一直活在美好的幻想当中，他企图一个人诚实无私的努力，在一夜之间将几百年遗留下来的统治错误做一个彻底的改进，当然，他并不是最后幻想症的受害者。

帝国内部旧式官僚体系已经腐朽不堪，没有任何的效率可言，并对民族的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这是许多头脑清醒的俄国人都清楚的事实。

他们曾经做出过巨大的努力，却以失败告终。

我们的同胞们尽管深思熟虑，却还是不能把民主式的而不是代表式的政府（就像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所向往的那样）看个清楚透彻，所以发生一系列的混乱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对此，他们无能为力。

这些受到人们关注的复杂的问题，非得要用一场社会大动乱才能将它顺利解决。但是，一想起这种可怕的大动乱，许多人都不禁毛骨悚然，所以他们是不会轻易采取极端措施的，他们乐意做的就是对这部老化故障的机器进行局部的修复，同时发出祈祷，希望有奇迹降临。

建立在教会组织的基础上的专横宗教社会制度是中世纪末期的滔天罪行。

最后的关键时刻，军队跟着指挥官一起溜之大吉，这在历史上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坦白讲就是教皇无法掌控形势了。稳住基石，修复残破的组织，这才是教皇能够做的，另外，他们还可以安抚一下自己的敌人，即使那些人已经引起了托钵僧人的不满。

伊拉斯谟经常被置于教皇的保护伞之下，就算是卢万刮起狂风暴雨或者是多明我会愤怒狂跳，罗马也没有退缩过，他指着这个不听从命令的人说：“让这个老人家折腾去吧！”

看了以上的描述，对下面发生的情况我们就会以平常心对待：拉伯雷有罗马教廷为他撑腰，每当这个狂妄自大、桀骜不驯而又聪颖过人的家伙与上司发生争执的时候，罗马教廷总是站在他这边，当他无法忍受那种被人打搅太多的生活时，他得到了批准，顺利地从修道院走了。

走出修道院的拉伯雷感到无比轻松，他将脚上的尘灰掸干净，走进了蒙彼利埃和里昂学习医学。

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这个单身僧人成功获得了里昂市医院主要内科大夫的宝座，他的才智确实令人惊叹。在新的荣誉面前，他的灵魂又开始躁动起来，为寻找下一个新乐园而蠢蠢欲动。他开始涉足文学领域，至于医学方面，他只是放弃了解剖学（跟希腊文一样危险的一门新学科）的学习，药片和药粉还紧紧地握在手里。

位于罗讷河谷中心的里昂，与意大利毗邻，同时也是普罗旺斯的邻居，这里是追求文学的人们的理想天堂。特鲁巴德的古代乐园向人们展示着壮观的古老文学之光，这一点是宗教法庭无法摧毁的。此外，里昂还是印刷厂云集的地方，这里有最精美和最新的出版物。

有一个叫作塞巴斯蒂安·格里菲斯的著名印刷商，他雇用了人称学者的医生拉伯雷，为他编辑他的中世纪古收藏品。在为这个印刷商工作期间，他先后完成了加朗和希波克拉底教派的论文还有年鉴和注释的小本子等工作。后来那个奇特的受人瞩目的巨作就是从这些平凡的开端中走出来的，它使作者一跃成为当时最耀眼的新星作家。

对新奇事物的追求和探索为拉伯雷赢得了著名医学家和成功小说家的称号。他用人民大众的通俗语言写作，这是前人们做梦也不敢做

的事。他打破了千年历史中学者用平民看不懂的文字写作的传统。他用法语写作，而且是没有任何修饰的公元1532年的地方话。

伽冈杜亚和庞大固埃这两个拉伯雷所热爱的主人公，他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用什么方式发现的呢？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还是留给文学教授们去研究吧。这两个人很可能是某个异教的神灵，凭着天神的本能，熬过了一千五百年来基督的迫害和鄙视。

这两个人物有可能是来自拉伯雷某次的狂欢所产生的灵感。至关重要的是他为人民大众带来了无数的欢声笑语，对民族的欢乐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对于作家而言，这堪称最高的荣誉了。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他的书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那些可怕的“趣味书”，它笼罩着严肃的理性光辉，把对宽容事业的经营暗藏在人物描写中，把教会专制统治者丑恶的嘴脸寄予在书中的人物身上，极具讽刺意味，发人深省。公元16世纪上半期的深重苦难正是这种统治制度的产物。

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神学家，拉伯雷知道如何躲过教会的麻烦，将那些露骨的评判巧妙地藏匿起来。他把握的尺度是：与其蹲在牢狱里面做一个愁容满面的改革家，还不如在牢狱外面做一个活泼的幽默家。

但是，敌人并不傻，他们知道他的本意。他的作品受到了巴黎大学神学院的严厉斥责，并且还在巴黎国会的黑名单上榜上有名。于是，大范围的没收和焚烧运动开始了。但是，不管奉命毁书的绞刑吏（那时候绞刑吏也是官方负责毁书的人）如何面目狰狞，也不可能阻止《巨人传》的迅速流传。在将近四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本经典之作以欢笑和趣味的方式为人们带去了极大的启示。另外，它也为那些见不得真理女神微笑的人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那本书的作者一直被认为是“一本书而闻名天下”的人。他的朋友杜贝拉家族从来都没有抛弃过他，一直坚定地

站在他身后。但是，拉伯雷是个非常谨慎的人，因为有了这些有权势的人的“特别照顾”，他的邪恶的作品能够顺利地发表，尽管如此，他却与那些权贵们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他冒着很大的危险去了罗马，不过却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反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公元1550年他再次回到法国，在默顿居住了三年后与世长辞。

我们没有办法准确地衡量这样一位人物的正面影响，因为他不是电流也不是一桶汽油，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

有人说他只是喜欢搞破坏而已，或许这是对的。

但是，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不正是迫切需要一支能摧毁社会的队伍吗？这支队伍的领导者不正是要像伊拉斯谟和拉伯雷这样的人才能担任的吗？

谁又能想到，很多即将出现的新房子内的很多东西其实是跟旧房子一样的丑陋难看呢？

无论如何，那是下一代人造成的错误，我们应该责备的是他们。

他们遇到了一个可以另辟蹊径的好机会，尽管这样的好机会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的。但他们却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将它错过了。

看来，他们只能到上帝那里去寻求宽恕了。

第十五章　旧时代的新招牌

最伟大的现代诗人海涅将世界比作一片有许多船只航行的大海。当一只船与另一只船碰撞在一起的时候，“美妙的音乐”便响起了，人们把它叫作历史。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和比喻效果，我借用了海涅的大海理论。当我们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游戏，那就是把小石头扔进水里去，这时，水面上会飞溅出美丽的水花，还会出现不断扩大的涟漪，非常漂亮。假如在你的旁边刚好有砖头，不妨用核桃壳和火柴做一个“超级舰队”，将它置于狂风暴雨之中。不过，我得提醒一下，丢掷重物的时候最好保持平衡，不要把靠近水边的孩子摔进去，不然的话他就只能躺在床上而吃不了晚饭了。

这样的消遣在成人世界里，虽然众所周知，不过结果却要惨痛得多。

一切都美好平静，风和日丽，水面上划船的人们欢乐地摇曳着身姿。这时，一个大胆的男孩突然抱起一块大石头，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石头就在水面炸开了花，平静被打破了，所有的人都开始慌乱起来。人们相互询问是谁干的，并且商量着把他揪出来惩罚他。也有人替他求情，说：“放他一马吧。”还有另外的一些人，嫉妒这孩子能够引起大家的关注，于是也学着他的样子，偷偷地向水里丢东西，所有的人都被溅了一身水。这些此起彼伏的风波终于导致了一场壮观的集体打架事件，几百万人相互厮打着。

亚历山大就是这样一个会引起争端的胆大的孩子。

还有特洛伊美丽的海伦那样的坏女孩，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人比比皆是。

但是，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那些品行卑劣的小人才是最坏的肇事者。他们为了达到自己拙劣的目的而毫不客气地利用人们平庸思想下的冷漠态度。聪明正直的人视他们为仇敌，假如他们在这个游戏中遗憾地成为别人戏弄的对象，那么等待他们的将是非常糟糕的下场，关于这一点，我很确信。

想想他们在近四百年的时间里所犯下的罪行吧。

在复辟的旧世界里，他们以领袖的姿态出场。中世纪伟岸的护城河向人们描述一个颜色和架构浑然天成的和谐社会，它本身存在很多缺点，但并不影响人们对它的喜爱，人们喜欢自己红色砖墙的小院子搭配着暗灰色的天主教堂，高高在上的天主教堂就这么守护着他们的灵魂。

文艺复兴在大地上炸开了花，瞬间就闹腾的沸沸扬扬了。但这才只是个开始而已。在可怕的震动中，那些自由民还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狰狞的日耳曼人又出现了。他们并没有空手而来，而是带着一大车特意准备的砖头，全部投掷在了教皇的环礁湖中心。这个行为所引起的动荡是空前的，世界在三个世纪以后才稍稍的缓过神来。

对这段历史潜心钻研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忽视了一个小问题。看到纷乱的动荡，他们认定这个后果是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这个共同原因所引发的。

事实上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两个不同的运动，现在我们对这个概念已经很清晰了，虽然他们都扬言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但是，他们为到达目的地所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也正因为这样，

人文主义者和新教徒之间并没有建立友好的关系。

双方都坚定地认为至高无上的权力应该归人类所有。中世纪，个人在集体面前太过渺小了，他的作用完全被遮盖。不像聪明智慧的约翰·多伊。约翰·多伊可以自由地做生意，随意来往于几十个小教堂中（当然，他也可能一个都不会去）。他一生都十分谨慎地遵照经济和精神礼仪的那个呆板手册行事，从那本手册里，他了解到大自然母亲给人类借了一个品质不怎么好的衣服，那就是身体，这件粗劣的衣服唯一的价值就是用来暂时寄存灵魂。

通过这些言说，他脑海中根深蒂固地树立了这样的思想：这个世界仅仅只是通向美好世界的一个中转站而已，没有必要过多在意它的存在，可以对它持轻视的态度，就像到纽约旅行的人看不起昆斯顿和哈里法克斯那样。

约翰悠然自得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只知道这个世界），似乎很享受的时候，突然被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神仙教母打扰了："快些起来吧，尊贵的公民，从今天开始，你自由了。"

约翰问："自由了以后，我要做些什么呢？"可是各种回答不相统一。

文艺复兴告诉他："自由地去追寻美好的事务。"

宗教改革告诉他："自由地去探索真理。"

"你可以自由地去钻研过去那个真正属于人类的世界。自由地去实现诗人、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家曾经追求的理想。自由地把整个宇宙都放进你的实验室里去研究，去挖掘它无限的奥秘和真理。"这是文艺复兴的诺言。

"你可以自由地将上帝的真言钻研透彻，让你罪恶的灵魂得到真正的救赎。"这是宗教改革的忠告。

说完这些，他们就走了，留下享受各种新自由的可怜的约翰·多伊。可是，与以前的不自由相比，这些新的自由实在是让人窒息。

无论是不是值得庆幸，没过多久，文艺复兴就与现存的各种制度和平共存了。菲迪亚斯和霍拉斯的后人们发现，表面上服从教会与真正信仰上帝，这两者之间是天差地别的。只要你不会忘记赫拉克利斯、施法者约翰·赫拉和圣母玛利亚这些神灵的名字，就可以安心地去画异端图画，写异教协奏曲了。

就像那些去印度旅行的人一样，只要遵守当地的法律，就可以得到进入寺庙的门票，同时能够自由地行走，不会有人来干涉你。

不过，在路德忠实的追随者看来，任何微小的细节都不能忽视。在《旧约》中用错了一个逗号就等着被流放好了，《启示录》里错用了一个句号，那便是死罪。

这些人对待宗教信仰是非常严肃的，他们对于文艺复兴提倡的轻松的中间路线极为不齿，他们觉得那是懦夫才做得出来的。

就这样，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彻底分道扬镳，从此再无瓜葛。

就这样，宗教改革独自挑起了面对这个世界的重担，它用“正确”的盔甲作为坚固的防护，为它神圣的财产准备迎接战斗。

最开始与它交锋的是由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他们披挂上阵、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也接受了战争深重的苦难。但是，他们抵挡不了妒忌和内讧的侵蚀，北方的那些小国家各怀鬼胎，相互争吵大大地消减了他们的战斗力，最后不得不接受停战。取得最终胜利的良策是不同凡响的天才提出来的，加尔文坐上了路德的位置。

早该这样了。

法国那个曾经记录着伊拉斯谟许多暗淡时光的学院里，有一个年

轻人，他长着黑黑的胡子，瘸着腿（高卢人子弹的杰作），他做梦都想带领一支上帝的军队将世界上的异端清理干净。

一个疯狂的人只能由另一个疯狂的人来击败他。

罗耀拉的阴谋只有加尔文这样有毅力的人才能打败。

一方面，我对自己没有生活在公元16世纪的日内瓦而感到万分幸运，另一方面，我也非常庆幸日内瓦存在于公元16世纪。

如果没有它的存在，公元20世纪的世界会比现在糟糕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可能只有在监狱里度过余生了。

约翰·加尔文正是这场荣誉之战的著名英雄。他比路德小几岁，公元1509年7月10日出生在法国北部诺杨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里，他的父亲是一个职位低下的神职人员，母亲是酒馆老板的女儿。这个家庭里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他从小就接受敏捷、简朴、做事井井有条、大方、细心、有效率的教育。

作为这个家庭的第二个儿子，约翰的父亲打算疏通一下他那些有权势的朋友，让他到好一些的教区去做一名教士。他还不到十三岁就在城里的教堂里打工，收入稳定，这些钱成了他后来在巴黎的好学校读书的学费。他的聪明才智使得很多与他接触的人都说："注意这个孩子。"

这个特殊的孩子在公元16世纪法国的教育体制下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熏陶，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十九岁时的约翰被批准进行布道，这样看来，他似乎已经注定要做一个副主祭了。

但是，家里面有五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教堂从事，升迁的机会毕竟很少，如果转到法律门下，则可以有更好的前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实在是有些动荡不安。他有一个远亲叫作彼尔·奥利维坦，刚刚将《圣经》译成法文。在巴黎学习期间，约翰经常与他在一起，但是一

个家庭是无法容忍有两个异教徒的，于是，约翰被送去了奥尔良，在那里，他跟随一个老律师学习辩护、争论以及公文的法律业务。

就跟在巴黎一样，只到了年底，这个孩子就由学生变成了老师。向那些不专心学习的同学教授法学概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他学会了需要的一切，具备了单独受理案子的能力。对此，他的父亲感到无比的高兴，他热切地期望着他的儿子可以成为跟那些著名律师一样的人物，因为这会有很丰厚的收入，那些律师只要稍微发表点意见，一百金币就轻松到手了，还能享受坐四轮马车去觐见远方的贡比恩国王的殊荣。

不过，这些都只是梦想而已，仅仅只是梦想，从来没有成为现实，因为约翰·加尔文根本没有走进法律这个事业中去。

他卖掉了法律汇集和法典，又走进了自己第一爱好的大门，他开始收集各种神学著作，一门心思扑到这项伟大的事业中来，为日后他成为二十个世纪以来最举足轻重的人物奠定了基础。

初期所学的罗马法典在他以后的各项活动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理智和清醒充满了他的头脑。他对事物的看法总是很深刻，他能看到很本质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们大可以从他写给追随者的信件中看出来，这些追随者后来在天主教残酷的火刑中丧生了。尽管遭受着暗无天日的绝望和无边的苦痛，但就是这些信件，是唯一慰藉他们灵魂的珍宝，从这些信件的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对人们心灵上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理解，那些可怜的受害者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为这个写信的人祷告，然而，正是这个人造就了他们这样的下场。

不，加尔文并不是他敌人口中的那种冷酷无情的人，在他看来，生活是无比神圣的职责。

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想对上帝和自己诚实，因为，他必须把一个问题进行分解，套上基础原则和教义的模式，让人类的感情来检验它

的真伪。

“这个异教徒的力量在于他丝毫不在乎金钱这种东西。”这是教皇庇护四世在得知他离世的消息的时候所说的。教皇在称赞他的这个敌人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从这个角度来评价是正确的。加尔文生前一直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由于“病痛折磨的他不能像以前那样挣钱了”，所以他拒绝了最后一个季度的薪酬。

不过，至于他真正的力量，在另一个方面才能体现出来。

他一生唯一的信念和唯一的推动力就是看清楚《圣经》中上帝的真面目。当他认为自己得出的结论已经可以经受得住所有的争辩和反对的时候，他就把它当作自己遵守的生活准则的一部分。此后，他特立独行，丝毫不在乎自己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成为一个无法超越和战胜的人。

这个品质是在很多年以后才显现出来的，在此之前，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自己从谋生这个庸俗的话题上挣脱出来。

“新学”在巴黎大学赢得了胜利的呼喊，尽管较为短暂。教授的几次关于希腊文词尾变化、希伯来文的不规则动词和其他受到禁止的知识的课程无一例外地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甚至连在著名博学宝座上端坐的教区长也被这些教义腐蚀了。于是，人们再也坐不住了，一场肃清运动开始了，矛头直指现代医学会称之为“思想传播者”的那群人。首当其冲的正是加尔文，听说，他曾经向教区长递交了几篇有很大争议的演说稿。作为头号疑犯，他的房间被彻底搜查，文章也被收走了，还将得到一道逮捕令。

听到此事，他迅速到朋友家藏了起来。

当然，这种发生在学院里的小风波，过一段时间就风平浪静了，不过，要想继续在教会担任职务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此时他需要作一

个明智的选择。

公元1534年，他与旧信仰分道扬镳。就在同一时候，在环绕法国都城的蒙特马特山上，传来了罗耀拉和他几个学生的庄严誓言，这些誓言在后来的耶稣会法规中可以看到。

继而，他们全部从巴黎撤离。

原本向东边走的罗耀拉，想到了他第一次与圣地交战的惨痛结局，并掉转马头，原路折回，到了罗马。就是在那里，他开始了使他英明（也可能是臭名）传世的伟大工作。

约翰却不这样，他的上帝之国是没有时间地点限制的。他四处游走，漫无目的，期望到达一个宁静的地方，能够用余生来阅读、思考和宣扬他的思想。

在去斯特拉斯堡的途中，他遇上了查理五世和弗朗西斯一世的战火，于是不得不绕到瑞士西部。在日内瓦，他受到了法国宗教改革中的那只海燕吉勒莫·法雷尔的热烈欢迎，这位逃出长老会和宗教法庭牢笼的卓越人物展开双臂拥抱他，向他讲述了在渺小的瑞士公园里可以完成的业绩，诚意地挽留他。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他选择留了下来。

为了避免战火的袭击，新的天国应该在阿尔卑斯山脚下建立。

那是个不寻常的世界。

哥伦布去寻找印度的时候意外发现了新大陆。

加尔文急需寻找一块宁静休闲之地，好让自己的余生在平静的思想探索和求知中度过。后来，他来到了瑞士一个三等小镇，并将它奉为精神首都，没过多久，这里的人们在他的带领下用基督教义将天主教王国的土地覆盖了。

如果读历史就能知道一切，那我们就没有读小说的必要了。

加尔文家的圣经有没有被保留下来，我无从知道。如果还保存着，人们会看到，载有丹尼尔的书的第六章磨损得尤其厉害。这个谦逊的法国改革家经常需要从上帝的仆从的故事中获取力量，来慰藉自己的灵魂。故事中讲述了一个被丢进狮子巢穴中的人被自己的清白所拯救，因此没有悲惨的结局。

日内瓦不是巴比伦。体面正直的裁缝居住在这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让人称道的城市。这些受人敬重的裁缝对待生活是很严肃的，不像那位新宗教的领导常常在讲堂上口沫横飞的传教，就像圣彼得一样。

还有一个萨沃伊的公爵，名字叫作尼布甲尼撒。萨沃伊家族曾经长期与恺撒的后代争吵不休，这样的境况促成了恺撒的后人们与瑞士其他地区的联合，他们一起加入了宗教改革运动。日内瓦和维腾贝格的联合就像一场相互利用的婚姻，没有爱慕，只是纯粹的利益关系。

但是，日内瓦改奉新教的消息刚一传开，就有不少于五十个追求各种异教的教徒聚集在莱芒湖边，他们竭尽所能大肆鼓吹他们所想到的任何奇异的教义。

对于这些业余演说家，加尔文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们，他对他们总是嗤之以鼻。他非常清楚，这些人将会为自己鼓吹的事业带来致命的打击，他们虽然拥有很高的热情，却走在了错误的道路上。经过几个月的短暂休息，他开始用准确简单的文笔写下对新教徒们的期望，他希望他们能够理智地分清楚对和错。把人们那惯有的老借口彻底地封锁了，即：“我不知道啊。”他和他的朋友法雷尔将日内瓦人民做了严格的分组检查，每十个人为一组，他宣布，想要得到公民的权利，就必须遵守这个怪异的宗教法。

接下来，他特意为年轻朋友们编写了一本浩大的教义问答手册。

此外，他成功地说服了市议会，将那些依然站在错误的旧观点线上的人全部驱逐出城。

阻碍下一步行动的障碍已经清除干净了，所以，他参考了《出埃及记》和《申命记》经济学家制定的准则，着手建立一个小国家。像绝大多数改革者一样，这个表面上崇拜着上帝耶稣，内心却向往摩西的耶和华的加尔文不是一个现代的基督徒，更像一个古典的犹太人。

如果感情压力太过强大，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似乎是很正常的。卑微的拿撒勒木匠把仇恨和斗争看得太过明白了，所以他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偏见和暴力之外找到其他任何对等物。两千年来，不管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个体，想要达到目的都是直接使用暴力。

因此，战争的爆发得到了所有与之有关联的人的默许，他们合上福音书，在血泪和炮鸣中欢呼雀跃，《旧约》中以眼还眼的哲学让他们看得津津有味。

宗教改革确实是一场残酷的战争，饶恕和生命保障统统无从谈起，加尔文建立的小国家充当了军营的角色，将那些个性自由，崇尚异端的行为全部镇压下去。

当然，取得这些成果的过程当中是遇到很多困难的。公元1538年，阵营中出现了一些对加尔文产生很大威胁的开明分子，他不得不离开了城市。公元1541年，政权再次回到他的支持者手中。乔安尼斯行政长官踏着响亮的钟声和教士们的赞美声走进了罗讷河的城堡，成为日内瓦的免冠国王。他用了二十三年的时间苦心经营着神权专制的政府组织，这种政府自从以西杰和以斯拉的年代以来，并没有人知晓。

“纪律”这个词在《牛津大辞典》中的解释是“使受控制，训练服从和执行”，用他来表达加尔文梦想中政治宗教体系是最贴切不过的了。

路德是个悲观主义者，与绝大多数的日耳曼人一样，他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告诉人们去往永恒世界的路在何方。

这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与法国改革行为不相符合。上帝的话固然是指引人们通往幸福的灯塔，但是，人们要走的路太过漫长和黑暗了，并且，在路途中有许多诱惑，这些诱惑可以迷惑人们忘记自己最终的目的，继而半途而废。

不过，这个新教教士却是个例外，他从来不会让自己迷失方向。他很清楚陷阱在什么地方，也不可能被收买。就算偶尔开了小差，稍微偏离了正道，每周的教士例会也会迅速将他拉回来。真正正直的人可以在例会上自由的发言，相互批评。因此，在所有迫切追求真理的人心目中，他是最理想的人物。

凡是爬过山的人都知道，职业导游有时候可能成为十足的暴君。他们非常清楚每一块岩石的危险性所在，也知道哪块平坦的雪地下埋藏着危险。因此，他们可以任意的对自己带领的游客发号施令。假如有人不听从指挥，就会遭受言辞激烈的指责。

任职于加尔文理想王国中的教士们也有这样的觉悟。他们很乐意对那些跌倒了要求帮助的人伸出援助之手。但是，如果那些不听劝告的人企图离开已经开辟好的道路，从群体中溜走，那么非常抱歉，那只伸出来的手将缩回来变成一个拳头给以致命的一击。

在其他的宗教组织里，教士们对于他们的这种权利也非常喜欢。不过，这种特权也引起了地方官员们的嫉妒，他们基本是不允许教士拥有与法庭和行刑官一样的权力的。加尔文了解得很透彻，他在自己的教会管辖区域内建立了一种实际上超越了法律的教会纪律。

许多错误的怪异历史概念在大战以后争先恐后地冒出来，并且到处流窜，其中有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说法：法国人（与条顿人相比）是热爱自由的民族，对于所有的管制都无比仇视。法国已经被官僚体

制统治了几个世纪了，它甚至比战前的普鲁士政府还要混乱和低效率。

官员们似乎无视纪律，上班迟到早退、衣冠不整、嘴里叼着廉价烟，这样的情景经常可以看到。不然的话，他们就像东欧政府的官员们一样，瞎搞一通，惹得人们无比厌烦。对于官员们粗鲁的言行，公众表现得很温顺，这样我们还能说这是一个赋予反叛心理的民族吗？

加尔文是个热衷集权制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法国人。在很多细节方面，他甚至已经可以与拿破仑相提并论了。但与那位伟大的帝王比起来，他没有什么雄心大志，也没有幽默感，是个异常严肃的人。

他为寻找装饰耶和华的词语翻遍了《旧约》，为他理解的犹太历史披上上帝旨意的外衣，以便符合日内瓦人民的口味。

只在一夜之间，魅力无限的罗讷河城市变成了悲哀的罪人聚集之地。市民们所有的言谈都由城市宗教法庭日夜监听，这个特殊的法庭是由六个教士和十二个长老组成的。如果有谁不幸被怀疑持有“受到禁止的异教观点”的倾向，就会被带到长老会法庭接受审问，他必须对他的观点做出详细的解释说明，包括从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得到这些异端观点，诸如此类。如果被告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能够诚心悔改，就能免于刑罚，改派到主日学校去旁听学习。相反，如果是个顽固分子，将在二十四小时内被驱逐出城市，剥夺从今往后在日内瓦管辖区露面的权利。

其实，与“教议会上院”发生冲突并不是因为正义感的缺乏那么简单。下午去隔壁的村子里玩保龄球，如果被控诉，就会遭受一顿痛骂。开玩笑，无论有用与否，都被当作最坏的形式，如果胆敢在婚礼上玩脑筋急转弯，就很有可能是坐牢的下场了。

慢慢地，法律、法令、规则、命令和政令充满了新天国的天空，生活越来越复杂，往日的风采一去不复返。

唱歌跳舞、玩扑克牌、赌博以及举办生日会和乡镇集市这些活动全部都被禁止了，就连丝绸和所有具有华丽外表的装饰物也被隔离开来，人们只能去学校和教堂，这源于加尔文思想主张鲜明的特点。

政治手段的禁止只能免除罪责，却永远无法强迫人们放弃对美德的追求，这才是真正来源于内心深处的启示。因此，优秀的学校和一流的大学在城市里不断兴建起来。所有致力于学术的活动都得到了提倡。此外，还开展很多趣味横生的集体活动，供大家消遣和休闲，使人们享受欢乐，忘记苦难。

加尔文的制度正是将人的情趣考虑在内，才得以存在，并且在近三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些都在一本论述思想政治体系的书中记录着。现在我们非常在意日内瓦为宽容事业所作的努力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新教徒的罗马”并没有比天主教的罗马好到哪里去。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列举了很多可以得到救赎的情况。在那个圣巴托罗缪日大屠杀和许多荷兰城市被夷为平地的这些野蛮行径充斥的年代，期望势力弱的一方彰显美德就等于让他们束手就擒，这是非常不现实的。

不过，这些并不能成为加尔文开脱罪责的借口，毕竟，格鲁特和塞尔维特是在他的煽动下被法庭杀害的。

格鲁特被屠杀的时候，加尔文还可以用他煽动市民暴动的罪行来解释他所得到的下场，可以说他有推翻加尔文政权的企图。但是，塞尔维特却冤枉得多了，甚至很难找出他对社会构成威胁的理由来。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现代的护照规则来解释，他原本只是个“过境者”，因为误了船，所以没有安全过境，因此丢了性命。这听起来真是个恐怖的故事。

西班牙人米格尔·塞尔维特，有一个受人尊敬的担任公证人的父亲（这些人在欧洲有一定的法律地位，不光是负责盖章而得到两毛五报酬的人）。米格尔在图卢兹大学学习，他准备涉及法律事业。在图卢兹大学的那段日子是非常让人难忘的，教授们用拉丁文教学，学习的范围涵盖各个行业，只要学会了五个词尾变化和几个不规则动词就可以自由地去探索世界上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奥秘。

在法国学习期间，塞尔维特结识了不久后将成为查理五世皇帝的忏悔教父的胡安·德·昆塔纳。

中世纪的皇帝加冕跟现代的国际展览会有些相似。公元1530年，查理在博洛尼亚加冕的时候，米格尔作为昆塔纳的秘书参加了加冕礼，这个充满智慧的青年人怀着无法满足的好奇心，亲眼见证了一切，在以后的十年里，他涉猎了各门学科，包括医学、天文学、占星术、希伯来文、希腊文甚至是危险的神学。我们从他的反对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本书的第十五章中可以看到他的血液循环理论，这些是他在研究神学的过程中萌发的启示，而这些足以证明他在医学方面的天赋。但是，这项发明却并没有被那些检查过他图书的人发现，公元16世纪的神学思想到了何其偏执的地步啊！

假如，塞尔维特一直在医学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他就可以一直活到年老，然后安静地离世，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不过，对于当时争议很大的一些问题，他总是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参与。当他发现可以利用里昂的印刷厂以后，他便开始针对各种各样的话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现在，一个富翁可以很轻易地说服学院把“三位一体”改为烟草商标，肯定不会受到任何惩罚，试想一下，这如果发生在过去，那肯定将引起人们无限的恐慌了。

今天，当人们听到这样亵渎神明的话，并不会表现出不安的情绪

来，似乎这是不值一提的事情。因此，要充分理解过去的人们仅仅因为说了“三位一体”这样不敬的话便对整个生活造成了惊慌，这确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可是，假如我们对此没有明确的认识，我们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公元16世纪上半期塞尔维特带给善良的基督徒们的恐惧。

事实上，塞尔维特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派，不能说他是激进派。

对于新教徒和天主教都提倡的三位一体旧信仰，他是坚决不接受的。他给加尔文写信，表达自己的看法和观点，并且希望得到邀请到日内瓦与他私下讨论这些问题。他写信这个举动实际上是犯了一个大错。

他并没有被邀请。

他也不可能接受邀请。这件事引起了宗教法庭的注意，他被送进了监狱。法庭的大法官曾经秘密收到一封来自日内瓦的信，据说这封信正是出自于加尔文的指示，所以法官对他的大不敬行为了若指掌。

没过多久，加尔文又秘密提供了一些证明塞尔维特罪证的手稿。如此看来，加尔文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他只是希望这个年轻人快点从地球上消失，至于谁来做这件事，他是不在乎的。但是宗教法官疏忽了他们神圣的职责，塞尔维特逃跑了。

他原本想从西班牙边境溜走，但他实在是太出名了，在法国南部作长途旅行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此，他不得不绕到日内瓦、米兰、那不勒斯和地中海。

公元1553年8月，一个星期六的黄昏，他来到日内瓦。他本想坐船去对岸，可是马上就是安息日了，所有的船都停开了，要到星期一才有船。

第二天是星期天，无论是当地人还是陌生人都要参加宗教礼拜

式，否则便会被当成异类看待。因此塞尔维特也去了教堂，不幸的是，他被人认出来，锒铛入狱。虽然这个西班牙公民没有受到指控触犯日内瓦的任何法律，但这个不敬神明的自由派竟敢对抗三位一体神学观，法律是绝不可能保护他的。异端的遭遇比罪犯还要惨，他被关进了阴暗潮湿的小洞里面，所有财富及随身物品被没收。

两天后，他在法庭上面对问答单上的三十八个问题开始了为期两个月零十二天的庭审过程。

最后，他得到的罪名是“坚持反对基督教基础的异端邪说”。在问到他的教义方面的问题时，他的回答使法官气得怒发冲冠。

一般情况，这样的案件最后的判处结果是永远逐出日内瓦城，特别是对外国人，可是，塞尔维特却是个例外，他得到的判处结果是：火刑。

几乎是同时，法国法庭也对这个逃亡案进行了开庭审理，他们与新教徒得出一样的判决结果：死刑。法国的司法长官来到日内瓦，要求把罪犯带回本国处理，结果这个要求被拒绝了。

加尔文自己也可以执行火刑。

在走向刑场的漫长路途中，这位异教徒身后一直跟着一队牧师，他们至此都没有放弃对他的说服教育。那样惨绝人寰的苦难一直持续了半个小时，直到人们出于对牺牲者的怜悯将新鲜的树枝投掷到火焰上为止。有些人可能对这类事情比较感兴趣，觉得读着有意思，不过我实在是不想谈得太多。在那个宗教专横、黑暗腐朽的年代里，死刑多一次或者少一次并没有多大区别。

不过塞尔维特不会就此成为过去，这个案件产生了可怕的后遗症。它将新教徒们伪装的面具彻底地撕开了，那些高喊着“保留个人观点的权利”的人是一群心胸狭窄的伪装的天主教徒而已。他们像对

待敌人一样对那些怀有不同意见的人毫不留情。他们只是在找一个绝好的时机以便建立属于自己的恐怖统治。

对于这个严肃的指控，我们应该严肃对待，决不能轻而易举地说一句“还能怎么样”就一笔带过了。

关于这次审判，我们掌握着大量的材料，对于外界的评论也知道得一清二楚，真是一件令人无比痛心的事。加尔文曾经宽容地建议过将火刑改为杀头，但是，塞尔维特对他的仁慈表示感谢，并要求获得释放，得到自由。他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犯什么错，他只是一心想要追寻真理，像他这样正直的人，并且掌握真理的人，法庭凭什么对他进行审判呢？他认为他是有权利在公众面前与加尔文进行辩论的。

这些，加尔文是不可能听进去的。

他曾经发过誓，只要这个异教徒落在他的手里，就绝不放过他，他不可能违背自己的誓言。为了给塞尔维特定罪，他不得不跟自己的敌人——天主教宗教法庭合作，并且，如果可以有更多的定罪资料，他也丝毫不介意跟教皇合作。

更不幸的事情还在后面。

塞尔维特行刑的那个早上，应他的请求，加尔文走进了那个黑暗肮脏的牢房。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都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人性和宽容。

面对这个即将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人，他极力争辩着，口沫横飞，怒火中烧，嘴巴里面没有冒出任何一句同情怜悯的话。他怒目圆睁，内心充满了对这个异教徒的仇恨，用恶毒的语言吼道：“在烈火中见鬼去吧，这是你这个流氓应该得到的下场！”

这是发生在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塞尔维特离我们远去了。

所有的雕像和纪念碑都不可能唤醒他的躯体。

加尔文也离我们远去了。

成百上千的咒骂汇编成书也不可能打扰他的安宁。

狂热的宗教改革者在审判过程中激动无比，全身颤抖，他们担心这个心怀不轨的恶棍逃跑；行刑结束后，忠诚的教会支持者欢呼雀跃，互相写信道贺：“日内瓦万岁，终于采取措施了。”

这些人也全部都远去了，人们应该将他们彻底地忘却。

我们只需记得一点。

宽容就像自由一样。

不过，一味地祈求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永远保持高度的警惕才能使它长存。

为了子孙后代中像塞尔维特一样的人，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一点。

第十六章　再洗礼教徒

面目狰狞的怪物充斥着每一个时代。

我们这一代中有“赤党”存在。

父辈那一代是社会主义者。

到了祖辈，有莫利·马圭尔当道。

曾祖辈则是雅各宾派的世界。

至于三百年前的祖先们的世界也并没有比现在好到哪里去。

那个时候是再洗礼教徒。

流行于公元16世纪的那本叫作《世界之书》的历史方面的书籍，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历史纲要”或者干脆说它是编年表，它出版于公元1534年，作者其实是个叫作塞巴斯蒂安的肥皂师傅，他住在乌尔姆城，极力倡导禁酒。

塞巴斯蒂安是个自由思想者，虽然他的妻子是个成长在再洗礼教徒家庭的人，但这丝毫也没有动摇他坚定的信念，正是因为他的妻子，他才对再洗礼教徒有了一定的了解。在他的书中，他对再洗礼教徒是这样描述的，他写道：“他们向人们传授爱、信仰和十字架，并不惜自己的生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他们都能保持耐心和谦卑，并能相互帮助，相互平起平坐，称兄道弟，同甘共苦。”

对于他们的做法，我们应该毫不吝惜地给予夸赞，不过一百年来，让人很奇怪的是，他们却被无情地猎杀，在最血腥的年代里，最残忍的处罚被加到了他们的身上。确实很令人无法理解。

但是，必须得清晰地认识到，这就是宗教改革所必须发生的一些事情，必须去理解它、接受它。

说到宗教改革，我们不得不说，实际上它没有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

改革是把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但宗教改革给世界带来的变化却是两个铁笼。我们可以用两个“监狱”来比喻。一个是制造了一本所谓正确的书，用来取代某些正确的人；一个是试图建立一个黑袍教士统治的社会来取代白袍子的教士。

宗教改革经历半个多世纪，经过艰苦的奋斗，无数的牺牲，但是获得的成果却是贫乏的，这的确让千千万万的人心灰意冷，他们盲目的相信了宗教改革，以为改革可以给他们带来几百年，乃至一千年的社会安定及宗教安定，却根本没有做好对付宗教迫害及经济奴役的思想准备。

改革者本来的打算是做一次大冒险，但结果却发生了这样的事，这就好像他们掉到了码头和船的空隙里，他们不得不努力拼命地挣扎，尽量使头露出水面，维持他们的生命。

现在的处境对他们来说是可怕的，旧的教会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也不能背叛内心的良知加入新的信仰。他们被社会淘汰了。在那些官家眼里，他们已经不存在了，可是他们的确还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生命仍在继续。既然活着，他们便想改变世界，消除邪恶和愚昧。

最后，他们通过努力活了下来。不过，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研究他

们是怎样生活的了。

没有了旧的生存关系，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结成一个新的组织，形成一个新的关系，推选出新的领袖。

但问题是没有一个正常的人会去管理这群可怜的疯子。

结果，一个鞋匠和一个歇斯底里的助产婆担当了预言家的角色，他们一个有预见力，一个充满幻觉。他们聚在一起天天祈求，天天祷告，并且时常胡言乱语，他们经常在一个小黑屋里开会，屋子的椽木在信徒们恭敬而有诚意的赞美声中晃动，他们的祷告影响了村里的正常生活，结果引起了法警的关注，法警不得不来进行整顿他们这群躲在小黑屋里的角色。

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好几个男男女女都被送进了监狱，紧接着，村镇里的议员开始了调查。

因为他们既不去天主教堂，也不尊敬新教徒的苏格兰教会，因此，议员们要求他们交代清楚，说明自己是什么人，信仰什么教会。

许多最受尊敬的宗教改革者做人处世圆滑，不得罪人，只要他们的生活能过得舒适体面，有一点点的妥协也未尝不可。但是，说实话，那些村镇里的议员可就没那么舒服了，他们的处境不仅尴尬，而且很困难，因为囚犯是所有异教徒中最不幸的人了，事实上他们对宗教的信仰是很认真细致的，一点儿也不马虎。

话又说回来，一个真正的再洗礼教徒却是另一种人，他们对所有的措施、改革都要求彻底，他们讨厌妥协，讨厌不彻底。耶稣曾告诉过他的追随者，当半边脸遭到敌人的击打时，要把另外一半脸也转过去让他打。剑在人在，剑完人完，一个剑客必须死在剑下。这些，对于再洗礼教徒来说，就意味着绝对的命令，绝对地服从，不允许有暴力反抗。他们时常在慢吞吞、无休止地小声嘀咕着，说什么环境会使

情况改变，虽然他们也反对战争，但是这场战争跟以往的并不一样，扔几颗炸弹，偶尔使用一次，就一回，上帝是不会介意这么做的。

圣令就是圣令，仅此而已。

基督徒是反战主义者（他们的敌人正是这样称呼这种实用基督徒的），他们拒绝应征入伍，拒绝扛枪，他们的敌人逮捕了他们，因为他们主张和平主义，他们被捕后总是显得很心甘情愿地接受这样的命运，嘴里不断念叨着《马太福音》第三十一章第五十二节，直到以死亡的方式结束他们的折磨。

他们的怪癖行径很多，反战主义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耶稣教导说过，上帝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并不相同，它们各有特点，彼此不应该融合。说得很好，一点不错，也正是因为这样，所有的优秀的再洗礼教徒都小心地避开了国家的公职，拒绝当官，当别人在费尽心思，花费时间研究政治的时候，他们却把时间用到了研究《圣经》上。

另一个怪癖的行径是耶稣告诫他的信徒保持体面，不要面红耳赤地去跟别人争吵，即便是丧失了财产的所有权，再洗礼教徒也不能向法庭提出异议，因为他们的怪癖，使得这些怪人都与这个世界隔开了。但是，上面几个例子却引起那些正在享受着美好生活的、身材肥胖的邻居的猜疑和厌恶。他们总是自以为是，想当然地把“待人宽则人亦待己宽”的做人原则和虔诚混为一谈。

即使是这样，如果一个再洗礼教徒有能力保护自己不被朋友伤害到，他们也可以像再洗礼教徒及其他许多观点不同的人一样，跟官方协商，找到调解的方法。

有很多对他们的无产阶级兄弟抱有很真诚情感的布尔什维克，总是不分日夜地为使世界能够更加美好而奔忙。这些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一般人听到“布尔什维克”这个词的时候，通常都会想到莫斯科，想

到一些刺客，而这些刺客看上去都很有学者风度，还有的会想到关满无辜者的监狱，想到准备执行死刑的刽子手嘲弄着即将受刑的人。这些情景也许有点不公平，但是由于最近这些年发生在俄国的那些很难启齿的事情，人们有这样的印象确实也不足为奇。

公元16世纪的再洗礼教派似乎也有着相似的遭遇。

再洗礼教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被人怀疑有许多奇怪的罪责。首先，他们一丝不苟地研究《圣经》。这点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他们在研究《圣经》时不带有任何的偏见，如果谁要是特别喜欢《启示录》，那就不一样了，这是件很危险的事情。这也就是他们被人怀疑的根据。

到了公元15世纪，对于一个容易感情冲动的人来说，这本书仍然很受欢迎，虽然这本怪书因为有点“虚伪”而遭到了抵制。在流放中的帕特莫斯这样说过，这些被无情猎杀、追捕的可怜的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虚弱的怒火使他浸沉于现代巴比伦歇斯底里的预言时，所有再洗礼教徒就齐声高呼“阿门”，并虔诚地祈祷着新天国、新大地快些到来。

面对高度狂热的压力，软弱的头脑一次又一次地选择屈服，对再洗礼教徒的迫害，几乎都伴随着宗教疯狂的大爆发。男人女人都赤裸裸地冲到大街上，竭尽全力地宣布这个世界末日的到来，竭力想通过自我的牺牲来平息上帝的怒火。一些老巫婆乘机进入其他教派正在举行的仪式中，打断他们的会议，发出刺耳的号叫声，乱说胡话，说什么魔鬼就要来了。

总有那么一些事，一些有怪癖行为的人和我们形影不离。只是比起上面那些疯狂的举动来说，程度上轻了许多。只要你抽空读一读日报，你就会看到在俄亥俄州、衣阿华州或佛罗里达州的偏僻小村里，有一个女人用切肉刀把丈夫大卸八块，理由是因为她听了天使的话，

天使让她如此。或是头脑清醒的父亲预见到七支号角的声音，便杀死了妻子和八个孩子。不过，这些都是很少的例外，当然，他们很容易被当地警察抓住，也不会给国家的生活和安全带来什么巨大影响。

不过在公元1534年，在美丽的小城明斯特，严格按照再洗礼教徒的理论讲，新天国确确实实在那里宣布建立了。这件事情的发生的确不同往常。

没有一个北欧人愿意提起那恐怖的冬天和春天。

这件事中的恶棍是个漂亮的裁缝，他的名字叫约翰·比克斯宗。历书上称他是莱顿的约翰。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勤奋小城的人，在脏乱不堪的莱茵河畔度过了童年。他像当年所有的学徒一样，东游西转，南奔北跑，学习他那个行当的秘诀。他读和写的本事很一般，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许多人都会因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卑贱和知识的缺乏而产生一股自卑感，但他并没有。因为他年轻漂亮，而且脸皮厚，又酷爱虚荣。

在英国和德国闯荡很久之后，他又回到了故乡，开了一家裁缝店，做起了长袍和礼服的生意。同时他加入宗教，就这样开始了他不寻常的生涯，因为他成了托马斯·芒泽尔的信徒。

虽然芒泽尔以做面包为职业，但是他是个有名的人物。在公元1521年，在维腾贝格有三个再洗礼预言家突然出现，要向路德指出通往拯救的真正道路，他便是其中之一。他的本意虽好，却不受赏识，被赶出了新教徒城堡，被禁止永远不许在撒克逊尼公爵的管辖范围内露面。

到了公元1534年，再洗礼教徒已经历了许多失败，于是他们孤注一掷。

他们选中威斯特法利亚的明斯特作为最后的尝试点，关于这个没

有人会感到惊讶。因为该城的公爵主教弗朗兹·范·沃尔代克是个鲁莽的醉汉，一个花花公子，长年和多个女人公开姘居，从十六岁起就因为生活的不检点而为所有正派人士所不齿。这座城市奉行新教时他让步了。但他是个远近闻名的骗子，他的和平条约并没有给新教徒带来安全感，没有安全的生活实在太让人难受。于是城里的居民都憋足了劲，等着下一次选举。于是，这座城市的政权落入了再洗礼教徒手中，主席是个叫伯纳德·尼伯多林克的人，他白天是布商，晚上是却变身成为先知。

那个主教看了一眼他的新议员，便一溜烟地溜走了。

这个时候，莱顿的约翰登场了。他以简·马希兹圣徒的身份来到明斯特。马希兹自己创建了一个教派，被拥为圣人。约翰听说正义事业刚刚进行了一次有力的出击，便留下来庆祝胜利，帮助清除原主教在教区里的余孽。再洗礼教徒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竟然把教堂变成采石场，他们没收了女修道会，除了《圣经》，其他的所有图书都被焚烧。在高潮的时候，所有拒绝按照再洗礼教徒的仪式进行再洗礼的人都被赶到主教营地，按照减少社会损失、惩处异端的原则，将他们不是砍头就是溺毙。

这些仅仅只是序幕。

戏剧程度的可怕有增无减。

几十种新教的上层教士涌向这个新耶路撒冷。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对虔诚、正直、向上的人们有号召力，只要他们振臂高呼，人们就会聚集到他们的旗下，但是，若论起政治手腕，他们就像孩子一样无知了。

在明斯特被占领的五个月里，所有社会复苏和精神重建的计划、制度和议程建设都尝试了一遍，每一个新的预言家都在议会上比画一番。

不过，在这个充满逃犯、瘟疫和饥饿的小城里，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社会学实验室。不同派别之间的分歧和争吵让军队首领的努力化为乌有。就在这危急关头，裁缝约翰站了出来。

他短暂的辉煌从此开始了。

在一个人人挨饿的社会里，什么事情都是会发生的。约翰按照他在《旧约》里读到的旧神权政府的形式，把明斯特的自由民像以色列那样分为十二个部落，自己当上了国王。本来，在此之前，他已经和预言家尼伯多林克的女儿结了婚，现在他又娶了一个寡妇，约翰·马希兹的妻子。后来他想起所罗门国王，便又加了两三个妃子。于是，令人作呕的滑稽剧开场了。

约翰整天坐在商业区的大卫王宝座上，每天人们都站在周围，听宫廷牧师宣读最新命令。法令一个又一个的产生，来得很快，因为城市的情形在日趋恶化，人民缺衣少食，人民迫切需要它改善现状。

显然，约翰是乐观主义者，他完全相信一纸条令具有无上的权力。

因为人们抱怨吃不饱，天天挨饿，约翰便向他们许诺解决。接着并签署了一道圣旨，大体意思是说，无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财产一律平均分配。把街道铲除做菜园，所有餐馆共同享用，有饭大家吃。

到此为止，一切还不错。但又有人告状，说富人藏起了一部分财产。约翰告诉臣民不要担心。紧接着，第二条法令宣布，任何人不得违反任何一条法律，否则就得砍头。每个人都要注意，这个警告不是随随便便的恐吓，因为这个皇家裁缝用剑与剪刀都很熟练，经常亲自动手行刑。

接着进入了一个幻觉时代，人们患上了各种各样的宗教狂热症，商业区内日日夜夜都有几千名男女聚集在那里，等待着“天使”吹响的

号角。

后来就到了恐怖时期，这个预言家割断了他的一个王后的喉咙，以使他的信徒保持士气。

最后便是报应来临的日子，两个绝望的市民为主教的军队打开了城门，城里的先知们一个个被关到了铁笼里，拉到了威斯特法利亚的各个乡间市场上、集市上示众，最后被折磨而死。

这是历史上怪异的一章，但却给许多害怕上帝的朴实的人们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从此以后，所有再洗礼教徒都被通缉、追捕，即便是逃过了明斯特大屠杀的领导者也被追捕，像野兔一样到处逃窜，被抓者就地处决。在每一个讲坛上，新教的牧师和天主教的教士都谴责再洗礼教徒，用恶毒的语言诅咒他们，说他们是叛徒，是企图推翻现有秩序的叛乱分子，根本就不值得同情。

对再洗礼教徒的围剿很彻底，也很成功，让再洗礼教作为一个教派不复存在。不过，他们的思想却成功地活了下来，并被其他教派所采纳、吸收，从而演变成了各种形形色色的宗教和哲学，渐渐被人们尊敬，现如今，成了每一个人精神和智慧遗产的一部分。

这个故事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它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却很难做出一个有效的解释。毫无例外地，每个再洗礼教徒都属于那个把墨水瓶看作奢侈品的阶层。

因此，那些撰写再洗礼教徒历史的人都把它看作一种危险的宗教激进派。只有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我们才发现，在基督教发展形成理智、宽容的精神的过程中，这些卑微的农民和那些工匠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不过，思想就像闪电一样，谁也无法预知下一次它会落在哪里。

当狂风暴雨在锡耶那上空肆虐的时候，明斯特的避雷针还有什么用处呢？

第十七章　索奇尼一家

宗教改革在意大利从来都没有成功过，并且它也无法成功。因为，宗教在南方人眼里根本不值一提，他们是不会为了宗教而血腥残杀的。还有，宗教法庭的中心——罗马就紧紧地挨着它，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抓到把柄，可能会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但是，有成千上万个人文主义者居住在这个半岛上，在他们中间难免会有几颗老鼠屎，这些人更喜欢亚里士多德，而不是圣克里索斯托。当然，他们旺盛的精力可以在俱乐部、咖啡馆以及体面庄重的集会上得到发泄，这些男女可以尽情挥洒知识热情，而不会得罪帝国。

这一切就在悠闲自在的生活中度过了。事实上，生活就是应该妥协，而且他过去也一直是这样的吧，只要世界没有毁灭，就应该是和谐的。

没有必要为信仰中的琐碎小事而大动肝火吧。

接下来我们的两名主角就要登场了，看过我在前面作的简单介绍，读者应该不会希望看到洋洋洒洒的描述或者火炮隆隆了，他们可是体面斯文的正人君子。

他们最大的贡献在于推翻了残酷专横的暴政，这种贡献甚至比那些气焰嚣张的改革者还要大。不过，我们无法预见这样的事情。事情一旦发生了，我们非常庆幸，如果非要追问原因的话，我们也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

这两个人就是在葡萄园里平静地干活的索奇尼叔侄。

年纪较大的雷利奥·弗朗西斯科喜欢用一个“Z”来拼写自己的名字，而年轻的福斯图斯·保罗则喜欢用两个“Z”来拼写，这是为什么呢，其实我也不知道。只不过，拉丁文形式的索西尼厄斯人们要跟为熟悉一些，至于意大利文拼写的索奇尼，人们则不太熟悉。这个细节，我不想去研究了，就让语法学家和词源学家去伤脑筋吧。

这对叔侄，侄子的影响要比叔叔的影响大，所以我们先让叔叔出场，然后再到侄子。

雷利奥·索奇尼在银行世家和法官世家出生，曾经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过，这个锡耶那人一出生就注定了要与法律打交道。但是，他跟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自作主张地涉足神学领域中去了，他放弃了法律，开始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后来，他也跟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成了理智的神秘主义者，在事故和老道的中间徘徊着。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复杂，能理解的人自然不用解释，不能理解的，解释了也没有用。

他的父亲还做着自己的儿子成为文坛巨星的梦，他为了给儿子开眼界，慷慨地给了他一大笔钱。因此，雷利奥离开了锡耶那，他利用十年的时间游历了威尼斯、日内瓦、苏黎世、维腾贝格，以及伦敦、布拉格、维也纳和克拉科夫。在他游历的过程中，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村子或者城镇住上几个月或者一年半载，他致力于寻找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物。在那个年代，人们谈论宗教就像现在的人谈论生意一样，总是絮絮叨叨、没完没了。雷利奥在常年的旅途中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奇思妙想和异端邪说，他熟悉从地中海到波罗的海的所有宗教学说。

当他满载着知识的行囊来到日内瓦的时候，碰到的是加尔文阴险晦暗的眼神，他丝毫也没有感受到友好的气氛。这个高贵富有、学识渊博的年轻人，不像塞尔维特那样困苦无依，但他却是塞尔维特的支

持者。加尔文认为，三位一体的这个问题随着那个西班牙异端在烈火中丧命已经得到了完美的解决，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无论是马德里还是斯德哥尔摩或者是其他地方，塞尔维特事件已经成了耳熟能详的热门话题，世界上思想严谨的人们开始陆续地反对三位一体。还不止如此，谷登堡的邪恶发明被他们巧妙地用来大肆宣扬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被散播到世界各地，发展远离日内瓦，他们大可以用不敬的言辞来进行更猛烈的宣言。

就在前不久，出现了一本很畅销的小册子，它记录了每一代教会神父对迫害异教徒及惩罚异端者的事情的所有言信。这本书尤其深受加尔文嘴里的“仇视上帝”的人们的欢迎。加尔文曾经表示要跟这本畅销书的作者单独谈话。大概作者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封面上根本没有任何署名。

据说这本小册子的作者曾经在日内瓦的一所中学里任教，他叫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奥。由于对各种各样的神学罪恶很有自己的看法，所以他比较欣赏蒙田，而憎恨加尔文。但是这些都只是听说而已，并没有真正的证人。不过，一般情况下，只要有一个人带头，都会有很多人紧随其后。

因此，加尔文对索奇尼保持着礼貌的距离，他建议索奇尼到气候温暖适宜、湿度适中的巴塞尔去，索奇尼起身前往著名的伊拉斯谟古堡时，加尔文对他表示了衷心的祝福。

让加尔文感到无比高兴的是，没过多久，宗教法庭就盯上了索奇尼叔侄，最后的结果是雷利奥不但被没收了基金，还疾病缠身，三十六岁的时候便在苏黎世去世了。

雷利奥的过早离世在日内瓦刮起了一阵欢快的旋风，不过仅仅只是一阵子而已。

除了一位寡妇和一个侄子以外，几大箱子的笔记本便是雷利奥的

所有遗产。他的那些没来得及发表的手稿全部由侄子继承，这个侄子很快就步了叔叔的后尘，成为塞尔维特的追随者，其狂热程度更胜于叔叔。

福斯图斯·索奇尼像老雷利奥一样从小就开始到各地去旅行。他从祖父那里得到了一块不动产，因为直到快五十岁的时候才结婚，所以他有大把的时间用来研究自己热衷的神学。

好像他还在里昂做过一段时间的生意。

他究竟是个怎样的商人我不知道，但是他经营的是实物的商品而非精神财富，从这些经营中，他得出结论：依靠屠杀和暴力手段是不能将处于更有利地位的竞争对手打倒的。他一生坚持的这个处事原则我们也许可以在公司办公室里面找到，但却无法在神学院中寻得到它的踪迹。

公元1563年福斯图斯在回意大利的途中进入了日内瓦，他似乎没有去向当地主教请安，况且那个时候加尔文已经重病缠身了，即使福斯图斯前来拜访他，也只会给他带来烦恼而已。

在此后的十多年中，索奇尼都一直在伊莎贝拉·德·梅第奇那儿工作。直到公元1576年，这位女士结婚了，短短几天的欢乐时光过后，她居然被自己的丈夫保罗·奥希尼谋杀了。于是索奇尼放弃了现有的工作，永远地离开了意大利的天空。他来到了巴塞尔，在那里，他把《赞美诗》翻译成了意大利白话文，并且还写了一本描写耶稣的书。

就像他自己的作品所描述的那样，福斯图斯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他的耳朵有问题，因此更具备谨慎的品质。还有，他位于阿尔卑斯山另一面的那几块地产可以给他带来不错的收益。他从托斯卡那的当政者得到暗示：路德学说的嫌疑人不要用太激烈的言辞谈论宗教法庭敏感的论题。因此他总是有很多的笔名，每出版一本书都要让朋友仔细地审核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问题才安心的送到出版

社出版。

正因他的谨慎小心，他的书籍从未上过禁书榜单，以至于那本描述耶稣平生的书流传到了特兰西瓦尼亚，最后被一个思想自由的意大利人看到了。这个人是米兰和佛罗伦萨的一些贵妇的私人医生，与那个地区的权贵有很大的亲戚关系。

那个时候的特兰西瓦尼亚还是欧洲的远东，直到公元12世纪初期还是荒蛮一片，成为安置德国多余人口的指定地方。撒克逊农民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繁荣富有、秩序优良的小国家，城市、学校甚至是大学都应有尽有。

不过这个小国家距离通商要道有些遥远。然而这对于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想远离宗教法庭制约的人来说，却是一个优良的避难所，于是这个小国家顺其自然地成了他们理想的栖身之所。

还有波兰，在很多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是与保守和沙文主义相提并论的。可是，我不得不说，在公元16世纪上半期，它实实在在地充当着庇护所的角色，有效地保护了那些因为宗教信仰而遭受折磨的欧洲人，这应该算是个特殊的惊喜了吧。

这个出人意料的局面，具备了典型的波兰风格。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共和国的管理制度在整个欧洲来说，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波兰的高层教士们纪律松散，职责不明确，对于这些情况人们已经无暇顾及了，因为整个欧洲的主教都是放荡丑陋的，乡村教士们也经常酗酒，这些已经成为家常便饭了。

但是，公元15世纪下半期的时候，大量的波兰学生涌入了日耳曼大学，这种现象引起了维腾贝格和莱比锡当权者的注意。他们开始采取了措施，后来，受波兰教会管理的克拉科夫波兰学院彻底垮塌了，

可怜的波兰人只能远离家乡到别的地方去求学。不久，条顿大学开始追随新教，来自华沙、腊多姆和琴希托霍瓦的学生也紧随其后。

当他们学成归来的时候，已经俨然成为意气风发的路德派了。

在宗教改革的最初阶段，国王、贵族和教士能够轻而易举地阻止错误思想的传播。矛盾的是，这必须要让共和国的当权者们团结在一项明确统一的政策之下。对于这个国家而言，通常是一张反对票就可以推翻一项法律制度，就算国会其他议员大力支持也行不通，这是最神圣的传统。

没过多久，著名的维腾贝格大学教授在大肆宣扬他的宗教的时候，衍生出一个经济性质的副产品来，即，没收所有教会的财产。这项规定得到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的平原上的波莱斯劳家族、福拉基斯劳家族以及其他骑士、伯爵、男爵、王子和公爵的大力支持，因为他们喜欢自己的口袋里被多多放进一些钱财。

伴随着这个发现，为争夺修道院的真正领地而进行的恶意抢夺之战爆发了，闻名于世的“间歇”现象由此产生。从人类有记载开始，波兰人喜欢用这种“间歇”的方式来拖延思考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所有的当权者都停止动作，对于新教徒而言，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他们抓紧时间在不过一年的时间里建立了自己遍布全国的教堂。

然而，新教士之间无休止的争吵使得农民们对他失望了，于是他们又重新回到天主教的路途上来，波兰再次成为天主教的世界。但是到了公元16世纪下半期，波兰真正成为宗教自由的天堂。西欧的天主教和新教展开了残酷杀戮再洗礼教徒的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幸免于难的教徒纷纷逃往东方，最后在维斯杜拉河畔安定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布兰德拉塔大夫看见了索奇尼那本关于耶稣的书，他非常想结识这本书的作者。

乔吉奥·布兰德拉塔是个多才多艺的意大利人，同时，他还是个毕业于蒙比利埃大学的医生，这个优秀的妇科专家一生桀骜不驯却又聪颖过人，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医生一样（想想拉伯雷和塞尔维特），具备神学家和神经病专家的双重身份，他时常在这两种身份中间走动。波兰皇太后总是出现幻觉，将那些对三位一体有所怀疑的人统统归入谬误者行列，乔吉奥·布兰德拉塔成功地治好了她的这种病，痊愈后，太后对自己的错误表示无限的悔恨，此后，她只判决赞同三位一体教义的人。

这位称职的母后娘娘已经辞世了（据说是被情人所害），她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当地的权贵，布兰德拉塔作为她们的私人医生，一跃成为具有很大政治影响力的人物。他开始意识到，如果不尽快终止宗教上的争执，离内战爆发的时日就不远了，所以，他非常努力地劝和那些势不两立的教派。可是这是项非常艰巨的任务，除非有一个比他更加善于处理复杂多变的宗教论战的人出现，由此，他想到了那本书籍的作者。

他写了一封信给索奇尼，邀请他东行。

遗憾的是，当索奇尼到达特兰西瓦尼亚的时候，布兰德拉塔私生活中的一大丑闻被揭发出来，那个意大利人不得不辞去工作，此后就杳无音信了。但是索奇尼却在这片遥远的土地上定居了，他与一个波兰姑娘结了婚，公元1604年在那个地方过世了。

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宽容思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阐释，这也是他一生中最有价值的年华。

公元16世纪后半期，大批宗教问答手册问世，信仰、信念和教义解答铺天盖地而来。在德国、瑞士、法国、荷兰和丹麦，这些东西肆意猖獗，人们似乎随时都在制造着它们。每一个地方传播出来的小册子都在宣扬着属于它们自己的真理，所有信服这些东西的当权者都在

用刀剑、十字架捍卫这个特殊形式的真理，对那些异教者进行残酷的镇压。

索奇尼的信仰包含着与众不同的精神实质，它直截了当地显示出它真正的意图，对于那些无谓的争执，它从来都不屑一顾。

它继续说道：“那些忠诚的教徒们可以抱怨说，目前已经在流传的和教会真正印刷的各种各样的宗教读本和教义自私地想把自己所认为的信仰强制性地加到人们的头上，假如人们不接受或者信仰了其他的教义，就被划入异端行列，正是这些引起了教徒之间的纷争和分歧。”

基于这些原因，它严正声明索奇尼派绝不提倡剥夺或压制别人的宗教信仰，对于广义的人性，他作了如下呼吁：

“《新约》早已定了的法则，最初的教会已经做出表率，还给人们信仰自由吧！上帝的圣火已经照亮了人们的内心，为他们指引了方向，我们这样卑微的人，凭什么要将那团火焰熄灭呢！我们谁有资格独自霸占解释《圣经》的权力呢？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上帝，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谁又有压制别人的权利和能力？无论我们个人的学识相差多少，我们都是自由和平等的上帝的子民。”

这些话听起来是何等的美好啊，不过早出现了三百年。这个世界如此动乱不堪，索奇尼派和其他新教派都不可能长久地立足在这个社会里。反对宗教改革的气焰已经无法阻挡。

已经沦陷的城市里有大批的耶稣会教士在作威作福，东部的人们受不了新教徒们无休止的争吵和不务正业，纷纷倾向罗马这一边。现代的旅行者踏进这块远离欧洲文明的土地的时候，怎么也不可能想到，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最先进、最自由的城堡，也不可能会想到，世界上第一次实现宽容的方法是在那个恐怖的路德山林里的一个小村

子里面得到的。

因为好奇和时间空闲，前不久的一个早上我到图书馆翻看了目前最流行的教科书，我们国家的青年人就是从这些教科书中解读过去的历史的。这些书几乎都是从社会民主派跳越到汉诺威的索菲亚，从撒拉森斯跳越到索比斯基，只字未提索奇尼派或索奇尼叔侄。事实上，在那些被跳过的历史中还存在着很多伟大的宗教领袖，俄克兰帕鸠斯和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就包含其中。

只有一本书，在某一章描写路德或加尔文事迹的一个模糊的附录里面稍稍含混不清地提及了一下这两个锡耶那人文主义者。

预见确实是存在很高的风险，不过，我很怀疑在今后三百年的通俗历史中，这一切是可能会改变的，到时候，会有一个独立的章节专门用来描述索奇尼叔侄的故事，而宗教改革的传统领导者则会被放在不显眼的地方。

他们的名字就算是在脚注上出现，也同样会异常耀眼。

第十八章　蒙田

有人认为中世纪的城市空气对自由有益。

确实是这样的。

躲在高大的石墙后面，再对男爵和教士们撒野，这才是安全的。

不久之后，欧洲大陆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为国际贸易的出现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于是，另一种历史现象出现了。

用七个字的一句话来表示就是：生意有益于宽容。

对于这个观点，你随时可以否认，在一周内任何一天，尤其是星期天。

纽约人不可能像温斯堡和俄亥俄那样去力挺三K党，假如纽约人发起一场运动，将所有的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外国人都驱逐出去，那么华尔街就崩溃了，你会看见轰轰烈烈的劳工起义，一切都将不复存在了。

中世纪下半期就是这样一种情景。莫斯科是一个跟公爵差不多的小伯爵的领地，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招惹新教徒。不过，诺夫哥罗德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处于国际商业中心的位置，瑞典、挪威、日耳曼和佛兰芒商人的利益全都积聚在这里，如果处理不当就会被这些人驱赶到维斯比。

一个以农业为支柱的国家可以对它的农民任意使用残酷的刑罚，

但是，如果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布吕赫人胆敢在他们的城市里大肆杀戮异教徒，那么那些外国驻地公司便会马上撤离，资本也会被抽走，城市将陷入崩溃和瘫痪。

这个教训并没有被那些国家所牢记（如西班牙、教皇统治区和哈普斯堡的领地），仍然打着“忠诚于信仰”的招牌，将那些信仰不忠诚的人强制驱逐，最后，这些国家不是彻底沦陷就是版图不断缩小。

但是，商业国家和城市的统治者都是务实主义者，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捞到好处，因此，他们在精神世界里一直保持中立，天主教、新教、犹太人和中国人能够在他们的管辖范围里自由贸易，同时能够保持自由的信仰。

为了体现尊严，威尼斯通过了一项法案，用来反对加尔文，不过，这纯属表面功夫，十人内阁小心地告诉宪兵，不必太拘泥于这条法令，除非那些教徒真的要占领马克教堂，用它来做自己的会堂，否则就随他们去吧，不要对他们有太多的管制，让他们爱信仰什么就信仰什么吧。

他们的好朋友阿姆斯特丹也是这么干的。每个星期天，教堂里面传来斥责“淫荡女人”的牧师们的声音，但旁边那个渺小的房子里同样有天主教徒在做弥撒，外面则会看见警察来回走动的身影，他们随时防备着日内瓦宗教的狂热崇拜者突然闯进来，吓跑自己的法国和意大利客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威尼斯和阿姆斯特丹的人们已经脱离了教会，不再是它虔诚的子民。他们一直都是天主教或新教的忠实追随者，从来没有变心。只不过，在他们看来，汉堡、吕贝克或里斯本的十个异教徒商人的善良愿望，要比日内瓦或罗马的十个穷困教士的许诺更有吸引力。所有他们就这样做了。

蒙田是一个思想开明、见解独到的人，但他的父亲其实是个鲱鱼

商人，母亲则是西班牙犹太人的后代，如果硬要把他本人和他的家世联系起来，可能多少有些勉强。但是，我认为，蒙田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从商的长辈们。作为战士和政治家的蒙田一生对偏执和盲目相信非常痛恨，这跟波尔多码头附近的那家小鱼铺有莫大的关系。

假如我说这些话的时候，蒙田就在我面前，他是不会感谢我的，因为他一出生就没有在那个家族里面见过任何生意带来的荣誉，非常遗憾，那个时候，这个家族已经从生意场上谢幕了。

他的父亲得到了一块蒙田的产业，开始了挥霍的生活，大把大把地花钱，让儿子成为一个真正的绅士是他的梦想。他为儿子请了私人教师，从小就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六岁的时候，父亲把他送进一所高级学校学习，十三岁开始学习法律，二十岁未满就成了波尔多市议会中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了。

此后，他又进了军队，还从事过法律方面的工作。三十八岁的时候，他的父亲过世了，此后他杜绝了一切社交活动。在生命最后的二十一年里（除少数几次违心地短期介入政治），他潜心研究马匹和狗，并且博览群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这个划时代的人物身上同样有几个弱点。这个鱼贩子的孙子为了保持所谓的绅士风度，一直恪守着某些感情和礼仪。就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都拒绝承认自己是个作家，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真正的绅士，至于那些书籍完全是因为冬天的时候太过无聊，为了打发时间才粗略地记录了一点有哲学内容的思想。这真是一派胡言，这位开明的绅士完全没有与卓越的达尔塔昂相提并论，就是他，将自己全部的内心、灵魂、美德和罪恶、邪恶统统献给了自己的著作。

这个大度得体、教养良好、性格温顺的人拥有的是这样的心、灵魂、美德以及罪孽，所以他所有的作品不得不高出文学作品一层，它

们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了，而是用常识和实际生活中的礼仪堆积而成的哲理。

蒙田从生到死都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的时候曾经加入过天主教贵族联盟，这个组织是法国的贵族们为了将加尔文主义从法国彻底赶走而建立的。

公元1572年8月，决定命运的一天出现了，那天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因为杀死三千名法国新教徒而举办了庆祝仪式，蒙田听说后，就彻底离开了天主教。虽然如此，但他从来没有参加过别的宗教团体，对于天主教的某些重大礼仪，为避免别人闲话，他都坚持参加。但是，自从发生了圣巴托罗缪惨案之后，他的作品就变得跟马克·奥勒留或者爱比克泰德或其他十来个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差不多了。其中值得注意的作品是那篇叫作《论良知的自由》。这篇文章运用了伯里克利那个时代的语气来描述，而非法国皇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仆臣的语气，他引用了教会叛徒朱利安的例子，进一步说明了真正的宽容的政治家应该做的事情。

请翻开第二册的第十九章，你就可以看到我所说的这篇最多五页的很短的文章了。

那些固执的新教徒所提倡的绝对自由以及天主教徒们追求的绝对自由，蒙田早已经腻烦了。那些自由（在那个时代中）只会引发内战。但是，当条件已经允许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们睡觉时不再枕着匕首和手枪的时候，明智的政府就应该能立刻停止对别人思想的干涉。人们应该被批准自由地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崇拜上帝。

当然，蒙田不是第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也不是唯一一个敢想并且还胆敢将这种想法四处向法国人民宣讲的人。在公元1560年的时候，米歇尔·德·霍比托尔就已经发出了对付异教徒适合用文字方式的论断，这个人曾经做过凯瑟琳·德·美第奇的大臣。他最令人钦佩的观

点是那一句：暴力无法改变人性，因为人性有自己真实的面目。两年后，《皇家宽容法》诞生了，这里有他不可磨灭的功劳。因为这部法律的存在，胡格诺教派获得了召开集会的权力。他们被批准可以召开宗教会议，并在会议上对本宗教内部事务进行讨论，跟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宗教派别没有什么两样了。

让·伯丹这个备受尊敬的巴黎律师（他对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里表达的共产倾向极力反对，很好地保护了私人财产）也是这样想的，他认为，国王没有权利强制人们选择宗教信仰。

人们似乎对于官员们的演讲和哲学家的论文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不过，蒙田的书却经常在有学之士的集会中被谈论，并且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传阅、翻译、讨论。

人们很乐意接受他的业余作家身份和因乐趣而写作的说法，所以，他的作品虽然“光荣”的列入了官方指定的“哲学”图书范围，但人们还是很情愿去购买和阅读的。

第十九章　阿明尼乌

在宽容的斗争领域里，还有这样的情况，“有机社会”更多考虑的是“整体”的安全，但是那些卓越的人才却把个人的能力看成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而忽略了集体的力量，即，他们不重视改革运动的作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一直存在着。

假如我们承认了这个条件，那么就是说，国民个性越自由，国家就越宽容了，否则就是相反的。

很久以前的那些开明正直的统治者会对孩子们发出这样的教导：“我相信只要对别人有一颗宽容的心，就可以得到别人的宽容，基于这个原则，我希望我所有的子民都能包容别人，从而使自己从中获得好处。”在这样的鼓励下，臣民们开始急切的存储刻有“宽容第一”的徽章。

不过，臣民们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因为出于对统治者的畏惧，他们害怕凶神恶煞的绞刑官会找上自己。因此，建立在暴戾威慑下的屈从并不会长久。统治者除了使用暴力以外还应该建立一整套明确合理的教育体制，把它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让国民能够真正地接受这种观点，才能成功。

这朵宽容之花有幸开在了公元16世纪后半期的荷兰共和国。

这是有原因的，居住在这个半自给自足的国土上的人，绝大多数是渔夫、水手和商人。这些人具有独立自主的个性和灵活自由的职

业，他们必须具备果断决策的能力，能够随时对工作中的机遇做出合理的判断。当然，我不是说他们比别人更智慧、宽容和豁达。但是，由于他们所从事的艰苦工作和身上所持有的埋头苦干、坚毅执着的特性使他们成为整个北欧和西欧谷物和鱼类的运输工。他们公平地对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反正对他们来说，这两种人身上的钱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很欣赏付现金的土耳其人，总是要赊账长达六个月之久的长老会成员让他们无比头疼。所以，宽容试验最理想的国家非荷兰莫属了。尤其重要的是，这里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各种条件。

有一句古老的格言是这么说的："想要统治世界的人必须对世界有充分的了解。"这句格言在不善言语的威廉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验证。威廉年轻的时候是最高统治者的机要秘书，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且他穿着时髦、富有体面，他时常出入晚宴和舞会，娶了好几个有名的女继承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过着挥金如土的日子。在这位不思上进的年轻人眼里，竞赛图表要比宗教书籍有意义得多。

他认为宗教改革引起的社会不安定只不过是那些低贱的平民和国王之间又一次发生了争吵，稍微使些手段，并动用几个魁梧的警察就可以摆平。

当他真正看清楚国王和臣民之间的这场争吵的时候，他的职业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辉地位，变得毫无意义了。这时，这个温顺的有钱人很快卖掉了宫殿、马匹、金盘和乡下的土地。这个曾经花名远播的贵公子一跃成为卓越的领袖，坚定地站在了顽强反对哈普斯堡阵营的最前列。

即使已经千金散尽，威廉仍然保持着原来的个性。当他拥有挥霍不尽的财富的时候，他是一位哲学家，当他穷困潦倒，居住在两三间出租房的时候，甚至付不起周六的洗衣费的时候，他同样是位哲学家。以前，他曾经成功地劝阻了某位主教建立大量绞刑架处死所有新教徒的企图，现在，狂热的加尔文教徒迫切地想要杀死所有天主教

徒，他也不能坐视不管。

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却是徒劳。

两三万人已经被杀死了，无数的人被关进宗教法庭的监狱里等待着死亡的到来，遥远的西班牙正在组织军队，准备将刚刚崭露头角的叛乱扼杀在摇篮里。

对于那些刚刚绞死自己父母、兄弟、叔叔和爷爷的人，有人说应该感谢和爱戴他们，这种说法未免太荒谬可笑了，有人坚决反对。我想，在这里就没有必要告诉大家那个反对者是谁了。通过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对反对者的和解态度，威廉向追随者们说明，摩西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律法根本算不了什么，善心和宽容的性格可以超越一切。

在这场实现公共道德的战斗中，有一个卓越的人才站在了他这边。你可能看到一个树有简洁墓志铭的华丽教室，那里安放着道德高尚的德克·孔赫特的遗体。这个颇有意思的孔赫特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年轻的时候在各国旅行，得到了很多关于德国、西班牙和法国的第一手资料。回国后，他爱上了一个贫穷的姑娘。尽管他严谨的荷兰父亲并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他还是和那位姑娘结婚了，之后，父亲痛骂他忘恩负义并取消了他的继承权，这似乎是所有长辈对违逆自己的儿女所要做的事情。

失去继承权的年轻人孔赫特开始了谋生之路，虽然有些困难，但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他学会了一门手艺，当了一个铜雕匠。

啊！只要是荷兰人就跟教士脱不了关系。白天拿雕刻刀，晚上孔赫特便换上了鹅毛笔，将一天中发生的大事记录下来。也许他并没有现在人们认为的吸引人眼球的文笔，但他却阐述了很多使人容易接受的道理，就像伊拉斯谟那样。因此他结识了很多朋友，这里面就包含了少言寡语的威廉。威廉对他的能力大加赞赏，并聘请他当机要顾问。

那个时候，威廉正陷入一场奇怪的争论中。国王菲利普在教皇的支持下，悬赏两万五千个金币，并丢出贵族头衔和免于一切罪责的诱惑，希望有人去荷兰将这个人类的大敌、异端者的头目杀掉。这样的危险，威廉已经遭受过五次了，不过，他并没有停止动作，对他来说，他应该要坚定地履行职责，用言论和书籍驳倒国王菲利普。在这件事上，孔赫特使了足够的力气。

威廉和菲利普之间的决斗在全世界人民的注视中展开了，那些对哈普斯堡内阁针针见血的观点并没有激起内阁任何一点宽容之心。威廉散布的小册子被译成了很多不同的文字，四处发散，过去人们只敢低声议论的论题如今终于被摆到阳光底下大肆地讨论开来。

遗憾的是，这场空前大讨论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公元1584年7月9日，两万五千个金币的报酬被一个法国的天主教徒尽收囊中。过了六年，孔赫特也离开了人世，而他还没来得及把伊拉斯谟的著作翻译成荷兰文。

以后二十年的岁月，世界一片狼藉，战火不断，各种派别的神学家们此起彼伏的谩骂声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最后，敌人被彻底赶出了新共和国边界。这个时候已经找不到像威廉一样的人才了，内部事务要谁来掌管呢？本来因为慑于大量的西班牙军队的威力，不同的教派团体已经暂时勉强地和解了，但是现在又开始狼烟四起、磨刀霍霍了。

他们要为战争找一个好的借口，不过，每一个神学家都会有一些需要抱怨的事情。

有两个莱顿大学的教授持有不同的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很普通的事情，可是，他们反对人们有自由的意志，这个事情就非同小可了。热情高涨的人们立刻加入到激烈的讨论中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国家就分成了两个敌对的团体。

一个支持阿明尼乌。

另一个支持戈马鲁斯。

戈马鲁斯出生在荷兰，但却在德国生活了一辈子，深受条顿教育体系的影响，并且是条顿教育体系的优秀代表。他是个博学多才的人，可是对基本常识却含糊不清。他的大脑忠实于希伯来韵律学，心脏却忠实于阿拉姆语的句法规则。

他的对手阿明尼乌却是一个与他截然相反的人物。阿明尼乌出生于奥德瓦特，距离这个小城镇不远的地方就是伊拉斯谟度过苦涩童年的斯特恩修道院。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拥有了自己的邻居同时也是马尔堡大学著名数学家和天文学教授的友谊。就是这个叫作鲁道夫·施耐利的人将阿明尼乌带到了德国，并让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第一个假期来临的时候，这个孩子回到家，发现一切都变了，自己的家乡遭遇了西班牙人的洗劫，亲戚们也不知所踪了。

他的学习生涯原本至此就终结了，这个时候一些善良的富人伸出了援手，纷纷解囊，将这个命运悲惨的孤儿送到了莱顿大学学习神学。这个可怜的孩子，埋头苦读，用了六年的时间学完了所有的课程，接着他并没有停下来，又奔向了另外的知识殿堂。

那个时候，有些人可以为优秀的学生提供赞助，以供他们得到更好的前途。阿明尼乌非常顺利地从阿姆斯特丹几个行会那里得到了介绍信，他怀着美好的心情到南方去寻找新知识去了。

作为一个优秀的神学继承人，日内瓦是他的首选之地。加尔文已经远去了，代替他的是他的仆从西奥多·贝沙，这个人接过了加尔文的手杖，当起了指引人们方向的牧羊人。这位经常与异端邪说打交道的人鼻子异常灵敏，他很快就从这个年轻的荷兰人身上发现了拉姆主义的气息，于是大大缩减了对他的拜访。

现代人对拉姆主义毫无概念，也不会觉得这个词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但是，在三百年前，他代表着一种危险的新宗教派别，对弥尔顿著作熟悉的人都知道。这个派别的创始人是皮埃尔·德·拉·拉姆，当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非常厌恶教师们老套的教学方法，于是它的博士论文里用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题目：《亚里士多德教诲的一切是绝对错误的》。

谁都可以想到，老师们绝不可能喜欢这个题目。过了几年，这些想法和观念再次出现在了他那几本才华横溢的书里面，还有什么好说的，他死定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爆发的时候，他成了牺牲者名单上的不二人选。

作者虽然永远的从这个世界消失了，但是那些著作却不会消失，它们苟延残喘地留了下来，他的不同凡响的逻辑体系在西欧和北欧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真正的忠诚人士却认为与拉姆主义有染将会受到地狱的惩罚，他们建议阿明尼乌去巴塞尔，当对一切都持怀疑态度、追求探索发现的伊拉斯谟掌管了这个多灾多难的城市的时候，“自由主义者”一直被当作好榜样。

在一片建议和警告声中，阿明尼乌向北方前行了。可是，他还擅自作了一个让人惊讶的决定，他进入了敌人的虎穴之中，来到帕多瓦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并且还踏上了罗马的土地。公元1587年返回家乡的他被视为危险分子，人们不敢靠近。但是，毕竟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并没有丑陋的外表，没过多久，大家对他的好感又回来了，并且得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新教牧师的身份。

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才能，还在瘟疫爆发的时候，充当了一回英雄。他很快就赢得了人们的真心拥护和爱戴，他受托建设城市的教育事业。公元1603年，他被调往了莱顿，人们对他恋恋不舍，这个时候，阿明尼乌已经成长为一个受人敬仰的神学教授了。

假如，他知道他在莱顿的命运，我敢保证，他是绝对不会去的。他到达的时候，恰逢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和上拉普萨里安派教徒之间打得天昏地暗。

阿明尼乌接受的是下拉普萨里安派的教育，并且家庭背景也属于这个派别。虽然这样，阿明尼乌仍然怀着美好的心愿，想公平客观地对待自己的同事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戈马鲁斯。可是，这两个派别已经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了，阿明尼乌不得不坚定地站在了下拉普萨里安派这一边。

看到这里，读者朋友们可能会对这两个派别有所疑问，可是我也不知道这两个派别是什么玩意儿。我所知道的是，这两个派别已经争执了很长时间了。阿明尼乌的这一派认为人们具有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能够自己决定命运；但是索福克利斯、加尔文和戈马鲁斯那一派却坚持人们的一切早就由上天安排好了，造物时的圣骰决定了人们的一切命运。

公元1600年，北欧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上拉普萨里安派的教徒。他们非常乐意听那些布道者说，很多人已经命中注定要进地狱了，除了他们自己。假如有某些教士竟敢胆大妄为地宣讲善良和慈悲，就会马上遭受人们的怀疑，将会划入邪恶、软弱者的行列，跟悲悯之心过重的医生一样，因为不忍心开给别人苦口难喝的良药，而活活地把病人害死了。

当阿明尼乌下拉普萨里安派教徒的身份被莱顿那些长舌妇识破的时候，他的利用价值就到此为止了。以前的朋友和支持者立刻变成了他的敌人，对他发出了猛烈的攻击和谩骂。最后，这两个派别都涉足了政治，在公元17世纪的世界中，这似乎是注定的。选举中获得胜利的一方是上拉普萨里安派，这个时候，下拉普萨里安派沦为了公共秩序的敌人和国家的叛徒。

这场荒谬绝伦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接替沉默少言的威廉的奥尔登·巴内费尔特，他的头被夹在两只脚中间悲惨地死去了。他曾经致力于共和国的建设。至于格罗修斯，他曾经用他的温和政策成为国际法律公平天坛上的第一位人物，最后却在雅典女王的宫殿里避难，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到这里，威廉倡导的事业似乎就中止了。

但是，现实并没有如加尔文主义者所愿，成功并未降临。

名义上的荷兰共和国实际上由几百个势力强大的家族所掌控，这里只是商人和银行家的天堂。这些绅士只对法律和秩序有兴趣，他们丝毫不会注重平等和博爱。对于已经存在的教会组织他们是支持和认可的。每个星期天，他们会怀着激动的心情准时来到墙壁洁白的教堂，这个地方不久前还是天主教堂，现在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说教地了。星期一来临，当这些虔诚的教士前去拜访市长和议员们，并且想顺便说说某人的坏话。这个时候，官员们总是忙于“开会”而无暇会见他们。假如，这些忠诚的教士们召集几千名教徒在市政府门口“示威”（这种事常常发生），誓要见到官员们，官员们则会礼貌地召见他们，礼貌地收下工整的建议书和状告书。不过，当最后一个穿黑袍的请愿者离开大门的时候，那些文稿就变成了官员们点燃烟斗的材料了。

他们铭记了那句有效的名言：“只能有一次而已。”上拉普萨里安教派掀起内战的那些年月实在是把他们吓怕了，所以，他们镇压起宗教狂来毫不留情。

这些贵族们总是将国家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们不能长久地区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后代人对他们并没有多大的赞美之词。这些人不具备国家宏观眼光，经常在小事上无比精明，而大事上却糊涂敷衍。不过，有一件事他们的确做得很好，值得我们称道，那就是将国家变成了国际交换中心，各种各样的思想在这里碰撞，各种人物在这里交汇，人们可以自由地言说、自由地表达。

我并不想描述得太过动人心弦。假如内阁给出否决票，市议员们就会被逼无奈地去铲除一个天主教的秘密协会，或者是将一本盛气凌人的异己分子出版的小册子没收掉。但是，通常情况下，只要你不爬上市中心的临时木台上反驳宿命论，不把天主教的念珠带进公共餐厅，能够承认南方卫理公会的上帝，就能够明哲保身了。在接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上无数的人丧生于思想迫害，而在荷兰共和国的人却相安无事。

这座城市再次成为人间天堂，这个消息不胫而走。此后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各式各样的狂热者充斥在荷兰的印刷馆和咖啡馆里面，为了精神自由而战，在这支新奇的队伍里，他们站在了最前列。

第二十章　布鲁诺

有一种颇为可靠的消息说，世界大战归根结底就是一群没有军衔的士兵的战争，那些将军、上校及三星战略家整天坐在一个废弃的别墅里，经受着寂寞的折磨，伴着单调的光亮，沉迷于几英里长的地图，冥思苦想之后，制订出一套完整的作战计划，那就是用三千人的生命为代价，来使他们能够获得半英里的领土。而在这个时候，一些下级军官、中尉、下士却干着所谓的“黑活”——也就是不为人知的肮脏的勾当。当然了，德国边防的完全陷落是必然的结果。

即便是为了精神独立而进行的大规模战斗，情形也大同小异。

几乎没有出现过几十万人的正面进攻。

也不可能会出现那种破釜沉舟似的盲目冲锋，没有人会把自己的士兵当成活靶子交给敌人宰割。

可以这么说，很多时候，绝大部分的人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战争已经爆发了，他们只会好奇地关心一下谁死于清早的火刑，谁又将在明天下午的绞刑架上丧命。然后，他们或许有一天会发现，有那么几个不顾自身性命的人，还在继续为宗教自由原则而战斗，但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并不赞同自由原则。不过，在我看来，这些小道消息仅仅只会引起人们轻微的惋惜而已。但是，假如遭受这种灾难的人是他们的叔叔或者什么亲戚的话，他们一定会痛不欲生。

情况似乎都是如出一辙。我们不能单纯地用几个数学公式就将牺

牲者们以生命为代价换回的事业概括了，就算安培和马力也不能表示他们为事业作出的努力和牺牲。

乔达诺·布鲁诺的著作是每个在读博士生必看的书籍，他们精心地收集了他作品中精辟的语句，诸如“人们可以自由的思想，不受国家干涉”或“国家不能用武器（比如剑）来处罚那些反对公认教条的人”。这样他们就能够轻松地写出人们喜欢的博士论文来，题目为《乔达诺·布鲁诺（1549—1600年）和宗教自由的原则》。

凡事都具有两面性，那些不研究这种重要课题的年轻人，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会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有那么一批忠诚无比的人，看到当时的宗教狂热和人们身上沉重的枷锁，老百姓生活在水生火热中，于是乎，他们站出来进行反抗。他们实在是太过贫穷了，只有一件破衣烂衫而已，并且毫无安身之处，但是，他们的心中有一团圣火激励着他们，他们整日穿梭在大街小巷，不停地演讲、写作，还跑进庄严的大学，找到那些学问渊博的教授，并与之不停地争论高深的问题，即使在普通的乡间小酒吧里，他们也会同村夫进行口沫四溅的争吵。他们不知疲倦地宣传着善意、理解、宽容和仁慈的待人之道。他们顾不上衣服破烂，提着书，拿着小册子，从东到西，走南闯北，不停地奔波。最后，他们一些人患上了肺炎，死在了伯美拉尼亚偏僻的小村庄里，一些人被苏格兰小村里的醉汉私刑处死，还有一些横尸在了法国的大街上，被车轮压得粉碎。

乔达诺·布鲁诺，我之所以提到他的名字，是因为他为我们树立了典范，可是像他一样的人不计其数，不过，他对生活和思想以及他对自认为正确的事情的那份执着、那份坚持、那种永不熄灭的热情，非常值得我们将他作为一个例子提出来讨论。

布鲁诺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像很多意大利孩子一样，并没

有什么过人之处，资质平平，按部就班地进入修道院，后来也成了多明我会的一个僧人，这是个支持迫害行为的团体，与布鲁诺的思想半点都不相符，那个时候的多明我会也被称为“正统信仰的爪牙”。这样的称呼说明教会里的人都很机敏，那些异教者不必将他们的观点写成白底黑字，只要他们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者一个举止，他们总能分辨出来，然后把他们统统抓到宗教法庭的面前。

布鲁诺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服从的声音，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是怎么成为一个叛逆者的呢？是什么让他丢下《圣经》，而拿起塞诺和阿纳克萨哥拉的著作的？这点，我也弄不明白，不过，格格不入的布鲁诺还没来得及学完那些必修课就被赶出来了，从此他开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

他像许多前辈那样翻过了古老的阿尔卑斯山。他们心中充满了对自由的向往，希望在罗讷河和阿尔夫河交汇处的那片森林里有他们企盼的自由和美好。

可是，他们发现改变教义并不代表可以动摇人们的内心，而人们的行为恰恰是受内心指示的，不管在任何地方都是如此，所以，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带着失望的情绪离开了。

布鲁诺在日内瓦居住了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意大利的难民们充斥着这座城市，通过同乡的帮助，他得到了一套新衣服，并且找了份校对员的工作。他充分利用夜晚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并进行文学创作，当他看到了一本德·拉·拉米的书的时候，就像找到了知己一样的惊喜。德·拉·拉米同他一样都坚持世界前进的步伐被中世纪教科书中宣扬的暴政阻碍了。跟他的法国老师相比，布鲁诺走得并没有那么遥远，他认为不能对希腊人的理论全盘否定。但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到了公元16世纪，人们还在受到早在基督出生前四个多世纪的时候写下的字句的束缚呢？

信仰正统宗教的人告诉他："一直都是这样的。"

而年轻的叛逆者却这样回答他："我们跟我们的祖先有什么关系，他们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死去的人就应该永远的死去。"

没有多久，警察就找上了他，警察建议他收拾行李，到别的地方交好运去。

从此，布鲁诺踏上了寻找安全自由居住地的旅程，他非常努力地去寻找，可是这条路却漫长得没有尽头。他先去日内瓦，又来到里昂，然后又去到图卢滋。在那个时候，他开始涉足天文学，并对哥白尼的学说表示赞同，不过这样做会让他走入一个危险的境地，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人们都在大声叫喊着："这个世界是围绕太阳转动的，世界只是围绕太阳转动的一颗普通的星星？见鬼去吧！真是可笑至极，谁会听说过这样的胡说八道呢？"

即便是在图卢滋他也感到很不舒服，于是他便横穿法国，徒步到达了巴黎，最后又去到了英国，成了一个法国大使的私人秘书。但是，他只是再一次尝到了失望的滋味。英国的神学家跟大陆的神学家简直是半斤八两，可能他们更实际一些，例如，在牛津大学，对于违反了亚里士多德教诲的年轻学生，他们用的不是处分，而是处罚，每次罚款十个先令。

经历了很多事情后，布鲁诺开始变得喜欢挖苦别人，喜欢讽刺人。他开始写一些很精彩却带有危险性的短篇散文和对话，内容大多以宗教、哲学、政治为主。在对话中，整个现实社会的制度被他弄得颠三倒四，被剖析得细致入微，一点情面都不留。

同时，他还教授自己感兴趣的天文学。

虽然布鲁诺的演讲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是，校方却不喜欢他，学校向他下达了逐客令。他只能又回到法国，然后来到路德和茨温利

刚刚待过的马尔堡，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交流匈牙利伊丽莎白的城堡里辩论变体说的本质。

他的“自由分子”的名声已经传遍了大街小巷，因此他连当教师的资格都没有，虽然维腾贝格很好客，但是，这座路德信仰的堡垒已经开始落入了加尔文派手中，从此以后，像布鲁诺这样有自由倾向的人再也没有了立足之地。

他决定向南行，到约翰·胡斯的地盘寻找新的机会，但是，他又一次失望了，布拉格成了哈普斯堡的首都，随着哈普斯堡的进入，自由也随之销声匿迹。布鲁诺只得继续行走，开始了通往苏黎世的漫漫旅程。

在那里，他接到了一封意外来信，是一个意大利年轻人写给他的，名字叫作乔瓦尼·莫塞尼戈，信中邀请他去威尼斯。我不知道为什么布鲁诺会接受邀请，或许是因为这个意大利农民经受不住贵族头衔的诱惑，为收到这样的邀请而惊喜若狂。

乔瓦尼·莫塞尼戈的祖辈们有敢于挑战苏丹和教皇的胆量，但是他自己却胆小如鼠，意志力薄弱，当宗教法庭的官员闯进他的家里强行将他的客人带去罗马时，他被吓得像个木头人一样，一动也不敢动。

布鲁诺最终还是被带到了罗马。一般情况下，威尼斯政府都很重视自己的权力，可是，他们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只有思想而不能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实际好处的人去得罪罗马教皇。除非布鲁诺是一个日耳曼商人或荷兰船长，他们还有可能会发出强烈的抗议，若外国军队胆敢在他们的地盘随便抓人的话，他们肯定会干涉，甚至会发动战争。

他以学者自称，这是无可厚非的，共和国为此也感到非常荣幸，但是在国内，这样的学者实在太多了。

再见了，布鲁诺，愿圣马可宽恕他的灵魂。

在宗教法庭的监狱里，布鲁诺度过了漫长的七年牢狱生活。

直到公元1600年2月16日，在鲜花广场，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骨灰随风散去。懂意大利文的人或许能从中获取灵感，写出一则寓意深刻的文章来。

第二十一章　斯宾诺莎

历史中的有些事情，我总也搞不明白，古代某些艺术家和文学家的工作量就是其中的一件。

现代的作家有打字机、录音机、自来水笔，有的还有秘书，每天能写出三四千字，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过去的年代中，像莎士比亚，他身兼数职（大约有十几种），还有个老婆整天在耳边喋喋不休，鹅毛笔也十分笨拙，三十七个剧本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呢？

同样，我也无法理解“无敌舰队”上那个异常繁忙的老兵洛普·德·维加，怎么会想到用找来的那些墨水和纸张写下一千八百个喜剧和五百篇文章呢？

还有一个叫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奇怪的人，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居然能够在挤着二十多个小孩的小屋子里，承受着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依然写出了五个清唱剧，一百九十个教堂大合唱，三个婚礼大合唱，十二支圣歌，六支庄严弥撒曲，三部小提琴协奏曲（他可以凭借任何一部双小提琴协奏曲而名垂青史），七部钢琴管弦乐队协奏曲，三部两架钢琴的协奏曲，两部三架钢琴的协奏曲，三十部管弦乐谱，此外，长笛、竖琴、风琴、提琴、法国号管他都写过相应的曲子，这些，任何一个普通的学生都需要用一生的时间来练习。

还有，我不知道有哪个画家能像伦伯朗和鲁本斯那样勤奋努力，在三十年中几乎每个月能创作出四幅画，或者是四幅蚀刻画。一个平凡的人，有谁能像平民安东尼奥·斯特拉地瓦利那样，在有生之年做了

五百四十把小提琴、五十把大提琴和十二把中提琴呢？

现在，我并不想谈论他们是如何设计出那些情节，如何听出那些旋律，如何能分辨那些色彩和线条的组合，如何选择那些木头这样的话题。我好奇的仅仅是关于体力这方面的事情，他们是如何做到的，难道他们不睡觉吗？他们不会去打打台球，去休闲娱乐一下吗？难道他们从来就不知道疲倦吗？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说过神经这个词？

在公元17世纪到18世纪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整天大肆吃喝，丝毫不遵守健康规律，人类的光荣职责和神圣使命早就被他们抛在脑后，不过，他们将大把的时间花在了艺术创作上，并且他们的艺术成果确实令人拍案叫绝。

不管是艺术还是科学，甚至是无比挑剔的神学，情况都惊人的相似。

如果回到二百年前的图书馆里，你会发现那些早已丢弃在人们记忆中的八开、十二开和十八开的宗教小册子、布道书、讨论集、驳论、文摘和评论，这些有着皮革、羊皮纸和纸张封面的书籍塞满了天花板和顶楼，上面堆满了尘土。虽然这些书籍包含了广博的学识，但是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

对于现代人来说，其中一部分书谈论的题目和采用的许多词汇没有任何意义，不过在当时，有非常重要的目的隐含在这些发霉的书籍中。如果它们失去了实际作用，至少可以帮忙清洁空气。因为这能够给它们讨论的问题提出一个完美的答案，让有关人士感到非常满意。或者使读者明白，有些问题并不是用逻辑推理或者使用辩论的方法能够解决的，于是他们会选择丢弃它们，对它们放任不管。

这些恭维的话听起来更像在挖苦。假如我们的文学作品和科学成果还能有幸出现在公元30世纪，我希望那个时代的批评家能够对它们表现出仁慈和公平。

这一章的主角是巴鲁克·德·斯宾诺莎，他并没有追赶那个时代的时髦，在数量上下功夫，他的全集不过就是三四本小册子，外加几捆信件。

但是，我们不要因此小看了他的作品，因为如果要用正确的数学方法去解决他的那些伦理学和哲学中的抽象问题，那必须得下狠功夫，学习大量的知识，这些学习量会让一个健康的普通人感到非常吃力。这个得了肺结核而死去的可怜人，为了献给上帝的乘法口诀表而耗尽了生命。

斯宾诺莎是犹太人。他的祖辈们居住在西班牙半岛的时候，那还是一个摩尔人居住的省份。那时，犹太人还没有受到犹太隔离区这样的“待遇”。后来，西班牙被基督教征服后，推行“西班牙人的西班牙”的政策，整个国家陷入了混乱中，斯宾诺莎一家只得离开了故乡。他们乘船来到了荷兰，并最终落户在阿姆斯特丹，在那里买房置业，勤勤恳恳地工作，省吃俭用，积累了很多的钱财，很快，他们就成为声名显赫的“葡萄牙移民”中威望很高的家族。

假如这家的儿子巴鲁克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身上流着犹太人的血，那么邻居家小孩的讥讽已经算不了什么了，他在塔尔姆德学校接受的训练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荷兰共和国被阶层的偏见压得几乎无法呼吸，种族偏见已经不能引起它的重视了，因此，北海和须德海的海岸成为所有外来人民的安身之所，他们安心地在这里过着平静的生活，人们相处友好。这是荷兰生活的一大特点，旅行者们总是喜欢在自己的“游记”中记录这一点，当然，这是有理由的。

犹太人和欧洲人一直都不能融洽地相处，在欧洲其他大部分地区都是这样的，甚至到了近代，情况也没有改变。他们之间无休止的争吵，真是不可理喻。可能双方都有对错，都有理由说自己是对方专横和偏见的受害者。就像我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一样，专制其实是自我保护的一种方法。这样的话，只要基督徒和犹太人各自忠诚于自己

的信仰，对方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划入敌人的阵营。第一，他们都坚持认为自己信仰的才是真正的上帝，其他民族信仰的都是假上帝。第二，在商业领域里，他们是竞争敌手。犹太人怀着首次去巴勒斯坦寻找家园的美好梦想来到了西欧。那个时候的工会，也就是“行会”，阻止他们从事一切职业，万般无奈之下，他们开了典当行和银行来做生意。这是十分类似的两种职业，中世纪的人们将它们看成是邪门歪道。教会一直对金钱抱着厌恶的态度，不过税收除外，他们认为收取利息是犯罪行为，把拿利息看成罪孽，这种想法真让人无法接受，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加尔文时期。在那个时期，放高利贷是被政府禁止的行为，早在四十个世纪之前，巴比伦人的法律中就明确规定了禁止金钱交易或者从别人的钱中谋取利益。从两千年前写下的《旧约》里，我们也可以读到，摩西的门徒们是绝对被禁止放高利贷的，不过，可以借给外国人。此后，像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样的大希腊哲学家对钱生钱的勾当都深恶痛绝，基督教神父更是如此。整个中世纪的人们对放债者都持鄙视的态度。更有甚者，但丁在地狱里为他金融界的朋友们专门准备了一个小壁龛。

从理论上讲，开当铺和开银行的人是不受欢迎的公民，假如他们消失了，世界将会更美好。可是，世界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农业再也不是唯一的主宰了，人们要做一些普通的小买卖就必须依赖信贷，所以，放债者尽管可怕，人们却无法离开他。那么这些“龌龊”的行业就让犹太人来干吧，反正他们已经注定要受地狱之苦，体面的人会远远地躲开。

就这样，可怜的犹太人被迫与这些人们厌恶的行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然，这让他们很自然地走上了与富人和穷人敌对的路。当他们满载而归的时候，对方一下子就变脸了，辱骂和驱逐统统降临在他们身上，情绪冲动的时候，甚至以不信教或基督教叛徒的名义将他们送上绞刑架或是火刑柱。

这样的做法真是愚蠢和幼稚之极，犹太人并不会因为这样没完没

了地压迫和残杀而对基督徒增加好感。它只是导致了大量聪明的人从公共流通领域中离开，成千上万个天性聪明的年轻人，本来可以在商业和科学中有所作为，却把大脑和精力浪费在了毫无用处的旧书上，去研究那些深奥莫测的难题和钻牛角尖的问题。还有成千上万孤苦无依的青年男女，注定只能在发臭的小屋里过不正常的生活，他们一面听老人讲，上帝已经做好了安排，他们将拥有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另一面，却又听到邻居们不停地骂他们是只配上绞架或刑车的猪罗，他们常常被这些辱骂声吓得灵魂出窍。

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让这种生活在逆境中的人用正常的眼光看待生活。

犹太人一次又一次被基督徒同胞逼迫，只得采取疯狂行动反抗压迫者，于是，“叛徒”“不知报恩的小人”这样的帽子再次被扣在他们头上，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可怕的欺侮和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会导致一个后果，那就是心中充满怨恨的犹太人越来越多，而另外的人却走向堕落，犹太区俨然成为一个受挫的雄心和仇恨累积的恐怖地域。

出生在阿姆斯特丹的斯宾诺莎非常幸运，他并不像他的大部分亲戚那样，从出生开始就遭受到了深重的灾难。他首先被送进犹太教堂开设的学校，随后又被送往弗朗西斯科·阿皮聂斯·范·登·埃因德博士那里学习拉丁文和科学，那个时候，他在原先的学校只是刚刚学会了希伯来文的动词变化而已。

从他的名字可以看出，弗朗西斯科博士出身于天主教徒家庭，据说他是卢万大学的毕业生，还有掌握内情的法官说他其实是一个耶稣会成员，是个危险分子，不过这些都是传闻，是不可信的。年轻时候的范·登·埃因德有在天主教学校学习的经历，不过他的心思丝毫不在课本上。后来，他离开家乡安特卫普，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一手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

他对教学很有一手，总是能找到办法让他的学生对古文课产生兴趣。阿姆斯特丹的加尔文派自由居民并不在乎他过去与天主教的关系，非常乐意把孩子送进他的学校，他们还会因为这个学校在六步格诗和变格上总比别的学校强而感到很自豪。

范·登·埃因德教授小巴鲁克学习拉丁文，不过，他在探索科学领域的道路上，逐渐对乔达诺·布鲁诺产生了钦佩之情，并且一发不可收拾，所以，他教了一些正统犹太家庭不能提及的事情给这个孩子。

小斯宾诺莎没有和学生们住在一起，他仍然住在家里，这跟当时的习惯是不相符合的。他的学识给家人留下印象，亲戚们都自豪地称他为小老师，慷慨地给他很多零用钱，他用这些钱买了很多哲学方面的书籍，而不是拿去买烟抽。

笛卡尔是他最感兴趣的作者。

雷内·笛卡尔头顶法国贵族的光环，出生在图尔和布瓦蒂耶之间的一个地方，当穆罕默德发动对欧洲的战争时，查理曼的祖父就是在这个地方击败了他。笛卡尔被送到耶稣会接受教育的时候还是个不满十岁的孩子，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十二年，因为他善于思考，绝对不会轻易接受没经过“证明”的东西，因此，大家都很讨厌他。唯一知道如何对付这种顽皮孩子的就是耶稣会教士了，他们能在充分保护他的心灵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有益的训练。要检验布丁就要亲自品尝，教育也是一个道理。如果现代教育家能够研究耶稣会罗耀拉兄弟的方法，我们也许会培养出几个自己的笛卡尔来。

二十岁时，笛卡尔到了荷兰服兵役，那里拿骚的莫里斯有一套完善的军事体系，对所有想当将军的有志青年来说，他的军队绝对是最好的进修学校。笛卡尔并不经常去拿骚亲王的总部。一个忠诚于天主教的人不可能任意听从新教徒首领的使唤！那无异于叛国。笛卡尔对宗教和政治没有半点兴趣，他只是一门心思地研究数学和炮兵。荷兰

和西班牙停战后，他立刻辞职，随后加入了慕尼黑天主教巴伐利亚公爵的军队。

不过，那是一场短暂的战役，拉罗谢尔附近的那场战斗是整个战役中唯一有点意义的，那时，胡格诺派正在顽强抵御黎塞留的进攻。为了能够学到高级的攻坚战术，笛卡尔回到了法国。可是，这个时候的笛卡尔显然已经厌倦了军旅生活，他毅然终结了军营生涯，全身心投入到了科学和哲学领域。

他是个有固定小笔收入的人。但是他不想结婚，也没有什么大的奢望，他如愿以偿地过上了安宁的生活。

他选择了在荷兰定居，我不明白是出于什么原因。但是荷兰是个印刷业和出版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书店随处可见。只要不公开攻击政府和宗教，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越过出版检查法顺利出版自己的作品。并且，笛卡尔对这个国家的文字一窍不通，尽管真正的法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学会它。因为语言不通，他节约了大量无聊谈话的时间，每天二十小时都能花在了自己的工作上。

这种沉闷的生活对于有过军营经历的人来说实在是无法忍受的，不过笛卡尔却是个例外，因为有生活目标，所以对这种背井离乡的生活很满足。经过多年的岁月洗涤，他渐渐看清了这个世界还处在愚昧无知的黑洞里，那些被称作“科学”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世界前进的步伐总是被谬误和老旧的东西所阻碍，他想做的工作就是清除这些阻碍。这个想法很大胆。但是，千万不要小看笛卡尔的耐性，当他三十岁的时候，一套崭新的哲学体系问世了。随着他自己目标的指引，他把几何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加入到了原先的提纲里。他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项研究工作，最后，天主教徒将他划入加尔文派，而加尔文派将他归为无神论者。

不管什么流言传到他的耳朵里，他都当作没听到，丝毫不受干

扰。他专心致力于自己的事业，最后在斯德哥尔摩同瑞典女王谈论哲学的时候安详地闭上了双眼。

公元17世纪的笛卡尔主义跟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达尔文主义一样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公元1680年当一名笛卡尔主义者是件可怕的事，并且非常不体面。从中我们看出某人被看作现行社会制度的敌人，是索奇尼教徒，被排除在体面人的行列之外。尽管如此，知识界大部分人依然毫无顾忌地接受笛卡尔主义，与我们的祖辈接受达尔文主义如出一辙。但是阿姆斯特丹的正统犹太人却不会提起这个话题。笛卡尔主义也没有出现在犹太法典和圣经当中，因此，它消失不见了。人们却在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头脑里发现了笛卡尔主义，一旦犹太教堂的掌权者采取官方行动出面调查此事，斯宾诺莎就等着毁灭吧。

笼罩在阿姆斯特丹犹太教会的危机才刚刚散去。小巴鲁克十五岁的时候，有一个叫尤里尔·艾考斯塔的葡萄牙流亡者来到阿姆斯特丹。这个非比寻常的人即使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愿意接受天主教，他坚持信仰祖先的宗教。艾考斯塔是一个喜欢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腰上别一把剑的绅士。他自己是个很骄傲的人，总是第一时间把自己的观点公之于世，但他却不能忍受在日耳曼和波兰学校受过训练的荷兰犹太教士所表现出的自傲。

如此小的一个社会怎么可能有那样嚣张的轻视的容身之地呢。于是，一场血腥的杀戮在高傲的梦想家、半先知半贵族和铁面无情的护法卫士之间展开了。

结局必定以悲剧收场。

首先，地方警察局收到消息，说艾考斯塔写了几本否认灵魂永生、渎圣小册子。这个时候，加尔文教徒们找上门来了。不过事实很快就真相大白了，控告也到此结束。最后，他被犹太教会驱赶了出

来，他成了一个生活没有着落的人。

此后几个月，这个可怜人在阿姆斯特丹的大街上四处流浪，最后实在无法忍受贫困和孤独，他选择再次回到组织中来。可是，他首先得为自己的罪恶行为表示忏悔，任教会的人鞭抽脚踢才能得到入会批准。在这些侮辱之下，他终于精神崩溃，于是他用自己买的一支手枪结束了性命。

阿姆斯特丹市民对这起自杀事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犹太团体觉得这件事对他们造成了不良影响，他们尽量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因此，当笛卡尔主义侵蚀了“生命之树”中优秀学生的时候，犹太教会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将事态平息下来，他们找巴鲁克谈话，用一大笔年金收买他，条件是他从此走向“正途”答应去犹太教堂礼拜，承诺不再发表任何反对法律的言论。

斯宾诺莎是个绝对不会屈服的人，他坚定地拒绝做这笔交易。结果，他们翻出古老的《惩处准则》，将他逐出了教会。那是一本对耶利哥时代的诅咒辱骂照单全收的书。

形形色色的谩骂声包围了他，他却能够平静地安坐在家中阅读报纸，了解前一天发生的事。甚至当一个狂热分子想要杀死他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半点想要离开这个城市的意思。

对于犹太教士而言，这简直是颜面扫地的事情，虽然他们将约书亚和伊莱沙都搬了出来，在短短的几年里，却有人再次公开地向他们挑战。他们急急忙忙地向市政府求助，要求和市长面谈，他们要把这个刚被赶出教会的巴鲁克·德·斯宾诺莎的危险事迹报告给市长，说他是个十足的不可知论者，不信仰上帝，在阿姆斯特丹这样受人尊敬的基督社团中，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存在呢。

官员们按照常规，把这件事情交给了由基督教牧师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去办理。这个小组委员会经过调查研究发现斯宾诺莎并没有做过

有害于城市法律的事，他们把实情报告给了市里的长官们。不过他们又觉得，一个教派的人应该团结一致，于是便向市长建议，让这个似乎独立性很强的年轻人离开阿姆斯特丹几个月，到外面避避风头。

从此以后，斯宾诺莎的生活风平浪静，就像他窗子外面的世界那样。他离开了阿姆斯特丹，在莱顿附近的小镇莱茵斯堡里租了一间房子，白天对着光学仪器打磨镜头，晚上抽着烟斗，读书写作。他一直没有结婚。不过传闻说他和前任拉丁文老师范·登·埃因德的女儿有过一段恋情，可是，当斯宾诺莎离开阿姆斯特丹时，那个女孩子才十岁，所以这个传闻肯定是假的。

他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每年都提出两三次要给予他经济上帮助的要求，让他能专心致志地致力于研究。他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他更愿意独立，除了一位年轻有钱的笛卡尔主义者每年给他二十个英镑外，他没多要过一分钱，像一个真正的受人尊敬的哲学家那样生活着。

曾经有一个去德国当教授的机会也被他谢绝了。他甚至拒绝了著名的普鲁士国王的资助和保护，对他而言，漂泊无依的生活也是很快乐的。

几年后，他从莱茵斯堡搬到海牙。他的身体一直很差，因为半成品镜头上的玻璃粉末他不幸得了肺病。

公元1677年，他孤独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这个世界。

至少有六辆宫廷豪门的私人马车参加了这个“无神论者”的葬礼，这让当地教士无比的愤慨。两百年后，当他的纪念雕像揭幕的时候，为了保护参加这个隆重仪式的人不被成群的加尔文教徒的怒火灼伤，当局调动了大批倒霉的警察。

关于这个人，就先说到这里吧，而他的影响是什么呢？难道他只

是个在书中喋喋不休的哲学家，使用的语言能把奥马尔·卡亚姆气得半死的人吗？

不，不是这样的。

他取得成就绝不是靠卓越的才智也不是靠他探索的真理。他的伟大在于他的勇气。他属于这样一种人：他们只知道恪守着一套永恒不变的规矩。这些规矩是为那些自命可以解释圣理的职业教士创立的精神专制体系。

在他的世界里，思想方面的自由与无政府的政治是同一个概念。

他非常清楚，他的逻辑体系会把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全部得罪干净。

但他坚定如一，从未动摇。

对他而言，所有的问题都具有普遍性，它们包罗在人们的意识里，体现的是单纯的现实，不管是在创世之初，还是在末日降临之时都是这样的。

他以他自己的方式，为人类的宽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斯宾诺莎像前辈笛卡尔一样，打破了旧宗教设置的狭隘禁锢，踏在百万星辰的基石上，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崭新的思想体系。

就这样，他恢复了从希腊、罗马时代就被歪曲的人类的真正形象，人类再一次成为真正的宇宙居民。

第二十二章　新的乐园

斯宾诺莎的书就像三角学教科书一样，死板无趣，不管是任何一个章节，很少有人能读懂三两句，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担心他的书能够畅销起来。

关于新思想的传播我们只能指望另外的人了。

在法国，一旦所有的权利掌握在国王手中，任何独立思考和考察研究都不可能有存在的空间。

德国所爆发的三十年战争给人们带来了无尽的贫困和恐慌，它迫使人们的创造力往后倒退了两百多个年头。

在公元16世纪后期，整个欧洲大陆在自由思想方面取得一定成就的国家就只有英国而已。因为在这个国家，王室和国会长期处于冷战状态，动荡的政治体系倒是给自由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生长空间。

现在，我们有必要来聊一个关于英格兰国王的话题。这些不幸的君主一边要对付恶魔一样的天主教，另一边要面对像大海一样宽广的清教徒运动，他们夹在两者之间已经有很多年了。

天主教臣民以及许多私下已经回到罗马圣公会教怀抱的教徒，心中向往的只是那个国王臣服于教皇的时代，他们整天吵闹着要过那个时代的幸福生活。

但清教徒们的一只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日内瓦。他们做着一个

英国无国王统治的美梦，憧憬着这个国家可以成为第二个依偎在瑞士山脉旮旯里的幸福快乐的小共和国。

不过，这并不包含所有。

统治英格兰的人同时也是苏格兰的国王，对于宗教问题，英格兰人头脑非常的清醒，他们对自己的需求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充分信任自己，对宗教自由一直持反对态度。因为他们觉得，同一块土地上如果既有新教徒又有其他教派，那么宗教自由就无法存在。他们不能容忍天主教徒和再洗礼教徒生活在不列颠的土地上，至于那些索奇尼主义者、阿明尼乌派、笛卡尔主义者以及所有对上帝有怀疑的人都应该被送上绞刑架。

可是，这个三角矛盾却产生了出人意料的后果。那个时候，各种教派相互仇视和敌对，那些想坚持中立的人不得不选择沉默，这样，宽容就被迫出现在他们当中了。

斯图亚特和克伦威尔用一生的时间想要保持各个宗教之间的平等权力，不过，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对长老会教徒和高教会教徒产生了感情，那些教徒们也并没有对他们表示过敬爱。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艰难险阻中站稳脚跟，能够取得一个好结果。我们从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里那个权力激增的教派里可以看出，英国的命运取决于国家中那些众多小教派的某个教派的势力，假如这个教派能够建立全国性的专制政权，那么这个国家就变了。

护国公克伦威尔已经达到了这种任意发挥的地步。不过，这个护国公是非常精明的，他非常清楚只有坚如磐石般的军队才能真正维护自己的地位。因此，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了所有反对派联合起来对付他的可能性，他也不下达任何招惹敌人的法令。但是，他的宽容仅此而已。

不过，我们却无法确保“无神论者”，即前面所说的索奇尼教徒、

阿明尼乌教徒、笛卡尔主义者和其他掌控人类权力的信徒们的性命。

可是对于英国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来说，面临大海的绝好优势可以为他们成功出逃荷兰提供极大的方便，只需要坐三十六个小时的船就到了。发源于荷兰城市印刷局的违禁文学作品流传至南欧和西欧各地，如果有人从北海穿越，其实是到出版商那里去拿稿酬，然后顺便了解一下那里正在流行一些什么样的新式违禁书籍。

像约翰·洛克这样的人会好好的把握这个机会，安静地思考、寻觅。这个与斯宾诺莎同年出生的人就像斯宾诺莎以及大多数独立的思想家一样拥有一个虔诚的信教家庭。巴鲁克的父母是真正的犹太人，而约翰的父母却是纯正的基督徒。

两个孩子在这样严格的不同教义下成长，要么是心灵受到扭曲，要么就是成为十足的叛逆者。他们都是不肯轻易低头屈服的人，于是决绝地踏上了离家之路，到外面的世界谋生去了。

二十岁的时候，来到牛津的洛克首次听到了笛卡尔的演说。不过，他在圣凯瑟琳大街上那个堆满尘土的书店里找到了更加与他趣味相投的书籍。托马斯·霍布斯的作品就是出自于那个书店。

曾经在马格达朗学院学习过的霍布斯非常的有趣，他可不是什么本分的人，他特意到意大利去，与伽利略长谈，还与著名的笛卡尔互通信件，为了躲避清教徒的愤怒，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欧洲度过。当然，有时间的话，他也会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写进一本厚厚的书里去，再配上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名字：《极权主义国家，或曰长老会联盟和国民联盟的物质、形式与权力》。

当洛克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这本包罗万象的书籍出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它将诸侯们的本性和权力以及责任赤裸裸地展现在人们面前，连彻底的克伦威尔派也对它钦佩不已。大多数克伦威尔门徒们都对他表示了宽恕，因为这个具备怀疑精神的保皇派人士用一本五磅多

重的书籍将保皇派的伪装面具彻底地撕去了。不过，我们却很难将霍布斯归于某个类别。那个时候的人们将他看作“不拘于教条的人”，这意味着他真正的兴趣所在是基督教伦理学，而不是基督教教义，他强调人们要充分享受自由，尤其是在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上。

洛克和霍布斯是同一类人。他的一生都在教会度过，可是，却真正向往生活和信仰的宽容。他和他的朋友们一致认为当一个国家挣脱了一个头戴金冠的暴君，却迎来了另一个滥用权力的头戴黑色帽子的暴君，这实在是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为什么总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今天将这一伙教士的忠诚推翻，第二天却同意另一伙暴力专制的教士们来统治。这其实是很符合道理的事情。可是，当“自由人”取得成功，使生硬的社会体系向伦理辩论的社会转变，有一些人就会饿肚子，所以说，他们不会支持这个观点。

洛克是个很有魄力的人，那些有权势的朋友可以给他很好的保护，使他免于遭受地方长官的怀疑，不过这种保护并没有维持多长的时间，最终他还是被套上了“无神论者”的头衔。

公元1683年秋天洛克来到了阿姆斯特丹。这个时候斯宾诺莎已经离开这个世界有五六年的时间了，可是荷兰首都还保持着浓厚的学术自由气氛，这给洛克提供了良好的学习和创作机会，并且没有官方的人来打扰他。这位勤奋可敬的人在异地用了四年时间成功的创作了举世闻名的《关于宽容的信》，因此，他成了我们这本小小的历史书的一个主角。根据反对派的意见，在他的第三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国家干预宗教事务是持反对态度的。在洛克看来（这源于另一个法国流亡者皮埃尔·拜耳，一个非常博学的人，那时他住在鹿特丹，正独自编撰百科全书），国家是一个巨大的保护组织，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安全而存在。洛克及他的信徒们对于这个组织所颁发的限制人们信仰的命令百思不得其解，觉得它完全没有权力阻碍人们自由信教。

公元17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奇特的宗教妥协时代，这是由于清教徒

运动的不彻底所造成的。

威斯特法利亚取得了和平的局面，那些宗教斗争暂时停止了。由此我们看到这样的启示：“所有的臣民都跟统治者信奉一样的宗教。”这样的话，就产生了这样的情况：今天这个公国的大公爵是路德教徒，那么全民就得信奉路德教，明天他改信天主教，那么又得全民信奉天主教。

洛克辩解道：“假如国家能够自由决定人们的灵魂归宿，那么将有一半的人要到地狱里面去，因为不可能有两种宗教都是正确的（根据宗教手册的第一条说法），在边界这边出生的人就注定要进入天堂，而另一边的则要下地狱了。这样的话，人们的灵魂是否能够得到救赎取决于他降生时的地理位置。”

在洛克的宽容计划里，天主教徒被排除在外了，这真是无比遗憾的事情，不过，这是能够理解的。公元17世纪的不列颠老百姓早已经把天主教当作一个政治团体来看待了，而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团体，他们认为这个政党一直在干扰着这个国家的安全，“无敌舰队”就是它的产物，这个友善国家的国会随时会毁灭在它弄来的那一些炸药里。

所以，洛克更信任殖民地的异教徒，他愿意将权力交给他们，而不是天主教徒，他厌恶这些天主教徒们在英国的土地上生活。不过这并不是由于他们不同的信仰，只是他们所从事的那些危险的政治活动。

我们必须倒退十六个世纪，才能再次听到这种观点。有一个罗马教皇曾经定下一条著名的原则：宗教是每个人和他的上帝之间的事，当上帝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时候，自然不会亏待自己的。

由于在不到六十年的时间里，英国人民看到了有四个政权的更替，因此，那些在常识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宽容理想所折射出来的道理，是英国人民最乐意接受的。

公元1688年，洛克跟随奥兰治的威廉横渡北海，英格兰王后也跟他们在同一条船上。从此以后，他成了人们心目中尊敬的作家，再也不是恐怖的异教徒了，他度过了平静和安定的一生，直到七十二岁才与世长辞。

内战固然恐怖，不过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对清洁空气还是有好处的。

公元17世纪，英国各界的政治纷争将这个国家剩余的精力消耗殆尽了。当其他的国家还在三位一体的厮杀中相互拼命的时候，英国的宗教迫害已经消停了。在此期间，可能会出现像丹尼尔·笛福这样狂妄的批评家对教会提出严厉的抨击，这种行为或许已经触犯了法律。但是，当我们看到《鲁宾逊漂流记》的作者被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千万不要以为他是因为业余神学家的身份而获罪，其实他是因为幽默家的身份而获罪的。一直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讽刺文学都持有怀疑之心。如果笛福写的是严谨的为宽容解释的书，就不会遭受灾难了。只是，他是用幽默诙谐的小本子来攻击教会的暴政的，这本书的名字是《持不同意见者的捷径》，这说明他是个粗野的人，跟监狱中的小偷一样。

不过，笛福是个很走运的人，因为他一直只是在不列颠群岛旅行而已。当专横被彻底驱逐出发源地的时候，大西洋对岸的殖民地终于找到了十分欢迎它们的立足之地。这是因为新世界里经济发展比起旧世界更有优势，而不是出于人们的性格。

在英格兰这个小岛屿国家里，居住着大量的人口，不过绝大多数人还是有地方居住的，人们必须继续坚持古老而可敬的“平等交换”原则，生意才会持续下去。相反，美国却是一个土地宽广的富有国家，并且只有很少的农夫和工人居住在那里，因此，这样的国家是不需要做出类似的妥协的。

所以，马萨诸塞海岸的小共产团体里产生了自以为防守坚固的正统宗教。从加尔文当上了瑞士西部的警察署长和最高审判长以后，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首次在天寒地冻的查理河建立居住地的是被称之为“朝圣神父”的一小群人。而通常意义上的朝圣者是指“为了表达自己忠诚的宗教感情而长途跋涉到圣地去旅行的人”，按照这一条，“五月花”号的旅客算不上真正的朝圣者，他们只是来自英国的瓦匠、裁缝、搓绳匠、铁匠和修车匠。他们鄙夷别人信奉的天主教义，离开英国是为了远离天主教义。

当他们渡过北海到达荷兰的时候，经济大萧条正在爆发当中。从我们的教科书中还了解到，他们为了避免被同化，阻止自己的孩子学习荷兰语。最后这些质朴的人没有丝毫感恩之情，全都去做了美国公民，这似乎很难让人相信。不过，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在贫民窟里打发时间，想要在人口密集的国家谋生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听到在美国种烟草的收入远远高于在莱顿梳羊毛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踏上了去弗吉尼亚的路。不幸的是，他们在路上遇到了逆风，马萨诸塞岸边蠢笨的水手坚定了他们留下来的决心，于是他们摒弃了那艘破烂不堪的船，停止了到海上冒险的行为。

不过，他们虽然没有遭遇到被海水淹死和晕船的危险，却依然没有真正地脱离危险。这些人大都生活在英国内陆的一些小城市里，不具备开创生活的能力。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在寒风中支离破碎，无休止的狂风吹灭了公民热情的火焰，妻儿们在饥饿的折磨下丧命。有幸熬过三个寒冬的是极少数善良温顺的人，他们身上带着故乡粗野纯朴的宽容。但是，最后他们完全淹没在随之而来的成千上万新殖民者中。后来的都是些严厉而且倔强的清教徒，他们将马萨诸塞建设成为查理河畔的日内瓦，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个世纪。

在这块巴掌大的地方上，清教徒在艰难的谋生之路上行走着，遇

到了许多的困难和阻碍，所以，他们迫切地想要从《旧约》中寻求所做和所想的依据，这种想法比任何时候都强烈。他们丢弃了体面的社会和书籍，自己想出了一套怪异的宗教精神。他们以摩西和纪登的后裔自居，用不了多久，西部印第安人就将他们视为马喀比。他们不能使自己从艰难困苦的生活中挣脱出来，他们坚定地相信自己为了心中的信仰才受那么多的苦难，并且得出结论说，其他的人全都错了。如果有人否定了清教徒的行为，则会因为意见有分歧而遭受到不仁道的对待，就算只是隐晦地说也不行，等待他们的将是残酷的毒打，然后被丢弃在荒郊野地，或者是接受割去耳朵和舌头的酷刑，此外，还要被驱逐出境。假如他们能够幸运地逃到邻居瑞典和荷兰殖民地里躲起来，就有可能逃过一劫。

宗教自由和宽容事业在这块殖民地上没有捞到丝毫好处，如果，它曾经做出过一些贡献，那也只是巧合而已，并不是它的本意，这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常见的。宗教专制采取的暴力行为激起了自由政策的加倍反击。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教士专制以后，形形色色的教士专制统治的明目张胆的敌人开始出现了，他们支持政教分离政策，十分反感前人们将政治和宗教结合在一起的做法。

这的确是一个异常缓慢地发展过程，在大不列颠和它的殖民地美国之间出现了敌对情绪之前才出现的这种危机，听起来似乎还是幸运的。最后的结果是，思想自由的人或者是旧式的加尔文主义的秘密敌人成为美国宪法的作者。他们将现代化的观念带到了这个文件中，这些观念和原则对于共和国的稳定和平有巨大的意义，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结果。

不过，有一次宽容领域里的发展发生在这之前，那是在新世界中发生的事，结果让人有些惊讶，不可思议的是它是发生在天主教区里，也就是现在的马里兰州的某个地方。

当然，这个有趣事件的主角是卡尔弗特父子，他们的祖籍在佛兰

芒，但是，后来父亲来到英国居住，为斯图亚特王朝卖命的工作。当乔治·卡尔弗特成为国王詹姆士一世的私人秘书和总管的时候，他对那个时候人们无休止的神学纷争感到无比厌烦，于是，他们摒弃了原先新教徒的身份，又重新拾起古老的信仰。老的信仰不管好坏或是中平，至少它分得清黑和白，不会让一些半文盲来判断那些教义。

乔治·卡尔弗特是个博学多才的人，皇帝却并没有因为他叛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而对他有所冷落。相反，还册封他为巴尔的摩的巴尔的摩男爵。他计划着为那些受到迫害的天主教徒建立一个小小的收容所，在此过程中，他得到了许多承诺帮忙的呼声。纽芬兰是他选择的第一个碰运气的地方，遗憾的是被他派去的居住者都被人驱赶出了家门，这个时候，他又向皇帝申请了弗吉尼亚几千平方英里的土地。可是，异常顽固的圣公会教徒弗吉尼亚人拒绝与这些危险分子为邻。接着，他再次向皇帝索要弗吉尼亚和荷兰、瑞典领地之间的一条荒地，不过，这次申请还没有得到批复，他就离开人世了。继续这个事业的是他的儿子塞西尔，公元1633至1634年冬天，乔治的兄弟伦纳德命令“方舟”号和“和平鸽”号两只小船横穿大西洋，到切萨皮克海湾去，这两只载满旅客的船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公元1634年3月了。这是个用法兰西国王亨利四世的女儿玛丽命名的新国家，叫作马里兰。建立一个欧洲国家联盟是亨利四世计划中的事，不过，有一个疯癫的僧侣却用一把匕首将这个计划终结了，英国国王娶了玛丽，没过多久国王就死在了清教徒手中。

这是个非同一般的移民区，它不排挤印第安人并且平等地对待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就这样度过了一些艰难的岁月。这是因为，许多的圣公会教徒充斥在这个移民区里，这些人在马萨诸塞清教徒的专横逼迫下，逃到了这里。后来，为了躲避弗吉尼亚圣公会教徒专横的清教徒也踏进了这块土地。这两群气焰嚣张的亡命徒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的“正确信仰”强行注入这块刚刚占领的栖息之地。

因为马里兰禁止了“所有可能引起宗教狂热的纷争”，旧的移民者

有足够的能力制服圣公会教徒和清教徒，让他们保持安静。可是，保皇党和圆颅党的战争刚刚在故乡爆发了，马里兰人对自由极其看重，任何一方取得胜利，他们都将失去这种自由。所以，公元1649年4月，当查理一世被判极刑的消息一传开，塞西尔·卡尔弗特就直接发起倡议，顺利通过了举世闻名的《宽容法》。这里面有一段优秀的文字：

“因为宗教对思想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一定范围内常常产生有害的后果，为了保持本省政权的安定，为了促使居民之间团结友爱，特决定，不允许任何人以宗教或宗教信仰为借口，对本省信仰耶稣基督的教民进行干涉、骚扰和迫害。”

巴尔的摩家族的卓越政治才能和非凡的勇气因这部方案的颁布而体现无疑，尤其是这是发生在一个耶稣会会士掌权的国家。这种宽容精神将我们的对手都感染了。后来，有一群出逃的清教徒将马里兰的政权推翻了，《宽容法》被废除了，代替它的是他们的《关于宗教的法案》，它将自由的权力赋予了天主教徒和圣公会教徒以外的基督教徒。

值得庆幸的是，这只是个很短暂的时期。公元1660年，斯图亚特派重新掌权了政权，马里兰的大印再次回到了巴尔的摩派手中。

他们的政权再一次遭到了来自另一方的打击。圣公会教徒取得了这个国家最后的胜利，他们急于为自己的教会戴上所有移民区官方宗教的王冠。卡尔弗特家族一直没有放弃努力，显然他们已经没有能力把新的移民者笼络到自己的帐下了，一整代人共同参与的试验，在此告一段落。

胜利属于新教徒。

连同专横。

第二十三章　太阳国王

在人们眼里，公元18世纪是一个专制的时代。在如今这个民主自由的年代里，无论有多开明的专制，也达不到人们理想政权的标准。

那些总是为人们说好话的历史学家，也会对路易十四国王提出指责，至于结论，就留给我们自己去总结。他是一位充满智慧的皇帝，当他坐上帝王宝座时，天主教和基督教是这个国家旗鼓相当的两大教派。在一个多世纪里，他们相互仇视和血拼，最后，天主教占到了很大的便宜，和平局面终于来临了，两个教派相互协定，虽然双方是敌人，但是都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彼此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邻居，应该相互接受对方存在的事实。这个和解条款被写进了公元1598年发布的“不可改变的”《南特赦令》里，它承认了天主教国教的身份，规定基督教徒享有宗教自由的权利，不会发生打击不同信仰的迫害行为，他们具有建造自己教堂的权利和进入仕途的权利。为了表示诚意，他们将法国境内二百个要塞城市交给基督徒掌管。

事实上，这些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胡格诺派教徒并不是天使，怎么可能会将二百多座繁华的城市交到一个跟政府敌对的党派手中呢？这简直太荒谬了，就好像我们把芝加哥、旧金山和费城交给民主党人以换取他们接受共和党人的统治一样。

作为一个聪明的统治者，黎塞留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因此，这个大主教用了很长的时间将政治权力从基督徒手中夺走了，留给他们的是充分的宗教自由权利。胡格诺派教徒不再需要与国家的敌人进行单独谈判了，除此之外，他们从前的那些自由听教、唱赞美诗的权利依

然得到了保留。

紧接着，马扎林掌握了法国的统治大权，他继承了前任的政策制度，不过这个短命的皇帝在公元1661年就离开了人世。接替他的是年轻的路易十四，这标志着善心世界的终结。

这位睿智的国王一直活在人们的争议之中。非常遗憾，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正直的人结交，就被一个叫作佛兰西斯卡·多碧娜的女人抓在手中，这个对宗教异常狂热的女人是御用文人斯克朗的遗孀。她的职务是宫廷里路易十四和蒙特斯丹的七个私生子的家庭教师，她的道路由此开始变得宽敞。当那位夫人的春药再没有任何效果，国王开始显露出厌恶的表情的时候，家庭教师便乘虚而入，替代了那位夫人。她住进国王的寝宫时，巴黎大主教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结婚仪式，这是她与国王之前所有情人的唯一区别。

此后二十年，这个女人牢牢地抓住了王位上的权力，而对她的忏悔神父言听计从。由于黎塞留和马扎林主张与基督教和解，因此，法国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对他们一直持有仇视的态度，从来没有宽恕过他们。现在，摧毁那些能干的政治家的劳动成果的机会来临了，作为王后的官方顾问，以及国王的银行家，他们决定放手一搏，大干一场。

又一个怪异的故事。

修道院用八个世纪的时间累积了不计其数的财富，国库的开支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了，他们仍然拒绝缴纳税款，将丰厚的财产掌握在自己手中。荣誉远远胜于信誉的国王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时机来充盈自己的国库。于是，为了换取丰厚的回报，他给了教士们一些好处，果然，教会慷慨地借钱给他，并且他想借多少就借多少。

由此，原本“无法改变”的《南特赦令》被一点点地改变了。基督徒被彻底地禁止了，胡格诺派的追随者们不断地被打扰。当听说有些省份错误教义非常顽固，龙骑兵的大队人马立刻就会赶到那里，他们

强行住进百姓的家中，任意发号命令，人们对他们异常反感。这些人就像到了被征服的国家一样，整天吃喝玩乐，还做起偷盗的勾当，甚至欺辱良家妇女，真是坏事做尽。他们的行为让主人们失望透顶，他们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想寻求法庭的保护，结果只是换回来一顿嘲笑而已。法庭说那是他们自找的，让他们自己解决这件事，并且应该迎合新政府的口味。

有极少一部分人接受了告诫，来到附近的乡村，让神父为他们举行天主教洗礼仪式。绝大多数人依然保留了原来的信仰。当看到教堂一座座的关门大吉，神父们在十字架上丢了性命的时候，他们终于醒悟：命中注定，他们要遭遇劫难。

屈服不是他们选择的路，于是便决定逃走，他们走到边境才发现为时已晚，边境已经被彻底封锁了，谁也逃不出去，抓到就会被送上绞刑架，连那些暗中提供帮助的人也是一样的下场。

那个时候，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后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是什么事。

事实在，从法老那个时代开始，每个政府都会时不时地“关闭边界”，不过都是以失败告终。

只要是下定决心要走，无论怎样困难都会寻求到出路的。无数的法国基督徒踏上了“隐秘通道”，成功到达伦敦、阿姆斯特丹、柏林和巴塞尔。这些穷苦的逃亡者一向以诚信和能干闻名于世，他们有着商人和艺术家的身份，有良好的信誉，并且充满活力，过了短短几年，他们就开始发迹了。可是，他们的故乡法国却遭受了无法估量的经济损失。

我们完全可以把法国大革命的前奏说成是《南特赦令》的废止。

在一直以来都非常富裕的法国，商业和宗教却一直势不两立。

当法国的政权被一个女人和神父操控的时候，一切都已成定局。

如果说《南特赦令》的取缔是法国大革命的前奏，并不算夸张。就是写下驱逐胡格诺教徒法令的那支笔签署了路易十四的死刑判决书。

第二十四章　腓特烈大帝

平民百姓们推崇的执政形式并不受霍亨索伦王族的喜欢，可喜的是这个家族的人非常的聪明能干，并且对收藏书籍和救济穷苦的人民有着特殊的爱好。在宽容事业里，他们的确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直到他们被巴伐利亚维特巴赫人的气质所侵蚀之前，都是这样的。

事实上，这是必需的，这个王族所掌控的地方是欧洲最为贫穷的地方，到处被贫瘠的沙地和突兀的森林所覆盖，有人烟的地方仅仅只占到一半左右。那里的人们经受了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原本幸福的家庭早已经七零八散了，他们迫切需要补充人口，并且需要大量的资金，他们努力地开拓进取，周旋于各个种族、各种信仰的人群当中，不管那些人以前是何等卑微，只要能够提供他们想要的东西，能够对他们重建家园有帮助，他们都在所不惜。

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粗鲁而且俗气，行为和言谈跟地道的煤炭工人一样，低俗地跟酒吧女招待趣味相投。但是在会见外国流民代表团的时候，他能够表现的礼貌周到。对于数字的概念，他一向坚持“越多越好”的原则。国家所摒弃的东西一律被他仔细地拾捡回来，这种行为就像收集六点三英尺高的掷弹兵来保护自己一样。

不过，这位父亲的儿子却是个非常有素养的人，并且不是普通人。他违背父亲的意愿学习了拉丁文和法语。他爱看蒙田的散文，也欣赏爱比克泰德的睿智，不过，路德的诗歌和那些主教的愚蠢却让他无法忍受。根据《旧约》的指示，父亲对孩子异常的严苛，最好的例子就是，孩子的好朋友成为他学习服从的牺牲品，这就是这位严厉的

父亲干出来的好事。但是这些努力却没有将儿子引向正派的犹太思想。这种思想是那个时候的路德派和加尔文派牧师们极其称道的。对于腓特烈来说，所有的宗教都跟史前时代一样的愚昧和恐怖。人们信仰宗教就等于被一小部分头脑精明却龌龊可耻的人所控制，这些无耻的人把自己的优越性运用自如，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对他人利益的侵害之上。腓特烈最大的兴趣在于基督教教义，尤其是对基督。不过，在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受到了洛克和索奇尼的观点的影响，因此，在宗教问题上，他应该算是一个有宽容心的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所在的那个国家“每个人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得到救赎”，这种说法毫不夸张。

这个充满智慧的结论，奠定了他在宽容道路上行走的坚实基础。比如，我们可以从他颁布的一条谕旨里看到这样的描述：宗教的好坏由传播者的人品来决定。所以，所有的宗教思想都是平等的，有平等的权利，政府无权对其进行干预，顶多只能维持一下各种教派之间的和平就足够了，就像履行警察的职责一样。对于这一点，他深信不疑，臣民们只要老实本分，绝对忠诚就可以了。他坚持只有上帝才能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作最后的判断，“人们的良知只有上帝最清楚”，所以，为了避免人们怀疑他以上帝的意志为借口来推行暴力，他是绝对不会对上帝的意志作任何评论的。

腓特烈的思想境界已经提升到两个世纪以前了。那个时候的人们非常惊讶国王会赐给他们一块地，并且这块位于首都中心位置的地是给他们建造教堂用的。很多信奉天主教的国家将那些耶稣会的人驱逐出境，可是他却为他们提供了保护伞，恶毒的流言又开始到处飞蹿了。他认为宗教和道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人们的职责是缴税和服兵役，只要这样，就可以随意信教了，当他将这个想法宣布出去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会把他看成一个基督徒。

那个时候，他们刚巧住在普鲁士，评论家们闭起了一贯聒噪的嘴巴，因为国王可不是什么好糊弄的人，他对那些警句了若指掌，他只

需稍微地修改一下国法，就可以让那些他厌恶的人事业不顺。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他执政的三十年间，他以一个真正开明君主的身份第一次使宗教自由在欧洲大陆上站立。

新教徒、天主教、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不可知论者首次在欧洲偏僻的地方找到了平等和自由，他们充分地享受到了平等的权利和待遇。不管是身着红衣服的人还是身着绿衣服的人都不能向对方称霸。在罗马尼亚寻求精神抚慰的人和周旋于坏人和罗马主教之间的人必须和睦相处。

腓特烈对于他努力取得的这些成果是不是满意呢？我看未必！在他弥留之际，他让人唤来他忠诚的狗。生命的最后一刻，只有狗才是最后的伙伴，这样看来“所谓的人类”甚至不及狗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作为第一个莽撞的闯入这个世纪的马可·奥勒留，如同他的前辈们那样，他的继承者们从他那里得到了伟大而丰厚的遗产。

第二十五章　伏尔泰

在当代世界里，新闻广告人员常常会引起人们的非议，许多善良的人对“公开报道”都持不赞同的态度，认为那是魔鬼的发明，它以这种新式中略显笨拙的方法来吸引人们对某个人或事物的关注。但是，新闻广告人员对这种责骂声已经习以为常了。至于“宣传报道”，人们以为它是刚刚才被创造出来的。对以前的那些事物，如果我们能够摒弃偏见，客观公正地去看待它们，就会惊奇地发现真相与事实是截然相反的。

《旧约》中的预言家们，不分长幼，一律是糊弄百姓的高手，他们掌握着精湛的技巧，知道如何吸引百姓的目光。用新闻界的行话说，希腊和罗马的历史是一段漫长的、延绵不绝的“宣传噱头”。有些宣传是高雅的。不过，绝大部分都是些五花八门、粗俗不堪的东西，恐怕连现在的百老汇也不会愿意刊登出去。

精心策划的广告所体现出来的巨大价值，连路德和加尔文这样的改革家们都非常清楚。他们不可能像菊花那样，只喜欢默默无闻地躲在一边。他们充满了激情并且一直努力着。他们要把自己的理论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所以，只有设法去吸引一大批追随者，他们才能获得成功。

有一个叫作托马斯·肯皮斯的人在一个修道院里与世无争的生活了八十年之久，此种极具新闻价值的长期自我放逐事迹如果被及时挖掘，则会在道德领域里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这种素材的新闻能够很好地吸引人们去阅读它，从而了解到作者的思想和呼声。但是，方济

亚西西或者罗耀拉却只能通过现在的马戏团或电影明星才能了解他们这一辈子所取得的成果。

谦卑是基督教必须遵守的要义，那些有着谦卑品质的人可以得到基督教毫不吝啬的称道。而现在的人们之所以能够谈论这些称赞行为，是因为当时运用了有效的宣传手段。

难怪那些被称为基督教大敌的男女们，会效仿《圣经》的某一个故事的怪异宣传方法来奋力抵抗西方世界的精神专制。

我之所以把这个微不足道的事拿出来讲，是因为伟大的作家伏尔泰先生精通宣传之道，他非常了解吸引公众目光的方法，正因为如此，他也经常遭到人们的谩骂。可能，公众并不乐意接受他采取的宣传手段，可是，被他救赎过的人是不会这样对待他的。

确切地说，只有亲自品尝过布丁，才能达到检验的效果，尤其像伏尔泰这样的人，我们应该从他为人类所作的贡献来中来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而不是看他所喜欢的衣服、玩笑或壁纸。

这个奇怪的人有一天忽然头脑发热，便踌躇满志地说：“我没有权力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有一支笔就足够了。”

他说对了。他的笔不仅是一支，而是无数支。他简直成了鹅的敌人，即使二十多个普通作家也不可能比他一个人用的鹅毛笔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位伟大的文学巨匠，他独自承受孤独，在逆境中写出的文章，比一个作家协会所有的作家写的总数还要多。

肮脏的乡村旅馆里可以看到他埋头书写的身影。一卷又一卷的六步格诗从闪着寒光的破败村舍里飞了出来。他寄宿的格林威治的屋子里，七零八落的纸稿散落了一地。普鲁士皇家公寓漂亮的地毯上有他飞溅而出的墨水痕迹。此外，他还使用了许多印有巴士底狱监狱长名字的私人信笺。那时，他还在玩滚铁环，玩玻璃球，他收到尼农·德·

伦克洛斯慷慨赠予他的大笔零用钱，这些钱是给他“买一些书”用的。八十年后，还是在巴黎，我们听说他买了大量的纸张和很多的咖啡，他要在死亡带走他以前完成最后一部作品。

然而，他撰写的那些悲剧、小故事、诗歌、哲学以及物理论文，都不值得我们用这本书的一个章节去评论他。与他同一个时代的诗人中，至少有十几个能够写出比他更好的十四行诗。将他放到历史学家的范畴，那他的资料就显得单调得多，并且很让人怀疑，尤其是他在科学领域的探险，跟我们在星期日的报纸上看到的那种水平差不多。

但是，他作为一个跟愚蠢、狭隘、固执和残忍抗战一生的人，他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公元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

伏尔泰生活在一个极端的时代，一方面，这个时代的宗教制度、社会制度抑或是经济制度都是极度自私的，另一方面，有一大批狂热的极端分子希望通过自己的美好愿望来建立一个他们理想的和平世界，但完全没有实际基础。这个脸色惨白，体弱多病的小公证员的孩子，被命运开玩笑般的推到了鲨鱼和蝌蚪之间，他只有两种选择，游出来或者淹死。他不想死，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他只能奋力游上来。他用了很多下三烂的手段与逆境抗争，乞求、谄媚，像个小丑一样。这是在他没有成为文学巨人之前，没有稿费时所做的事情。有没有一位作家不是出于谋生而开始写作的呢？如果有，那么他完全有权利拿起一块石头砸向伏尔泰。

可是，即便是多几块石头砸向伏尔泰，他也不会烦恼的。他将自己漫长且忙碌的一生都花在了与愚昧的斗争当中。他所经历过的艰难险阻实在是太多了，对他来说，被当众殴打，被扔香蕉皮都是些不足挂齿的小事而已。他是一个永不屈服的乐观主义者。他的境遇始终是在变化的，譬如今天还在坐牢，明天就有可能回到曾经驱逐他的那个宫廷里去做大官。他一生都戴着那些恶俗的乡村牧师扣给他的那顶“基督教叛徒”的帽子，不过，在塞满了情书的书柜的某个角落里，

还放着教皇赠送给他的一枚漂亮的勋章。这些说明，他既会遭到教会的反对，同样他也受到过教会的称赞。

这不是什么值得好奇的事。

他喜欢尽情享受生活，希望自己的每一天、每一年都是多姿多彩的。

伏尔泰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的父亲，姑且称为开私立信托公司的人（我们无法给他一个贴切的名称）。他是许多富豪贵族的心腹杂役，为他们管理法律和财政事务，因此，青年阿鲁埃（这是伏尔泰的姓）经常能够与那些比自己家境好的人打交道。这一点成为他后来比其他文学竞争者有优势的地方。他的母亲是一位叫作德·奥马尔德的夫人。这个贫穷的姑娘嫁过来的时候没给丈夫带来一分钱的嫁妆。但是，她的姓前有一个小小的“德”字，这足以令所有法国中产阶级（一般说来，所有的欧洲人，特别是为数不少的美国人也是如此）都钦佩不已。她的丈夫觉得有这个荣耀就足够了。当然，伏尔泰也一直沾沾自喜于自己的贵族家族头衔，因此，他一开始写作，就把自己的名字弗朗西斯卡·马利·阿鲁埃改为更具有贵族特色的弗朗西斯卡·马利·德·伏尔泰。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获得什么灵感而让他如此更改他的姓氏。他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姐姐是他最喜欢的人，母亲去世后，一直是姐姐照顾他。他哥哥是一位忠实的詹森教派牧师，具有热情和正直的品质，但是伏尔泰却非常讨厌他，这也是他不喜欢用父姓的一个主要原因。

他的父亲阿鲁埃并不愚笨，很快他就发现小儿子是一个逆子。所以，他把小儿子送到耶稣会，让他学习拉丁文六步格诗和斯巴达的纪律。虔诚的神父们费尽心思地教导他，这个两腿细长的学生每天被神父们要求进行各种语言的基础训练。后来，这个不同凡响的孩子身上的特点暴露无遗，神父们对他的“古怪”秉性束手无策了。

在小弗朗西斯卡十七岁的时候，他离开了耶稣会，教士们终于松了口气。此后，弗朗西斯卡开始学习法律，这么做是为了讨父亲的欢心。可是一个人不可能用一整天的时间来读书，毕竟还有漫长的夜晚要打发，所以，弗朗西斯卡开始写一些诙谐的小故事，寄给地方小报发表，或者是在附近的咖啡店里将他的最新文章拿出来给朋友们分享。在两个世纪以前，过这种生活的人有下地狱的危险，关于这一点，父亲已经意识到了。他疏通一个颇有权势的朋友，为弗朗西斯卡在海牙的法国使馆里求得一个秘书职位。当时荷兰的首都就跟现在一样单调乏味，因为无所事事，伏尔泰就开始和一个长相普通的女孩谈恋爱了。这位女孩的母亲是一个记者，一个恐怖的女人。这个女人希望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个更有前途的人，于是，她赶忙跑到法国使馆里，找到法国大使，请求他在这件丑闻还没有让全城市的人都知道的情况下，赶快把这个危险的罗密欧送走。为了避免麻烦，大使立刻将这个秘书送上了一辆去巴黎的公共马车，于是，弗朗西斯卡失业了，再次回到了父亲的管教中。

情急之下，阿鲁埃想到了一个办法，这是一种法庭里有朋友的法国人常常使用的办法。他设法弄来一封“有国王封印”的信，他把这封信放到儿子面前，给他两条路选择，或者去监狱，或者写一封申请信，去学习法律。最后，伏尔泰选择后者，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会勤奋努力的学习。他果然信守诺言，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小册子的创作中，整个小镇都在热烈地讨论这件事情。父亲彻底地愤怒了，为了阻止他，决定将他从塞纳河这个喧闹的场所送走，于是，他被送到父亲在乡下的一位朋友家里，并且在那里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伏尔泰的第一个剧本就是在百无聊赖的乡下创作出来的，他在那个地方扎扎实实地学习了文学。呼吸了十二个月乡村的清新空气之后，他得到允许，又回到了繁华的都市。他马上补偿损失的时间，写了很多讽刺摄政王的文章。虽然这是那个匹夫应得的，但是，肆无忌惮的公开宣传惹恼了他，伏尔泰也因此得到了被第二次流放的下场。

后来，他又被送到巴士底狱，在那个地方待了一段时间。不过当时的监狱环境，对像伏尔泰这样在社会上很有名望的年轻绅士来说，还算可以。囚犯除了不能随意出入房间外，可以自由做任何事，伏尔泰要的就是这个。在巴黎市中心，一个小牢房，他迎来了自己的创作机会。当他被释放的时候好几个剧本已经成功出炉，其中一个因连续上演了四十五个晚上而打破了公元18世纪的一切纪录。

这些剧本让他名利双收，既赚到了钱（正是他非常需要的），也获得了才子的称谓。不过，对于一个还得为前途奋斗的年轻人来说这可能是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从此以后，不管是发生在林荫大道上或是咖啡馆里的玩笑都算到了他的头上。因为这些，他选择了到英国学习自由主义政治艺术。

公元1725年，伏尔泰拿古老而又无用的罗汉家族（也许不是他说的）寻开心，讲了几句小幽默，罗汉家族的爵士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哪肯罢休，一定要对此给予回应。当然，一个古代统治者的后代是不会直接和一个公证员的儿子举行决斗的，于是，侍从们理所应当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就在一天晚上，当伏尔泰正与父亲的一个主顾苏里公爵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门外有人找他。当他到了门口，就被罗汉爵士的侍从们狠狠地教训了一顿。到了第二天，这件事就在镇子里传遍了。伏尔泰的样子活像漫画上丑陋的小猴子。他鼻青眼肿，头上缠满了绷带，成了几家滑稽报社以及人们评论的话题。伏尔泰觉得，必须要做一些事情来挽回他的面子，于是，趁着肚子里的生牛排给他的力量，伏尔泰就向罗汉爵士下了挑战书，然后为了这场生死决斗而开始了紧张的剑术训练。

谁知道等到决战的那天早晨，伏尔泰竟然再次被送进了监狱。无耻的罗汉爵士让警察来解决了这场决斗，于是伏尔泰就被拘留起来，直到有人给他一张去英国的车票才被释放。方向是西北，并且他被警

告说，王国的宪兵没有对他发出邀请，他就不能回到法国。

伏尔泰在伦敦和伦敦附近度过了四年的时间。虽然大不列颠王国离真正的天堂还相差甚远，但和法国相比，就可以称之为天国了。

这块土地因为皇家断头台而心有余悸。公元1649年1月30日，是所有身居高位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发生在国王查理身上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忽视法律的人身上。至于这个国家的宗教，当然是国教要享受某种权利和优惠的待遇，尽管如此，愿意信仰别的宗教的人也能平安无事，与法国相比，国教的神职人员对国家事务的直接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明目张胆的无神论者和一些喜欢闹事的法国教徒，偶尔会有进监狱的危险，不过，比起生活在路易十五统治下的臣民来说，英国的生活可以说是完美了。

在公元1729年，伏尔泰回到法国，他已经得到了在巴黎生活的特权，但是，他很少回巴黎。他像一只受惊的动物，朋友们手中的食物虽然很诱惑他，但是他丝毫禁不起任何的风吹草动，任何声响都会吓跑他。他忘我的工作，时间和事实都一概忽略了，他自己选定题目，从利马和秘鲁讲到俄国和莫斯科，写了一系列知识丰富、通俗易懂的历史剧、悲剧和喜剧。到四十岁时，他已经是一位极负盛名的文学家了。

伏尔泰接触到完全不同的文明是因为发生了另外一件事。

在遥远的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土里土气的院子里被一帮土包子簇拥着，他呵欠连天，无聊透顶，苦于找不到给他作乐的人。他非常仰慕伏尔泰，能够邀请伏尔泰光临柏林，是他一直以来的心愿。但是，对于公元1750年的法国人来说，这就相当于被迁到荒无人烟的弗吉尼亚，伏尔泰勉强接受邀请也是看在腓特烈大帝不断加大的筹码的份上。

他到达柏林的时候，战争爆发了。无论是普鲁士国王还是法国剧

作家，都是无药可救的个人主义者，指望他们在同一个屋顶下和睦相处简直是天方夜谭。两年的分歧之争终于爆发了一场微不足道的争吵，此后，伏尔泰又被赶回了他自认为“文明”的地方。

不过伏尔泰得到了一个有益的教训。或许他没什么错，虽然普鲁士国王写不出像样的法国诗歌，但是这个国王大力支持宗教自由的态度是非常值得称道的，关于这一点，欧洲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

六十岁左右的时候，伏尔泰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法国的法庭是靠严酷的判决来维护其秩序的，不允许有什么严厉的反抗词句。上帝在创世纪的第六天赋予了他的最崇高的产品以神圣的智慧，可是人类对这闪光的智慧却视而不见，这使伏尔泰耿耿于怀，并且一生都非常的苦恼。人类五花八门的愚昧无知让他愤慨不已。所以，那些“无耻的人”成了他泄恨的对象，他像个十足的古罗马政治家，不停地发出要毁灭它的警告之声。这个“邪恶的敌人”指的就是人类的愚昧无知。这些人只要求得到基本的吃喝就满足了，他们一点也不会关心思考的事情。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伏尔泰就感到有一架死气沉沉的巨型机器压在他头上，这机器一头连接着残忍血腥，一头连接着固执偏激。年老时，他梦想着与这个机器抗争，并能够将它彻底消灭掉。在这件事情上伏尔泰的确应该感谢法国政府给予的巨大“帮助”，感谢他们制造的一大堆丑闻给了他坚决斗争的良机。

第一个案件发生在公元1761年。

在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城有一位叫让·卡拉斯的新教徒，他是个店主。图卢兹一直是个虔诚的城市，那里的新教徒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什么公职、医生、律师、书商、助产士等等都没有新教徒的份，甚至天主教徒的家里也不准任用新教徒做佣人。杀戮新教徒的圣巴塞格梅

大惨案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每年的8月23日和24日两天，他们都要举行盛大的仪式来纪念和赞美它。

即使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让·卡拉斯跟左邻右舍和睦相处了几十年。他的一个儿子改信了天主教，这对他而言无所谓，他完全允许孩子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宗教，但让他头痛的是他的大儿子马克·安东尼。安东尼是一个虔诚的加尔文主义者，但他却偏偏想做一名律师，这在图卢兹城是绝对不允许的，他因此患上了忧郁症。他的举止开始有点不正常了，他给父母背诵哈姆雷特的著名独白，他独自长时间地散步，他给朋友们讲述自杀的好处。最终，一段时间后的一个晚上，安东尼乘着家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拿了根绳子在门柱上悬梁自尽了。几个小时以后他的父亲发现了他，他的罩衣和衬衣都叠得整整齐齐放在鞋子的上面。

那时自杀的人要遭受惨无人道的“礼遇”：脱光了衣服，脸朝下，被拖着尸体穿城而过，然后绑在城门外的绞刑架上让鸟啄食完。家里人顿时惊呆了，这是他们绝对不能接受的。还没等他们讨论好应该做什么和准备做什么的时候，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一个邻居报了警，丑闻迅速传开了。整条街道上都挤满了大声疾呼要求处死老卡拉斯的愤怒的人群，因为他们认定老卡拉斯为了不让儿子成为天主教徒就把他给杀了，事实肯定是这样的。

无聊就像一个黑色的送葬棺材，沉重地压在公元18世纪法国乡里人的身上，听到这个消息，人们终于可以长长地如释重负地舒一口气了，人群激动起来了。

面对此种嫌疑犯，高级官员体现出了他们娴熟的职业技能：立即逮捕卡拉斯全家、客人、佣人及最近去过或接近过卡拉斯家的人，送到镇公所，戴上手铐和脚镣，关进专门关押那些十恶不赦的敌人的地牢里，等到第二天进行审查。审查的时候他们众口一词，说那天晚上安东尼怎么样不露声色地进了家门，怎么样悄然离开了房间，大家都

以为他像往常一样一个人去散步了，将实情和盘托出。但是糟糕的是图卢兹城的教士们也参与到了这件事当中，接着可怕的消息传开了，像那晚骚动的人群中流传的一样：儿子要转回到真正的信仰，这是作为新教徒的卡拉斯完全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冷酷无情地杀害了他。

儿子马克·安东尼二十八岁，可谓身强力壮，父亲让·卡拉斯已经六十三岁了，如果说父亲不经过任何搏斗就轻而易举地把儿子挂到门柱上吊死，连三岁小孩都不会相信。况且按照一般侦破方法，法官一定要结合对谋杀现场的调查结果进行审判，但是镇议会议员们已经来不及去想这些无聊的事情了，他们正忙着给马克·安东尼这位伟大的“殉教者”收拾尸体呢。他们将已逝的加尔文主义者视为自己的战友，采取了通常只有主教或者当地最有钱的资助者才能享受到的仪式，把他的尸体涂上了防腐药料，送到大教堂里停放三个星期后，按照最隆重的仪式埋葬了。

安东尼的尸体在教堂里停放的那三个星期里，城里每个布道坛再三敦促虔诚的人们尽力搜集反对让·卡拉斯和他们家的证据。审判在安东尼自杀五个月之后开始了。虽然当时一个法官突然脑瓜开窍，说是需要到卡拉斯的家里现地勘察一下他所描述的他儿子那种自杀的可能性，但是很快他就被以十二票对一票的绝对劣势封住嘴巴了。

最终，卡拉斯被判施以酷刑：车裂。

车裂前法官用尽了方法让他承认自己的罪行，可他却依然誓死不屈。于是，法官们先是将他在刑讯室内吊起来，使劲拉拽他的四肢直至脱臼（我是从官方文件上抄下来的）；然后往他体内使劲灌水，看着他的身体魔术般地增大了一倍，法官们都在乐呵；接着他们又让刽子手将他的胳膊和腿都撕开后，用蔑视的眼光看着躺在铁砧上的卡拉斯，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们开始了喋喋不休而又绵延不绝的审问，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承认。这下本来就已经火冒三丈的首席执行法官彻底无奈了，只好命令将他碾死。

卡拉斯的死平息了人们的愤怒，他的家人也因此被免死。他的妻子被没收了所有的财产，在忠心耿耿的佣人陪伴下过着忍饥挨饿的隐居生活。除了最小的孩子在安东尼自杀的时候因为在尼姆读书而明智地逃到了日内瓦外，其他孩子都被送到了不同的修道院。

这个案子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居住在凡尔内的城堡里的伏尔泰。因为伏尔泰一直与日内瓦的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们不和，而且这些牧师们还认为矗立在他们自己城里的那个小小的私人戏院是恶魔的建筑，是对他们明目张胆的挑衅。所以在伏尔泰听到这个案子后，并没有想着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并写道，这个新教殉难者不能激起他的任何热情，因为他认为胡格诺教徒固执死板，对他的戏剧没有任何兴趣，这比起不好的天主教而言就更差劲了。在他和大多数人看来，要说那十二个受人尊敬的法官无缘无故地把一个无辜的人判处死刑这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作为凡尔内的圣人，伏尔泰很好客，几天后一个在审判期间正好在图卢兹的马赛商人给他说了整个案情的真相。他开始明白了图卢兹法官犯下的罪行的可怕之处，他准备对这个案件刨根问底。当最高权威和整个社会都说对的时候，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发出洪亮的声音说“不”，这才是最大的勇气，伏尔泰的勇气！伏尔泰清醒地知道挑战图卢兹法庭的判决结果意味着什么，暴风雨即将到来！

伏尔泰忙碌起来了，他像一个职业律师那样，开始精心准备自己的诉讼。他向卡拉斯家逃到日内瓦的孩子询问了相关情况，向每个可能知情的人写信搜集相关信息。为了避免自己由于满腔怒火和义愤而影响诉讼书，他还雇了辩护人来检查和修改他的结论。等他成竹在胸后，这场战斗就开始了。

第一步，伏尔泰鼓动每一个在法国有影响的人给国务大臣写信，要求重审卡拉斯案件。第二步，他找到了卡拉斯的妻子，并把她带到了巴黎，雇用了当时最有名的律师照看她。此时的卡拉斯夫人精神已

经彻底崩溃了，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在她临死之前能够将她的女儿们从修道院里领出来。第三步，伏尔泰帮助卡拉斯的信奉天主教的儿子逃出了学校，让他来日内瓦找他。第四步，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关于卡拉斯家庭的最原始材料》的小册子，里面囊括了整个案件的所有事情，而且均由悲剧的幸存者们的书信组成，一点也没有提及伏尔泰他自己。

即使在这个案件的重审过程中，伏尔泰还是谨慎地躲在幕后，但他还是非常成功地策划了这场宣传战。不久这个案件就成了欧洲每个国家、每个家庭关心的事情，各地的人们纷纷踊跃捐款，这其中包括英格兰国王和俄国的沙皇。就这样伏尔泰取得了胜利，打赢了他一生当中最艰辛的一场仗。

当时法国的国王是臭名昭著的路易十五，幸好他的情妇因对他及耶稣会所做的一切都嗤之以鼻而站在了伏尔泰一边。民众对于一个死了的无足轻重的新教徒而议论纷纷，这使得国王颇为恼怒。但是只要国王对这一案件不签署新的判决，大臣们就不敢采取行动，大臣们不采取行动，那图卢兹法庭就会风雨不动。图卢兹地方法官自视清高，采用强制措施不让伏尔泰和他的律师们接触到案件的原始资料。

伏尔泰在这艰难的九个月时间里，持之以恒地做着鼓动工作，并最终使得大法官在公元1765年3月要求图卢兹法庭提交关于卡拉斯案件的所有记录，并提议进行新的判决。在这项决定公布之后，卡拉斯的妻子及终于回到她身边的两个女儿都来到了凡尔赛。一年后，负责审理这一上诉案件的特别法庭宣布卡拉斯是因误判而处死的，同时经过人们的不懈努力，国王同意给卡拉斯的妻子和孩子一笔补偿费，审理卡拉斯案件的地方官员也因此被解职。此事委婉地向法国暗示，图卢兹人民不允许卡拉斯的事件再次发生。

虽然法国政府对此事希望息事宁人而采取了温和的态度，但还是在法国民众里激起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伏尔泰突然意识到这不是一桩

个案，肯定还存在许许多多像卡拉斯一样蒙受不白之冤者。

例如，公元1760年，家住在图卢兹附近的一个新教徒乡绅，因为在家接待了一个前来参观的加尔文主义牧师而被剥夺了财产并被处罚做划船苦工。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十三年之后还活着，伏尔泰听到他的处境后，就将他从船上解救出来，连同他的妻子儿女一起送到了瑞士。后来政府退还了他们一部分没收的财产，并允许他们回到自己已经荒芜的田园里，在此之前都是伏尔泰照顾他们全家。

再如绍蒙，他是在参加新教徒的露天集会时被抓了起来，因此被判到船上做无期的划船苦工，后经伏尔泰多方调解才被释放。

然而，这两桩案件相对下面要讲的案件可谓小菜一碟。

还是在法国屡遭蹂躏的朗基多克，阿尔比和韦尔多这些异教徒被消灭之后，这里剩下的只是无知和偏见。在靠近图卢兹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个很受人们尊敬的老新教徒，他的名字叫作瑟文。因为当时的封建司法制度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就算是一张普通的租契都能像所得税申报单一样赚大钱，所以老人就靠研究中世纪的法律为生。

老人有三个女儿，最小的有点傻，整天老是琢磨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情。公元1764年3月，她离家出走，父母到处寻找，几天之后该地的主教告诉他说，他的女儿拜访过他，说是要当修女，现在在一个女修道院里。

几百年里压在法国这个地方新教徒头上的迫害真是太多了，他们的精神已经彻底崩溃了。老人毕恭毕敬地回答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件事都有自己的两面性，希望自己的女儿能有好的结果。但是在修道院那种令人窒息的氛围中，这个可怜的孩子很快丧失了仅存的一点生活的希望。她的异常举动使她被送回了家，她的精神彻底崩溃了，老是感觉自己的身边到处充斥着可怕的声音和魔鬼，她的父母为她的生命担心。不久后她再一次失踪了，两周后，人们在一口老井里发现了她

的尸体。

因为受让·卡拉斯案件的影响，当时人们对于新教徒普遍存在一种偏见，只要是关于新教徒的造谣和诽谤大家都相信。瑟文一家还清楚地记得可怜的卡拉斯所遭受的巨大灾难，他们感到异常恐惧，他们决定出逃。虽然他们最终到达了瑞士，但他们还是被抓住了，同时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过程中，他的一个小孙子也冻死了。几个月之后，瑟文夫妇被判有杀害自己孩子的罪，要求吊死，判处其女儿们目睹父母的死刑执行过程，而后终身流放。

卢梭的一个朋友将这个案件告诉了伏尔泰，待他一处理完卡拉斯的案件，就又马上开始为瑟文一家的诉讼案件做准备了。那时瑟文的妻子已经病逝了，剩下的工作就是为瑟文辩护，但就是这起案件花了伏尔泰整整七年的时间。图卢兹法庭依然那样傲慢，还是拒绝提供瑟文案件的任何资料或证据，伏尔泰只好再次鼓动宣传，请求普鲁士的腓特烈、俄国的凯瑟琳、波兰的波尼亚托斯基捐款，直至法国国王关注这一案件为止。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伏尔泰七十八岁那年，也就是他不屈不挠为此上诉的第八个年头，瑟文才终于被无罪释放，允许返回自己的家园。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第二个案件刚刚结束，第三个案件就接踵而来了。

公元1765年8月，矗立在亚眠不远的阿布维尔镇子里的两个十字架不翼而飞了。有三个男孩以亵渎罪被逮捕。不过，其中一个逃走了，他来到了普鲁士。被捕的两个人中，年纪稍大的那一个被怀疑是无神论者。因为人们发现他有一本汇集所有自由思想的《哲学辞典》，这无疑成了最好的罪证。于是，法官们将他的过去做了一个彻底的大翻查。他们极力想将这个孩子与阿布维尔案件联系在一起，于是，某次他没有向路过的宗教队伍下跪致敬就成了有力的把柄。

德·拉·巴里对那次不敬行为供认不讳，不过，他解释说，那个时候他正在赶乘马车，并不是故意的。

这个孩子毕竟太年轻了，经受不住严刑拷打，他不具备老卡拉斯那样的毅力，于是被迫承认了自己毁坏了其中一个十字架，最终他因为“不虔诚，故意不在圣饼前下跪，不脱帽，唱亵渎的歌，对渎神的书有赞许的表示”，以及类似的罪行，得到了死刑判决书。

异常残酷的判决（他的舌头被烧红的铁器挖出来，他的右手被砍掉，他会被慢慢地烧死，而这些就发生在仅仅一个半世纪以前）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就算这个少年真的犯了起诉书上写到的所有罪名也不能用如此惨绝人寰的手段来残杀他。于是，国王收到了人们的请愿书，人们纷纷要求对他缓刑处理。可是，这个时候的国家实在是太混乱了，统治者急需找一个替罪羊来做警示人们的标榜。可怜的少年像卡拉斯一样受尽了折磨，最后，由于国王特别恩惠，在断头台上斩首示众了。刽子手们将他的尸体和《哲学辞典》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拜勒的书籍一起扔进了大火中，化为了灰烬。

这件事，让那些对索奇尼、斯宾诺莎和笛卡尔的影响力感到害怕的人觉得大快人心。它向那些走错道路的年轻人发出了直接的警告：假如他们在正确与错误之间作了错误的抉择，盲目地跟着一小部分激进的哲学家们前行，就会得到跟那个少年一样的下场。

伏尔泰听到这件事后，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斗争的最前列。这个时候已经快过八十岁生日的他依然用极大的热情和与过去一样的正直加入到这个案件中来。

伏尔泰极力想要找出置德·拉·巴里于死地的那一条“亵渎”罪，可是根本找不到。是不是人们只要触犯假设的罪也将被处死呢？他的法律界朋友们也找不到这样的一条法律。终于真相大白了，这只是罪孽深重的法官们自己捏造出来的，他们只是想要犯人去死。

德·拉·巴里走向断头台的时候，各种辱骂声如潮水般涌来，迫于目前面对的这场狂风暴雨般的舆论压力，法官们在审判第三个犯人的时候，稍稍地做了政策调整，因此，对第三个犯人的审批是无疾而终的。可怜的巴里却从来没有沉冤得雪。直到伏尔泰离开人世，复审案件也没有得到解决。不过，他所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在反对不宽容的斗争中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因为长舌老妇的鼓动以及腐败法庭的判决而做出的那些恐怖可耻的行为，就此终结了。

伏尔泰采取的攻击方式，法庭无法抵挡，那些有宗教企图的法庭只能在黑暗里做事，才能有成功的希望。

可是，伏尔泰却在黑暗里打开了光明的灯火，并且聘请了一大支乐队，让敌人无处遁形。

敌人的末日终于到了。

第二十六章　百科全书

有三种不同流派的政治学说。第一种是这样教导人们的：“地球被无数蠢钝愚昧的人所占据着，他们缺乏主见，需要自己做出决断的时候，他们就会头脑发昏，容易受到第一个游说的政客的欺骗，从而走错了路。假如统治他们的人是一个真正了解他们思想的人，那对于全世界来说都算是一个福音，并且他们自己也会觉得非常快乐和高兴，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车间工作室、孩子以及便宜的二手车和菜园子的事情上了，而不必再为议会和选举箱而劳神。”

这个学派的人大多数都是帝王、苏丹、巨头、酋长和大主教，他们辛苦的工作，致力于公路、营房、大教堂和监狱的修建工作，至于工会，他们不会承认它在文明的行列里面。

第二种思想派别则教导我们这样：“上帝最智慧的创造就是普通人民，上帝完全具备做一个统治者的权利，因为他不但有非凡卓越的智慧而且动机纯良高尚。他可以很好地顾及自身的事情。他想成立一个委员会来统治世界，但是大家都清楚，这个委员会效率低下，行动迟缓。所以，执政大权应该由值得信任的朋友来掌握，他们不会为生计而忧愁奔波，他们有大把的时间和充足的精力来管理社会，为人民谋取幸福。”

当然了，这种光辉的理想主义者比较适合充当独裁政府、独裁者、第一统治者和贵族保护者这些角色。

他们努力工作，把精力放在了公路和营房的修建上，最后把教堂变成了牢狱。

第三种是态度严谨、眼光聪慧的平民百姓。他们能够准确地看到人的真实性，对于人们身上的优良品质大加赞赏，当然，也十分清楚他们的弱点在哪里。在他们看来，普通的人如果能够摒弃情感和私心的侵扰就能充分发挥潜能去做正确的事情，这是他们从过去的事情中得出的观察结论。不过他们坚定地从自己的幻想中走了出来。自然生长的过程是缓慢的，想要加快它的步伐就跟强行驱使潮流和季节的前进一样，是徒劳无功的。当他们有幸被邀请进入仕途的时候，他们便放弃了将思想变成现实的途径，改去修建公路和监狱，并且把余下的资金用在了学校和大学的事业上。他们乐观并且坚定地相信，世界上遗留下来的古老病症将由教育的光辉来彻底地清除，所以，这个伟大的事业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最强有力的支持。

最后，他们会对此写一部百科全书，以为这样，这个理想就彻底地变成了现实。

第一部包罗百科的书籍诞生于中国，就像其他许多凝聚巨大智慧和极度耐心的东西一样。中国的康熙皇帝组织编纂了一部五千零二十卷的百科全书，并以此得到了臣民们的爱戴和敬仰。

普林尼是向西方世界介绍百科全书的第一人，不过，对他而言，只要有三十七本书就已经很满足了。

基督教时代早期的一千五百年里，没有任何有启蒙价值的东西诞生。有一个非洲人，同时也是圣·奥古斯丁的同乡，叫作菲利克斯·卡佩拉，花费了很多时间写了一本自以为称得上是知识宝库的书籍。这本书用了诗歌的文体，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轻松的记住书中的那些有趣的故事。这个可怕的错误却牢牢印在了中世纪以后的十八代子孙的头脑里。这些东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文学、音乐以及科学真理的大雅之

堂。

二百年以后，又一部新的百科全书问世了，他出自于塞尔维亚一个叫作埃西多尔的主教之手。以后，每一个百年都会有两本百科全书问世。后来这些书的命运怎样，我无从知道了，可能书虫会知道它们的下落。假如所有这些书能够成功的流传下来，那么这个地球上就没有别的东西能够立足的余地了。

后来，由于公元18世纪上半期发生在欧洲的大规模求知运动，百科全书的撰写迎来了真正的春天。跟现在的情况一样，贫困的学者们承担着这些书籍的编写工作，每周八美元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费用，而这些辛苦钱却不够支付纸张和墨水。尤其是英国，充分发扬了文学大国的精神，在它的感召之下，在巴黎生活的英国人约翰·密尔斯决定要把埃弗雷姆·钱伯斯成功的《万能辞典》译成法文，好向国王路易统治下的臣民们大肆贩卖他的书籍，并且从中狠捞一笔。为了达到目的，他跟一个德国的教授合作，并且拉拢了莱布里顿来做出版工作。总之就是，这位国王的印刷商发现了这个发财的秘密，便欺骗了他的合作伙伴，成功地赶走了密尔斯和那个条顿医生，此后他独自开始了盗印工作。这本即将出版的书籍被他命名为《艺术与科学的万能百科全书辞典》，他还花费心思为这本书制作了一系列吸引人的书讯，很快，大量的订书单就纷至沓来了。

之后，他又做了一些工作，法国中学的一名哲学教授被他雇用来做总编辑，并买了很多的纸张，做完这些，他就安静地等待着喜讯的传来。可是，非常遗憾，一部大百科全书的成功出炉不可能像莱布里顿想的那样简单。这位教授将注释和条目搞混淆了，订书者们吵吵嚷嚷的要得到第一卷，局面变得混乱不堪。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几个月前成功出版的那本《医学万能辞典》出现在莱布里顿的脑海中，他立刻找到这部书的编辑并雇用了他。这个人就是丹尼斯·狄德罗。就这样，原本是一本专科的百科全书

却变成了一部大百科全书。至此，人类看到了公元18世纪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那个时候的狄德罗刚好三十七岁，生活困苦不堪。他没有进过大学的门槛，不随体面而年轻的法国人之流。他一离开自己的耶稣会老师，就在巴黎做起了文字工作。经历了一段暂时的饥寒交迫的生活后，在一个人挨饿与两个人挨饿一样的理论支持下，他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一个可怕的狂热教徒，一个十足的悍妇，事实上，这样的结合也是很常见的。为了养家糊口，狄德罗从事各种各样奇怪的工作，编辑各种各样的书籍，不管是《关于美德与价值的探讨》还是对薄伽丘的《十日谈》臭名昭著的修改，他一直坚定地追求自己的思想自由。没过多久，政府发现了这个温顺的年轻作家将自己显而易见的怀疑精神掺进了《创世记》第一章创世故事的描写当中。他被扣上了异端的帽子送进了万塞纳监狱，在那里被严密监禁了三个月。

狄德罗被莱布里顿雇用是他出狱以后的事情了。这个善于雄辩的人清楚地看到了他所从事的这个事业会有无限的前景。只是修改钱伯斯的旧资料不足于体现自己的价值。那是一个思想大爆炸时期。机会来了，他的百科全书要让最著名、最有权威的人来书写，要包含各个行业最新的信息。

狄德罗激动异常，他成功地说服了莱布里顿让出了全部的指挥权，这本书的编纂没有任何的时间限制。之后，他列出了合作人名单，开始在纸张上书写条目：“A：字母表中的第一个字母……”

当他写到Z的时候，已经是二十年以后了，此时，这项伟大的工程终于竣工了。会有多少人能够忍受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呢？莱布里顿雇用狄德罗的时候，已经增加了投掷金额，不过，每年支付给编辑的钱却都在五百美元以下。那些来帮忙的人就别提了，我们都明白是什么情况了，他们总是说很忙，一再把工作往后推延，要不然就是去乡下看望祖母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可怜的狄德罗不得不承受着

教会和政府的重压和谩骂亲自来做大量的工作。

目前，我们很难再找到他那个版本的百科全书了。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喜欢它，而是敌视它的人太多了。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这本书被当成了毒药和激进主义的代表，淹没在时代的鄙夷、排斥和怒吼之中。但是，现在看来，那本书就像单调乏味的育婴教材一样。公元18世纪的保护派教士们却将它看成通往地狱和死亡的路标，它无时无刻不在宣扬无政府、无神论和无秩序之说。

这些谴责和谩骂我们已经见惯了，总编辑在他们眼中就是社会和宗教的仇敌，是个十足的恶徒，心中没有上帝和国家，也没有家庭概念。可是，公元1770年的巴黎只是一个稍微广大的乡村而已，人们彼此熟悉和了解。狄德罗提出了生活的目的在于“行善事，探索真理”的理论，并且，他真心的践行着这个信条。饥饿的人们可以在他的大门内得到招待，他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只是为了人类的事业，他只是需要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和一沓纸张而已，除此之外别无他求。那些主教和帝王们身上明显不具备他的纯良、质朴和勤劳，他身上的这些美德使当局无法找到攻击的借口，他们似乎对此手足无措了，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们会放过他。无数的爪牙和间谍在他的家门口徘徊，他们没收他的笔记，抄他的家，甚至阻碍他的工作。

即使这么多的艰难险阻也并未使他有丝毫的退却。如狄德罗所愿，《百科全书》如期完成了。新时代的气息已经飘散开来，世界全盘的大检修即将开始，而《百科全书》就是他们坚实的后盾和精神指挥。

对于这位编辑的真实面目，我可能描述的有些过头了，不过他终究是那个衣衫褴褛的狄德罗。他是不是那种因为在朋友霍尔巴赫男爵家里饱餐一顿而高兴得不得了的人，还是那个因为四千册书籍销售一空而得意忘形的人呢？卢梭、达兰贝尔、图格特、爱尔维修、沃尔尼、孔多塞这些比他享有盛誉的伟人都与他身处同一个时代，不过，

这些人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之大的能量，《百科全书》是功不可没的。它已经不再是一本书那么简单了，它已经成了社会和经济的纲领。人们可以在上面读懂那个时代首领们的真实想法。不久的将来在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书写在了那里。它是人类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法国即将迎来一场巨大的灾难，正常的有眼睛和鼻子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采取措施的时刻到了，可是，这些正常的人却并不急于采取有效措施来抵挡这场灾难。他们异常固执地坚守着梅罗文加王朝的一套废弃了的法律，并且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换来和平的号角。那个时候，双方旗鼓相当，都坚守原样，这导致了奇怪复杂的局面。作为维护自由的领头羊，法国亲切的给乔治·华盛顿先生去了一封信，并且精心策划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部长愉悦的周末。在别人眼里富兰克林是“不可知论者”，我们觉得他是个朴素的无神论者。矗立在广阔的大西洋彼岸的这个国家，是各种各样进步思想的敌人，它的民主精神只是体现在判处农民做苦工，判处哲学家过乏味的生活上。

最后，一切都变了。

可是，变化的方式却是非常的惊人，这场斗争意在清除皇宫之外的人的精神和社会压力，不过，参与到斗争中来的却不是奴隶，而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正直无私的人。新教徒对他们的憎恨就像天主教对他们的重压一样。

这些无私正直的人最后的希望就是所有诚实的人能够在天堂中找到安慰，仅此而已。

公元18世纪为宽容事业而奋斗的人，我们很难把他们归于某个派别。有时候，为了方便，他们也会参加一些形式上的宗教活动，使宪兵们不接近他们的写字台。不过，他们的内心却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或是中国的孔子时代。

他们经常叹息自己不具备像同时代的其他人那样对事物的敬重，在他们眼里，其实那些只是过去残存的无比幼稚的东西而已。

西方世界某些好奇的人们，截取了巴比伦人、亚述人、埃及人、赫梯人和迦勒底人的历史记载，用来当作道德和习俗的指南针。但是，苏格拉底的信徒对古代历史却丝毫没有兴趣。他们只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不管后果如何，他们依然勇敢地行走在这个早已经被征服的世界里。

第二十七章　革命的专制

那个承载着达官显贵无限荣誉和平民百姓无限苦难的法兰西王国在公元1789年8月的晚上崩塌了，那真是一个令人记忆犹新的夜晚啊！

那个闷热的晚上，在人民情绪高昂的时刻，执政阶级交出了他们用了三个世纪夺取的古老特权和力量。其实，人们的怒火已经烧了一个星期了，只是国民议会还迷失在真正的兄弟之间的博爱之中，没有走出来。人们坚定地站在人权理论的阵营里，这是不久的将来实施的民主自治的良好开端。

在法国，封建制度彻底消失了。最具有上进心的人就是第一流的人，他们勇敢地扛着领导者的大旗，带领人们开拓进取，书写着国家的命运，并且有机会存活下去。贵族们只剩下最后的心愿，他们退出公职，只想在其他部门里谋得一份教士的工作。或许，纽约的五号街的茶馆比较适合他们，或是在二号街上经营饭馆也是不错的选择。

旧的法国就这样消失了。

这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我没法说清。

不过，它确实已经死掉了，并且连同那个隐形的残暴统治一起消失了。这种专制统治在教会的驱使下重重地压在涂了圣油的圣路易的子孙身上，并且从黎塞留时代就开始了。

不容置疑，人类又一次发展的机会到来了，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这样的情况。

人们心中激情澎湃。

太平盛世已经来到眼前了。

所有的独裁者和专横的统治阶级迎来了他们的末日，这个世界只能容纳美好的东西。

勇敢的国家后代们，向前冲吧！暴政已经从这个星球上消失了。

像这样振奋人心的话还可以多写一些。

帷幕落了下来，社会上的许多不公平的现象被彻底清除了，又将迎来新的开始。可是，当这一切成为过去后，“不宽容”又出现了，这次它将自己乔装打扮起来，顶着无产阶级的头衔，以罗伯斯庇尔式的发型呈现在帷幕面前，并且坐在检察官的旁边，安然自得地过着它从前那样的罪恶的生活。

十年前，“不宽容”毫不客气地把那些鼓吹统治者依靠上帝授予的权利生活的人送上了断头台。

而现在，假如有人胆敢说人们的意愿与上帝的意愿不一致，“不宽容”就会找上他们的麻烦，让他们去见阎王。

这个玩笑未免也太恐怖了。

但是这个颇受人们欢迎的玩笑却让人类付出了一百万个无辜旁观者的生命代价。

可惜，我讲的这件事已经不再是新鲜事了。古典作家们已经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做过文辞优美的描述了。

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人类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并且永远

都是这样。

极少数善于思考和学习的人会认真地思索自己的灵魂世界，他们从中领悟出一些合适的哲学结论，所以能够不像普通人那样的累和烦恼。

不过，绝大多数人对于只是精神层面的清淡的酒并不感兴趣，他们想要寻找更刺激、更振奋人心的烈酒。人们并不在乎那是什么样的烈酒，关键是要能产生兴奋和刺激的作用，当然最好是容易得到的，并且没有数量限制。

关于这个事实，历史学家是明白的，这真是太让人失望了。激动而愤怒的人们刚刚毁掉了过去的城堡（当地的希罗多蒂和塔西陀们及时而热情地报道了这件事情），城堡的废旧材料就被泥瓦匠们运到了城市的另一边，并利用这些材料重新建立了一座跟旧城堡一样肮脏龌龊、血腥残暴的牢狱，它意在对人们实施残酷的镇压。

就在这个时候，那些极度好强的民族挣脱了“一贯正确”的人扣在他们身上的枷锁，不过，他们立刻就臣服在了那本“一贯正确的书”的指挥棒下。

当旧的统治者以仆人的身份骑马从边境逃走的那一天，这座被遗弃的宫殿迎来了一批新的客人，那就是自由党。他们捡起被丢掉的黄袍，开始踏上了被他们逼迫远走他乡的前任统治者的道路。

尽管这一切都是这样的让人失望，但是我必须负责任的把这个故事的真实的一部分写给大家看。

那些引爆法国大动乱的人，出发点是好的，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可以看到《人权宣言》中的先进呼声：人们拥有依照自己的观点寻求自己道路的权利和自由，任何人不得干涉，即使是宗教方面的观点也同样受到保护，只要人们的这种观点不扰乱社会秩序和违背法律规

定。

当然，这并不等同于所有宗教都拥有同样的权利。新教徒虽然获得了与天主教徒在同一个教堂里祈祷的权利，但是必须记住这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仍然是天主教，它才是唯一的国教。

米拉波是一个对政治生活有着本能觉悟的人，他非常清楚这个众所皆知的让步只不过是暂时的。本来他计划着将这场社会大革命演变成一个人的革命，遗憾的是，这个宏图大志尚未实现，他就过世了。8月4日晚上，很多贵族和主教纷纷做出了宽容大度的让步，不过，他们早就开始后悔了，于是想方设法地制造障碍，这给他们的国王陛下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恶果。直到两年后，也就是公元1791年（整整两年，这对于任何实际目的来说都太迟了），完全平等的光束才照亮了所有的宗教派别，那个时候，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新教徒在法律面前都具有了平等自由的权利。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各式各样的角色开始大逆转了。法国人民的代表制定了国家法律，要求无论持有何种信仰的人都必须发誓忠诚于这个新政治体系，就像学校的教师、邮局的邮差、灯塔看守人和海关官员一样，严格地把自己当成国家的公仆。

这种做法遭到了教皇庇护六世的强烈反对。因为新宪法宗教方面的规定与公元1516年法国和罗马教廷订立的那些正式协议完全不相符。不过，先例和协定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议会是不会去考虑的，他们没得选择，如果拒绝遵守新宪法、效忠国家，那么就离职好了。这已经成了不能改变的事实，很多主教们手指交叉，办理了宣誓程序，不得不接受了。不过，还是有很多诚实的主教们不愿意发假誓。他们实在是走投无路，只好效仿被人们残害了很多年的胡格诺教派，在废弃的马厩里做弥撒，在猪圈里相互交流，把乡下的树篱当作布道场所，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他们以前教民的家里进行秘密拜访。

不管怎么说，比起当年的新教徒，他们的境况已经好很多了。因为秩序混乱的法国已经无暇顾及那些反对宪法的敌人了，只是敷衍的表示一下，更别说会注意这些人了。这些人不想平白无故的丢了性命，于是他们之中拒绝宣誓的顽固人士冒着生命危险向政府提出了要求，他们要求政府承认他们是一个“可以被容忍的宗派”，还要求得到一些权利。不过，我们想一下过去的三个世纪，很快就发现，就是这些人曾经无比坚定地拒绝了给加尔文教徒任何权利。

现在是公元1925年，不存在任何宗教方面的风险，当我们回过头去看那个时代的历史的时候，觉得它是残酷和荒诞的。不过，对于他们提出的要求，当时的政府并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因为那个时候国会已经落入激进分子的掌控之中。因为法庭的背叛和国王采取了与外国结盟的愚蠢行径，使得恐慌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就迅速地向比利时海岸蔓延到地中海海滨，它导致了公元1792年9月2日至7日的一系列血腥的残杀活动。

从此以后，这个革命注定了沦为恐怖统治的命运。饥肠辘辘的人民大众用怀疑的眼光看着宗教的首领，他们在想，这些人是不是在策划着一个卖国求荣的大阴谋。哲学家们日积月累的努力就这样成了一场空。随后发生的大变动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此之大的暴乱，执政权力很容易就被冷酷无情的人所掌握了，对历史有颇多研究的学生很容易理解这样的情况。不过，让人惊奇的是，这个剧本的主角竟然是一个正直的人，并且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是集聚了无数美德的人。

当法国人看清新主人的本来面目时，一切都来不及了，这跟在协和广场的绞刑架旁边唠唠叨叨地说一些远古时代的警示语是一样的。

到现在为止，对于这场革命的分析，我们已经运用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手段，即使这样，对于那股黑暗的力量我们仍然无法理解，或许，当历史学家具备了心理学家的素养或者是心理学家成为历史学家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民族的命运正是它们在极

端痛苦之中匆忙决定的。

有的人认为世界是由欢乐和光明来支配的，也有人认为，野蛮的暴力才能博得人类的尊重。从现在开始一直到此后的几百年间，我们都将面临对这两者的选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大革命是社会学实验室里最伟大的发明，暴力在此得到了神圣的升华，这是非常确定的。

那些希望靠理智来建立人性化世界的人往往不是终老离世了就是死在了他们想赐予荣誉的人的屠刀之下。当伏尔泰、狄德罗、图格特、孔多塞在历史的舞台上渐渐退去的时候，主宰国家命运的主人变成了那些提倡新至善论的愚蠢的人，原本是一项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却因为他们而变得糟糕透顶。

他们统治的第一个时期，宗教的敌人牢牢把持了胜利的果实。这些人因为某些原因，对宗教象征深恶痛绝。教士统治的时期，他们受够了磨难，因此，他们厌恶穿着黑色长袍的教士，香火的味道使他们想起痛苦的过去，引起他们愤怒的情绪。还有人企图用数学和化学否定上帝存在的事实。这些人开始组成了联盟，他们摧毁教会以及它的作品。显然这是件徒劳无功的事，看不到任何希望的曙光。但它体现了一种正常的变为不正常、可能的事变成每天发生的事这样的革命心理。所以，基督的旧历、万圣节、圣诞节和复活节、星期和月份就这么被一张法律公文废除了，并且用十天组成的段来对年进行划分，规定每十天有一个异教徒的休息日。紧接着，上帝也被废除了，这个时候，世界失去了主。

这只维持了很短的时间。

空空如也的雅各宾俱乐部里回荡着各种各样高声且激动的解释和辩驳，不过，人们对那些空虚的观点还是没有多大兴趣，还没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人们就无法忍受了。既然旧的上帝不能满足人们的要

求，那么，是不是应该效仿摩西和穆罕默德，重新创造一个符合时代需要的神灵呢？

这个是时候，理智女神诞生了。

关于这位女神的真实身份，我们在后来才彻底弄明白了。那个时候，人们急需找一个漂亮的女演员并且穿上古代希腊的服装，这样就万事俱备了。人们在前任国王的芭蕾舞团里找到了这位女士，在一个合适的日子里，这位女士被人隆重地抬到了废弃的巴黎圣母院的祭坛上。

说到圣母，她现在已经下落不明了。那个许多个世纪一直站在祭坛上，用包容和理解的柔和目光抚平人们心灵创伤的女神在被送到石灰厂磨成粉末的时候得到了及时的挽救。她原来站立的位置被自由女神像取代了。自由女神像全身呈白色，她出自于一个业余雕塑家之手。有变化的还不只是这些，巴黎圣母院还有其他的发明。唱诗班中间竖起了四个柱子和一个屋顶，作为“哲学殿堂”的象征，国家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这里便成为新舞神的宝座。当这位女神不主持仪式，也没有崇拜者来膜拜的时候，“真理的火炬”就在哲学殿堂里面被点燃了，这个光荣的火炬具有照亮世界文明的神圣职责，一直到最后的时刻。

不过，这个所谓的“最后”时刻，却在短短六个月之后到来了。

公元1794年5月7日早晨，法国人民接到了上帝被重新确立的通知，灵魂不灭再次成为人们的信仰。6月8日，新的上帝（那是用已故的让·雅克·卢梭遗留下的旧材料匆忙塑造出来的）出现在了等待已久的信徒们面前。

那个来自于三流城市的渺小的律师迎来了生命中最光辉的时刻，罗伯斯庇尔穿着一件新的蓝马甲，发表了欢迎词，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法国革命的高级教士了。更加荒谬的是那个神志不清的修女凯瑟

琳·泰奥特因为说了救世主即将到来的话，并且还说出来具体的名字而被吹捧为上帝的母亲，受到成千上万人民的崇拜。修女口中的救世主就是罗伯斯庇尔。他穿着自己设计的怪异服装夸夸其谈地宣扬自己的观点，并且向上帝做了保证，承诺他一定会好好地管理这个世界。

两天后，一项新的法律又出台了，它规定凡被怀疑犯有叛国罪和异教罪的人（二者又一次被视为一体，就像宗教法庭时代一样）不具备自卫权利。这样一来，人们对他更加深信不疑了。此后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内，有一千四百多人在断头台上丧命，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这项法律确实是很有效果的。

接下来所发生的就是大家都熟悉的事情了。

罗伯斯庇尔把自己当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化身，在如此狂热的念头驱使下，他绝对不可能承认那些不完美的人享有和他一样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仇视罪恶了，从而导致了法国面临着人口灭绝的危险。

后来，为了使自己能够活下去，美德的敌人终于发起了进攻。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那个正直并且固执的信徒命丧黄泉了。

从此以后，法国革命的力量迅速减退。那个时候的宪法承认了各种宗教共存的权利，法国人民欣然接受了，各个宗教团体获得了平等和自由，不过，共和国官方已经决定不再插手宗教事务了。人民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建立教堂、工会或者是联盟，不过，除了要支持自己的教士和牧师以外，还必须肯定国家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个人的自由选择。

法国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迎来了和平共处的时期。

天主教会从来不会在失败面前低头，它对政教分离的原则（见公元1864年12月8日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教令）依然感到极大的不满，

竭尽全力进行诽谤和辱骂。对那些企图颠覆共和国体制恢复君主制的反叛者给予极大的支持，并希望它们可以重新执掌大权。但是这些斗争只能在员工们太太的卧室里或者是在退伍军人和岳母打猎的树林小屋里面进行而已。

他们只能为幽默读本提供一些很好的材料，然而，这只能证明自己越来越没有用。

第二十八章　莱辛

公元1792年9月20日的夜晚，在法国革命军和君主联盟军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而可怕的战争。

这次战役的最后胜利果实被法国革命军摘取了。瓦尔米村光滑的山坡对联盟军的步兵没有丝毫有利之处。战斗演变成了一场持续的炮攻战。在革命军异常猛烈的攻击下，联盟军被迫从战场上退出，向北退离了。参加这场战斗的有一个叫作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人，他是世袭魏玛王子的助手。

几年过去了，那天所发生的事再次重现在这个青年人的回忆录里面。那个时候在洛林黏稠的泥浆里挣扎的他曾经预言过，世界会因为这场战争而改变，这确实是真的。就是在那一天，上帝无比宠爱的君主权利被彻底摒弃了。人们料想着参加人权运动的那些人会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可是，结果却恰恰相反。他们翻山越岭，扛着武器，将“自由、平等、博爱”的火种散播到了欧洲偏远的地区。他们的马匹在欧洲每座城堡和每个教堂前停留过。

我们可以轻松地把这些事情写在纸上，也可以随意嘲笑那些已经辞世一百五十多年的革命领导者们，我们也可以为他们对世界所作的贡献而心怀感激。

不过，对于那些从这些黑暗的日子里挺过来的男女们来说，他们绝不可能对这场战役采取安然若素的态度。可能某一个早晨，他们还兴高采烈地欢聚在自由的村落里面唱歌跳舞，三个月以后，就可能像

下水道的老鼠一样被到处追打了。他们不可能忘记这场灾难，当他们钻出地窖和阁楼的时候，只稍微整理一下凌乱的假发，就开始费尽心思的想避免这场戏重新上演了。

不过，为了迷惑敌人，他们必须进行遮掩。这不是历史学所说的模糊的过去，而是他们私下阅读伏尔泰的书，并到处宣扬对《百科全书》无比佩服的那个“过去”。他们费尽心思，用尽全力企图将他们追求自由的痕迹全部涂抹干净。于是，伏尔泰的书籍被丢弃在了阁楼里，狄德罗的书全部卖给了废品站，那些曾经无比崇拜的显示真理的小册子也扔到破箱子里去了。

哎呀，这跟我们经常见到的文字材料遭难的情况一个样子，有一件比散布谣言更糟糕的事被这些忏悔者忽略了，这就是舞台上正在上演的一场戏剧。他们曾经把《费加罗的婚礼》捧上了天，但是现在却做出幼稚可笑的事情：他们公然否认人人平等的理想会变成现实。《聪明的南森》曾经成功的博取了他们的眼泪，现在，他们拿什么来证明自己一直认为政府的软弱才导致了宗教宽容的出现。

这出戏以及它的成功演示与他们所说的是截然相反的两回事。

这出著名的戏剧成功地迎合了公元18世纪人们的情感。它是由一个叫作戈特霍德·埃弗雷姆·莱辛的德国人所创造的。他的父亲是一名路德派牧师，他曾经在莱比锡大学学习神学。不过，他似乎对宗教没有多大兴趣，逃课成了家常便饭。最后，父亲将一道选择题摆在了他的面前：要么退学，要么申请到医学系学习。戈特霍德虽然对医学也并没有多大兴趣，不过，他能够尽量不违背父亲的意思。之后，再次回到莱比锡的戈特霍德继续做着为他喜爱的演员担保贷款的事情。后来这些人从城市里消失了，为了免于因债务而获罪，他被迫逃到了维腾贝格。

他在漫长的逃亡生涯中，忍受了极度的饥饿和徒步的苦难。柏林

是他的首个驿站，在那里，他靠给神学刊物写稿赚取低廉的稿酬为生。后来他成为一个富裕的朋友的私人秘书，准备跟随他去环球旅行，不幸的是，在他们刚刚动身的时候就遇上了七年战争。那个富裕的朋友不得不坐着第一辆马车回家当兵去了。这意味着莱辛再次失业，他在莱比锡的城市里四处游荡。

不过，这个颇有交际天分的人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结交到了新的朋友，这个白天是政府官员，晚上是诗人的朋友叫作埃瓦·克里斯蒂安·克莱斯特。正是从这个敏感的人身上，莱辛培养了良好的社会洞察力，他看到了这个世界的崭新面貌。不过，好景不长，库内道夫之战毁灭了他的这位朋友，莱辛在穷途末路的时候被迫给报刊专栏写稿。

接着，他又成了布莱斯劳（现在的弗罗茨瓦夫）城堡的指挥官的私人秘书。在那段时间内，他苦心钻研斯宾诺莎的作品，用来打发枯燥乏味的生活，这位哲学家的作品开始在国外盛传的时候已经离他去世有一百多年了。

可是这一切并不能使他的日常生活有所改善，已经四十岁的莱辛需要有一个家庭。他的朋友们想让他到皇家图书馆当管理员。但是，许多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普鲁士皇宫不喜欢他的事情。首次拜访柏林的莱辛结识了当时法国著名的哲学家伏尔泰。他成功地从这位慷慨和蔼的哲学家手里借到了还没有出版的手稿《路易十四的时代》。可是，当莱辛离开柏林的时候，匆忙间忘记将手稿交还，而是放在自己的行李里面带走了，当然，这完全是个意外。原本就非常讨厌普鲁士皇宫内的劣质咖啡和硬板床的伏尔泰先生愤怒了，他高声宣布，他非常重要的手稿被一个德国青年人偷走了，他像一个身在异国他乡的激动的法国人那样叫嚣着让警察到边界拦截那个小偷。没过几天，丢失的手稿被邮差送了回来，其中还有一封莱辛的亲笔信，他在信中直率的对怀疑他人品的人提出了责问。

公元18世纪的人们受到巧克力罐的巨大影响，所以，这场在巧克

力罐里发生的风波并没有很快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即使过了二十多年，国王依然很反感他的朋友伏尔泰，并认为他是个无事找麻烦的人。因此，莱辛被拒绝进入宫廷。

离开柏林的莱辛又来到了传说要建设大型国家剧院的汉堡。可是，这个谣传却始终没有付诸行动。感到万分失望的莱辛在世袭大公爵布伦斯威克的图书馆里当起了管理员。那个时候他所在的沃尔芬布特尔城虽然不是什么大城市，不过，他所在的那个图书馆却是首屈一指的。有一万多部手稿保存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并且有很多记录了历史上基督教改革运动的重要文稿。

无聊的状态往往会滋生出各种流言蜚语和恶毒语言。沃尔芬布特尔城的人们总是对艺术评论家、报刊专栏作者、戏剧文章作者抱有怀疑的态度，没过多久，莱辛又开始麻烦缠身了。其实他什么也没有做，但是别人却偏偏谣传他出版了很多攻击路德派的文章。

这些以布道传教方式流传出来的谣言出自于汉堡一位前任校长。布伦斯威克大公爵非常害怕他的领地内会爆发宗教斗争，于是他下达命令，让图书馆的所有工作人员加倍小心，不要触及任何争执。莱辛遵从吩咐，并且也是这样做的。

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开诚布公的论述这个问题，于是，莱辛埋头苦干，将他的观点诠释在戏剧表演里面。

在小乡镇的娱乐厅里面，《聪明的南森》这部戏剧诞生了。它选用了一个很古老的题材，我在前面的已经大致提过一下。那些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人随时可以在薄伽丘《十日谈》里看见它。不过，在那里它有另外的名字——《三个戒指的悲惨故事》。下面，我来简单地描述一下故事的大概情节：

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有一位想侵吞某个犹太臣民财产的伊斯兰教的王子想出来一个计谋，让人把那个犹太臣民找来，经过一番虚伪

的夸赞之后，王子问那个可怜的犹太老人，土耳其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这三种流传最广泛的宗教中，哪一种是最真实的呢。面对这个刁难的问题，老人聪明的绕开了，并且开始讲起故事来。他说：“啊！伟大的君王啊，请允许我为你讲个故事吧。在很久以前，有个富人拥有一只举世无双的美丽戒指，他即将死去的时候立下了遗嘱，谁拥有这个戒指，谁就是财产继承人。这个信条被一代代地往下传，戒指一直作为财产继承人的信物被完好的保存着。几百年后的最后一个主人，因为无法取舍由三个儿子中的哪一个作为继承人，于是他让金匠做了跟那个真戒指一模一样的两个戒指，并分给了三个儿子。儿子们自以为是继承人，顺利地送走了老人之后开始宣布自己财产继承人的身份。可是问题出现了，每个人都有一样的戒指，分不清真假了。这个案件被摆到了法庭上，法官也无法做出正确的判决，这个案子只好就这么一直被搁浅着，恐怕到了世界毁灭的时候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了，阿门！”

这个远古的民间故事寄托了莱辛的信念，他坚定地认为：真理是不会被任何宗教所左右的，最有价值的是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形式化的规定和教条，人们有和睦相处的责任，任何人也不可能完美无缺，并且还强迫别人来崇拜自己，他们没有这个权力，同样也无权宣称：“只有我才懂得真理，我优越于任何人。”

这种思想在公元1778年的时候受到人们极大的欢迎，不过，这个年代的小国家的人们却不吃这一套。即使是狂风暴雨，这些小国家都要保住他们的财产和牲畜，对他们而言，这才是重要的。他们宁愿把自己的土地乖乖地交给警察，只是为了赢回自己的名声。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依靠他们生存的牧师身上，希望他们确实起到精神支柱的作用，能够在建立秩序和法律方面给予警察们最大的协助。

在这场运动中，五十年前的宗教模式不能够在塑造人们思想领域里立足了，十足的反动运动取得了胜利的火炬。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因为事实摆在眼前，很多国家的人们早已经厌倦了战争和暴乱，厌倦

了虚无、不切实际的演说，也厌倦了工商业中屡屡遭受破坏的关税制度。他们只是期盼和平，只要能够迎来和平，任何代价也在所不惜！他们迫切地想要恢复商业，他们受够了士兵的骚扰以及从橡树上流下来的肮脏的汁液，他们想悠然自得地坐在自己家里喝咖啡。只要能够换回幸福快乐的生活，他们不会在意那些生活细节上的诸多不便，即使向每一位戴着铜纽扣的人行礼或者对着皇室信箱鞠躬，称呼为公家打扫烟囱的工人为先生，他们也非常乐意。

人们在漫长的黑夜中行走了太长的时间，实在是太过于疲惫，需要有喘息的机会，所以人们能够保持那样谦逊的态度实在是因为个人需要。在那个时代，新制服、新政策、新政治讲台以及统治上帝和平民的统治者每天都在变化着，可谓层出不穷。但是，我们不可以从这些单一的奴役状态，还有他们欢呼雀跃的支持上帝任命的统治者这些事迹中就草率地断定人们已经把格朗中士的鼓励全部都忘记了，那些鼓励曾经极大地震撼了人们的心灵，充实了人们的头脑。

跟所有反对独裁运动的人一样，他们的政府充斥着顽固不化的思想，他们只抓表面的秩序和规则，而忽略了人们内心的世界，从这个角度上看，人们得到了很多的自由。人们只需要在星期天按部就班地带着《圣经》到教堂去听教，而其他的时间则属于精神自由空间。不过，这是有条件的，他们可以有自己的见解，但必须选择沉默，就算要发表自己的言论，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并且还要确保四周没有间谍。可是，尽管他们具备了夸夸其谈的议论的权利，不过，那些严谨认真的报纸却揭露出新的统治者又将采取某种滑稽的方式来捍卫国家安全，看情形，人们要过公元1600年那样的日子了。知道这些，他们禁不住摇头叹息起来。

在相同的情况之下，这些人的主人与自公元元年以来所有无知的人类的主人所做的是一样的事情。当有人站在广场破旧的箱子上高声发表言论的时候，主人们发出命令，将那些垫脚的箱子搬走了。在他们看来，这些是有毒的言论，对政府造成了威胁，他们甚至幼稚到以

为这样做，言论自由就会被彻底摧毁。他们会抓住任何机会，毫不客气的让那些口出狂言的演说者去蹲监狱，并且尽最大可能给他们严肃的惩罚，判处他们四十年、五十年或者一百年的监禁，将这些可怜人送到阎王那里。但通常情况下，这些主人实在是愚蠢的可怕，他们只是稍微读过几本书，看过一些看不懂的小册子而已。

这样的例子实在是有着非常好的警示作用，很多人都不敢到公共场所去休息游玩了，他们觉得僻静的酒馆和拥挤肮脏的公共旅馆更安全些，并且在那种地方会有更认真的听众，这样的影响力超过了公共场合的演讲。

我们可怜的上帝，挖空心思地想赐予某个人一小点权力，却又对自己的官方声望感到不安。一个帝王可以离开他的王位宝座，并且坦然地把这个事故看作枯燥乏味生活的一个小插曲。对他而言，无论是头顶王冠还是头顶仆人的小圆帽，他都是一个皇帝。不过，对于一个三流城市的市长来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旦丢掉了小木槌和办公室的徽章，他就什么都不是了，随之而来的还有嘲笑和讥讽，等待他的将是艰难的困境。所以，他对自己的地位和荣誉极为看重，如果有人胆敢对他不尊重，那么很遗憾，就等着吃灾难的苦果吧。

至于那些胆敢在市长面前嚣张跋扈的人，还有那些以文字工具、学术著作、科学作品和人类学、经济学为武器挑战当今社会秩序的人，他们的处境就更加危险了。

他们将会被套上污秽的头衔，断了一切生路，被强行驱逐出他们散布有毒言论的居住地，害得妻子和儿女们孤苦无依。

有些人真心诚意地想要革除社会存在的许多弊病，但是这个反动精神突然爆发，阻碍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不过，时间可以搞定一切，这些善良的学者们制服上的污渍早已经被它清除干净了，警察不可能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干涉了危险的激进派伊

曼纽尔·康德的学说而被人们铭记了。康德给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的行为准则要以世界规律为标准。警察又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嘴上没长胡子的小青年以及愚蠢的傻子"才会被他的言论所左右。

有个叫作雅各布·格里姆的人在那份《陛下不合法地取消国家宪法》的抗议上签过字，而被昆布兰公爵判处流放，这位汉诺威的国王也因此而臭名昭著。梅特涅也因为怀疑舒伯特的音乐而声名狼藉。

多让人同情的奥地利啊！

当奥地利从这个地球上消失的时候，人们对"快乐王国"有了新的憧憬，原来发生在这个国家的积极的学术思想被淡忘了，他们不在乎那些远远优越于乡村集市上的美酒和低劣的雪茄烟以及约翰·施特劳斯亲自作曲并指挥的优美的华尔兹的东西。

深入一些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对奥地利在宗教宽容的传播工作中所做的努力给予充分地肯定和赞扬。基督教运动结束之后，新教徒们将自己的大本营转移到了多瑙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的那块肥美的土地上，不过这一切却因为鲁道夫二世坐上皇帝的宝座而彻底改变了。

鲁道夫完全就是德国版的西班牙菲利普，他根本不会给以异教徒们任何和解的机会。这位懒得出奇的帝王从小受到耶稣会的教育，他在位期间，帝国并未发生过于剧烈的运动。

不过，当费迪南德成为帝国统领的时候，表面的平静就被打破了。费迪南德凭着自己拥有好几个儿子的筹码坐上了皇帝的宝座，也难怪，他在哈普斯堡皇室中是唯一具备这种筹码的人。在他统治时期，他悠然自得的欣赏了天使报喜馆，它是在公元1291年被一群从拿撒勒到达尔马提亚的天使们搬迁到意大利中心的。这位宗教情感异常丰富的君王立誓要将自己的国家建设成为十足的天主教国家。

说到做到。他在公元1629年的时候昭告天下，天主教成为奥地

利、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唯一指定的官方宗教和信仰。

就在这个时候，匈牙利加入到了与这个奇特的家族联姻的阵营中，随着每个新妻子而来的还有大片的位于欧洲的地产。费迪南德在驱逐新教徒的运动中出了很大的力气，他不想这些新教徒混在马扎尔人集中的地区。可是，直到公元18世纪的后期，匈牙利的新教徒还能够保持独立，这都是因为得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唯一神教派以及土耳其异教徒的大力支持。不过，这个时候的奥地利在内部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哈普斯堡皇室原本是教廷最忠实的追随者，但是，教皇的干预和专横实在是让他们吃不消了，虽然他们思想迟钝，却也萌发了暴动的情绪，他们想制定一项与罗马背道而驰的政策。

在前面的几个章节里，我已经清楚地阐释了中世纪的很多天主教徒都完全不赞同教会体制，认为它们是荒谬的。有些评论家认为，由于主管教会的长老和主教们是由教区居民民主选举的，所以体现了民主思想，是那个时代真正的民主机构。那些教会的掌权者真心实意地追随着那个以圣徒彼得的继承人身份自居的罗马主教，这样，他们也能在教会委员会里得到些许好处。不过，另一方面，他们却否认教皇高于其他主教的地位，在他们看来，教皇的权力应该只能是名誉方面的，不应该真正的干涉别人的势力范围。

这种思想显然触犯了教皇的利益，于是，各种训示、诋毁以及驱逐出教会的惩罚措施纷纷上阵抵制那种邪说，当然，免不了又有几个冲锋陷阵的人成为试刀鬼。

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被搁浅着。直到公元18世纪中叶，当财富和权力并重的特利尔主教的代理主教出现的时候，才再次得到了复活的机会。这个人原名叫作约翰·冯·霍恩泰姆，不过他的拉丁文笔名弗布罗纽斯则更为人们所熟知。霍恩泰姆深受自由思想的熏陶，曾经接受

过卢万大学的教育，之后，他又离开家人去了莱顿大学学习。他到达莱顿的时候，正赶上加尔文主义的阵营里被怀疑有自由派入侵。这种怀疑被公开曝晒在太阳底下是由于法律部成员杰勒德教授踏进神学界并发表了赞扬宗教宽容的演说。

事实上，霍恩泰姆的那一套推理方法是具有创新性的。

他说："上帝是万能的，他有能力制定出适合于人们的科学规律，并且这些规律适用于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况。因此，上帝是有能力指导人们的思想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让人们在宗教问题上达成一致。不过，上帝似乎并没有那么做，既然连上帝都这样，那我们就不应该违背他的意思，而迫使别人认可自己的说法，甚至是付诸武力。"

霍恩泰姆是不是受到了伊拉斯谟的影响呢？关于这个话题实在是难以说清楚。不过，伊拉斯谟唯理主义思想的影子我们是可以在霍恩泰姆的作品中看到的。此外，他还明确地阐释了自己对主教权限和分散罗马教皇权限的看法。

果不其然，罗马教廷没有放过他，他的著作遭到了猛烈地攻击，这是发生在公元1764年的事。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坚定地支持他，这个人就是玛利亚·特雷萨，这是因为他们利益相同。这场由他发起的运动被冠之以费布罗尼主义或主教统治主义。奥地利成为这场运动发展壮大的地方，最后《宽容专利权》问世了。公元1781年10月13日玛利亚·特雷萨的儿子约瑟夫二世郑重地将这本具有实用价值的著作推荐给了自己的臣民。

约瑟夫的母亲与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是不共戴天的仇敌，但是，约瑟夫恰恰就是再版的弗雷德里克，不得不承认，这个天才有着惊人的能力，他能够审时度势，在错误的时刻做出正确的事情来。接下来的两百年，新教徒成了人们哄骗孩子入睡的制胜法宝，孩子们不想被

恐怖的新教徒带走，就得乖乖睡觉。在孩子们心里，新教徒是长着角和黑色尾巴的怪物，他们绝不可能将新教徒当作自己的亲人。当然，约瑟夫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在这个可怜、诚实、努力却又容易犯错的人身边有那些拿着高收入的红衣主教以及伯父母和表兄弟们，所以，他能够在关键时刻公开宣布要用宽容来治理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他能表现出如此可嘉的勇气，实在是令人惊叹。因为那个时候，天主教还占有统治地位。

其实这些比起他在三个月以后做的那些事并不算什么。公元1782年2月2日，他颁布了一条惠及犹太人的法律，使犹太人享受到了只有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才有资格享受到的广泛的自由，从此，这些犹太人终于可以抬起头自由的呼吸基督教邻居们呼吸的空气了。

写到这里，应该就结束了吧。至少读者们心中会有美好的愿望，相信好事情还在持续，那些可以按照自己的内心自由行走的人在奥地利找到了人间天堂。

我也希望这一切都是真的。

不过，很显然，帝国的统治者们与平民们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思想差距。从古至今，奥地利的农民们一直被灌输着犹太人是他们最大的敌人、新教徒等于背叛者这样的观念，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不可能因为约瑟夫的一道法律就会彻底改观的。

虽然著名的《宽容法令》已经闪耀了一个半世纪的光辉了，但是，除了天主教会以外的其他人民依然只拥有公元16世纪一样的地位。从理论上讲，犹太人或者新教徒们已经拥有了当首相或军队长官的平等权利，但事实上，他们却不配与皇帝的擦鞋匠共进晚餐。

很明显，这仅仅只是一纸空文而已，那就先讲到这里吧。

第二十九章　汤姆·佩恩

那些对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历史有颇多研究的人很清楚那首流传在某个地方的歌曲是真实的，它的歌词大意是：上帝秘密地注视着这个世界，它在创造着奇迹。

公元17世纪的上半期，在美洲大陆的北部有一群对《旧约》狂热追求的崇拜者，许多不知道真相的游客往往会以为他们是摩西的信徒，而不是基督的追随者。

这些开拓者在广阔无边、波涛澎湃的大西洋彼岸，与欧洲国家隔洋相望，美洲大陆成了他们阴森、专横的精神统治的疆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对马瑟家族的大规模搜捕以及残酷的迫害中看到，并且这次迫害行动达到了这种精神统治的极限。

我们实在没有办法说这些绅士们对宽容精神做出了什么贡献，但是，当英国和以前的殖民地之间还没有过多冲突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美国宪法》还有其他一些文件中看到这种宽容倾向。事实是，自由思想在公元17世纪恐怖的高压政策下做出了激烈的反抗。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放弃使用邪恶的地方和邪恶的城市这样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而是改用索奇尼的著作。不过，这些人的首领们都是能力强、善谋略的人，他们是新思想的追随者，并且用羊皮纸记录着自己的宽容思想，继而，试图在上面构建独立民族的大厦。

如果，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统一而坚定的国家，那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并且也很难说会取得胜利。不过，把移民区建立在美洲北部从来都是极其麻烦的事。这个地方有来自瑞士的路德派，有法国的胡格诺教徒，有荷兰的阿明尼乌教徒，还有虎视眈眈的英国宗派，他们谁都想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那块蛮夷之地上筑起自己的安乐窝。

这样的情况可能对宗教的发展是有好处的，有利于不同教派间的平衡。在移民区里面，各个宗派移民成员都被强制接受了一种原始和初级的忍耐和相互制衡。如果不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一定会打得血肉模糊、不可开交。

这种进步的情况损害了那些企图坐收渔利的绅士的利益，多少阻碍了他们的财路，他们显然是很不高兴的。即使新的慈爱精神已经出现了很多年了，他们依然固守着旧的正直理想，并为之奋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并不是没有收获，至少他们使年轻人背离了那个从野蛮的印第安邻居的仁慈概念中借来的一种信念。

非常幸运，我们国家发生的这场为自由而战的斗争，只有极少数勇气可嘉的反对者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在思想传播的过程中，一只仅重八十吨的双桅帆船就可以承载使整个世界瘫痪的新观点。公元18世纪的美国人民有源源不断的书籍可以阅读，他们只是缺少雕塑和大钢琴而已。这个世界正在经受巨变和前所未有的考验，关于这一点，十三个移民区中的开明人士已经预见到了，当然，每个星期天的布道会中是不会宣布这些的。在那个时代，他们将书贩子奉为先知。从表面上看，他们仍然依附于现存的教士，并且似乎也看不出生活有什么变化，不过，他们会在最恰当的时候亮出自己特兰西瓦尼亚老王储虔诚信徒的身份。那个老王储怀揣着上帝赋予的做三件事的权力，对唯一神论者手下留情了，那三件事是这样的：“能够有能力创造出世界上没有的东西，能够预知未来，可以支配人的良心。”

勇气可嘉的爱国人士总是会在最需要的时候，把自己的思想写在文件里，并且将它公之于世，让大众舆论这个最高法庭来审视它，继而成为能够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纲领性文件。

善良的弗吉尼亚的公民每天细心倾听的那些演说其实是从他们的敌人自由思想家口中发出的，假如他们知道真相的话，一定大惊失色。可是，那个伟大的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是一个很有主见和想法的人，他说要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宗教，而杜绝使用暴力，他也说过人们有权利自由地支配宗教，他说的这些话，其实就出现在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中。

有一些邪门歪道的说法到处散播开来，有一种说法是："在美国政府部门任职是不需要以宗教信仰作为条件的"，还有一种说法是："宗教的建立或者运动不受国会及法律操控"，对于这些做法，美国的反叛者们是支持的。

因此，世界上第一个宗教和政治分离的国家诞生了，那就是美国。这个国家第一次竖起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大旗，候选人们可以直接绕过主日毕业证而顺利受命各种公职。

不过这就跟奥地利的情况一样，平民和领袖之间的差距太过遥远，领袖们稍微领先一步，百姓们就迷茫了。在许多地州，那些不信仰主导宗教的百姓们被压制的抬不起头来，并且在纽约、波士顿和费城这些地方，有异端邪说的人依然受到人们的歧视，就像他们没有读过《宪法》一样，没有容身之地。这些灾难很快在汤姆·佩恩身上应验了。

作为美国独立战争中的宣传员，汤姆·佩恩在美国历史上享负盛名，他为国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汤姆·佩恩原本是个水手，身上流淌着英国人的血液，不过骨子里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叛逆者。

在四十岁的时候，他开始到各个移民区去访问。他在伦敦的时候，幸会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先生给他提出向西前行的建议，他接受了。公元1774年，他踏上了费城的土地，以本杰明的介绍信为纽带成功地协助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杂志，而理查德·贝奇是富兰克林的女婿。

汤姆·佩恩是个经验老到的业余政客，没过多久，他就清醒地发现自己的处境了，此时他站在了考验灵魂的暴风雨中。还好他是个聪明绝顶的家伙，他收集了美国人民发泄愤恨的那些杂乱的资料，并把他们汇编成了一个小册子，用和蔼的语气作了描述，以“常识”的方式向美国人灌输正义事业的理念，让人们衷心地支持美国的正义事业。

这本薄薄的书籍很快就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上传播开来，很多人通过这本书籍第一次认识了“美国民族”，这个民族向自己的母国挑衅，是神圣职责的驱使。

独立战争结束后，佩恩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欧洲，当塞纳河两岸的天空被恐怖的阴霾笼罩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向英国人民揭露了统治当局的种种愚蠢行为。这些体面的绅士对海峡对岸发生的情况持怀疑的态度和不确信的眼光。

《对法国革命的反思》的作者埃得蒙德·伯克已经惊吓过度了。怒火高涨的佩恩立刻举起《人的权利》的长矛作为回击，这一举动在英国当局看来无异于背叛国家，他因此而获罪受审。

就在这个时候，他在那些法国崇拜者的大力支持下，进入了国会，这个对法文一窍不通的人，还是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人们的好意。他一直住在巴黎，直到罗伯斯庇尔开始怀疑他为止。就在他知道自己即将有牢狱之灾或者更大的灾难的时候，匆忙中，一本《理智时代》的书问世了，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在他即将入狱的时候发表的，后部分是在他坐牢的十个月中创作完成的。

在佩恩的心里，真正的宗教就是人性的宗教，无神论和盲目信仰者是它最大的敌人。可是，他的这个观念却遭到了人们无情的抨击。公元1802年再次回到美国的佩恩，受尽了人们的唾弃和辱骂，并且被强行扣上了“肮脏卑劣的无神论者”的帽子，这顶帽子使他臭名昭著，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后的一个多世纪才渐渐被人们淡忘。

不过，佩恩并没有遭受到残酷的迫害，这是事实。他没有上过火刑柱，也免于分尸的惨痛，只不过遭到了人们的唾弃，如果他有胆量出门，就会被那些经大人们怂恿的小孩吐口水，直到他死去人们都不愿意提起他。他将自己心中的不满与愤恨全部书写在反对独立战争中的一些英雄人物的小册子上。

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开始，却没能得到好的结局。

不过，这种事情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太常见了。

公众的不宽容得到了一通发泄之后，接下来就轮到个人的不宽容了。

官方设立的死刑已经终结，私刑中的死刑又悄然而生。

第三十章　最后的百年

二十多年前的人们似乎都认为“不宽容”就等同于“宗教不宽容”，如果看到历史学家写的“有一个为宽容而战斗的战士”，人们头脑中立刻会想到这个人是一个坚决反对教会黑暗统治的人，用尽一生的力量在与宗教专制做斗争。这样看来，如果我在二十年前写这本书，那肯定要容易得多。

之后，世界被硝烟弥漫的战场所笼罩，很多变化自然而然的产生了。

那些带着严苛的不宽容的统治出现了几十种。对人类残酷的迫害形式更是五花八门，上百种的压制在人们头上。

宗教专制的恐怖阴霾才刚刚散去，更加残忍痛苦的社会弊病又开始滋生，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不宽容现象狰狞着向人们扑过来，十年前的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些不宽容现象的存在。

很多人一直在自己的梦境之中生活到生命的终结，在他们看来，时代的发展就像时钟一样，自动向前转动着，只要他们同意，钟表里面就有一个永动机，可以不停地支付能量，这种想法未免太荒谬了。

人类天性中流露出来的可怕的固执，让他们无所适从，他们发出失望的叹息：“虚荣啊虚荣，这一切都是虚荣的幻想！”尽管每一代人都在挫折和失败中吃尽了苦头，但是却无视经验教训。

当希望的火焰一点点熄灭，直到完全消失，人们在绝望的深渊里无法自拔的时候，他们就加入到精神失败者的行列，因此这个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把自己交给那些宗教团体寻求精神安慰，将自己的重压转移到别人身上，然后，带着沮丧的语气告诉大家他是个失败者，从此退出社会。

这样的人是十足的懦夫，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我对他们是深恶痛绝的。

既然这样说了，又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呢，应该用什么办法呢？

老实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解决。

至少，我们无法从现在的世界里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法，这个世界上的人们总是想要立刻看到效果，他们希望用数学、医学公式或者国家法律这些手段迅速有力的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难题。不过，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我们也乐意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清楚，公元20世纪的到来不会使文明消失，希望就在前方。

我们往往被一些悲观的观点蒙蔽了双眼，诸如“人类一直就是那个样子”“人类永远都是那个样子”“世界不会改变”“四千年前的情况和现在的一样”等等，这些绝望消极的论点并不是事实的真相。

我们应该冷静地思考一下，将个人的情感因素置于一边，客观地评价两万年来的人类历史（我们多多少少掌握了一些这段历史的证据），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虽然前进的道路险阻重重，发展速度缓慢，甚至还经常被阻断，但一直都是向前行走的，我们都在经历从残酷野蛮到高尚完整的过程，就算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没有影响这个主线路，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

人类的生命力顽强到无法形容的地步，它远远地将神学抛在了后面，不久的将来，就可以超越工业主义。

它经历了霍乱、瘟疫、血腥残杀和严苛的清教徒法规，从这无尽的苦难中，它将寻找到对付侵害这一代人精神罪恶的方法。

历史小心翼翼地将自己的秘密展示给我们看，至此，我们已经学习了最伟大的一堂课。

人类有制作东西的能力，同样也有毁灭东西的能力，这首先表现在勇气上，然后是教育。

这似乎是一个很陈旧的话题了。人们在最后的这一个百年里受到了很多的教育，人们甚至看见“教育”这个词都会产生厌烦情绪。他们更向往以前的那个社会，那个时候的人们虽然不会读写，却可以充分利用多余的智力独立地思考和想象。

当然，我所说的“教育”其实是给孩子们的精神食粮，并不是单纯地把事实累加在一起的东西。要真正地了解现在，就必须对过去有一个宽容的认识，这就是我想表达的。

我努力地想在这本书中表达人们不宽容其实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已。

一群狼不能容忍与众不同的狼（不管是强大的还是弱小的），它们必将攻击不受欢迎的同伴。

吃人部落里的某个行为怪异的人如果胆敢惹怒大家共同的神灵，他在部落里就会无立锥之地，落后得到的将是被驱逐到荒郊野地的下场。

神圣的希腊共和国制定的规则和制度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有谁敢公然挑衅、提出质疑，这个国家是不可能容忍他的。一位善良的哲学家在这件不宽容的事件里，被判处喝下一杯毒酒。

古罗马一直将从罗慕拉斯时期就流传下来的一些法律视为神圣不

可侵犯的信念，假如帝国能够允许那些心无杂念的征服者任意去动摇这些信念，或许它只能是一个短命王国了。能怎么办呢？尽管有些行为与它所提倡的统治自由政策不相符合，它还是不得不做不宽容的事。

作为这个古老国家的精神统治者，教会因为温顺的臣民的绝对服从而存在着，它不得不实施残酷的压迫和专横的统治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所以，在残暴的土耳其人与仁慈的基督教面前，人们往往更愿意选择前者。

与宗教专制英勇作战的斗士们，总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和险阻。当他们做出对其他所有的精神运动和科学实验不宽容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只是为了让自己生存下去。没得选择，他们不得不高举着“改革”的大旗堂而皇之地走上了敌人刚刚走过的道路，尽管敌人正是走上了这条错误的道路才导致毁灭的。

年年岁岁，时间飞快地流逝，生命的历程由无比荣耀变成了阴森恐怖。这都是因为直到现在人们还活在惊恐之中。

之所以出现不宽容，都是因为恐惧的存在，这一点我要再次申明。

不管残酷和杀戮是用何种方法和形式，罪魁祸首都是恐惧。搭建断头台和向火葬堆扔木柴的人们的极度痛苦表情就是对它最好的演示。

了解清楚了这一点，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事实上，当这个世界上的空气中还未出现恐惧的成分的时候，人们还是充满正直和正义感的。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两种美德，人们真的很少有机会去实践。

但是，我并不为在我有生之年无法看到这两种美德的实现而感到惋惜。这是人类在前进中必须要走的路，人类如此年轻，如何能够要求这个年轻的团队要获得依靠年龄和经验才能累积出来的美德呢？毕竟这些哺乳动物是在几千年前才开始独立生活的啊，显然，是不能够苛求他们具备这种美德的，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要求。

并且，我们的思维会因为这个而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它扰乱我们平静的耐心，使愤怒的情绪不断滋长。

我们原本应该有的怜悯之心也被它破坏，迫使我们说出尖酸刻薄的话。

当我写着这本书的最后几章，内心经常会出现去当悲观主义的预言家的诱惑，我多想去做一个业余的说教者啊！

但是，我及时的抵挡住了这种诱惑，这短暂的生命如何能够承受如此冗长的布道生涯呢？

假如用一百字表达不清楚的东西，就不要说了吧。

我们的历史学家会因为一个重大的错误而心怀内疚。他们经常将史前历史挂在嘴边夸夸其谈，将希腊和罗马的全盛时代讲给每一个人听，信口开河地编造出一段想象中的黑暗时期来，热情的高歌比过去繁荣昌盛十倍的现代生活。

如果人类发展中的某些情况与这些博学多才的人心中的理想画面不相符合的话，他们则会低眉顺眼的表示抱歉，并且嘀嘀咕咕地说着这种不理想的状况是过去不文明时期的残存，这虽然有些遗憾，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它会在恰当的时候全部消失不见，就像火车替代了公共马车一样。

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听起来就像美妙的音乐，可是却不是真的。它

可以暂时蒙蔽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自以为是在迷雾里找不着出路，还美滋滋地以为自己就是这个时代的继承人。事实的真相是，我们只是一群现代版的古代山洞穴居人，就像一群来自于新石器时代的人突然叼起了香烟、开起了福特汽车一样，即使乘坐着公寓大厦的电梯也跟个穴居人似的，假如我们能够清楚这些，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的精神健康。

那个时候，我们就能看见隐藏在密林深处的那一缕曙光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更加靠近我们的目标。

在恐怖横行的世界里，任何全盛时代、现代、发展的话题都只能是空谈而已。

既然不宽容已经成为人们自我保护规则中的必要成分，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要求宽容呢？

可能再过一万年、十万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当我们把杀戮无辜的俘虏、烧死寡妇、疯狂崇拜一张纸条这样的举动看作荒谬绝伦的事情的时候，就可以看见宽容统治的天下了。

这一天的到来，虽然太过遥远，但终将会到来的，当人类在征服自身恐惧的战役中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这一天就到来了。

康涅狄格州西港（1925年7月19日）

后记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的世界

出版商给我写了一封信，对我说："公元1925年出版的《宽容》离现在已经很遥远了，我们想以大众化的价格，重新搞一个普及性强的永久版本。"假如他们要对原作重新安排，我可能不愿意再写最后一个章节了。不过，我可以竭尽全力地去解释，在这十几年的时间里，宽容的理想为什么会没有得到实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为什么仍然充满了仇恨、残酷和偏激？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关于这个原因，就算我是知道的，我可以讲给大家听吗？

我想说的是，把漂亮的宽容女神剖白在大家面前，虽然不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情，但出于责任，我想我一定会这样做的。

我在这里遇到的难题是，我不知道怎么与十五年前写的那本书做一个告别，我不清楚该从哪一页开始写后记。

出版商给我的意见是，可以删去最后那一章，因为它以无限的憧憬和希望来结尾了，或许出版商是对的，我不应该这样乐观。可能《英雄》中的葬礼行进曲比起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中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适合用来做结尾。

但是，我仔细的思考了一番，认为这并不能解决问题。

跟出版商一样，其实我是个对前景悲观的人。可是为了能够让后代们了解我们在公元1925年情绪高涨的憧憬了幸福和希望，而在公元1940年的时候，这些梦想全都又破灭了，这些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想让后代们了解内幕，毕竟这本书还要在这个世界上存在很多年。

经过多次写信协商，我终于成功地说服了出版商，以下就是我写给出版商的《宽容》的最后也是最新的一个章节，是作为本书的补充说明。

最近的这七年汇集了人类所有的罪恶和弊端，就像巫婆的杂锅汤，各种有毒物质在里面交汇混杂，我们这些人迟早是要被毒死的，除非我们能够制造一种灵验的解药。在这个令人作呕的大锅里，我细致地将它的成分进行了分析，同时还观察了那些主要的负责人。这个臭气熏天的大杂锅正在以最快的速度侵占我们的世界。当我们看到卑贱的厨房奴仆被很多人追捧，真是觉得不可思议，不只是我这样想，那些在少数几个民主国家生活的人也是这样想的。这个肮脏的大杂锅让那些奴仆们觉得异常兴奋，他们的职责就是把这些毒液灌进毫无防备的无辜观众的喉咙里面。虽然这些旁观者并不喜欢这锅污秽的东西，他们更愿意喝祖先留下来的慈善和宽容的汤汁，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为了活命，我们必须违心地对那个污秽的东西表示喜欢，并且把它吃掉。我非常想知道这些事情发生的原因，并且通过我的努力观察和思考，已经找到了答案，下面就让我来说给你听吧。

如果想要彻底搞明白这个问题的原因，大家不妨效仿一下以前住在纽约阿尔巴州的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先生。这位精明能干又受人尊敬的政治家现在在帝国大厦里面居住。我们还是来看一下记录吧。

在此之前，我要提一个看似离题但实际上与我们寻找的答案密切相关的问题。你是否饲养过狗和猫或者其他的小动物呢？你有没有仔细地观察过这些渺小的动物是如何看待饲养它的家庭和主人家的花园

和后院呢？你可能也发现了，这些不能开口说话的动物无一例外都非常重视它们自以为的“特权和权力”，这可能是出于天性、本能或者训练，也可能是三种都是。主人家的孩子可以随意地拉扯自己家养的警犬，甚至它不会介意被扯下一撮毛。但是，假如是邻居家的小孩，那就不可能了，不管这个孩子多么的友善，那条狗依然会在那个孩子刚走进“它”家的草地时，毫不客气的冲过去并发出吓人的狂吠。就连德国种的小型猎狗也胆敢扑向侵犯它自己领土的邻居家的北欧大猎狗。尽管它十分清楚，那只凶狠的大猎狗完全有将自己撕裂的能力，但它还是这样做了，为了捍卫“自己的领土”。一向只图安逸的懒猫也丝毫不能容忍另一只猫踏进自己的炉子边。

专门猎捕大型动物的猎人非常熟悉这些野兽们的生活习性。通过他们，我们了解到野兽具有群居特性，他们的部落不允许任何外来动物的加入，就算新加入者强大的足以增加它们整个部落的战斗力和整体实力，它们也不会接受它。我还从那些自以为能够明白沉默的鱼的心理的人那里得知，在这些冷血动物族群里同样存在这样的潜规则，外来的鱼休想加入到在河流岩石中居住的鱼群部落里来。

关于动物学，我是一窍不通的，不过，我从中学到了一些人类学的知识，这使我在研究一定时期（就是在这段时期里，人类将自己的言行记录了下来）的人类行为时有了新的发现。一直以来都有群居特性的人类，只有在志同道合的团体里才会觉得幸福，因为这个集体里的成员跟自己有着相似的爱好、信仰、偏见、恐惧和希望，等等。

还有一种情况也不能排除，那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出于经济利益关系，某些人群或者是敌对的群体会按照政治方式行事。不过，这种情况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很多人能够不顾艰难险阻而坚定地走到一起，其实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共同的信仰和偏见，有一样的爱好和恐惧，连希望和理想都是相同的，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我们可以从乔普斯和哈姆拉比以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那些记录

中看到，不管哪一个时代，在什么地方，情况都惊人的相似。每个团体、部落、家庭都与自己的邻居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大家都自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优于别人，跟别人没有共同语言及共同行为的需要。

下面，我举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例子。

世界各地的人们在最初的时候是怎么称呼自己的呢？他们称自己是“上帝的人”或者是“上帝的特选子民”，还有一种更荒谬的说法——“属于上帝的人”。别人把埃及人看作卑微的农民，他们以“上帝的人”自居。犹太人也认为自己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现在我们知道的芬兰，那个时候叫作“苏密”，它的意思是“上帝的人”。我们熟知的太平洋上的部落之一塔希提岛人也把自己当作“上帝的人”。距离西亚、北非和北欧上万里的波利尼西亚人民与前者毫无共同之处，除了有排他性和优越感。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种族才是有价值的人，其他任何的人类都是卑贱低劣的，他们不愿意与那些低贱的人为伍。

一眼看过去，希腊似乎不在这个可怕的规律之中。不过，他们高傲的以海伦的直系后代自居，并自以为是神明的儿子，那场大洪水过后，他们是唯一存活的人，这样看来他们对本族相当的尊重。可是，从他们对希腊以外的民族的轻蔑态度，又可以看出他们对其他民族的歧视。连同那些在各方面都非常卓越并且心怀宽容的科学家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眼里，所有的非希腊人都是野蛮低等的人。由此可以看出，他们跟那些居住在澳大利亚的不识数的野蛮人是一个层次的。假如那些欧洲的旅游者问他们是什么人这样的问题，他们会觉得无比的愚蠢和可笑，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上帝的人”，这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还要问呢？

不过，这种粗鲁无礼的傲慢形式却无法束缚罗马人。当然，这并不代表罗马人看轻了自己，只是在他们看来，他们本来就是光辉亮丽的人类，他们的优越性任何人都可以看见，过多的说明和解释简直就是浪费口舌，就跟现在的英国人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是优秀的种族，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们是罗马人，这就足够让他们感到满足了。因此，他们并不过度的在乎这些事情。

在纯种族的概念上，许多部落和民族都以为只有自己才是唯一真正的人，对于这个话题，我就先谈到这里吧。不过，我发现了一个微妙的细节，无论大小的部落和集团都一律居住在自己建造的制度森严的堡垒里，用偏见和固执谨慎地堤防着外界的入侵。这可能跟人们具备的那些优越感和排他性有关，还有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同样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美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已经存在了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当然了，清教徒的那些狭隘的行为实在是不值得一提，更不值得夸赞，不过，最恐怖的极端行为毕竟没有降临到我们头上。现在，国家迅速的发展了，偏远地区也逐渐地被开发了，可是我们却有些跟不上发展的步伐，这个世界上那些古老民族的错误观念依然被我们继承了。那些种族部落依然各自为政，大肆宣扬自己的禁忌，把《人权宣言》践踏在脚底下。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生活的周围随处可见。虽然《宪法》有出版自由方面的规定，但是，宗教团体却无视这个，依然强制命令自己的成员只能按照自己的规定去阅读和思考，甚至藐视代表人民的代表们制定的法律，悠然自得的自己制定新的法律。如果我们愿意的话，随时可以看到狭隘精神的膨胀和种族歧视的快速发展。这种黑暗时代的残余一直延续到公元1914年战争爆发。

我们对形势估算得太过乐观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近六年的时间里，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到处横行肆虐，原本充满希望的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他们有理由相信，这跟中世纪的情况一模一样。

这个发现的确不能令人感到愉悦，不过，我们可以用那个对哲学感兴趣的法国将军的预言来安慰自己：“用不着对不快乐的生气，这些事情根本不存在，所以也无法被改变。”那么就让我们拿出勇气来

面对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发展吧，我们要对它进行归纳总结，并且找出解决的办法来。

从广义来说，宽容确实是个奢华的物品，只有智慧非凡的人才能拥有它。这些人能够从思想上摆脱顽固派的狭隘和偏激，他们能够看到更广阔的未来。他们对我们提出了如这本书中最前面部分提到了旧相识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似的疑问：我们抬起头看见的是同一片天空的星星，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旅伴，我们头顶着同一个天空，通往生存真理的道理只有一条而已，我们都要去走一走，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相互敌视呢？我们大着胆子，把一个古时候的异教分子充满理性和智慧的话语拿过来作为引证，那么那些坚持相信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途径可以拯救人类的团伙头目就会高声叫嚣起来，并且不宽容地向我们丢木棒和石块。谁要是不按照他们既定的那条羊肠小道行走，就会受到地狱之苦。他们往往采取高压手段进行残酷的迫害行为，力图将那些有鼓动性的怀疑扼杀干净，防止更多的人受到影响，阻止别人去尝试“唯一权威性的地图”上没有指示的道路。

昆塔斯·奥里利厄斯·希马丘斯是公元4世纪的人。从此以后，思想高尚的人对待精神和种族中立态度，只是采取偶尔加大音量的方法了。有时候，他们会成功的组织一个属于自己的团伙，允许人们在内部自由的思考和交流，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真理，当然，这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而且，这样的宽容只能是上层领导来决定和安排，几乎没有来自下层人们的宽容。这种来自上层的干涉常常让人们觉得厌恶，他们总是运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观念强加在别人身上，如果人们执意抵抗，他们就会动刀动枪强制人们“入会”，这个时候通常需要警察出面来防止流血事件的发生。

一群真正的哲学家缔造了美国这个国家，他们不受十三个移民区早期历史的狂热宗教主义束缚，并且拥有非常丰富的实际经验，对此，美国人应该感到庆幸不已，并心怀感恩。当这代人从地球上消失的时候，这片承载着他们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梦想的土地上涌进了成

千上百万的欧洲饥民，随之而来的是用之不尽的劳动力还有先入为主的偏见。这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从来只信任自己而已，对于别人的任何意见他们都不可能听得进去。

那个时候，我们被美好的前景冲昏了头，另外还忙于勘测大陆的各种资源，所以胡乱的以为这个大熔炉可以解决一切困难。不过，不是任何物体都能够随意地被融化掉的，尤其是人的灵魂，是异常顽强的东西，这个熔化过程会非常缓慢和复杂，并且，中途还要有专人照看和管理。人的思想和灵魂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用枪支弹药以及集中营武装的世界，“不宽容”在这里到处横行，比起中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知道，中世纪对付异端的手段只是地牢和火刑柱而已。

那么，我们究竟能够做些什么呢？在前面几个章节中，我已经明确地表示过了，那些对悲伤的事情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的做法，我一点也不信赖。所以，我不得不悲观地认为：我们并没有对眼下糟糕的事态做出一些有建设性的决策，至少当下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要一边适应新的情况，一边对未来做出计划，我们不能临时抱佛脚，把自己弄得措手不及，假如这个苦难的六年再重复一次，那我们的文明火光就要彻底熄灭了。

公元1914年到1918年之间爆发了一场飓风般猛烈的战争。绝大部分的人类组织都被摧毁了，贫穷困苦夺取了无数人的生命，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是无法在短时期内挽回的。当然，也有一些人经历了这次暴风雨般的战争灾难依然毫发无损，他们兴高采烈地建设自己的房子，至于别人的房子是不是变成了一堆烂泥，他们丝毫不关心。那些遭受严重打击的废弃的小巷子里面完全看不见任何正常的人类活动了。还有一些奇怪的人从阴暗的地窖里面爬出来，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散布着自己的学说。谁都别指望这些山野居民能够创造出什么理智健康的哲学。

很显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很多年了，既然已经这样，我们不妨用理智的思维来审视它。被战争洗劫一空的世界迫切地需要补充新鲜空气、阳光和美好的食物，结果，只是得到了饥饿和绝望而已。这为有害学说的滋生提供了良好的温床，就像在公元3世纪和4世纪小亚细亚颓败城市的街角旮旯里面发展起来的一样。

最后，那些预言能够得到拯救的人也抵挡不了饥饿的攻击，他们向我们相对平静的山村逃窜，这真是让我们措手不及啊。跟公元17世纪的亚历山大人如出一辙，那个时候，那些宣扬宽容精神的哲学家们就是这样猝不及防的死在了突然冲杀出来的沙漠暴徒的手中。暴徒们觉得哲学家宣扬的思想简直是对他们的侮辱。

的确如此，我们带着跟过去一样的惊讶和哀伤的眼神。现在的我们已经无法对抗这场席卷全球的偏激和死士精神的瘟疫了。不过，我们得有勇气承认它们的存在，这些瘟疫本来就是古老人类的性格体现，其实它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出于休眠状态，一旦时机成熟，它就疯狂地跳出来，将压抑已久的能量全部爆发出来，势必夺取最终的胜利。

就是这样的一幅恐怖的图画！我们应该为自己和宽广的大西洋祝福！毕竟在这场血腥的种族和宗教战役中，我们是平安的。可是我们不能使自己松懈下来，要随时提高警惕，防止病毒上岸侵蚀我们。

刚刚，我在问我自己：“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依我看，我们就保持头脑冷静吧，并且做好一切准备工作。此外，我们真的无法做出什么，就算说破了嘴也不见得会有效果。也不要萌发思想和感情上的冲动，自以为是的想着自己的优越性，这只会让毁灭来得更快。我们的同情之心和长期的忍耐在民主的敌人看来，只不过是懦弱的表现，它们会乘虚而入。以后我们可以在集中营里顿悟，我们重新走了一遍欧洲中部国家走过的道路，大家都是这样被毁灭掉的，他们苦口婆心地对着敌人说宽容精神，就像对着白蚁说“大家都有不可分割的权

力”，不过，白蚁们关心的是如何摧毁我们脚下的基石。

对当前的时局采取措施，进行反击，已经来不及了。遗憾的是，正是我们自己鼓励了敌人的进攻。我们一路保驾护航，看着他们从弱小成长到强大，直到有一天，他们抡起拳头砸过来，将我们禁闭起来，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才意识到来不及了。不过，还有一些人潜藏在这个世界里，他们养精蓄锐，等待时机，期盼着重新开工，并且他们把这个事业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绝对要履行。

假如人们认为这是失败者的表现，是怯战的人提出的可笑想法，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是不容辩驳的，或许，我们曾经因为麻痹大意以及一时的勇气缺失而导致领土的丧失，不过，我们选择暂时的撤离，并不表示永远的退让，只是因为我们要为下一次战斗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这样一来，我们得到了在宽容问题上进行实际锻炼的机会。我们必须得打起精神来，摒弃那种“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这里”的消极想法。因为，这样的事完全有可能会发生，更可怕的是已经发生了，而且还有很多。当我们有勇气像一支真正的、纪律严明的军队那样接受一场战争洗礼的时候，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我们将要进行的是一场伟大的战役，我们在这场战役中将赢得永恒的理性和永久的自由。

朋友们，我要留几项任务给坚定的志愿者们。不得不提的是，即将面临的这场战斗，是异常艰辛的，不过，它将使担当它的人永垂不朽。能够在这场圣战中活下来的人们将受到最高的崇敬，他们是真正的慈善家，为人类解除了千百年来的偏见和自以为是的优越感的枷锁。当这种偏见和优越感与怀疑和恐惧联合起来，那么即使最温顺、最卑微的人也会在顷刻之间变成残暴无比的畜生，并且成为宽容精神最强有力的敌人。

1940年8月于康州老格林威治市